谨以此书献给：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无私奉献的人们

毛泽东及其无数先烈的在天之灵

中国千百年来倍受欺压的亿万农民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扉頁圖說明：

2005 年夏，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郝盛琦老人家啓程去北戴河時，送行人員將拙作《巨人的背影》（第一版）給郝老，當時郝老已經 81 歲高齡。他後來說：一本書他一般也就讀幾頁，但該書他連讀兩遍。隨後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该批語。本書第二版直接用帶郝老筆評的扉頁代替原有扉頁。

郝老從北戴河返京後即招作者進京。對作者這麼年輕就寫出這樣的一本歷史反思性的書感到意外（作者寫作此書時 37 歲，該書更早的雛形即著名八章網文《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寫成時，不到 33 歲）。郝老給予了作者極大的鼓勵，并贊譽道："這是社科院包括各專業的團隊才能完成的工作，讓你一個年輕人完成了"。後來郝老將該書送交胡錦濤和溫家寶，建議中央一字不改出版內部發行版。據聞，郝老是胡錦濤任總書記後拜訪的第一位退居二线的老人家。



2016 年 12 月，作者登門看望郝盛琦老人家。

巨人的背影

东生 题

——爲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

（第二版）

The Back View Of A Giant Man

——Defend Mao Zedong And Study Of China Nowadays

Version 2



董玉振博士 著

By *Dr Dong Yuzhen*

南洋出版社

ALL RIGHT RESERVED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盜印牟利者或販賣盜印書者必遭惡報，勿存僥幸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itle: The Back View Of A Giant Man——Defend Mao Zedong And Study Of China Nowadays
Author: Dr. Dong Yuzhen

巨人的背影

——爲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 (第二版)

作者: 董玉振博士

責任編輯：周 妍
出版發行：新加坡南洋出版社 South Ocean Publishing House
地　　址：37A Hong Kong Street, Unt 2191, Singapore 059676 Singapore
電　　話：0065-90210286
電子信箱：south_ocean2002@163.com
QQ：455829029，微信：gudongz
合作公衆號：南洋智庫
網　　址：nanyang.ws
出版日期：2003 年 4 月第一版（平装），2018 年 8 月第二版（精装）
國際書號 ISBN：978-981-11-5218-4

9 789811 152184 >

感謝新加坡李氏基金的贊助！

建议零售价：$46


为毛泽东平反
刻划巨人的背影
董玉振
集体主义
摧毁中国人价值观

2004 年 4 月 9 日，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與友誼書齋于吉隆坡的報社總部聯辦講座，邀請作者做“爲毛澤東辯護”的演講。4 月 11 日《南洋商報》在“名人專訪”欄目全版報道了作者及其成果。2006 年《南洋商報》再次邀請董玉振于總社發表演講，并給予大篇幅報道。該報一位高層領導評價道：董博士對改善中共形象的宣傳效果超過中國政府過去 20 多年的外宣成效。


董談
毛澤東功大於過
馬來西亚《光华日报》
董玉振教授为毛泽东辩护
郭家骅：加强文
毛泽东与中国崛起讲座
董玉振博士细述历史
影响中华民族复兴
董玉振为毛泽东辩护
董玉振：破舊立新
毛澤東功在中國
董玉振博士今日
开讲两场文化讲座
南洋商报 活动
董玉振博士受邀来晋
为市民呈献两场讲座会
友谊书斋特邀
董玉振主持3讲座


Who contributed more to China's economy? Deng Xiaoping or Mao Zedong?

自 2003 年以來，作者應邀于馬來西亞新山、吉隆坡、怡保、檳城、古晉、詩巫、馬六甲等地演講，備受關注。馬來西亞主要中文媒體如《星洲日報》《國際時報》《聯合日報》《光華日報》《詩華日報》《中國報》等都做了大量報道。


联合晚报　　　　2007年5月25日　星期五　33

特辑

世界书展 WORLD BOOK FAIR

2007年世界书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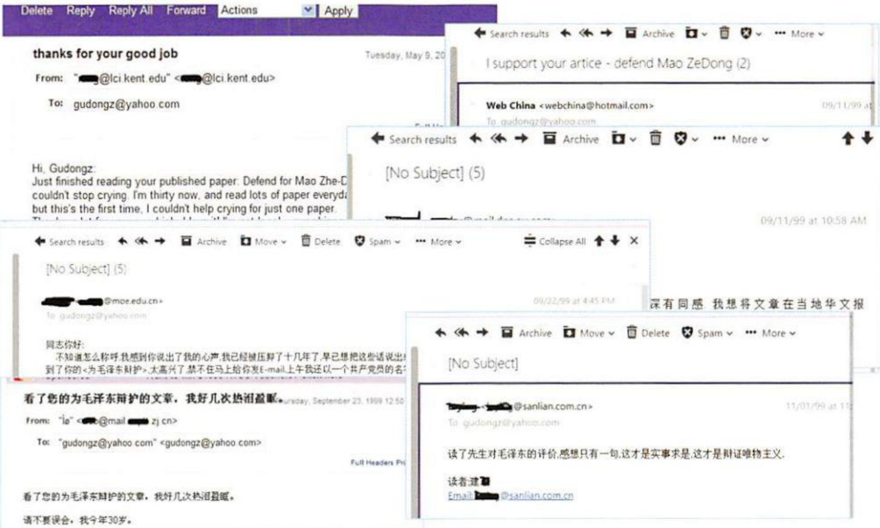
世界书展今天起 一连举行10天

地点：新达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

中国民族文字展 首次狮城展出

书展办多个讲座

2007 年新加坡舉辦的世界書展上，作者應邀作“毛澤東在中華民族復興中的地位”演講。作者因在直銷學領域的成就，還做了“如何分析直銷公司”的演講，成爲新加坡直銷史上唯一被公共機構邀請做直銷知識分享的學者。


Delete Reply Reply All Forward Actions Apply

thanks for your good job

From: "[redacted]@lci.kent.edu" <[redacted]@lci.kent.edu>

To: gudongz@yahoo.com

Hi, Gudongz:
Just finished reading your published paper: Defend for Mao Zhe-D
couldn't stop crying. I'm thirty now, and read lots of paper everyda
but this's the first time, I couldn't help crying for just one paper.

I support your article - defend Mao ZeDong (2)

Web China <webchina@hotmail.com>

[No Subject] (5)

09/11/99 at 10:58 AM

深有同感 我想将文章在当地华文报

[No Subject] (5)

[redacted]@moe.edu.cn>

同志你好:
不知道怎么称呼,我感到你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已经被压抑了十几年了,早已想把这些话说出
到了你的<为毛泽东辩护>,太高兴了,禁不住马上给你发E-mail,上午我还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

看了您的为毛泽东辩护的文章，我好几次热泪盈眶。

From: "lə" <[redacted]@mail[redacted]zj.cn>

To: "gudongz@yahoo.com" <gudongz@yahoo.com>

看了您的为毛泽东辩护的文章，我好几次热泪盈眶。

请不要误会，我今年30岁。

[No Subject]

[redacted]@sanlian.com.cn>

读了先生对毛泽东的评价,感想只有一句,这才是实事求是,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

读者:[redacted]
Email:[redacted]@sanlian.com.cn

該書原始雛形是 1998 年作者寫成的著名八章網文《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該文首先郵寄中央高層，并以打印件在朋友中傳閱。1999 年 9 月 9 日，作者將該文在海外網上刊出，瞬間引爆網絡，作者在該文上留下的郵箱也在幾天內收到上千電郵，對作者表示感謝，不少讀者表示“含泪讀完此文”。之後兩年不斷有讀者來信鼓勵，對作者于 2002 年着手完成此書第一版是重要鼓勵。



自 1999 年開始，作者爲創辦晶圓處理工廠而多次回國籌集資金。2001 年受邀參加由團中央和歐美同學會主辦的歸國創業研討活動，很榮幸得到李嵐清副總理接見。上圖第五排右五爲作者。



来自中国山东的董玉振是理工科出身，却对社科、文学等多方面有广泛兴趣，甚至为古老的珠算古籍做注释。

他曾为理想耗光积蓄，但在妻子的支持下，一直坚守着对事业与理想的追求。

理工科博士的人文坚持

张金宇（特约）/报道

受访者提供照片

工学博士的研究方法，往往让董玉振能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独辟蹊径。

为出书成立出版社

注释珠算古籍

妻子的理解与支持

左圖：2017 年 5 月 29 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就作者在文化傳播和學術方面的貢獻，對其做了人物報道。

下圖：2017 年初，作者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孟加拉國吉達港中國工業園戰略諮詢做現場調研途中，順道參訪達卡大學。





第一版 前 言

本書以全新的視角帶您重新認識毛澤東時代，及中國未來的出路。

要瞭解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不能不瞭解毛澤東。無論是客觀把握毛澤東領導下的歷史，或經濟、政治、軍事等全方位的遺產，還是探詢中國未來的出路，毛澤東始終令人無法回避。然而，今人是否真正瞭解毛澤東及其時代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五十多年。作爲新中國創建人的毛澤東至今受到各種議論、批評、甚至指責謾罵，當今日的中國面臨什麽困難時，人們還象八十年代那樣將毛澤東作爲代罪羊(如就業壓力在于毛澤東沒搞計劃生育等)。至于這些指責的合理性已沒有人深究了，因這些指責一般都不會遇到强有力的辯護；甚至中共中央也不會正式出面爲毛辯護，因擔心這可能導致外界對改革開放方向的誤解；他們同樣抱有其它的諸多顧慮。中共中央本身對毛澤東聲譽的損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中國的知識分子要麽因個人過去的遭遇而不能客觀看待毛澤東時代的全貌，要麽帶著文過飾非的心態，或因對毛澤東時代乃至整個中國國情的不够全面瞭解，而在維護毛澤東形象時捉襟見肘。而大多數人批判毛澤東的人則是人云亦云而不假思索。

今天，我們繼續享受著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豐富遺産，而我們很多人却對此視而不見，反而以不負責任的語調對毛澤東繼續進行攻擊和批判。他離開我們已二十多年了，這期間中國社會發展的風雨歷程，應能使今日的人們以更客觀的眼光看待毛澤東及其時代，但很遺

憾，對毛澤東無理的攻擊、批判甚至污辱至今廣泛存在，什麼"毛澤東時代的經濟乏善可陳"、"毛澤東不抓計劃生育導致今日人口負擔"、"'文革'十年中國一團糟""毛澤東搞獨裁"、"亂搞女人"等。而"博學多識"、理應負起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更是批判隊伍的中堅力量。每念及此，作者內心總感强烈刺痛，再也按捺不住積蓄多年要還毛澤東本來形象的衝動，挺身而出，爲毛澤東在天之靈，也爲自己和千百萬人的感受和尊嚴辯護，爲本來屬于中華民族的一份榮耀辯護；也爲了糾正已被扭曲二十多年的一段歷史。

對毛澤東時代進行全方位認識和反思，超越了個人的能力。但如果只集中于個別方面進行探討，那麽，反毛人士將會立即從其它方面對毛澤東進行攻擊。因此，筆者只好做此自不量力之事，在多個方面對毛澤東及其時代進行全面的再認識。筆者長期以來對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關注和思考，知識積累的廣種博收，以及個人的人生經歷，爲完成這本涉及廣泛領域的著作，作了長期而必要的知識準備，才不至于將一本漏洞百出的書放在讀者的面前。

爲辯護而辯護，或僅僅滿足于對過去的回顧，其意義是有限的。正確對待歷史的目的之一是爲了今日和將來。毛澤東時代作爲中國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代，有經驗的積累，也有含帶血泪的教訓。如果對經驗不予總結和繼承，將是中國的一大損失。但如果對教訓不予汲取，中國勢必白交了這筆學費。筆者對毛澤東時代的興趣，部分是因爲對當今中國問題的困惑，不得不從海外的横向和歷史的縱向中尋找綫索。面對中國泛濫的貪污腐化，中共高層和知識界總能找到推脱的藉口，但如果和毛澤東一代曾遭遇的困難比起來，當今中國的問題又算得了什麽呢？只能說明當今中共領導隊伍德能的欠缺。本書結合各主題進行反思的同時，聯繫當前的實際，和國家將要面對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一些見解，希望能爲廣大讀者，甚至中國决策階層

提供有益的參考。

“中國人靈歸何處？”、“中國女性站起來了！可站得更優美”等章節，則就當今中國人的心態、信仰重建等課題，進行了探討。當然，面對這些龐大的題目，本書很難做到完美無缺，如果能帶起讀者的興趣和思考，已超額完成了這些章節的使命。

毛澤東高大的背影，既確立了高不可攀的政治標尺，同時，也留下了斜長的倒影。本書無意也不可能全面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這實際上遠超一人，甚至一個時代之力。但本書如能啓動對毛澤東時代歷史研究，及中國復興命題探索的新思維，無疑將是筆者最大的滿足。

對于那些由于毛澤東領導的失誤而承受個人和家庭痛苦的政治運動受害者，筆者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完全理解他們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憤恨。但這本書的目標并非全面評價毛澤東，因此對他的過失談得很少，而且也無須多談，因這類話題已被談的太多了。

作者也希望該書能爲臺灣同胞和海外華人客觀瞭解毛澤東時代及當代大陸的發展提供些許參考。由于大陸在毛後時代極力否定毛澤東，使得港臺和海外讀者對毛澤東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希望本書將爲他們提供瞭解大陸和毛澤東時代全方位真相的參考。

本書中有幾章的部分內容最初寫作于 1998 年 9 月。但直到 1999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祭日，才將其以“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爲題目（筆名：古董）貼在網上。出乎意料的是，網友們的反應异常熱烈，并被轉貼到很多網站。不少網友來電郵，希望能將其成書出版，以便于學術參考。多位網友，包括解放軍軍官、大陸公務員、海外中國留學生，甚至聲稱含泪讀完幾章的內容，更令在下受寵若驚。直到四年後，還有網友來電郵，談他們閱讀該文的看法。筆者對網友們的鼓勵和抬舉非常地感謝，不敢以帶太多瑕疵之文

予以褻瀆，筆者怎敢以兩周寫就的拙作，貿然出版呢？該文自此存在計算機裏，幾被忘却。直到2002年中，筆者得空回顧過去幾年不平坦的人生歷程，如同夢中，更似天意；爲今日個人思想的成熟，上了最好的一堂實踐課。在感慨少立興邦之志，青年發奮攻讀，胸懷天下；讀書不下萬卷，行路不下萬里；而今却浪迹天涯，壯志難酬，不禁感觸良多。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成書，以爲社會留下些許的思考綫索，多少實現一些人生的價值，也算有些意義吧。網友們昔日的鼓勵再次喚醒筆者，該書的初稿才從計算機裏復活過來。伴隨近三個多月的晚霞和晨露，趕在2002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26周年前初步完成對這些龐大題目的探討。但由于多種原因，直到幾個月後2003年，該書才得以正式付印。

該書在寫作過程中，雖然不時在學術性和可讀性之間徘徊，但最終渴求能二者兼顧，結識更廣泛的讀者群。因此，在確保了嚴密的邏輯推理和事實引證的同時，避免煩瑣的數據和圖表；同時引入了散文的寫作手法，甚至難免嬉笑怒罵的成份；如果某些寫作手法令您不快，敬請諒解。見縫插針地插入100多幅毛澤東時代的宣傳畫等，可能圖不對題，希望能引領讀者進入時間隧道，感受那火紅的時代。對于港臺、海外讀者及大陸年輕一代來說，這些圖畫應是比較新鮮的。

這本書能一字不改地在中國大陸出版，是筆者的最大心願，雖然這一天還非常遙遠。這一天到來之日，也必將是中國全面復興之時。

筆者的電子信郵爲 gudongz@yahoo.com，可否勞駕傳來您的斧正建議或思考？毫無疑問，您的智慧和熱情，必將令筆者受益匪淺，也會爲本書的進一步完善提供助益。謝謝！

作者 2003年3月于新加坡

第二版 自 序

第二版終于面世了，自第一版售罄已經多年，這對期待該書的讀者，尤其是對于我本人，是一個漫長的等待。對第一版沒有涉及的大饑荒慘劇、廬山會議與彭德懷悲劇，以及“文革”起因的新發現，讓筆者即不忍以原有版本再印後提供給讀者，也不敢倉促出版第二版，在兼職確定不適合做這類複雜課題研究写作情况下，筆者2017年8月離開諮詢公司後得以全力以赴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才使得在毛澤東誕辰125周年來臨前終于出版了補充完善後的第二版。

拙作第一版2003年出版，適逢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由于該書與普世觀點的巨大差別，筆者有一份急切被認可的期待，也有份自信。在出版當年新加坡新傳媒電視第八波道即破天荒在毛澤東誕辰當天邀請筆者做了現場直播的專訪（讀者可以上 https://youtu.be/觀看搜“董玉振”），并于第二天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兀蘭分館和新加坡讀書發展總會的安排下舉辦了紀念毛澤東專場演講。這對于一向因毛澤東早期支持東南亞共産黨而比較敏感的南洋各國來說，有點突破性的意味，緊接著新加坡華族文化節，馬來西亞《南洋商報》等機構和媒體接連不斷的演講邀約和采訪報道，對筆者是莫大的鼓勵。

來自于中共體制內鼓勵，是筆者非常期待的。

筆者在2004年2月于中央文獻研究室得到李捷副主任（現《求是》社長）的接見。很榮幸得到李主任簽名贈書。

2005 年，原中顧委副秘書長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負責人郝

乏接觸第一手資料的機會，構成了新中國歷史研究的無奈和缺陷。

李主任的這段網傳表述不論真假，都道出了當今中共的一個無奈：毛澤東的形象已經觸底反彈，高層已經不太擔心毛澤東的形象進一步受損，反正毛澤東作爲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垃圾桶”已經有三十多年，再臭也臭不到哪裏去；而其他同時代領導人（其中有些成爲改革開放時期的核心領導層成員）的“頭蓋”如果被揭開，必然會帶來輿論的巨大波動，那些人們心目中還算不錯的領袖們的形象被毀，對中共中央來說，其後果的不確定性難以掌握。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中共的這種拖延術，但我同時堅信，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如筆者），通過非官方渠道來爲民衆逐漸撥開歷史的迷霧，撥亂反正，恢復毛澤東的本來形象。其他領導人的歷史責任，必然在未來被逐漸認知，因爲這是一部完整的共和國歷史不可或缺的內容。沒有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這些當時和後來主要領導人在毛澤東時代實際作爲的描述，那共和國的歷史只能留下一段空白任由他人去隨意發揮了。筆者也期望中共中央能對如拙作這樣的著作的民間流傳網開一面，給民衆逐步認識共和國開國元勛的真實歷史面貌創造一個逐漸開放的環境，或借助于民間力量來給民衆打“預防針”，或傳達中央不方便出面傳達的歷史真實。這也算是官民分工，各有側重，相互尊重，殊途同歸，渠道不同，目標一致。

歷史在某個時期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也必然由人民來書寫。

這類著作的寫作，會隨著越來越多資料的披露和局勢的改變而有些內容顯得過時，但對毛澤東時代的認識，同樣不能忽略站在十幾乃至二十年前的中國現實下進行觀察，不能因爲今日中國的一些問題得到解決或變得更好而忽略毛後時代中共曾經出現的問題。本著保留對歷史的思考軌迹，本書第二版出版時，對新增內容明確標

出，對第一版的內容除非發現較大的錯誤或問題，一般不做更動，反毛運動最猖獗的時代是改革開放至第四代領導集體上臺之前，尤其第二代領導人，帶著歷史積累的私怨和爲給改革開放找理由，极力否定毛澤東時代，因此，以改革開放首 20 年和毛澤東時代進行類比，是必要與合理的，因此，本書第二版繼續保留了 2000 年之前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相關數據與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的相關描述。

爲了讓讀者方便區分第二版新增內容，有些第二版注釋和參考文獻，直接在頁脚標明，而第一版的參考文獻還是保留原來模式列在書後，這次不做更動。

該書的出版，連同筆者 1998 年所寫的八章網絡熱文《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對恢復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歷史形象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彌補了筆者 1995 年博士畢業時報考國家公務員失敗後無奈下南洋的遺憾。由于該書第一版完稿時沒有出版社願意幫忙出版，使得筆者當年不得不辭掉半導體行業工作而成立南洋出版社，進入這個注定賠錢的行業，并在幾年內耗光積蓄。適逢父母暮年，受限于經濟狀况而沒能經常回國探望父母，構成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遺憾。可以說，我對得起毛澤東，對不起父母。本書第二版出版之際，難免勾起這段難以平復的記憶與遺憾。所以，筆者權借第二版出版來聊表對父母的感恩和紀念！

該書第一版出版後，得到各方人士的支持，出版後不久收到了新加坡李氏基金的贊助金；新馬兩地友誼書齋創辦人宋兆裕夫婦多次資助我去馬來西亞的演講活動；其他友人如練佩紅、鄭文咏、李萬植、鐘惠明先生等，也都給予多方面支持；東生老人家（曾任胡喬木秘書）爲第二版題寫了書名；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謝！

作者 2018 年 6 月于新加坡

目　　錄

第一章　人本經濟的成功嘗試 …… 1
一、輝煌的發展成就 …… 1
二、人本經濟的意義 …… 7
三、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影響 …… 9
四、閉關鎖國的無奈 …… 17
五、“大躍進”與“洋躍進” …… 19
六、國營企業的貢獻、問題及出路 …… 21
七、國企改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 35
八、如何看待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 44
九、如何看待同時期日本的崛起 …… 47
十、小結 …… 53

第二章 計劃生育與農民 …… 55
一、毛澤東時代計劃生育的不可行性 …… 55
二、農業改革的尷尬 …… 59
三、“社隊工廠”與“鄉鎮企業” …… 63
四、政權的無情、無能與農民的新苦難 …… 66
五、毛主席和農民心連心 …… 77
六、反思：“一胎化”是一次民族自殘 …… 82
七、“三農”改革不能都走大農場化 …… 85

第三章 大饑荒解析 …… 88
一、對當前社會認識的基本質疑 …… 88
二、大饑荒發生時期的中央領導體制 …… 91

三、大饑荒發生的輪廓……95
四、劉少奇：“共產風”的主要鼓吹者……97
五、鄧小平：背負歷史罪責而罔顧正義……106
六、周恩來：明哲保身下任由蒼生倒懸……114
七、毛澤東的作爲和責任分析……117
八、將大饑荒推賫給廬山會議太牽强……128
九、大饑荒分析小結……135

第四章 不一样的“廬山會議”……138
一、廬山會議的疑點及毛彭關係回顧……139
二、“彭赫秘會”導致的信任危機……143
三、“萬言書”引發浮誇風集團反擊……147
四、彭德懷晚年悲劇的必然性……150

第五章 民主與獨裁……154
一、毛澤東政治獨裁的歷史必然性……156
二、“一國兩制”基本思想的首倡……161
三、中國民主化的出路……162
四、對臺灣民主政治的一點看法……174

第六章 知識分子、反右與“文革”……180
一、知識分子的特點和反右……180
二、知識分子的改造……188
三、再探“文革”……191
四、“文革”十年中國人在幹什麼?……204
五、毛劉之爭——林彪事件的預演……212
六、“文革”的點滴啓示……222
七、中國已走出“文革”的陰影了嗎?……226
八、讀書人的毛澤東情結……227

第七章 毛澤東與個人崇拜……229
一、對毛澤東崇拜情結的由來……230

南洋出版社
忠告

二、超凡的智慧和膽略……232
三、人民曾經的精神支柱……251

第八章　中國人靈歸何處？……254
一、毛澤東對中國人的精神改造……254
二、中共對待人民精神需要的誤區……261
三、中國人的信仰重建和宗教改革……268

第九章　城墻殘垣的哀怨……289
一、古都的困惑……290
二、上海風華的殘影……302
三、來自巴黎的眺望……305

第十章　日本侵華與中共的勝利……310
一、沒有“西安事變” 蔣介石能消滅毛嗎？……311
二、共產黨抗日的歷史真相……318
三、“百團大戰”及其它……327
四、蔣介石的遺憾　民族的幸運……332
五、解放軍的力量和潛在問題……350

第十一章　毛澤東與女人……361
一、毛婚姻生活的遺憾……361
二、李志綏的真面目……366
三、中國女性站起來了！可站的更優美……371

第十二章　毛後時代鄧小平及中共中央之失……385
一、結束毛澤東時代方式的拙劣和短見……386
二、“集體結晶論”及其它……388
三、批毛的不良後果及中共的代價……392
四、毛後時代軍隊領導上的失誤……395
五、值得注意的問題及無奈中的期望……398

第十三章　以動機判斷道德　以結果判斷能力……404

前言 1 自序 1 目录 1 第十一页

第十四章　假如歷史上沒有毛澤東 408

第十五章　共同的責任 417

一、弘揚毛澤東時代的精神遺産 ········ 417

二、整理和發展毛澤東時代的文化遺産 ········ 420

三、自覺維護毛澤東的形象 ········ 426

附錄一　隨想：重建中華文化的自信 431

附錄二　美國經濟學家對毛澤東及"文革"的看法 457

附錄三　何炳棣：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 461

附錄四　關于《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的公開信（1995 年 2 月 17 日） 489

參考文獻 498

後　記 502

作者董玉振簡介 504

特別提示

※本書第二版的修改完善原則是：第一版除非有明顯錯誤，否則，儘量不改，哪怕有些描述隨著中國的發展已經不符合當今的情况。因爲就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前 20 年進行類比，具有可比性，可更鮮明看清毛澤東時代的成就，以及改革開放後領導人拼命詆毀毛澤東時代時，他們自己做得并不像宣傳的那麽高明。本書中有些文字如"當前""今日"等，凡是第一版的很多沒有修改，因爲把"今日"修改爲"按照 2000 年情况"，將非常累贅。新加的內容，所說"今日""當今"等描述的時間爲 2018 年近期情况。第二版中大段新加內容都做了脚注。

※本書的插圖并不與內容一定關聯，第一版插圖的文字說明爲簡體中文，第二版時這些文字也保留簡體，新加的或修改的圖或文字說明則用繁體。以示區別。



要抓案命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一章人本经济的成功尝式[1]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

¥ 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

一、辉煌的发展成就

“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笔者也不愿将毛泽东视之为经济学家并为此进行辩护。作为一位政治家、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关键在于在他任内国家的

[1]特别问题提醒：1998 年写出本章网络版，2002 年完善成本书第一版内容，当时正值非毛化最猖獗的岁月，所用的类比数据均为 2001 年以前的。2018 年第二版出版时，中国各项发展有了长足进步。但不能因为今日或未来发展的更好而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吹毛求疵，继续保留第一版时的数据，是认识毛泽东时代的有效类比依据。即使一百年后，中国高度发达了，这一类比手法仍然有效。

经济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求全责备，或因一时的经济失误而否定经济的整体成就是不客观的。至于“毛泽东时期经济一团糟”、“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等观点，更是轻率和不负责任。

在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早期，既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并由此启动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最大的群体过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础——土地。就影响和意义，超越后来的任何单项经济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市场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土改和暴力革命，彻底铲除了到处盘踞的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经济霸权、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治山头、黑社会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真正大一统局面，促进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流通等，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而 1949 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级政府机构，为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必要的领导力量。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对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必要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提供了制度的保证。毛泽东对人民的动员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则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已为今天所放弃，但自 1949 年之后在经济、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的巨大发展成就，是无法否定的。

建国之初，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等，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都要靠进口。经过二十七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 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农业占 64%(三年实现经济恢复，1949 年没有详细资料，可以肯定非常糟）；而到 1975 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 72%, 农业则仅占 28% 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 1965 年的 1402 亿元发展到 1976 年的 3207 亿元[量]。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第二代领导人和大陆经济学家贬之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济崩溃的所有先兆如：物价飞涨、失业增加、

收支状况恶化等全部没有踪影，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崩溃的边缘？"

以下是几个重要产业的发展数据：

从 1952 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以 1978 年为截止年，因 1976 年至 1978 年是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自然延续。毛泽东时代的大型基础建设和重工业项目也在 1979 年前大部分投产），钢铁产量从 140 万吨增长到了 3180 万吨，煤炭产量从 6600 万吨增长到 6 亿 1700 万吨，水泥产量从 300 万吨增长到了 6500 万吨，木材产量:从 1100 万立方米增长到了 5100 万立方米，电力从 70 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 2560 亿度，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 1 亿 40 万吨，化肥产量从 39000 吨上升到了 869 万 3 千吨，农药从 2 千吨增加到 53 万吨[量]。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 1976 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 1949 年的第 13 位上升到 1976 年第六经济大国（这在海外学者中被认可，虽然有汇率的争议，但如果按照货币购买力来计算，

这个位置并不离谱。只要按国际市场价格算一下当时能源、原材料、冶金、农业等基础领域的产出就能明白这一资料的可靠性）。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条窄轨）、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甘肃省在解放初期的铁路只有陇海铁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兰州，并建设兰新线）。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 20 亿立方米以上的 31 座超大型水库中，30 座为 1949 年后所建。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 3400 座水库（现在即使建 3400 坐标准游泳池也是一个浩大的开支）。为毛泽东之后从容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在文教方面，“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 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至 2000 年前，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没达到过 3%这一世界平均线，人大代表每年喊破嗓子，政府就是不理）。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后来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当时在农村一些家长不让女孩读书，纯粹是封建余毒的影响，并不是上不起学的问题。笔者家乡就有几十位这样的女孩，包括笔者的姐姐）。1975 年学龄儿童入学率更达到 96.8%的历史高点，毛逝世后却连年停顿在这一水平线以下，一直到 1987 年，才恢复到 97.2%;初中毕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油画）

业升学率在 1975 年为 60.4%从此至 2000 年再没有达到过这一数据，1998 年为过去二十多年的最高点，才达到 50.7%(笔者家乡就是个证明，1976 年高中毕业生每年有十几位，后来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高中生越来越少）；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976 年为 22.4%，1977 年为历史最高点达 22.7%，后来再没达到这一比例，1998 年为后来的最高点，才达到 17.3%，和“文革”爆发的 1966 年相差无几（15.7%）。在校中学生数，1977 年为历史最高点，达 6779.9 万；小学在校学生败的历史最高点为 1976 年，达 1.5005 亿，后来的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从来没有达到过上述数据，因学费负担而辍学的问题，自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过[21]。

毛泽东时代的升学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高的。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所做的贡献和中国社会的高度平民化色彩，这和今天“贵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层次；当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这种对比变得更加鲜明。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对在中国投资普遍的担忧是：在大陆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他们以为大陆像菲律宾和印尼）。各级官员和学者也在胡说八道什么“劳动力素质是制约中国吸引外资的障碍”。但令最初试探性投资的外商惊奇的是，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到处都是，这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取消高考使得高等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础教育的伟大成就，至于那些说什么“文革”期间没人好好学习，更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除了“文革”开始的两年，后来的教育（包括绝大部分高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为中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基础（保守估计有 3 千多所）。而这样庞大的科研体系，在发展

中国家是唯一的，在全球范围来看，也只有美、苏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中国在解放后二、三十年建起的较高素质的民用和军事工业，根本不可想象。这些院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跟踪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这真是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创意）。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只相当于几个鸡蛋的价钱。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得 1976 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男人为六十六岁，女人六十九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这从一个方面赋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及其执政体制的人道主义的色彩。虽然在政治斗争中有些反人道内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享受的人道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既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下大还外汇储备，截止 1977 年共有黄金储备 1280 万盎司和外汇储备 23.45 亿美元（请记住：70 年代毛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为华国峰和邓小平时代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

即使邓小平也承认："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以及"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31]。



二、人本經濟的意義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 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据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完成投资额而被计入。

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全长 1100 公里，桥隧占总长度 4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屋和进度。在地形极为复杂的地区修建铁路，不少解放军战士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

在毛泽东时代，劳励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人民的高度主人翁精神确保了当时工程建设的效益和质量。看一下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建设了不在少数的“豆腐渣”工程，再看看毛泽东时代建设的诸如南京长江大桥等工程的质量，就能明白毛泽东时代国家和民风建设的成就。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败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以及忽略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重工业的较高技术层次等因素）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惝得市场经济才是“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七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否定的回答。

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笔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它并不否定货币，但货币仅作为分配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或激励劳动力。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道德高尚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

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它领袖们远高一让之处。

虽然人本经济已不适于今天的现过，但这幷不能成为否定昨天的理由。毕竟毛泽东创建了适于人本经济发展的环境，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昨天的简单否定将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华，并完善当前市场经济的

机会。毛泽东的经济资践为人类的发展道路开关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学家将会发现，毛泽东的人本经济实践很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状态，毕竟它比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替如，中国在工业和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环境下，只用十多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只用 9 年就完成百吨级“运十”客机的试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并不很差的基础上并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在第一辆桑塔纳合资汽车引进二十五年后才推出一辆不太差的国产轿车。

直到今天，在国家重点工程、大型市政建设项目方面，有关负责人往往将其作为一“政治任务”来监督，大大提高工程的进度。这其中已明显存在人本经济的核心内容。

三、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影响

当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共领袖们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得到群众的附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薄弱的工业基础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

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

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毛后时代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由华国锋和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主导下开始的以宝钢一期工程（耗资 178 亿美元，此数据援自宝钢一期工程投产时，上海一家报纸的相关报道)为代表的“洋跃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革”结束时还不是太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而所消耗的外汇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期通过国家的节俭而积累的外汇盈余。

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

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中国对苏“一面倒”的政策后来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如果考察一下苏联对中国 156 项工业项目的援助和影响，应不难明白，

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苏联、东德、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负责任的姿态，为协助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进行类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156 项主要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各工业领域的分布搭配经过了中苏专家的认真研究，甚至在各项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认真推敲。在中国还缺乏对工业化发展全面认识的情况下，苏联专家在吸收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给予了必需的知识协助。就拿机床工业来说，机床工业所有类型的制造厂，如车、铣、刨、磨、钻、冲等，全部包括在内，还有象投资 6 亿元建立的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等一系列重机厂（建这类工厂要比“联想”之类的计算机厂和家电组装厂困难的多）。这些工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的机床制造装备水平在解放后不久立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也在基础工艺发展、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方面，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今天，随着数控系统的完全国产化，中国机床工业水平已直指日、



学习苏联先进生产经验.
为我们趄国的工业化而畓斗.

美、德先进国家；没有早期的基础，今日国产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制造将不可想象。

如果想一下上海宝钢等大型引进项目建设时，日本将一些二手设备涂上新漆运来中国，而美国至今不愿将先进设备宝给中国，

更别提军工企业和技术引进了。由此不难明白，中国如果没有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11]



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将面临更大的困难。没有第一汽车制造厂、一系列重机和机床厂的建立，后来的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万吨水压机和万顺轮等大型工业项目的迅速建成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除苏联及个别发达国家外，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业力量建立起如此规模的现代化汽车厂的（二汽于 1969 年开工建设，1975 年第一辆汽车下线，共安装四千台新设备，300 条生产线，117 条自动化流水线，载重车产能位居世界第三。单看建设的速度和自动化程度，就可以驳斥所谓“文革”期间没人搞生产和科研的谬论）。如果没有苏联援建的哈尔滨锅炉厂、电机厂和汽轮机厂，后来的四川东方动力集团等一系列大中型动力设备企业将难以迅速崛起，中国大型电站设备的建造能力将很难短期建立起来，毕竟这类设备囊括了机械工业几乎所有的加工工艺（例如，大型电站锅炉的焊接技术，汽轮机的转子动力学、合金钢和精密制造等，都是机械工业领域相关技术的最高水平）。八十年代后半期，哈尔滨锅炉厂能利用美国图纸建造 60 万千瓦的超大型电站锅炉，与以前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也验证了中国焊接技术的世界级水平。东方动力集团能制造 60 万瓩大型汽轮机组，标志着中国动力设备领域正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使得中国这样一个赤贫的国家，一步跨越了市场经济国家需更长时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而得以展开大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即使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没有能力在重工业领域（尤其是基础装备及原材料领域）进行商业冒险。

在中苏蜜月时期，还得到了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支持，而中国除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分散了美国的战略力旧•外，在经济和技术上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回饿微乎其微。[2]

当今日的一些中国人就毛泽东时代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责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援助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中国对外援助无论在规模上、技术层次上还是产业的合理搭配方面，与中国在这方面所得到的国际援助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大国和富国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援助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拒绝对外援助的大国必然面对外交上的尴尬，印度对外援助的资金曾长期维持在高水平。

即使在接受中国对外援助方面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对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撺了重要作用。中国援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家卫国”，中国不能允许周边小国被世界强权作为对付中国的桥头堡[3]。

如果就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而言，毛泽东对苏联的“一面倒”外交政策，无疑是一极为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毛泽东的个性和民族主义色彩来说，没有天大的好处，他会轻易地叫别人一声“老大哥”吗？当斯大林送给毛泽东一辆小轿车时，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爱的红辣椒（他老人家真够幽默的）；可当苏联希望在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建一个箩卜罐头厂时，他的民族主义情节立即发酵：您把机器给我，我们生产的箩卜罐头卖给你们还机器钱。当然，最后不了了之。（请读者不要以现在的引进外资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唯一目标无疑是正确的）

韩国虽然在朝鲜战争后三十多年成为亚洲四小龙，创造了


夜共产接柄主席网下，《!帼I龈
g－鼸杂 Sftflgi 订前附！
1954年作

“汉江奇迹”。造船工业的生产吨位多年居世界第一，但其大型船用引擎长期依赖日本进口。而中国在 1976 年以前已具备了各种船舶（从鱼雷快艇到万吨轮和核潜艇）引擎的制造能力。韩国现代重工也学会了制造电力机车，但其关键技术全是进口。而中国则具有完全独立的机车制造能力，在种类和技术层次上虽然比个别发达国家（日、法、德）落后，但在全球范围来看，则居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台湾，虽然在经济上有长足的进展，但其早期的主要产品以轻工业品为主。

如果拿 1976 年时的自有工业技术层次和综合制造能力进行对比，除韩国三星刚起步的半导体工业外，韩国和台湾根本无法和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他们生产的家用电器的元器件主要靠进口。

即使从全球角度来看，1976 年的大陆的工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七十年代中后期，微电子工业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腾飞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在包括家电、钟表、自动化控制等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才迅速拉大了中国和周边小龙在某些新兴领域的距离，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个人计算机及其全方位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差距。当然，中国在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领域的产业不足、相关领域技术准备不够、对消费品经营理念的缺乏、体制上的欠缺灵活（这对重工业的影响远不如对消费品工业的影响大；在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产 il 便于计划，而对消费品工业进行计划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行的），以及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在 IT 领域的封锁非常严重，当 1024 分辨率的计算机

显示器在美国大量应用时，中国国防系统只能从香港偷买），是中国没能及时赶上的主因。

即使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半导体工业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他们中没有一个具备独立发展半导体工业装备和基础工艺原理的能力。这是美国这种经济强国最难于被别人追赶或超越之处。而中国大陆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独立发展了集成电路制造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制），日本买去一台加以研究，后来日本发展了自己半导体设备工业。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导体工业，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人才和知识。而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日和苏联了。当然，中国后来半导体工业的落后原因就不谈了。笔者本人横跨多个理工科领域的知识，和基于对众多工业领域及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才有信心为毛泽东时期重工业路线进行辩护，也才得以认识到毛泽东时期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和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全面的、基础性的伟大贡献。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更喜欢从经济发展的宏观数据进行评判，而忽略经济微观结构的极端重要性（即使从宏观数据来看，也没理由质疑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没有强大的基础装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工业，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的电器产品都在中国生产组装，中国最多只能算是个经济大国，而决非经济强国。

当我们看到外国技术上的领先而埋怨毛泽东时，实际上我们已将自己放在了和发达国家竞赛的擂台上。这样的比赛规则对于 1976 年时的中国并不公平。

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

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但国企改革中，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无情下岗。他们已经没有青春，没有社保。政治没有人性，放弃责任，只有效益。这不是下岗工人的错，而是错误理念下由糟糕政客操盘的所谓改革成果。



四、闭关锁国的无奈

毛泽东另一项让今人能作“事后诸葛亮”的即闭关自守，不搞对外开放。

在建国前，毛泽东曾表示过访问美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建国不久，美第七舰队进驻埸湾海峡，接着中、美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更让老美颜面扫地。围堵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战略。在军事上，东面有日本、南韩美军基地，台湾的蒋介石随时准备“反攻大陆”，东南方有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北方遍境紧张；越南战争使中国南国境线吃紧。从解放至毛泽东逝世恶仗不断，计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间接参与印度支那战争，六二年中印之战，六十年代援越抗美，六九年珍宝岛战争，紧接着苏联威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使得中国不得

不“深挖洞，广积粮”；七四年西沙之战。如果中国对外开放，也只能面向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和泰国。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和最大市场，不能为我所用，且尽力在技术输出上封锁中国。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高达一百七十多项，而对其死对头苏联的禁运才一百五十多项（当然，这与苏联技术较进步有关）。台、港、东南亚直到八十年代初还没能力大退输出资金，即使有良好开放环境，也难有所作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打开窗户进来苍蝇的同时还能进点新鲜空气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时代则没有新鲜空气可以进来。毛泽东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领袖，他一生何曾惧怕过挑战？那些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担心外来思想会动摇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对毛泽东的根本不了解。

解放初期，解放军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气解放香港，但毛泽东将香港的殖民地状态保留下来，以便能充分利用，作为打破西方封锁的窗口。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不仅不准备闭关锁国，而且尽力突破封锁，以取得国家发展所必须的资源。

建国至中苏决裂，中国的国门曾面向苏联、东欧打开；这种开放是以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主。这期间，苏联对华一五六项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而且大多数项目属于苏联最先进工业技术。就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相对收益而言，这段时间决不逊色于改革开放前十多年对外开放的成果。

1970 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缓和后，中国立即从美、日、法、英等引进包括石油化工、化肥制造、冶金、采矿和石油钻探、热电厂、波音客机等设备。1973 年，仅中美贸易就从七千万猛增到八亿美元。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一年多就有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和设备引进，怎么看也不像闭关锁国，反而显示出毛泽东时代

突破封锁的急切感。当时的设备引进是在全面统筹基础上，以提高民族工业货力和技术层次为目标，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引进设备均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从开放为增强国家实力和自力更生能力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时代从苏联、东欧和后来美、日、英、法等的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所带来的效果，绝对不亚于改革开放后以吸引投资为目标的引进。

1959 年作



把大跃 1 的战鼓敲得 I 响

BADe 量'TUCJINDCZh 量 NNQUO06

五、“大跃进”与“洋跃进”

谈到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败笔，就不可能回避“大跃进”。它确实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导致后来三年经济的极端困难，及重大的人间悲剧，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不论毛泽东及其政党为民族的崛起做过多少伟大的贡献，由于政策的失误而导致人民大！卩:死亡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或粉饰的。将人为的失误而导致的经济灾难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幷不客观。笔者对此的一点发言权来自于一个不值得羡慕的优势：笔者的家乡所在地一山东省菏泽地区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十个重灾区之一，笔者家乡的小村子也饿死了六人。

三年困难时期，至少在笔者家乡，自然的灾害并不比往年严重。但在“大跃进”和“大锅饭”中，一系列荒谬的行为极大地摧毁了正常的生产活动。

关于大饥荒的背景原因，在该书第一版没有触及，本次第二

版专章讨论，请参见“第三章大饥荒解析”。

作者在此无意为“大跃进”辩护。但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不断批评“大跃进”时，却很少有人检讨在毛泽东逝世后由华国锋和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主导的“洋跃进”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规划”。这是否存在着评价历史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失误检讨，而无人对“洋跃进”承担责任。虽然作个检讨也许不难，但面对今日中国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中国哪一位领导人向人民公开作过检讨呢？

“洋跃进”的特点是无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全套引进来迅速提高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债（从 1977 年的 23.45 亿美元外 1 灌储备，到 1980 年的 12.96 亿美元的净外债），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一些大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农业联产承包以任



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槅食的外汇，化解了“洋跃进”对经济的巨大冲喂。否则，中国经济阳[4]年作真要被拖到“崩溃的边缘”。

“洋跃进”的另一恶果，是曲于论证的草率而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永久性破坏。上海就是一例。

因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紧张不堪，而上海的优势在于一流的科研力 W 和劳动力队伍。因此，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应是优质轻工业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然而，重点全套引进项目——宝山钢铁总厂的

建设却使上海的产业结构+可挽回地继鲚走重型化的道路。当上海汽车工业占中国市场半壁河山时，人们已经忘了它正是“洋跃进”留下的苦果。当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与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题外话：中国政府应迫使上海将汽车工业的增加产能，

设在有一定机械工业基础，同时又相对落后的城市和省份，如洛阳、贵阳附近城市、太原、南昌、株洲、柳州、德阳、宝鸡等）。



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第一艘 2 万吨级货轮“风庆”轮下水，1974）

当第二代领导人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批评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时似乎忘了，他们所犯同样的错误还没来得及纠正。

六、国营企业的贡献、问题及出路[2]

当今日的人们评论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时，难免会提到当时建立的大•里“低效率”的国营企业。如何矜待和理解国营企业的贡献和今日的尴尬，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和工业发展史的客观认识和评价，也将影响对中国未来企业发展，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改

[2]本节内容写作于第一版，今天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和整体经济贸力已经于 2002 年时不可同日而语。本书在出版第二版时，这部分内容大部分还保持原貌，作为对中国经济演进过程的一个记录。本来嘛，该书的目的就是揭示历史的真相，当时的情况不论与今天的状况差别多么大，今天和后来人也不能因为今天的成功而忘记或否认曾经的对中国经济的怀疑，或曾经走过的弯路。

革和管理的探索。

前面已经对毛泽东时期的重工业建立的意义有所论述。本节将集中讨论一下毛泽东时期国营企业的贡献和如何看待今日国营企业的低效益问题，同时阐释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出路。

必须肯定的是，正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庞大国有（包括全民、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才奠定了中国工业大国的基础。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的话，中国会有庞大的金融、运输、轻工业和房地产公司，但指望民间的力量建立大规模工业企业，尤其是规模庞大的重工业群，根本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独特优势，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今，中国最大和最成功的大企业群体仍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患得患失的思想没那么重，因此也较易把握企业发展的良机；而民营企业家在风险承担能力上相对弱得多。

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私人企业在重工业领域达到较高水平和规模的屈指可数。韩国虽然是个例外，但与韩国历届政府对几大家族式财团的慷慨支持密不可分。这种无保留的支持虽然带来韩国大企业的迅速膨胀，也导致了整体经营效益的低下，国营企业的所有弊端它们几乎全有，至于其中所包含的道德问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台湾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不少高水平的信息产业，与蒋经国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关；如，今日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代工企业——台湾集成电路公司（台积电 TS 量 C)， 当 初 就 是 首先由政府出资和飞利浦合资创办，因只有政府能承担得起几亿美圆的初期投入和投资风险，而民间力 i：根本不敢贸然涉足。待台积电走上正轨开始赢利时，台湾政府才将股份卖出，退出对公

—某 本 厅 . 的 – 成 功 纽 .

司的经营。以此为起点，斋湾半导体工业才迅速腾飞起来。

美国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壮大，与美国本身的庞大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市场规模有关，但对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二者皆不具备。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国营企业，后来不少面临关停并转的命运。这除了企业管理人员的经营水平和后毛泽东时代道德水平下降的因素外，与早期国营企业建立的环境和目的密不可分。

中国为了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追求所有产业的配套完善。由于国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如果不能达到几乎全面的零部件自给，对工业的整体发展必然带来制约。如，中国围绕核武器工程的启动，就建了三百多家各类配套企业。当然，这类企业的产量是很低的，也许一年只造几十件某种零部件，但没有这类企业的建立，中国的核武器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来。当然，任何一类零部件的生产都需要一套工艺装备和科技及生产人员配备，如果将这类企业放在市场经济状态下，没有赢利的可能，但这又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产业。这类情况遍布在任何军工类行业，和航天、航空领域等。仅航天工业从零做起，建起了五大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以及庞大的生产配套企业。正是中国在工业领域的全方位发展，
以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不论是否符合效益原则，都为中国建立起全面的技术开发和生产配套能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一基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引进产品和技术的国产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在九十年代的惊人发展，外国人不能理解这种从“无”到富的跳跃性。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和商业意识的全面觉醒是至为关键的，但毛泽东时代积累的产业能量得以充分爆发出来，是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一伞人本经 i 费的成功尝试

如果中国没有外部的封锁，完全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话，那么，中国能分到什么样的一块“蛋糕”呢？对一穷二白，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国来说，只能分到轻工业低端产品的下游组装部分，中国后来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状况（如手机，计算机等）就是明证；甚至更糟。毕竟中国后来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在大部分领域，如机械、电机和原材料领域已有了相当丰裕的家底。比如，长虹集团能在电视机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甚至韩国三星电子、东芝等日本家电企业也采用长虹的行输出器件、高频头（电视机上的关键部件）等，与长虹和中国电子业在过去几十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在外资企业和私人经济得到优惠政策的扶植下，国营企业继续是出口创汇的主要力量，2000 年，在 200 大出口创汇企业中占据半壁江山。

中国各类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建立，也为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笔者在和曾参观或工作过的外资企业对比中，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私人企业里要找到像中国的八级工那样高素质工人真是不太容易（笔者在国内做课题时，曾亲眼目睹航天部二院的老师傅在普通车床上给本人加工的一个 0.3 毫米厚的锥型弹簧片；笔者敢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工人敢做和能做这样的加工）。而中国工人的整体素质之高，创造能力和组织性之强，是世界罕见的，但几乎完全被世人所忽略（某曰本学者著作《中国制造》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的高素质，但可惜的是，这位作者缺少工程方面的背景而无法去发掘更令他惊叹的事实）。在钱学森创办航天部第一研究院时，大部分人员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他们文化程度之低可以想象，也没人进过工厂，可就是这些人为航天工业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自己成了一流的产业工人。

这样的事例在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各类国营企业中俯拾皆是。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型工厂能分配到几个大学生还真是宝贝。

笔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上海的一些国营大厂实习，因笔者的一贯兴趣而对那儿的管理给予特别留意。后来在深圳和国外的一些企业的经历，使笔者相信，中国国营企业的微观管理绝对不亚于大部分外资企业。尤其在海外工作几年后，更对国有企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当然，由于中国企业的宏观管理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和今日符理人员道德观的淡薄而导致企业管理层在毛后时代的贪污腐化，进而导致国营企业效益的下降和员工工作热情的降低，则是另外值得探讨的问题。

至于国营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经营，需要中国在工商管理教育和科研以及相关人文和专业教育方面多做工作，很遗憾，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前几年大、小企业发疯一样搞多元化经营，摩托车厂造方便面，电子公司开药厂；一会儿又大谈 CI，把商标换来换去；今天又神经病一般到处在谈“资本运作”等，好像资本一运作，中国就能有世界一流企业。联想集团和清华同方学习外国大企业而将笔记本计算机和数码相机走“贴牌”路线，说不定哪天全中国到处猛刮起“贴牌”风。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中国顶尖大企业都不作研发（外壳设计不算）和尖端产品生产工艺开发，那中国工业素质的提高将会面临严重问题。联想是在学习 1B 量，可 IB 量走技术服务和委托加工路线，是因为它拥有在相关领域不比中国科学院弱的基础研究实力和应用技术开发能力，它赚的是技术钱而不仅仅是品牌钱，而品牌价值的“后台”不是生产，而是强大的研发馊力；看一下 IB 量在人类技术进步领域的一些里程碑式贡献，如电子隧道扫描显微镜、集成电路的铜芯制



197 足年竹

工业学大决

造技术及高密度磁盘存储技术等，就能明白它的强大基础研发实力。IB 量委托加工的是对它来说太低的技术，如计算机组装，

但不会把大中型服务器委托出去；而笔记本计算机和数码相机的制造对于联想的现有技术层次来说，并不算太低的技术。相对来说，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是建立在低端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营销上，这种牌子是经不起纯粹“贴牌”考验的。

进入 1990 年代，随着公司上市，从联想开始，中关村响彻云霄的是要造就多少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清华大学一上市公司老总的豪言壮语），更是全球企业界最无知、最荒诞、中国独有的怪现象，那些由教授和研究员组成的经营团队根本不考虑其它员工的感受和忠诚度，对企业文化肆意践踏，表现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为中国企业界树起了一面黑旗。

中国企业经营中的问题与企业家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问题及企管教育方面缺乏创意等密切相关。

大量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并不意味着昔日的建立是浪费。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崛起并非从零开始，实际上是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将其它企业的资产划拨而实现大企业集团的迅速膨胀。无论是海尔、春兰、一汽、上汽、长虹、青岛啤酒等，都在成长过程中低成本或无成本（资产训拨）地兼并了其它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即使过去十多年崛起的民营企业中，不少都曾通过对原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购买或合资经营。在一个破旧的企业基础上发展，也比一切从头做起方便快捷的多。

创立一家贸易公司易，创立一家工厂难。尤其是一家需要一

定技术力量和装备的企业，仅论证过程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某一空白领域发展工业，困难更大。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填补了工业各领域的空白，自然也创立了今日工业发展的起点。私人购买一家国营企业，启动阶段的设备、工艺、人员配备等重要资源已一步到位。其实，不少亏损的国有企业，只需要换个经营人，就可以令它起死回生。员工的整体素质和现成工艺装备是重要的保证。例如，新加坡丰隆集团购得中国优秀柴油机制造企业一广西玉林柴汕机厂的控股权，全部技术和车间管理都由原玉柴员工负责；而新加坡根本就没有玉柴这样的企业和相关技术，自然也派不出技术员工。丰隆在中国并购的另一个杰作就是新飞冰箱，而新加坡也不可能派得出任何的技术人员。

中国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另一个贡献是中国城市赤贫阶层的消失和落后地区工业化火种的散播。

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完全依赖市场力量的话，中国将会出现一大批超级富豪，但中国城市贫民窟也将同时遍地存在；而中国的产业布局也将高度集中在传统上的沿海工业中心和内地几个点上，而西安、兰州、贵阳、成都的发展将严重滞后，更别提绵阳、齐齐哈尔、洛阳和柳州了，只要看一下这些中西部城市当今吸引资金的难度就可一目了然。没有长虹的绵阳，没有二重的德阳，没有辽化的辽阳，没有一拖的洛阳，没有二汽的楚西北，没有冶金基地的六盘水，没有东方电机和第二重型汽车的乐山，没有陕飞的汉中……，您能想象这些城市的今天会是怎样？这将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国平均购买力的薄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严峻，社会关系的严重恶化，今日南美和东南亚国家的问题，也必将在中国更早暴露出来，而且会更严

重，并将从根本上窒息中国的发展步伐。



我们的大学生回来了

毛泽东时期工业化的一个直接成果是，财富平均地散布民间，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平民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大 R 财富均布在全民或集中在国家手里，南美和东南亚国家的资金严重外流的现象才不至于在中国过早的发生。今曰中国虽然也有资金外流的问题，但与国家的整体责力和每年的外汇流入相比，已不太会迅速威胁中国经济的稳定。看一下蒋介石管理大陆时期中国贪官和富荥往海外的财产转移，就能更好地理解上述说明。印尼在 1997 年金融风暴和“排华”事件后，估计有一千亿美元以上资金逃亡国外，因其财富主要掌握在流动性强的私人手里（看一下海外赌场里的中国豪赌客就该明白，如果没有早期集体和阙营经济的基础而纯粹靠私人资本，中国将会怎样）。

即使到今天，国有企业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二十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非平等国民待遇政策，外资企业的增值税为 17%，而国营企业长期维持在 33%的高位。政府很清楚这对国营企业的不公平，但又长期无可奈何，因为中央财政难以承受国有企业税收削减带来的收支不平衡挑战。

固然，一些国有企业后来经营中的问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不少的呆坏帐累积。但从中国国有经济的整体来看，何尝不是从一个口袋里拿出来，然后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当然，今天国有银行的资金抽逃和内外勾结的骗贷而导致的呆坏帐，则属另一个性质的问题。

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有企业将继续扮演中国产业进军国际的主力军角色，尤其在需要高投入的产业领域。关键问题不在于企业内部的微观管理和资产结构上，而在于中

央、省市或国有投资机构作为投资主体对企业的宏观监管上。这才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根本问题所在。

在 1980 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给政府开了不少的“药方”，来医治国有企业的“顽疾”，其中最被各界认可的“药方”之一是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即国有股份的变更。其实，自北大厉以宁教授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就已经开始酝酿，后来大有“一股就灵”的意味。厉教授的这一理论也促使笔者在哈工大硕士毕业后，放弃进京工作的机会而南下深圳，基于对这一理论的本能怀疑而去寻找证据；但很遗憾，笔者的人轻言微使得国家错失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笔者并不反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但必须认清，股份制可以让企业更加透明，也可以靠引进策略性股东来规刺企业的未来战略，但不应认为是改善企业管理的根本通道。对于政府投资主体来说，通过将优秀企业的部分股权释出，可以为公众投资人提供良好的投资选择，同时也使政府本身获得可观的资金收入，降低投资风险等；对个别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政府可以通过股份制得以逐渐淡出。所有这些都不应作为改善企业经营的手段。那些认为股份制可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是没有充分理据的。一个简单的疑问是：哪怕政府只拥有一家企业 10%的股权，那么，这 10%的股权如何管理？

可见，如果把国有企业的出路定在股份制改造，一个必然的推论是：国家放弃所有股份，实行完全的私有化。那么，当今和未来中国，有多少投资人能抽得出足够的资金来买下中国数家电信公司、中远、中国石油、中信、宝钢、中国电力、中石化、中

国粮油等企业呢？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市值在百亿，甚至千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何止这些。在当前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和汇率倒挂，以及国家经济刚处于起飞前期阶段的情况下，如果把国有大企业股权大量卖给外国投资者，同时将套现的资金用于低收益的基本建设或弥补经常项目开支，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将是得不偿失的，甚至有“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意味。只要对管理人员的监管和奖罚措施明确，即使不尽完美，中国不少国企的经营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简单地一卖了之，未免有点可惜。[3]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类大型国有企业也在增殖，所以即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也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吃得下大部分国企的股权。毕竟这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全民资产的大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私人资本主导的国家，这些企业的国家股权是社会财富均布的重要体现，也为国家调控经济运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手段，以及为国家组织重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安全的平台；在其它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国家，政府的产业导向有时因需要政府的无偿财政支持而带来道德的风险。

当然，对于中国企业宏观运作如何管理，是个几句话说不清楚的问题，但政府对管理层的个人操守监督力度理应大大加强，同时借助于职工民主调查，来评估企业管理层的表现。尤其是大型采购项目，政府不应完全放开。中国华能和其它电力公司在过去十多年建的大型电厂，不少是用的进口机组，对此中国政府没能给予应有的纠正是不应该的，否则，中国三大动力设备集圃如何生存？在航空公司选择机种的过程中，国家同样有义务督促配

[3]写作第一版这部分内容时，做梦也没想到后来的中国政府居然在对中小型国企私有化完毕后，开始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来渐进式蚕食优质国有企业资产。私欲激发动物智慧，也放纵人性的贪婪和丑恶，顺便借助于蠢人手中的权利。唉！

合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战略；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一些采购的审计方面，国家或各级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人理应加强监督机制的完善。

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公司的运营，但完全放手同样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即使美国这样的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在协助本国企业争取国际定单方面，从来积极介入。而中国政府在国企采购上完全不管，则未免过于洒脱了。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法规制度的问题，也不必要设立可能与 WTO 冲突的条例，而是一种政府责任意识的欠缺与否，同时也是国企管理人员的心态问题；这类问题完全依赖于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寻找中国的国有企业出路时，就不能老盯着股份制改造，否则，将永远找不到国企改革的出路。因为是在舍本而逐末。

必须肯定，国家的投资主体角色本身，并不是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源所在。例如：在新加坡经营最好的大企业，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电信、港务集团、发展银行等，都是国有、国家控股或国家为单一最大股东的企业，它们的经营水平是一流的；新航曾多次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世界最佳航空公司；而港务集团的管理水平也不遑多让，它将管理软件转移给合资的大连港务局旗下港口，使大连港装卸效率提升到日本港口的四倍。这些企业的政府股份由一家叫淡马锡控股的全资政府投资公司管理。当然，新加坡国有企业并非没有投资或经营失误，但这类失误与股权的结构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公司高层决策人的判断问题。即使私人上市公司也有倒闭的 3 这些公司在推动新加坡本地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私人企业不可能完全取代的作用。

新加坡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能运作良好，根本的因素在于拥

有一个廉明的政府体系，以及虽然有些控制，但还能听得到的舆论监督。如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夫人、李光耀的儿媳妇何晶，辞掉新加坡科技集团的董事长而出任淡马锡控股的执行董事，引起人们的议论，使得总理吴作棟出面向媒体解释任命何晶的理由。吴作棟提到，在何晶嫁到李家前已和吴在党务工作中认识，她已表现出较强的能力，吴作栋曾鼓励她从政；以及新加坡国小，不能因为她是李的夫人而牺牲一个人才等；不论民众是否接受这一解释，新加坡微弱的舆论监督已逼迫总理出面有所交代；而何晶则在民众的质询声中也解释了新加坡科技在某项投资上失误的原因。其过，如果吴作栋不出面解释，人们也拿何晶没办法，但这表现了政治和公众人物对舆论的敏感性，以及监督的有效性。

很显然，这种有效的舆论监督是中国所欠缺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国有企业宏观监控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因它的资产属于全民。

当朱总理为国企改革表现出雄心壮志的时候，笔者不禁担忧：朱总理不论多么有才干，当您试图在中国当今政治的乱象中建立理想的国企监管体系，根本等同于在沙滩上建一座大量。至于向国有企业派遣监事或代表，只能是理论上好听，实际上不好用。只需要一捆人民币就可以将您派去的代表砸得晕头转向。

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是内部监管和责任与激励机制的问题，宏观环境上，需要中共中央在社会宏观监督反馈机制和廉政纪律方面进一步强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早已存在，如果不能及时推动政改的话，必将影响到发展经济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

至于将企业卖给管理层的作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荒谬透顶。这无疑给管理人员掏空国有资产提供了动力和渠道。可悲的是，还真的在中国实施了。

当然，在国家现有的体制下，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人员的道德操守和对国家及人民财富的高度责任心。虽然是无奈的，但即使中国在未来有了完善的宏观管理体系，这种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的国有或民营企业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着企业文化的建立。看一下美国大企业的财务丑闻，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对于今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上百亿的资金流能独善其身，
且必须在没有强力监督的情况下自觉而忘我地工作，承担经营的舆论风险，确实是一种伟大和悲壮；就其道德层次和贡献来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社会精英，因这体现了一种对利益的非凡超脱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象征。海信的老总周厚键在海信上市时主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份认购权；青岛啤酒集团的彭作义，这位将青啤从年产十万吨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最大啤酒集团的企业家，喜欢念的一首诗是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表现了一代著名企业家对个人得失的超然，只希望能留“香”于人间。他的英年早逝似乎又在加重着这种悲壮。

看一下中关村的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整天喊着“要不是我企业不会有今天”、“当初创业时只是几万元起家，今天我当然该得个较大股份”等，他们就没想想：你的创业不承担任何个人风险，自己分文没投，“关系”还在学校和研究所，住着公家的房子，和研究所或学校属于雇佣关系，个人知识投入是受雇者的责任，你的巨大贡献理应多拿点股份，但没必要过分强调自己，好像研究所或学校亏你多大情似的；如果当初失败了，还可以回去搞研究或教书，这和拿风险投资公司一笔钱出来自己创

业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你们几个创业者当初辞职下海，领着老婆孩子租房住，搞到今天这个局面，那才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呢。而可爱的中国消费者对民族工业的一贯支持，更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或忽略不计（只要性能过得去，即使里面电路板粗糙一些，中国消费者也乐于支持国货。几年前随便打开中国几个知名品牌计算机机箱， 看一下主机板，就能明白中国消费者的宽容）。

当然，国有企业本身的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立同样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国有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企业员工能非常直接地体会出“主人翁”的意识，这是民营企业需要加倍努力才能达到的。当然，管理人员的个人操守即能轻易地推动员工主人翁意识的建立，也可轻易地摧毁它。中国的优秀民营企业,如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公司一一深圳华为技术公司的创办人任正非，在公司强调的是“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他本人虽然不是中国首富，但却以上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全国第一为自己，也为华为员工树立了一面旗帜。



中国企业家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任何时代，任何体制下都是必须的，不论中国的国企管理体制如何改革，这种精神是中国企业超越国外强大对手最重要的

“利器”之所在，就像

早期的中国乒乓球队一样。因为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核心。



七、国有改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4]

将企业资给管理层，是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企业股权转让模式。但在中国，这一点本来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国的企业性质是全民或集体所有，在缺少足够透明和公正性的情况下，盲目进行卖给管理层改制，必将导致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这一点中央也心知肚明。但中央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还是迈出了这人类历史上最丧心病狂地流失公共资产的一步，比俄罗斯市场化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还要不透明。这其中包括大量地方优秀国有企业，甚至一些五、六十年代国家勒紧裤腰带建设的大型国企被一股脑地改制给管理人员和地方官员。[5]

中国国企改制的方式是：把企业直接“卖”给管理层，可国企管理层都是受薪阶层，薪水不高，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买股权，甚至没有私产向银行抵押，那怎么办？就是以企业估值抵押给银行，或者干脆办理个股权过户手续，政府把债务也包下来。中国国企改制，几乎是类似于资产免费赠送的形式，实现国有公共财产的私有化。银行也是国有的，所以，抵押给银行其实也是您从我右口袋开个白条把我左口袋里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

[4]这一节为第二版新加内容。第一版的第七、八、九节相应改为第八、九、十节。

[5]这个由右派领导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固化了一个庞大而更无节制的官僚资产阶级。国企改制中，高级干部的白手套深入其中，他们有强大公关能力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取无限的公共财富，银行、保险牌照这类稀缺资源，国企都不易搞到，这些民企则轻易搞到而发展起来。公权力无形地支持着这些企业的发展，一旦社会动荡，这类企业就是压垮国家的最后一根稻氧

这是不考虑任何正当的改革！和国企职工下岗政策一起，构成了最无耻的改革！！共产党性质的改变从这一改革开始！！[6]

实际上，即使管理层以企业股权抵押向银行贷款，这笔钱实际是不用还的，而是继给贷款，反正经营亏损，扔给国家，如果赚钱，就是自己的。中国用亿万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庞大财富，一夜之间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以共产党干部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他们没经过艰难的创业冒险，上来就拥有了一个包括人才队伍、现成设备和产品、现成市场的成熟企业。这是建国初期私人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逆操作，但更不合理，更不公平。

这些改制企业实际上多数都是赚钱的。就拿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来说，它是张家港市属企业，有不错的利润。但 1995 年改制，这家企业改成了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和沙钢党委书记沈文荣的私人企业。至于这种改制的合理性在哪里，只有天知道。反正张家港市全体有户口居民再也没有了在其中本来拥有的股份，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是如何流失的。沙钢和其它民企借助于国家环境管制松的契机野蛮扩展成最大民营钢铁企业，但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线品种及质量上都无法和宝钢、武钢、首钢相比，所谓民企比国企创新能力强的神话，在很多行业都只是停留在“神话”层面。民企无法给员工归属感，是其不易但又必须迈上的台阶。而且，“私有制一定比公有制效率”同样是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编造的神话。国企改制后的民企，在技术革新和产能扩充中，继续大 4 收取政府给予的优惠扶持。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怪异之处，国家把公共资产给了私人，债务留给纳税人，国有银行继续给予信贷倾斜，政府还要继续给予各种优惠和扶持，而笑纳了一家国企的管理层从来家人就

[6]解放初期，上海等工业城市失业率高，为此，毛泽东要求企业尽置多安排工人就业，一个人的工作两人做，政府机构降低预算开支，用节省的钱补贴企业的薪水开支。国企改革中政府摔包袱，一股脑逼工人下岗，买断工龄，没有保险，导致下岗工人瞬间成为城市贫民，自杀、卖淫者普遍，他们中不少是优秀的劳动者和各类奖章获得者。工人下岗政策制定者与毛泽东比，政治道德何止天上地下！

不需要勒紧裤腰带。

这些国企改制的受益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一个现成的企业(创业最难的是第一桶金，创业者最初阶段阵亡率在九成以上，而这些改制受益者完全跳过这个阶段），笔者无意对这些人本身说三道四，他们没有过错，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改革下的产物。如果说官员贪污一百万元就要坐牢，那这些动辄拿到几亿免费财富的新权贵则完全合法，而且政府还给了他们一大串的荣誉，成为改革先锋。但改制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伤害之大却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钗际上，政府也不允许对此进行研究。

笔者长期观察发现，中国官员没底线贪污其实是在国企改制开始后不久。那些改制中没有捞到一家企业的高官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个天大的机会，除了后悔，就是开始心安理得地捞钱。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些少数人，并没有对自己捞个大便宜有感恩和戒惧谦卑之心，相反，大多数改制的受益者不仅用自己的财富去腐蚀官僚体系以获取更大财富，而且将财富和子女送往国外，甚至炫富，破坏社会价值体系。不会因为这些财富的原创股东是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下的国民而怀感恩报答之心。

这些改制企业也为其它优秀国企管理层带来心态的动摇。比如，长虹集圃在倪润锋带领下成为中国优秀的电视机及零配件制造企业，但在改制的大潮下，他为了把这个企业改制而刻意降低企业盈利，以达到降低估值，便于改制的目的。这么一个优秀企业和杰出企业家，最后走向了堕落。那些认为私字当头进行改革

就能激发人的积极性，却忽略了另一个同样可能的方向：私字当头同样可以激发人类内心的贪婪与邪恶。

万达集团的王健林说："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如果王健林不是靠改制自己管理的国企发起来，而是自主创业有这样的成就，您的话完全合理，但您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将一个国企改制成自己的私产，虽然程序合法（合的是那个改制的无耻法则），但并不意味着您已经对原创股东没有道义上的责任。万向集团的网页上写着"创办人卢冠球当初带领工人辛苦创业"，更是荒谬透顶，1969 年那个生产万向节的宁围人民公社（现为宁围镇）农机修理厂创办时，卢冠球是因为会打铁而被征召进厂的普通工人。后来您把这个公社几万人的公共财产变成自己的，摇身成了"带领""创业"的化身，太缺乏对历史的尊重了。您家族的荣誉和财富是借"改革歪风"从宁围百姓手里免费获得原创股而打下的基础。

人运气好时可以占个大便宜，但占了便宜还卖乖就有点不厚道了！我对这些改制的受益者并无妒忌，因为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问题。但他们不应该忘记自己的道义责任，比如沙钢集团沈文荣家族和沙钢主要股东，应该以感恩的心态去反馈张家港市百姓，而不是污染留下，财富带走。

中央政府里总有些让人无法理解的弱智大脑。最近几年中小型国企改制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央企这块"肥肉"，他们又来以莫名其妙的理论打央企的注意，造出一个"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中国一旦形成政策，市场规律和公正立马就变成陪衬（我一直怀疑中央高层智囊和管理层有受西方资助的第五纵队）。很显然，私人投资者不是傻子，央企必须拿出优质资产来进行合作才可能贯彻政令。问题是，这些国企的优质资产，有必要混合吗？央企在混合的要求下，到底有多少优质资产被混合掉，难以统计，因为完全不透明。有朝一日揭开这个盖子，很可能发现，是国有资产大流失的又一次"壮举"，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这一代领导人，将身负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彻底动摇的历史罪责。当然，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人物不可能让这个盖子揭开。

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渠道还算畅通。如果政府真想释出部分优秀央企的股权给民间投资，完全可以通过股票市场来透明合法地完成，根本不需要制定行政命令来完成一个纯粹的资本运作。比如新加坡优秀国有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星展银行等，通过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来释放出淡马锡控股手中持有的部分股权给公众投资者和机构，而不是通过新加坡内阁制定行政命令，在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对优秀国企股份出让给特别选择的私人资本。新加坡电信公司是优秀国企，当时上市时，政府为了让全民受益（因为新电信客户是全民，资产属全民，国家给全体国民参与 IPO 机会）

中国中央政府似乎更喜欢在普通民众无法参与，舆论无法监督的情况下，通过不透明的行政命令的压力，来帮助那些有责力的私人企业（普通民众和小企业可没资格来混合进去）进一步做大，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为这些私人企业未来主导国家命运做铺垫？为中国彻底放弃资本主义化夯实经济基础？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国家应该将国企 IPO 前融资的特权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就是只给国字号的投资机构和养老金、扶贫基金等，或者给中西部地区一些落后省份的财政基金。但国家似乎有股力量，就是设法为央企或国企打入私人的锲子。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出现动荡或国企经营出现问题，这些“锲子”将会借机做大，蛇吞象的时刻就会来临。拥有巨大资源优势的国企将会成为

一些家族政经力量的打手和舞台。

我坚决支持中一创立公平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是释放全民智慧的必由之路。但这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靠行政之斧干掉国有企业的手段，是拙劣和不公正的 9，实际上，不论民营经济如何发展，中国政府必须要清楚，保留和发展一个庞大而高素质国有企业群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私人财富的流动性和社会公共责任心的不足，正是国有企业的独到优势。

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集团就是一个代表性案例

创立于清朝末年的轮船招商局，是由李鸿章督办的官股为大股东的合营企业。自创立之日起，招商局协助国家发展近代运输，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立下大功。后来清朝灭亡，民国创立，再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直至共和国成立，招商局始终没有改变其国有的性质。虽然 1949 年后一部分退到香港发展成为今天的香港招商局集团（另一部分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成为后来的阳明海运集团），但在辫助内地购买紧缺物资，协助内地发展方面，招商局继续贡献良多。1980 年深[7]

[7]钢铁业就是个例子，国家 2008 年命令武钢防城港项目和宝钢湛江项目这两个极大优化国家钢铁产能布局，而且技术非常先进的优质国有钢铁项目停工，但却同时放行高污染低技术民企钢铁项目上马，放行了四亿吨的产能，其中以民企为主。直到 2012 年钢铁业放缓，发改委才放开上述两个项目在日益残酷的市场上来优化钢铁产能布局。如果当时武钢项目能够顺利完成投产，则后来就不会出现亏损而被迫和宝钢合并的命运。从钢铁业可以看出，国家发改委为支持民企发展已经完全不在乎中国的钢铁产业布局是否合理，技术是否先进。这也说明，先富起来的人是如何用他们借助政策妖风积累的财富来左右和窃取公权力。这部分内容摘自董玉振的博客文章《大字报：就华北雾霾和钢铁业布局问资国家发改委》（见博客 blog 一 sina 一 co 量. cn）。该文的和谐版被《财经》杂志 2015 年第 14 期发表了专家稿，标题为《钢铁业病态布局之祸》。

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家急需改革开放的经验探索。国内企业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隶属于国家交通部的香港招商局集团受命于国家需要，投资创办蛇口 I:业区。因为是国企，所以在政治上也可以大胆探索，为深圳经济特区快速成功和积累改革开放经验立下不朽的功勋。今天，招商局继续在世界各地投资基础设施，不论到哪里，投资什么，这些投资都会是中国全体国民的财富。招商局与斯里兰卡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有一块间于招商局的 99 年地契的土地，事实上代表中国政府以商业校式在外国的土地上运作属于中国国民的财富。在蛇口工业区建立初期，招商局还投资了中集集团，后者为中国海洋工程产业发展贡献卓著。



如果招商局是私人企业，上述所有这些投资活动还可以想象吗？1980 年，香港、寮湾和海外私人企业如此大规模投资内地的一家也没有，也不可能。霍英东在广州投资白天鹅酒店，泰国正大集团在深圳投资一个工厂已经让中国政府感恩戴德。只有招商局这样的国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国家需要置于核心位置，随时厉行必要的国家使命——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一带一路”。

国有企业在保留国民财富和国家复兴的火种与基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些民企如万达集团大量对外投资时，那些海外投资项目与中国有多大关系？如果王健林和主要大股东都移民海外，这些投资与中国已经没有了关系。民企在投资时，对于公共利益的兼顾上，经常是放在次要位置。就拿万达来说，管理层很有能力，它确实赚取巨额财富，但在各地拿地时的强势作风，肆意要求变更城市用地规划，只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完全不顾作

为大企业的社会责任。以长沙万达广场为例：万达广场所处五一路口，背靠五一商圈，面向湘江和橘子洲，从区位价值、城市天际线及临江景观考虑，这一带都是发展高层酒店和高档办公楼的合适地块，但长沙市政府为吸引万达，只好同意万达的要求，将该地块改为住宅用地，对这一关键节点位置的城市形象造成破坏。但万达才不管城市形象如何，反正改为高层住宅用地而为公司带来巨额“快钱”目的已经达到。在万达广场、办公楼和酒店建成后没几年，万达就在赚足了长沙的钱后将这些卖掉。这样的企业真是中国需要的吗？对国民的利益又在哪里？“先富带后富”如何体现的？大连市西岗区将区属国企改制给王健林等，西岗百姓得到什么好处？所有这些问题，给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改制到底为了什么，目的是否达到，还是事与愿违？

当然，笔者无意否定王健林等万达高管的经营水平，但能力与责任并不一定同时存在，在不顾责任的情况下，能力只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力。万达是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国企通过改制变成民企，国家改制的目的是这个改制后的民企能够先富带后富，为国家和社会均富做出更大贡献；但改制后的民企很快把自己是如何来的，以及改制过程中赋予的道义责任忘得一干二净，然后以完全市场化和利益最大化来决策，甚至为了商业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原有的道义责任完全不复存在。相反，大量以国企底子做大的民企以这个企业为依托，变成资本“大力士”，借助于他们本来在官场的厚实资源条件，开始通过影辨媒体和政府决策，更大规模影响社会舆论和蚕食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债务和污染留在国内，转移资产至海外。他们的行为给那些愚蕂的搞改制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一个响亮的耳光，并将这些所谓改革派官员和经济学家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是必然趋势，这方面也是他们的权力，只要不是把债务和污染留下，随便去哪里都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他们能从国外银行搞到钱去国外投资，那是值得喝彩的。英国对外投资长期在全球居于高位，这丝毫无助于扭转英国自身的衰退，最后只是换得可能已经移居海外的那些投资人财富增长。友邦保险创立于上海，但后来它成为一家美国公司；汇丰银行创立于上海，后来成为以英国殖民地下的香港为总部的银行，在获得香港发钞权的情况下，1997 年前它又将总部迁往伦敦。你指望这样的企业来肩负起一个国家稳定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资任？而 1872 年同样创立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则诚为现在的香港招商局集团和岳湾阳明海运，为两岸三地的发展持续做出积极的贡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将优秀国企改制和“混合”的领导人，他们的鲁莽、愚蠢和轻率，早晚受到历史的评判，从理论上，还是道义上，甚至国家长远利益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政治家的短见永远是国家最大的危害之所在。至于国内那些大谈改制和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学家们，我承认你们是西方经济学的优秀学生，但在我看来，你们属于战略层面的白痴，如果你们不是收受海外基金赞助而别有用心的话。

至于国内一些整天为国企改制和私有化摇旗呐喊的媒体，笔者实在不明白，你们到底能从中得到多大的好处而喊叫的如此 n 力。为某些权势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去摧毁自己子孙后代的和谐生存环境，算得上是中国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最无聊的一种嗜好。

如果说共产党当年没收官僚资本是一场革命，那么国企改制则是逆操作，将公共资产强制私有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是改革旗号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向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渐进式、隐

蔽式过渡的公私合营，是 1949 年建国后私人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逆操作，是彻底葬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关键一步。中共中央如果不立即喊停，那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下一步到底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还是彻底退回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是后者，国企改制将实际上成为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而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那毛泽东晚年所担心的真的变成了现实，无数革命先烈的血真的白流了。1949 年后又何必搞社会主义改造呢？毛泽东时代一代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焕发主人翁精神而无私奉献换来的产业基础，最后彻底葬送，改革开放这几代领导人将永远无法洗脱推动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倒退的历史罪责。

强制国企私有化，到混合所有制，下一步可能就是彻底私有化国有资产，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步骤怎么看都和西方国家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兜售的理念吻合，这仅仅是巧合，还是中央高层出现了西方的代理人，还是中央高层领导人在精神上成为西方的奴仆？这是值得深思的疑点。

下一步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了！！

八、如何看待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49 年新中国建国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方式是首先通过公私合营，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公有化。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工商业者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合营企业里享受着管理权和很高的薪金待遇，甚至有些资本家在离开原来的企业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后，仍享有比同等级别的官员远远高出的薪金待遇。正因为初期公私合营阶段的谨慎和务实，使得资本家在接受新政权的管理方面，困难较少，有所谓“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直到“文革”爆发，资本家的合法权益（也包括不合法权益）被制止，公私合营经济被完全公有化。

今天重新来看待这一事件，不可否定，对待资本家和私人资产的粗暴手法是不恰当的。毕竟，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大多数是爱国敬业的经营者，为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尤其是那些资本家及其后代，是否应因此指责毛泽东呢？

历史的进程幷非直线条的。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I1:出现，使人类似乎看到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非人道、不公平现象的道路选择。人类显然把一种全新的生存形态的产生和规划看得过于简单了。在私人经济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过渡，和如何对待资本家这个课题上，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处理的完美，更谈不上绝对公平。相比较而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私营经济改造，虽然有对资本家的不公平之处，但却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手段最柔和，也相对较具有合理性的一个，至少在“文革”之前是这样。而苏维埃俄国则对资本家不是进行改造，而是一杀了之。

虽然今天私营经济受到鼓励和保护，但今人没必要，也不应该因此而对过去否定私营经济的历史后悔或指责，即使历史让中国百姓重新选择，在1949 年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中国人民会选择谁呢？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次不可能完美的试验。对那些

曾为地方工商业发展做出贡献，后被没收财产的资本家，后人只能留有一份感谢，这是面对过去这段复杂历史时，不得不有的宿命情节。毕竟，完全凭靠私营经济，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从国家发展的整体得失来看，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在 1949 年的当时背景下相对较为有利的选择；虽然社会主义道路到底该怎么走，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土地改革过程中被没收的土地和被批斗的地主，也有不少人是乐善好施的；但没有这场带有血腥味的土改，中国土地的高度集中就无法根治，将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贫民失去生活的保障，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对多数人的人道主义就无从谈起。台湾在 1950 年后开始的，以官僚资产和没收日资股份换取台湾地主的土地，然后分配给广大贫民的做法固然温和，但这种做法在贫穷而辽阔的大陆则根本行不通。“革命”则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那些乐善好施、遵纪守法的地主和资本家部分遭受不公平对待，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社会大转型时，要确保所有利益集团之间的完全公正，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关键是，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否在转型过程中趋向更好。毫无疑问，1949 年后大陆的社会发展成果给出了相对满意的答案。以今天的政治环境，去评价昨天的道路选择，并不是客观理智的历史观。

如果那些资本家和地主的后代纯粹基于自己家族的损失而对毛泽东及其时代予以否定，虽然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也暴露了他们的自私和狭隘。

当然，后来国企改制又把这些企业改给另一个共产党家族，上节已谈到，这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对革命先烈极具讽刺性！

九、如何看待同时期日本的崛起

反毛和反共人士常用中国和日本战后的不同发展结果，来说明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失败；理由是：五十年代中、日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至七十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已相当于中国的三倍。

即使没有任何政治好恶倾向的人士，似乎对此也给予认可。社会各界人士，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它国人，无论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及广大民众，更异口同声地将日本的战后崛起，视之为“奇迹”，至今无人对此提出质疑。

曰本战后的迅速崛起果真是奇迹吗，还是发展的正常结果？

虽然汇率的确定和合理性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
日本经过同样三十年的发展而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中国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层次，这是不争的事货。如何看待这一发展结果上的差距呢？其实，这不仅仅是为毛泽东时代和中共领导能力辩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看待日本发展国策的问题。这也将影响到政治家们在制定国家发展政策时的战略考量。

二战以日本的战败而结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的城市和工业设施部份被摧毁，说日本部分城市成为“废墟”并不算过分夸张。但要说日本的大部分社会财富因此而化为乌有，则不切合 K 际。至少有下列设施和资源还很好的保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交通道路设施，包括公路、铁路、大部分桥梁和港口（港口上的房屋建筑相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码头本身而言，其价值微不

足道），城市自来水和通讯、输电系统的地下管线，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更重要也是最具根本意义的一笔财富完好地保留下来，那就是“人”。日本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包括工程师、教授、现代工商业经营管理人才以及近百分之百的全民识字率等，为日本的战后崛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二战结束前，日本的现代工业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具有建造飞机和航空母舰的技术实力。这在亚洲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因此，日本的重新崛起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曰本所需要的“东风”，包括将高素质的劳动力转化为物质生产能力所必须的资金，以及推动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市场。日本是幸运的，美国的资金援助、美国驻军所提供的就地采购资金、朝鲜战争提供的市场机会、美国市场的低关税进口优惠、降低至零的国防开支等，无不为日本的崛起创造了完整的条件和环境。曰本对美国成熟技术的模仿和美国对民用技术转让的宽松，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以及日本战败后的“哀兵”之势，也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因此，日本在战后的崛起，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事物发展的正常结果。

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一场大地震将东亚“四小龙”的工商业设施摧毁，但绝大多数工程师、管理人才等社会精英力量和具有一定教育素质的平民得以幸存。这时，如果有一笔庞大的国际资金援助和世界主要市场的准入优惠，那么，该“四小龙”将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崛起。但如果同样的一笔资金和优惠给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即使多给他们三十年的时间，他们也难于达到四小龙的发展水平。

1949 年后，中国除了廉洁的领导集体，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

人民的积极奉献精神，上述日本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中国一样也不具备（除中苏蜜月带来的有限技术援助）；而同时代的中国，除沿海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些轻工业，没有值得一提的现代工业，国家的基础设施也不堪一顾，很多县甚至缺乏公路和基本的现代交通工具，国家的教育体系和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极为低下。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使本来就薄弱的基础设施遭受巨大破坏。尤其糟糕的是，中国恶劣的国际环境，使得国家不得不拿出有限资源的不小部分支持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国防力量。国内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得国家在毛泽东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另外，中日两国劳动力素质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在相同的资金投入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素质和运行效益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别。

因此，将中日同时代的经济发展相提并论是不客观的，因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拿中国和其它国家进行对比的话，那么，印度可能是唯一具备相似起点而国情相近的国家；而在毛泽东逝世时，中国的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均已全面超越印度。

至于日本战前所确定的优势和今天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日本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对它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掠夺。当然，中国过去百年的艰难困境和今日的巨大差距，除朝代更迭、制度落后和传统社会的转型等因素外，日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巨大破坏是不应该否定的。

对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具有深远影响的当数甲午赔款。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但中国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的战争赔款，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财政能力，而同时则极大

地提高了日本的国力，几乎在一夜之间，使日本解决了近代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日本也迅速成了暴发户。

仅拿《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来说，中国向日本赔款 2 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 3000 万两，威海日军驻兵费用 150 万两（真是无耻到了极至），共 23150 万两白银，折合当时的曰圆为 3.5 亿元，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8000 万日圆）的 4 倍多。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中国掠夺了相当于一亿日圆的大量战利品。日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滚滚财源，“无论政府和私人朝野顿觉无比富裕”（曾任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语）。日本用这笔钱的大多数（约 3 亿日圆），建立了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其中著名的八幡制铁所仅用了不到 60 万日圆，打下了日本钢铁工业的基础。由此可以想象，那笔巨大的资金帮助日本建立了什么样的庞大工业基础。日本一步跨越了西方国家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也为日本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做了最好的前期准备。

这笔资金也协助日本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把日本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笔款项还推动了日本全民教育，为建立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打下了基础。

曰本在战前确立的优势在战后迅速恢复，并在资源争夺方面长期居于有利地位。所以，当今天的日本人不承认他们应对先辈的孽债负责时，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漠视，和对民族发展渐进性和承继性的无知。

如果今天中国政府突然得到从天而降的 5 万亿元资金（中国年财政收入的 4 倍），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将立即得到解决，中国的潜力也会得到迅速而强大地爆发出来。

为了偿还这笔赔款，清政府先后向俄、法、英、德的银团完

成三笔贷款达 3.09 亿两白银，并在还清本息前，海关又外国人控制。中国政府为此支付的本息达 6 亿两白银。面对这笔庞大的支付，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已很难再有前进的能量。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才算有了喘息的机会，并迎来了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区域布局也过分集中在沿海的几个中心城市，但国家经济在内陆地区军阀混战的硝烟中已有了起飞的征兆。非常悲哀的是，在中华有望中兴的时刻，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阻止了中国经济的强大势头，使得中国的崛起再次夭折在日本人的手里，为民族复兴带来的巨大损失，无论怎样夸张也不算过分。

上面这段文字似乎超越了本书的主题，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回顾这段痛心的历史。对于中国人，这段历史必需记取并认识它对中国发展的巨大迟滞作用；对于日本人，必须明白他们对中国的永久性亏欠。

如果向日本索赔的话，日本对中国的欠款本息将在 10 万亿美元以上，那么日本将立即变成一个穷光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曰本对华贷款本息几百亿美元，还经常大放厥词。考虑到德国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赔偿，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绝愤还这笔贷款。当然日本政府能主动本着中日友好放弃这笔贷款的话，多少可以为先人的孽债作象征性的补偿，也为后世日本人带来少许的体面。

八年抗战，再经三年内战，中国再次沦为一穷二白。而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两年，大印钞票货币，还预先征税，一口气预征到 1985 年（真够无耻的）；更通过金圆券将大陆的黄金搜刮一空。

共产党手里更是空空如也，以至于 1948 年 11 月 26 日人民币开始发行时，没有黄金作为货币基础。发行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让对货币的金本位机制有所了解的人笑不出来的可笑社论，社论宣布：人民币不以黄金为基础，因为“我们的人民不喜欢黄金”。

蒋介石将搜刮来的黄金运到台湾后甚至举办展览，让台湾人民领略他老人家仅有的丰硕战果。49 年前，一些资本家将资产移往香港、台辫和海外，更削薄了大陆本来就薄弱的家底。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摇头叹息：很难想象谁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摆脱贫穷。

不难想象，1949 年毛泽东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在此后短短一、二十年里，当飞机上天、巨轮下水、核弹爆炸、卫星遨游、完整工业体系确立、公费医疗、义务教育、江河得到治理、逃荒要饭基本消失、和美法苏印等所有大国交手并取胜、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并在航天、航空、军工、体育、基础科学等领域把日本抛在后面。此时此刻，天下任何炎黄子孙都不难想象，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大陆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什么样的伟大贡献！

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和日本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是通过掠夺的手段来达到，而中国则是通过对“一盘散沙”的人民的有效组织，和爱国主义及劳动热情的强力激励来实现的。

而领导组织激励中国人民的核心人物，就是毛泽东。

十、小结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山河残破，国无宁日；只有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统和发展经济的良好内部环境。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代人来说，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长的错误也不应给予过多的指责。毕竟他们也是出于良好心愿，而非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换了别人也很可能犯类似的错误。总结历史的目的应在吸取教训，而非指责先贤。更不应以双重标准，贬毛以扬邓。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事业是渐进式和借鉴式的改良运动。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没有系统性的指导理论来规划中国的未来，如果中共领袖们的只言片语不包括在内的话。

如果要说中国的“革命事业”，其实从 1949 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1999 年 8 月 10 日建国 50 周年来临前夕，《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 RoneTempest 的一篇报道，他写道：“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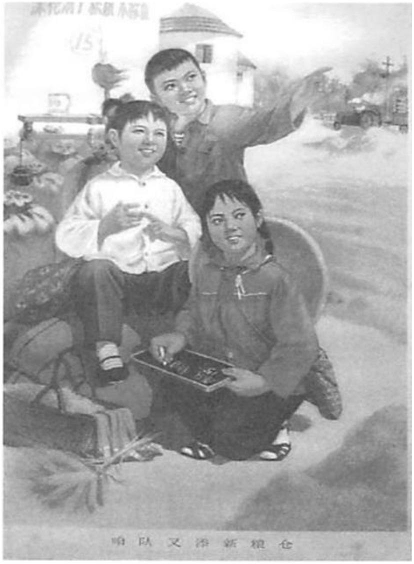
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彻底的改革。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 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 1966-1976 年‘文革’的政治迫害。但是，特别是在 50 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量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AmartyaSen）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状况时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改革的合理性。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尽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4]。



中国人民有志气。图中右边两位为钱学森和陈永贵

第二章 計劃生育與農民[1]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超过两个。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太多涉及农业，比较毛、邓对农业的贡献不能回避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一、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的不可行性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即：错批一个马寅初，中国多生几亿人。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8]

[8]本章内容在第二版增加了第六和七节。其它部分基本没变。虽然中国今日的三农问题已经与该部分最初写作时的 1998 年和第一版写作时的 2002 年有很大不同，但当时的历史状况是观察政府在"三农"和计划生育问题不可忽略的背景要素。实际上，过去十多年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继续是受剥削的弱势群体。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当年毛泽东曾肯定马寅初的理论，并支持马在国务会议上 1 削述他的《人口论》思想。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资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刺生育，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并没有任何的用处。邓小平主政后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或养老保险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老人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一胎化”虽有可以理解的无奈，但对农民则是极不公正的。

面对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酷现实，各级政府面临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异常疯狂的计划生育风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辔。这一影响被社会学家完全忽略。

这场风暴是以高额罚款、拘留等手段，对付超生的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刚尝到甜头，高额的计刺生育罚款又将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乡来说，当时多生一个孩子被罚二、三千元，约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单一个三百人的小村庄一年的罚款额就高达四、五万元人民币，连续多年保持这一水平。对大多数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来年补足外，还被牵走羊、猪等家禽，拿走农具等；甚至一度推出个连续罚款十三年，孩子不得上户口的残酷政策（后来被取消）。每到检查计划生育季节，小村庄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们讲“当年国民党还乡团也没这样坏过”。

由于罚款额由基层干部确定，罚款也无收据，而国家政策中也无此项明文规定，所有罚款全部被贪污。如果说价格双轨制开启了城市特权阶层大肆劫掠社会财富大门的话，农村干部的大面积鲸吞农民财富则始于计划生育罚款。毫不夸张地说，农村年轻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须为基层干部家白干三年活。

中国的农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即使在他们被罚得苦不堪言时，您听他们怎么说：“计训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后没地种还吃什么”。如果邓小平能象毛泽东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并将罚款用于公益事业，农民的抵触情绪也不会那么强烈。计刺生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巨大。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当农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成了土

地的主人时，却因多生个孩子而被他们为之牺牲的政权牵走牲畜，罚得倾家荡产，甚至四处躲避；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宁愿选择和人民一起挨饿。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严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

尤其是核武器的产生和可能应用，对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来说是不能忽略的。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毛泽东不会天真地幻想敌人不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他在嘲笑原子弹是“纸老虎”的同时，加紧建造自己的“纸老虎”。五七年，在莫斯科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上，毛泽东针对美国的核威胁发出豪言壮语：“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不少人对毛泽东的发言大加贬斥，批评毛泽东对人类生命的漠视。笔者也不认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更不会肤浅地认为他不珍惜生命，作为中国的元首，他应该认真地考虑过核战争的可能性，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并以老庄思想无惧地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核战争。从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1969 年苏联对中国的原子攻击已经是箭在弦上，才使得中国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并加速三线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我读小学时村庄的墙上还时不时贴上如何防核武器的布告。美国曾五次考虑对中国动用核武器。毛泽东去世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说什么“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的形势”等。没有爆发原子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能说明当初的准备是错误的，相反，抱着侥幸心理而不做充分的准备才是愚蠡和不负责任的。面对原子战争时代，避免亡种灭族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生孩子。

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个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基础将变得异常脆弱。（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军队建设，请参考第十章第五节）直到 70 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相应得到改善，苏联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同时降低；“计划生育”才重新走上台面。1975 年底，毛泽东在审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报告时提到：看来人口非控制不可了。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决定了，这时已很难启动一些涉及全局的重大政策，留下了永


合作社里装电灯（1958）

久性的遗憾。只有留给后来这些只惝得罚款的政治人物去胡乱折腾了。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不具备任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

二、农业改革的尴尬

计划生育罚款开阔了基层干部的第口，在计划生育罚款开始不久，农村乱收费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费就高达三十多项。名目繁多的收费已使“干部进村”和“鬼子进村”具有同样的含义。您民集体砸坏乡镇政府，赶走干部，乃至干部吓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一九九三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作者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难免“幸灾乐祸”，“幸”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农民的

2

希望，对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认识。老实且富忍耐力的中国农民只要过得去，就不会到政府门前示威，也就没人注意他们的遭遇。他们只能以农民式的幽默表达不满，如“毛主席万岁，邓小平万税”；江泽民主政后，则有“毛宰东（家），江宰（人）民”（在江北一些地区，“宰”有时和“泽”读同音)等。农民的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但他们不积极行吗？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余钱购买下一季的化肥等生产资料。“文革”期间，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约为十至十二小时，现在至少会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当邓小平的改革让他们获取大量收益时，政府和贪官的手又将其全部拿去，留下几枚可怜的硬币。农民的节俭会让他们几年后建起砖房，买上电视，但他们对此并不领情。他们说“如果按当年毛主席的方法，咱们现在也会盖新房，买电视，干得也不会这样累”。农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

作者开始读博士时，对家乡农民来说无疑是学识“渊博”的。每次放假探亲，乡亲们总焦急地问：“政府还让不让咱们活”，“共产党还是毛主席那时的共产党吗”，“以后这农业怎么搞法”。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呼吁“政府能让我们歇三年，也能攒点生意本不”。很遗憾，我无法给他们一丝安慰。由一群不懂农业，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官员制定的农业政策，是不会给农民机会的。政府在城市改革方面谨小慎微，但在农业问题上则轻易使出十八套剧本，虽然剧本的内容糟糕透顶。

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乘上经济发展的头班快车。当内陆地区农民商品意识觉醒，准备搭上后一班快车时，计划生育罚款和无穷的收费已无情地剥夺了他们买票的权力。也许，内陆地区的农民们已永久地错过了本来存在的发展机

会，因创业的成本越来越远地偏离他们的能力。

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国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对农民的二十九项收费（真够无耻的）。这是涉及农民生活每个细节的收费。其中有些收费只需到农家小院站上五分钟就能发现它的荒谬。之后，笔者曾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考虑将粮、棉、油基本作物有关的农业税全免，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税收削减。这一建议显然未被考虑。农业税收在国家的整体税收中所占比例很小，经开源节流，缩减基层政权的人员编制，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影响。和干部吃喝开支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这确是给农民的一点安慰和希望。[9]

如果您到广大内陆地区的县城走一道，会见到漂亮的路灯，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厦。可当您得知这儿没有一家工厂赚钱的时候，就会明白是谁在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转。给农民一份希望，也等于给城市一份希望，给国家一份希望。国家对每个城市人口在市政、就业方面要大量投资，国家给农民的仅是一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直到进入了新的世纪，面对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农村消费不振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中国政府才认真具体地对待农民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实际收入减少的问题。但面对异常庞大的基层干部队伍，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只有拭目以待吧。

固然，农村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养活众多的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业政策，显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以“投入产出比”这一惯用的方法来评价的话，考虑劳动量增加和

[9]直到 2004 年（本书第一版上市一年后）第四代领导集体上台，才取消了农业税等多项税种。同时取消基础教育学费，农民负担才得以减轻，但这时，城市工资快速提高，农业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了。

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及子女教育费用（属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增加等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如果不算一场彻底失败的话，至少也乏善可陈。

农业改革能迅速取得成功与毛泽东时期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70 年代初引进的 13 套大化肥设备至 1979 年建成投产，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用肥结构和肥效。利用农闲时间把全部的农民组织起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煨田水利基本建设，开挖了密布的河网，大小水库和小水电的建设基本完成，“文革”十年排灌动力机械增长 4.9 倍，旱涝保收的物质基础建成。千百年来靠自然形成的农村羊肠小道被笔直宽阔的道路网所取代（这同样是空前绝后的成就。改革开放后很少再修路挖河），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生活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也有较大提高，1975 年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 1965 年的 6.7 倍和 66 倍（中国的拖拉机既是农村最佳运输工具，又是收割、耕地、灌溉、打场的设备）。杂交水稻等优良品种开始推广。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直接推动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遍布各省、各专区的各类农业大、中专院校也在毛泽东时期建立起来。所有这些成就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发挥到极限，当农民走向城市，或试图发展其它产业时，农业生产已变成了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否应重新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甚至企业化道路，已再次引起专家的兴趣。毕竟，靠

那人均一亩多土地的单干，是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的。生产成本的居高不下一也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力



三、“社队工厂”与“乡镇企业”

人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改革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并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公社一级的“社队工厂”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农村改革后，这些企业像集体农业机械一样被废弃、鲸吞。像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购置了用于运输和农耕的拖拉机，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5]。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训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毛泽东时期的社队企业，为农民带来了最初的工业化概念，也为社队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为毛泽东时代农村学校的建设、卫生事业的发展、农业机械的采购提供了资金，也促进了公社所在地的城镇化发展。但当今日的人们谈论“文革”的劣迹时，从来没人去注意发生在中国广大农村的，这一具有革命性的进步。虽然在中国政府的统计资料里难以查到有关的准确数据，但以笔者家乡（在中国触于相对较落后地区）的当时发展状况，笔者可以肯定，农村大队、公社及县级工业在 1976 年已达到了惊

人的规模，使得从来没见过工厂什么样的中国农民，近距离地感受了工业的运作。至于较发达地区的江浙一带的地方工业规模，将更为可观，这为后来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作了多年的技术和人才上的准备。没有当时的社队企业的基础，后来的乡镇企业和一些私人企业的崛起将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浙江著名的私人企业家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以汽车万向节为主导产品，并销往海内外。但是，鲁冠球的万向节工业的起点在哪里呢？在 1969 年当地成立的“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当时作为打铁匠的鲁冠球和几位农民，以公社投资的 4 千元资金（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目，那时一台 25 马力中型拖拉机连同拖斗和耕犁的价格不到 4000 元，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低于 50 元。到八十年代中，“万元户”还是巨富）成立这个厂，生产拖拉机用的万向节。如果没有这个厂，鲁冠球个人绝对没有能力拿出最初的这笔资金，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当时的他也难以设计出生产万向节的构思，这超越他当时的眼界。再者，在这个工厂里，每个人抱着纯朴的心态工作，没有奖金，大家在为集体做事。如果一开始就让鲁冠球自己搞到大笔钱去办厂，员工是否还会不计酬劳的奉献呢？可以说，这个原始的工厂给了鲁冠球一个机会，让他了解工业的运作和万向节工业的市场特点。如果没有这个厂，今日的万向集团根本就不会出现，也没人知道鲁冠球是谁？

在中国像鲁冠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当今日的鲁冠球等私人企业家、成功的乡镇企业，和关心中国工业发展的人们在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最好不要忘记毛泽东时代的基础性和全域性的贡献，对“文革”期间中国的实际发展，应该保持一份尊重和感激。鲁冠球们和今日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实际上是毛泽东时期公有经济发展的直接受惠者。他们在取得一定成就后有责

任回馏社会。当然，对过去历史的强调，丝毫不影响对当代杰出民营企业家个人能力的肯定。



追出顺便谈一下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一场基层行政区划的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告别了旧有的乡镇和自然村的基层政权体系，确立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党政体系。固然，这一体系的确立，是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产物。但到了后来，它本身已经没有了成立初期的极“左”色彩，实际上和人民公社化前的乡镇政体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改革开放后，它和现在的乡镇.猫政体系已具有同样的职责和性乱虽挂了个“左”帽子，并不影响改革的进行。但后来基于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一切“左”的内容，人民公社党政体系也随之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乡镇党政体系（按五十年代初的乡镇区划，有的称乡，有的叫镇）。这项改革所造成的严重问题被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完全忽略。[10]

第一个问题是工商业的巨大损失和集体经济的流失。

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社队企业。两于公社改乡镇在行政区划上发生变化，随之带来产业归属的问题，伴随着人员的流动（因原来的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是干部编制），大量企业被关闭。这类企业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或被私人承包，或发展壮大，对当地经济造成的不良后果较小；但对于广大内陆地

[10]真是悲哀，涉及中国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经常被社会学家和政府忽略。真不明白养那帮人干什么。养一群鸡还会下个蛋；可他们如果下“蛋”的话，经常是些“臭蛋”。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必要二次下乡。让他们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了解城市，但无法了解农村基层。

区来说，这类企业则是当地工业化仅有的火种。一旦这些火种熄灭，对当地有限的工业资源几乎是彻底地断送。今天广大内陆地区的就业不振，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与此难脱干系。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基层党政人员总编制的膨胀。

公社改乡镇，基本是恢复解放初期原有的乡镇行政区划，因此，这一改革导致乡镇政权单位增加了一半以上，后来有些太小的乡镇进行了合并，但笔者家乡所在的山东菏泽地区所有县的乡镇数量仍比原来的公社多。这为今日庞大的基层党政编制埋下了伏笔。这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和教育经费缺乏的主要负担来源。

第三是资金和土地上的浪费。

在这种分家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土木建设，耗资巨大（不少乡镇是以大集镇为乡镇公所，但原来这里没有办公室和家馏院，必须全部建新的）；而后来的合并又导致原来建设的房屋闲置，土地浪费，或不能充分利用。

可见，在毛后时代基于对毛泽东的否定，进行了不少不理智的行为。量是令人痛心的。

四、政权的无情、无能与农民的新苦难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最感到满意的时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约在 1986 年前；虽然计划生育罚款对农民的收入造

成较大影响，但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必要性毕竟能让广大农民理解，为了多要个孩子，即使艰苦一点也在心理上能够接受。而同时，乡镇企业使得一些地区迅速富裕起来，城乡差别在个别地区迅速缩小。虽然受惠的地区和人口是少数，但傅媒的大力宣传推动，使得农民看到了发家的希望。因此在农民的心态上比较平和。随着苛捐杂税在 80 年代后期的迅速增加，官员贪污的表面化，学费的急剧提高，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成倍增长，农民收入（无论相对还是绝对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农民对改革的热情降温，精神和生活上的困苦也随之来临。

没有争取就难有获得，而在对国家资源的争取方面，农民哪是城市的对手！中国的政治家在面对舆论时不会意识到，农民对舆论的影响随着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庸俗化，也越来越微弱。

只要想一下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央政府，竟然在九十年代初的两年多时间内，没有安排一位专责农业工作的副总理就能明白，在粮食供应问题不再威胁到政府的威望和生存时，农业和农民利益在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心目中的分蛩，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中国农民收入的问题由来已久，八十年代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后就已开始显现，但直到今日才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然，至今还仅仅是“重视”而已，何时能出“重拳”？！

朱熔基任总理后一再表示对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注和急迫感，并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会诊，这虽然晚了点，也多少令笔者欣慰。但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真的那么难吗？如果中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能将中同农民看成自己衣食父母、同胞兄弟，您将会发现，解决或至少缓解农民收入问题将易如反掌。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七月三日的报道称，“中国可能取消由国家规定的底限粮价，如果落实，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蒙受惨重损失的农民，将面对另一波打击。中国政府智囊团提出改革，让私营贸易商自定价格，直接向农民购买穀类。一旦实施，这将给中国 9 亿农民增添新压力”。中国的粮食采购体系存在不少问题，有改革的必要，但在相关维护农民收入稳定的措施没有作好准备前，这辩策士们就敢提出放开粮价，真是莽撞得可以。而一大陆经济学博士在香港凤凰卫视一论坛节目中更阐述了的如下观点：中国的发展不得不牺牲农民的利益，以集中力量发展城市。

听到这些经济学家们和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言论，您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对经济学家开的那个黑色的著名玩笑，在中国真的部分变成了现实。对这微学者，笔者无意评判他们的道德，但从他们的言论中您不得不藐视他们的专业水平。一个读书人，只要稍微了解一点经济学常识，对一个健康经济体追求的指标有丁点的认识，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哪怕只是听说过，即使纯粹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考量，也不会提出如此愚蠢的论调。

现在的粮食价格如果算是对农业补贴的话，政府也没有值得炫耀。仅毛泽东时代国家工业化就向农民剥削了巨额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完成工业化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最露骨、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就是实行三十多年，由陈云发明的“统购统销”政策。

所谓“统购”，就是农民必须把指定的农作物产品卖给政府，而且以政府确定的价格交易。这种方式保证了城市的粮食供应，但农民却面临自身的粮食自给和布票等一堆票证的限制。根

据不同学者的研究，从 1952 年至 1986 年，通过“剪刀差”向农民暴敛了 6000 亿至 8000 亿的财富[6∽10]。除此之外，在 1952 至 1978 年，农业税收共达 7264 亿元，扣除国家给农业的发展建设等方面资金 1730 亿元，农业在这期间的净贡献至少在 5534 亿元一。因此从五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后期政府开始提供粮食价格补贴为止，政府从农业剥削的总财富将不少于 15000 亿元。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然，让政府和城市偿还农民这笔钱是困难的，那么如果把它看成农民给国家的无限期贷款如何？政府在初期的三十多年没有为此支付利息，以利息加上本金，那么在八十年代末期（以 86 年为截止年）政府欠了农民多少钱呢？即使按年均 6%利率和每年等额贷款计算，这个数据将在 6 万亿以上（忽略政府导致通货膨胀的庄家角色，虽然债务人让货币贬值稍微可耻了一点）。那么从八十年代末期政府需每年为此支付近 3600 亿的利息。因此，今天的粮食补贴款将连这笔利息的零头都不够，其余款足以让所有农家子弟免费讀完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同时协助大多数乡村在未来几年内完成普通的油面公路和通讯设施建设。

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和农民消费）是一个准内循环系统，农民在生活和生产资料上的开支，最终经过一个很长的消费链流入城市，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对中小城镇的影响尤其巨大。政府支付的这点“利息”将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综合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而政府在大都会的开支或向外国的工业项目贷款，将有更高的比例流入国际市场。

所以，农民根本不需要为那点糊食款补贴道谢，因这是他们应得的回报！而中国政府更没资格将此当作自己的政绩，或视为

对农民的关怀和照顾！但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城市知识分子，根本忽略对农民的这些巨额亏欠。

当中国加入 WTO 时，政府潇洒

地牺牲了农业的利益而至今不设置任何的补救措施。笔者无意怀疑朱熔基对农民收入问题的“真头疼”，更不敢指望朱总理的个人智慧能解决所有问题，关链是您老人家是否意识到，您身边的那量所谓的“智潢”实在是“窝囊”得可以。

上述分析，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甚至一个仅能识字的农民也能读愤上面的文字。但非常可悲的是，至今没有任何官方经济学者或政府官员公开做出类似的刚述，相反，从经济学家到不少高层官员都在忙着强调粮食价格补贴对中央财政的负担和对农民的关爱，逼得笔者这样一个理工科毕业生不得不在此激扬文字，以多少弥补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那严重亏欠的良心！

有时，笔者身为一名工学博士，真希望能对这辩所谓的“经济学家”大吼一声：住嘴，你们这群饭桶！

令广大的农民群众难于容忍的除经济问题，更要命的是基层和各级干部的全方位腐化，使得老实的农民在缺乏任何有组织反抗的情况下，只有默默地忍受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不公。中国基层党政和民主体系至今没有设置保护农民利益的有效机制。最近几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很受注目的节目《焦点访谈》，揭露了一系列坑农的事件，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农民已从总体上成为中国的二等公民：在经济上，他们已严重地被边缘化；在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力上，他们已无力应付高不可攀的学费（笔者不能理解，国家教委在推动教育普及和实现受

教育机会平等方面责无旁贷，而中国的教育国情不难把握，可教委过去十多年的作为，分明在把国家带往相反的方向。而笔者对基层教育的认识，没发现教委做过任何有价值的行动来改善农村的教育质量，降低入校门槛）[11]^从国家体制上，由于官员的曰益腐败，权力寻租的结果使农民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基本的重视；走向城市的农民工，在安全、薪水和尊严等多方面受到城市的剥削和欺负（如无薪加班加点，对工人的漫骂，缺乏工会保护，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等）而很少受到体制的制约，中国取之不尽的劳动力大军，使得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尤其是港台企业）对以农民工为主的员工任意剥削，而不担心劳动力的短缺；而各地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对员工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置之不理；在舆论上，他们没有自己的渠道，更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而顺便“压倒”他们的呐喊……。

总之，农民，这个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给予过无私的奉献，也是历朝历代保家卫国将士的主要来源，新中国的多次民族战争中，农民子弟始终是冲锋陷阵的主力，今天，至少在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政权的弃儿。

资本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法劳动者，让他们加入共产党笔者不会反对，但共产党必须肩负起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责任；这即

[11]第二版加注：教育产业化是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给中华民族挖的个大坑。在当时导致众多农民家庭孩子学费成为难以应付的开支。希望工程应运而生。所以，我不歌颂希望工程，就是因为这是政府渎职的结果。直到 2004 年第四代上台，才取消了小学学费。但教育产业化导致农村公立教育衰微，优秀教师被挖进城镇私立学校，使得很多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进昂贵的私人学校读书，继续承受着教育体系的剥削。教育产业化——这是中国这种人口大国最白痴的政策之一。

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所在，也是对执政党的道德要求。即使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不能很好地得到政府的保护，同样将面临道德和政治利益上的挑战。如果忽略农民利益，那震天动地的“三个代表”中至少一个“代表”就要立即作废。

中国农民，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独特群体，刚毅中不失一分柔和与忍耐；无比的坚韧和吃苦耐劳。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辉煌历史从本质上讲是农民铸造的历史。他们看似愚昧落后的外表下，始终保留一份狭义和大公。当民族面临危急关头，他们也许没机会成为领导者，但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最坚定参与者。西方人不可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政治人物和城市知识分子同樣难以了解农民，因为他们已在城市的浮华和功利世界里丢失了自己宝贵的朴实和侠义精神。外国对中国农民的不了解，使得他们以为在军事上占领城市就可以统治中国，而最终败在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中国军人的手下；中国精英阶层对农民的不了解，使得他们以为搞好城市就可以搞好中国，而最终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果政治家在亏待老实巴交的农民时，以为没人会注意到他们的施政缺陷，或不影响他们的历史地位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大多数生活在舒适城市里的学者不太注意农民的利益，但至少还有象笔者这样有点良知，且知农爱农的知识分子的存在，随时准备站出来为农民的苦难命运大鸣不平！

不知中国未来是否还会出现一位令农民感怀的政治领袖，他懂得将农民放在心里。中国社会的媚俗化倾向，将使得中国所谓的“精英阶层”逐渐远离朴实和泥土。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与社会大众的脱节而必然影响到他们判断和政策咨询的科学性。日益量俗化的公务员队伍，更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

对今日的中国领导人是谁，以及有什么“高见”，或划时代

意义的伟大思想，农民们已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他们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敢抱多大的希望。去年底，家乡县委宣传部门到各村庄了解农民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情况。笔者不质疑“三个代表”的正确性，但让面对孩子学费问题而愁眉不展的农民学习“三个代表”，真是滑稽得离谱。憨厚的农民胆量越来越大，这让笔者感到欣慰。他们对县委领导的调查回答到：“能让当官的不贪污，别说三个代表，三十个我也能学会”、“支书、主任和会计，他们三个全代表了，就不代表老百姓”……。农民的幽默真令笔者自叹不如。

今曰的底层似民如果在政府部门没有亲朋关系，或认个当官的作干爹或干儿子，在面对委屈时，他们的主要选择就是“忍受”，因政府和司法系统已失去保护弱者和维护正义的功能。下面的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就其实质来看，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山西榆次市乌金山镇大略口村农民胡文海，自 2001 年 3 月 16 曰起，将搜集的家乡贪官证据材料，征得村里 121 名党员、干部、群众签名，开始艰苦告状的过程。从镇、区、市一直到省，循着公安、纪检两条路径，时间长达 8 个月。但是各级当权者只是大笔一挥，按原路批回给当地镇有关部门。当地权贵是腐败受益者，当然压下，不予理睬。这期间，村党支书欲杀人灭口，胡文海曾遭铁锹袭击头部，险些丧命。于是胡文海忍无可忍，用猎枪、斧头等凶器，对村干部及其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结果胡被判死刑。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判决是正确的。但该农民与几百年来的英雄侠客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呢？共产党曾教导笔者那么多关于旧社会某某人杀死恶霸和劣绅，投奔共产党的动人故事。那么，这位山西农民的命运又如何看待呢？他没有投奔共产党的敌对势力，或跑到国外瞎

喊，而是从认真搜集材料，征求民意支持，再一级一级上告，受到官府的推诿和贪官的威胁，走投无路，进而被迫行凶；说明他并不是个南莽之徒，对国家的法制和共产党还曾有过希望。面对国家政权机器的欺负，如果不是彻底的绝望，断然不会做出如此的“壮举”。他很清楚这样做等待他的是什么。

固然，笔者坚决反对一切罔顾国法之行为，但请中南海的那些“英明伟大”的领袖们告诉民众：在胡文海状告无门而又受到报复打击之时，应选择忍受，还是造反？是在沉默中死亡，还是在沉默中奋起？据笔者对中国民族性格的理解，“忍耐”可以说是最鲜明的性格特点，这既为逆境中生存，进而发展壮大提供了突出且优秀的民族素质，但同时使中国社会失去了完善和进步的动力，并导致草根阶层的长期苦难，因最劣质的政治文化也能长期生存而不担心民众的挑战。因此，笔者坚决主张对邪恶进行造反而不是忍耐，应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性格。即使按照共产党的“光荣革命传统”，也应该支持胡“在沉默中的甯起”。如果中国民众都像胡文海这样的“鲁莽”，中国的贪官们肯定不会如此放肆，类似胡文海的悲剧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胡文海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生产）等企业上交的 400 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 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

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 30 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 4 至 5 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这是勇士在“共产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最后战斗。

很痛心，凶手成了侠士，受害者却不值得同情；中国陷入严重的“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的尴尬境地，其根源在于中国“基本法”的严重扭曲，和政治环境的严重恶化。

读到这里，读者是否会对毛泽东发动“文革”，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历史背景产生一些联想？如果毛泽东九泉之下有知，面对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来一次“文革”或清洗，当然也会毫无疑问地得到人民的“万岁”；然后被清洗的这些特权阶级逮着机会就会骂毛泽东对他们的迫害。

如果笔者是法官，同样会判胡死刑，以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但当砍下他的头颅时，内心会向他致敬，因在这颗头颅下面支撑着的是一个不屈的脊梁；这根脊梁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性格保障！笔者做梦都希望中国农民能有十万个“胡文海”涌现，这是在国家司法体系失灵的情况下，农民自救、自保和自强的一点希望。

毛主席 1955 年杭州考察时得知吸 il 虫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给予高度关注。在他直接关怀下，虽然物资匮乏，但彻底消除了这一危害 12 个省，1000 万人感染，1 亿人受威胁的传染病。1958 年 6 月 30 日，毛主席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笔者拭目以待，看中央的领袖门如何处置那些“踢皮球”的官气以及在这场杀戮中漏网的贪腐之徒。腐败的晚清朝廷因“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能连撤一百多名官员；民国初年“杨三姐告状”一案，七十多名相关官员被追究，那么，在自称“代表先进文化和多数人民利益”、“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的新中国，面对胡文海一案，又将有多少官员被处理呢？

很显然，这群拥有高学历、讲话必“重要”、旗帜必“高举”、领导必“英明”、舞文弄墨、权谋高超、能歌善舞，就是不干事的“白面书生”们，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希望！[12]

权借上述文字为胡文海及受冤屈的亿万农民作点纪念吧！考察中国历史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最后岁月，笔者有信心地认为：当今大陆基层政权的无耻、反动和残暴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严重。再看看铺天盖地学习各种“伟大理论”的报道，您不得不承认，当今中共政权是集幽默、荒唐、可笑于一体的“政治马戏团”。这真是对文明古国人民智慧的空前戲弄。

不论城市建设得多么富丽堂皇，高速公路多么发达，也不能掩盖这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最不道德的一页。而第二、三两代

[12]第二版加注：改革开放以来，被特权阶级剥削欺压下受冤屈的总人数有多少呢？至少是“文革”、反右扩大化受伤害总人数的十倍。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受迫害固然令人同情，但中国精英阶层有多少为受冤屈的底层人民呐喊？这就是政治道德的差别，也凸显精英阶层的无耻！城市化过程中，牺牲农民利益的例子遍布全国。

政权将毛泽东时代的绝对政治优势完全断送，可谓创造人类历史上政治道德堕落的新速度。

中国共产党，这个成长于草根阶层的政党，也是让笔者三十年来爱戴、尊重、参于、寄予民族复兴希望的政党，是否正在悄悄地背离本来的轨道，而驶向它曾经打倒和批判的对立面？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曰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面对当今人们对毛泽东的缅怀，他的这首几十年前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下写就的诗，却给了最准确的解释。这真是历史的天大反讽。

五、毛主席和农民心连心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农民，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却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他们遭遇了太多的无助和欺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以他有力的大手给予过农民几十年的有限呵护。当然农民给予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反馈也是巨大的。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业和农民继续遭受着国家整体经济的剥削，城乡剪刀差没有缩小，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但他领导下的时

代是中国农民最具尊严的时代；农民们也无须为孩子的学费担心。虽然没有今天这样齐全的法律，但没有人欺负他们（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个无耻的政权时代）。而今天，一个肥头大耳的党支部记足以让全村人民生活得不自在而不会担心受到制裁。而中国政府里的这帮文弱书生们，至今没有拿出像样的行动，来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

即使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政策曾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和数百万农民的死亡，但朴实知足的农民轻易地原谅了他，原因很简单，领导干部们同样在遭受饥饿的折磨，就连毛泽东的女儿也难以幸免(笔者相信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虽然人类的灾难接连不断），只需要和曾经历的旧社会作个比较就不难看出根本性的差别：那是一个好心做的坏事，是自己“家长”的错误；与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悲惨时代完全不同。有些外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暴动，那一定是军警的强力打压所至”。实际上，在笔者的家乡，当人人挨饿的时候，县粮库只有两个民兵把守。农民们虽然挨饿，但看到领导干部也在风雨同舟的时候；这是和历次人为或自然灾害最大的不同之处。

农民的宽容朴实，虽然比那些只以自己钱包作为判别标准的市侩可敬得多，但也暴露了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性格原因——他们太容易满足了，这根本建基于他们过去遭受的欺压太多了。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广大的市民拜“统销”之利而没人被饿死，种粮食的农民却在饥饿的生死线上挣扎而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救济。今日，那些对进城的农民横眉怒目、鄙视“乡下人”的城里人，你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亏欠和人格的卑微？！

中国的农民，在过去百年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中，他们的先辈曾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为共和国的建立付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也许无法料到，在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甚至今天国力日盛之际，他们再次面临几千年来已经习惯的厄运。

毛泽东给了他们的虽然有点缺憾，但却是值得回味的集体记忆；毕竟，几千年来，留在他们回忆中的美好内容实在太少了。对中国的广大农民来说，能有这么一点美好记忆已经是奢侈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底，毛泽东曾谈到建国十五年来医疗资源是如何分配给人民的，他批评道：“告诉卫生部，他们只为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这百分之十五之中主要是大人先生们，而广大的农民群众没有得到任何医疗。首先，他们没有医生；其次，他们没有药物。卫生部即不是人民的卫生部，为什么不改名叫城市卫生部，或甚至叫城市大人先生们的卫生部呢？”[34]。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促使卫生部于当年 9 月制定了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后需要经常保持 1/3 的城市医药卫生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医疗防疫、教育、科研等机构分出成套的人力和设备，由城市延伸到农村，抽调部分城市卫生人员长期留在农村工作，为农村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大力生产和供应农村需要的大众化药品，增加生产和供应农村需要的常用医疗器械，降低农村药价和医疗费用，对看不起病和买不起药的农民，继续实行减免办法，由国家医药救济费解决”[4' 随着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后来发展出世界独有，对广大农民意义重大的赤脚医生事业，改变了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农村基础教育体系的确立和义务教育的普及，让亿万农民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学堂。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县及人民公社都成立了电影放映队，挨村下乡为农民放露天电影（这才是为人民服务）；但改革开放以后，

农民们再也没有这个眼福，大多数农民已二十多年没有在自己村庄上嗑着瓜子，抽着烟，和老邻居谈着天看场电影了（现在的电影多属“农民不宜”）。没有毛泽东，那个时代会有几亿农民至死不知道电影为何物，他们谁舍得跑几十里路，用卖几斤麦子的钱看场电影？再者，电影院售票处那侗小市民只需一大声就能让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们不敢张嘴。看一下今日中国卫生部、教委、文化部等部门对农村和农民利益的漠视，就不难明白毛泽东的政治道德和对底层人民的深情，也自然理解亿万农民为什么轻易原谅了毛泽东的领导过失。

邓小平去世时，村民们见面打声招呼“邓小平死了”。没有怨恨，但也始终无法产生“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那种感觉——他们村边的河是毛主席领导下挖掘的，路是那时修的，桥也是那时建的，当然已经残破……。

等江泽民下台或百年之后又将留下怎样的背影？胡锦涛呢？政治领袖们始终无法牢记：生前的任何赞誉都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的铁笔是公正的，但又是有情的；关键在于，政治人物是否能抓住自己人生难得的机遇，为人民留下一段情深义重的回忆。

至于个别政治人物或经济学家以经济效益或现代化建设为理由，而将牺牲农民利益合法化和合理化，根本不值一驳。他们谈不上专业智慧，更没有道德和爱心。中国农民并没向政府要求医疗保障、工交系统及优秀教育体系配备，他们希望的仅仅是政府的一点体谅，和对贪官污吏的哪怕是象征性的惩罚。

可就这点要求，政府都懒得给予。

中国在改开三十年有几个乡镇及大队干部被送上刑场，又有几个不该得到这样的惩罚？再翻翻毛泽东领导“三反”、“五

反"时的报纸，每天都有长长的被枪决的名单。笔者家乡就有一个生意人因在鸡肉中掺水而被判死刑。没有毛泽东的铁碗政策和政治教育的配合，后来中国二十多年的社会安定和高尚社会道德的建立根本不可能实现，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权益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天安门广场有一条永不干涸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经常可看到衣着朴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儿孙们的搀扶下表情肃穆地步入纪念堂。他们不知如何献花，也不习惯城里人鞠躬的礼仪，只知道用磕头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如果纪念堂允许的话，中国亿万农民的双膝，一定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两个深深的凹痕。

（作者按：在本书 2003 年第一版出版后不久，中央在农村和农业工作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基础教育的学费减免。总算让农民的日子不再那麽艰辛，教育产业化、计划生育罚款、无穷税收这三座大山下的农民总算可以喘口气。如果基层体制改革上相应配合，乡镇及行政村干部任免民主化和行政透明化，对中国农民来说，才能真正有个不太憋屈的日子。农民和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如果不是唯一根本的话。中国未来任何领导人和学者们都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否则，他根本没资格谈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后大力反贪，但在基层收效不大；农民子女在衰微的公立教育体系下不得不花高昂的学费把孩子送入私立教育体系，负担一样很重。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制定用人原则：没有农村生活阅历者不得参与涉农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制定）

六、反思：“一胎化”是一次民族自残[13]

在“一胎化”政策推出不久，即有学者对这一政策的必要性提出过质疑，并以实际的例证说明即使允许二胎也不会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引起政府的兴趣。当时住房难和就业难等问题的存在，似乎为“一胎化”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本来,第二代领导人对人口的急刹车式控制,如果能以二胎为限，还不至于有严重后遗症，但“一胎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和家庭的结构与价值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子女养育成本的增加，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很难提高，这已经被发达经济体广泛证实。中国也必将面临保持人口稳定的巨大挑战。

人口众多，在很多人眼中是负担，但如果社会经济有较好的发展和服务配套，人口素质提升，则人口就成了社会发展最大的资源优势。而且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中华民族并不一定都生活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的对外迁移不仅是时代的潮流，也是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和平拓展。而这种拓展中最重要的资源不[14]

---

[13]本节为第二版新加内容。

[14]中国从政府到一些愤青，似乎对出国的人有种天生的情感抵制，以为出国就是叛国。政府在政策上也有此类表现，比如 2004 年前，公安部要求所有出国的都要同时吊销户口，回国后才能再恢复，结果大量出国留学人员因出国时是集体户口而归国不成，清华大学就有一万多毕业生出国被吊销户口，回国落户变成所有人的头痛问题，笔者就是直接受害者。政府和愤青们都缺乏思想的战略高度：中华民族应该走出去，到全世界去生根发芽，澳大利亚、加拿大那些广阔的土地本来就不是欧洲白人的，中国人一样有权力获取。国家应该对国民出（接下页下）

是武器，也不是财富，而是人口的规模。

从今日中国的发展现状其实不难发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所仰仗的正是庞大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这是毛泽东早期留下的最重要一笔财富，虽然他老人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笔财富的重要性。

笔者在城市规划和咨询行业常接待一些中国来的考察团，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是：新加坡成功的最核心要素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最核心的原因不是李光耀和他建立的廉洁公务员体系，而是有赖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之前那些伟大的华人母亲们，她们的高生育率奠定了新加坡人口的结构，才有了后来的发展。当时南洋华人家庭生育多子女非常普遍，我的朋友同事中，兄弟姐妹超过十个的就有四个家庭。但李光耀后来推行"家庭计划”，鼓励只生两个，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单身、晚婚、晚育等情况的严重性，已经威胁到新加坡人口的结构。中国未来的人口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因为新加坡好歹还可以通过从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吸引华人移民来维持种族比例的稳定和国家人口规模的缓慢增长，而这条路对中国则行不通。即使有选择地吸收外来移民，也只是杯

（接上页下）国定居（除公务员和一些特殊人物）和回国省亲创业给予多方面方便，不要小肚鸡肠地对待这些新时代的海外拓荒者，他们自掏腰包和承担风险在帮助中华民族开拓生存空间，传播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无论对整个民族还是中国本土都是利远远大于弊的。至于他们的智慧为他国服务，这首先是他们海外立足和被人尊重的本钱。再者，中国政府只要有好的政策，全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还在乎几位国人的出走？没有选贤任能的体制，

好的人才在
国内也是浪费。我 1995 年考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务员落榜（您懂得）而无奈出国，
就是个黑色案例。落叶归根已经是个不值得提倡的落后概念！国家媒体也要少报
道海外华人如何〃反馈祖国”，这只会增加当地华人与各国政府及土著的不信
任，对海外华人的生活生存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实，只要适当支持各地的中华文
化传承就足够了。文化的纽带中性而强大。

水车薪。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带来的伤害，远不止人口结构的问题。

计划生育在优待少数民族情况下，对汉族采取地区无差别对待，其负面影响在内陆地区不明显，但在边远省区则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时期通过创办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边疆开荒等，竭尽所能为新躯、黑龙江、内蒙、青海、西藏增加汉族人口，对促进边疆省份的发展和稳定打下了基础；但计划生育的无差别对待，对毛泽东一代好不容易取得的成边成就进行了釜底抽薪式摧残，笔者在 1990 年代在国内读书时曾和朋友们“胡扯”自己的幻想：国家打击“超生游击队”，对农民超生罚得倾家荡产，对公职人员采取撤职等处罚，如果能借机将这些超生的家庭全部迁往新昶，国家资助他们在当地生根垦荒，可以极大幅度地增加边疆汉族人口，是将“超生游击队”转化为国家边疆发展和稳定的原动力。但笔者人轻言微，就连一些体制内学者对“一胎化”的合理质疑都引不起重视，还会有人理会一个学生的胡言乱语？

随着当代生活压力的增加，养育成本提高，和享乐主义的蔓延，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甚至海外炎黄子孙人口面临同样的挑战）。为此，我建议以下几点：

（一）　在生育观念上再次回归传统。

（二）　国家在政策上应该给予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更多的照顾。

（三）　对于边远省份多子女家庭给予经济支持。对于内地夫妇移居边阙将给予生育和子女抚养上的支持。

（四）　国家将幼教纳入到公办教育体系。

（五）　针对一些文化、政治上不太激进的国家女高才生提供奖学金，比如东欧地区（被西方欺骗过的东欧国家民众，会对社

会主义有较高接受度；该地区人口整体素质高，女性多）、东南亚等，以及海外华人，吸纳进入中国高校读本科，如果她们和中国男性结婚并生育后代，国家将在绿卡和公民身份方面开绿色通道。政策上不鼓励外国外族男性（外籍华人例外）和中国女性结婚。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必须正视这一问题。

（六）单身大龄（30 岁以上）女性生育权应得到尊重，她们有权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育后代并登记户口。

七、“三农”改革不能都走大农场化

最近几年，关于农村和农业改革出现过不少响亮的口号。一是城市化，这个不谈了，因为没有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城市化，根本就是制造城市大难题，是不切实际的。另一个就是农村土地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后者似乎越来越多地进行试点和应用。

看待三农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还有个更加重要的要素始终没有引起重视，就是由自然村落组成的农村所承载的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些传统文化在今匚I 的大都会和小县城都已经越来越难以看到。这些丰富多姿的传统文化，很多并没有通过文字做丰富的呈现（也不可能完整呈现），在城市人看来，甚至将其视之为落后的东西。但这些却构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具有特色的地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甚至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伦

本节为第二版新加内容。

理观念，在这些乡土文化中得到了更原始的传承。

笔者在研识《金瓶梅》[1]时，感觉里面的用词、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几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麽生活的。而这些内容对于今日的城市人来说，则显得那麽陌生和遥远。

三农问题非常复杂，在处理时要格外谨慎，本处难以对这个庞大的课题做深度分析，但有几点是基本原则性的思路：

（一） 城市化必须遵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科学引导，而不是拔苗助长。农村青年移居城市是大势所趋。政府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创造农村留人条件方面做些工作。

（二） 一个地区的农业用地的改革探索，本着积极进取和谨慎保守相结合，不可一刀切。中国这个大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刀切式强制改革都必然副作用严重。

（三） “三农”不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政府必须尽到基本的公共责任，修好路，发展乡村基础教育和幼教，环境保护及垃圾处理，做好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与完善。不论乡村未来是什么，这些工作永远是必须的。

（四） 做好地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发掘。比如，我老家山东曲县乡村几十年前曾普遍使用的农具、纺织、婚丧嫁娶节日习俗等，都在快速消失中，当代人已经搞不清楚他们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这些都是亟待发掘保护的乡土文化财富。笔者所在的山东曹县孙老家镇老家，父母往生后，收拾出很多他们用过的织布缝

[1]《金瓶梅》作为世情长篇小说的开山鼻祖，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座奇峰。毛泽东对《金瓶梅》有深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笔者对《金瓶梅》从早期的没感觉，到后来的被吸引，其中

丰富的民俗文化展现
和历史场景感起到一定作用，让笔者看到了草根阶层的丰富
生活面貌，这是历史
书籍里看不到的。可见，民俗文化有它不可替代的魅力。

衣等做家务活的用具，就萌生在老家建一座民俗博物馆的念头，把老一代的生活方式展示出来。但精力和经济实力限制还无法实现这个愿望。

（五） 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中已经培育了一批庞大的“共产党反动派”，或者极右翼共产党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低端人口”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右思想下的词汇，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政府官员口中，可见中国政治道德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这是共产党必须重视的意识形态建设内容。让农民不以移居城市作为成功的标志，农村一样是广阔天地和高质量居住地。尤其是那些与农民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公务员，要做好素质教育。他们中素养低劣、趾高气扬的小市民太多了。

（六） 特色小镇建设的特点在“特色”，不太可能成为普适性的方向。传统自然村的保护、发展、合并（如新农村）、搬迁等，要慎之又慎。需要对此做好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参拜毛主席纪念堂川流不息的人河，比任何官方文件和学术报告更准确地反映出人民对伟人的评价。（先父先慈于 2000 年）



一九五八年九月的『八大』主席台上。他们中谁是主要创子手？

第三章大饥荒解析 1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大的败政就是三年经济困难及由此导致的百万人民死亡惨剧,在和平时期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重大事件，不论如何解释和辩护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中共的悲哀，也是民族的哀痛。

对这段历史假装不存在，或随意推卸责任给“自然灾害”，是对历史和逝去同胞的不负责任。对这段历史的探讨，一方面是对死去同胞的基本尊重，再者去探寻造成这一悲剧的制度原因，进而激发后人完善国家管理的思路。厘清毛泽东和当时各位主要领导人在这个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是追求科学历史观的必然要求。这是对正确客观认识这一代建国领袖所无法回避的一页。

一、对当前社会认识的基本质疑

自第二代上台后，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批评毛泽 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以及反右扩大化和极“左”思想的破坏时，中共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股脑地将大饥荒的责任推到了已经没法自我辩护的毛泽东身上，似乎毛泽东是亩产万斤“放卫星”、大食堂、“共产风”等荒谬行为推动者，及最终导致断粮的罪魁祸首。但历史并不以一个文件或一个时期人们的认识为转移，历史的真实必将在后人的追根求源地剥去舆论的尘埃而显现出其本来的真相。这是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

但很遗憾的是，笔者在撰写这部分内容时，包括《人民日报》在线数据库等，都不完整，刻意去掉了这段时间有关农业发展和“共产风”的一些报道，尤其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当时活动和讲话的新闻报道，而非权威网上资料要进行真实性确认才能采用。中央在刻意隐瞒些什么？这一有选择性掩盖本身就值得怀疑。

笔者对第二代领导层引导下强加在毛泽东头上的这一责难的怀疑，基于以下这个基本的认识：在中共当时负责政治建设并在内政事务上退居二线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负事经济建设的核心领导人如刘少奇（当时已经指定为毛泽东的接孤人）、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毛泽东是唯一种过地，真正懂农业和农民的人，他

[1] 本章为第二版新加内容。

怎麼可能会糊涂到相信亩产万斤的荒谬报告？当时毛泽东是党主席，主抓意识形态和军事外交，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等人，当时在干什么？这些一线经济管理领导似乎完全没有责任，所有的错误都是那位不直接负责经济而且是唯一懂农业的毛泽东铸造的，您不觉得这里面有个基本的逻辑扭曲吗？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和亲近感远非其他领导人可比,他会如此折腾农民?

在对这段历史的批评声音中，其他领导的缺位是极其不正常的。根据毛后时代对毛泽东的舆论导向性否定，任何同时代其他

领导人要麽以当时如何反对毛泽东所犯错误，要麽以受害者身份而纷纷登上各大媒体，进而证明自己当时的正确性。但在谈论三年经济困难和大饥荒事件时，唯一被常提起的中共主要领导的声音是刘少奇在大饥荒结束后的 1962 年举办的七千人大会上的那段“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看似坦诚的讲话，可刘恰恰又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核心内政事务最高领导人，他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到底讲了什么，如此关键时期的讲话，却从没见诸于毛后时代的报端，只要您有半点的理性和不带偏见及预设立场，请思考一个简单问题：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主抓内政事务的核心领导在农业“放卫星”和接踵而来的大饥荒时期，哪怕有只言片语的反对，第二代核心领导层能不予以大篇幅报道渲染，进而划清与大饥荒的政治责任吗？尤其对邓小平本人和其政治盟友刘少奇二人有利的宣传，在邓小平主政时期绝对不会放过丝它。当时仅有的，在第二代领导时期被反复提及的大胆质疑“放卫星”的领导人也就彭德怀及其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了。

这里有个参考案例：人们从第二代核心领导层上台后，大力宣传邓小平如何受迫害，周恩来如何艰困中保护科学家等，但从来没有关于刘少奇和邓小平如何在经济困难时期大力支持“两弹一星”的任何报道，虽然邓小平主政时期历经“两弹一星”成功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纪念重大事件。而毛泽东、陈毅、舔荣璨辱领心是如何在极其困难时期坚持搞“两弹一星”的，则不断出现在各方面的媒体和回忆文章中。了解中共舆论模式的读者自然从中不难看出，这事实上昭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两弹一星”事业上似乎没什么值得宣传的内容，而以当时他们所处的最高领导位置，又不可能不参与这类重大决策，那就奇怪了，他们如何参与

的呢？后来有学者根据回忆录和一些历史事件的拨蚕抽丝中发现，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主张“两弹”下马的主要领导人。

从“两弹一星”这件事情的有关报道所体现出的中共舆论模式，我们有理由怀疑，既然没有任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当时如何反对亩产万斤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报道，那更接近历史事实的可能是：他们是这类荒谬行为的实际推动者和认可者。而在邓小平主政下反毛舆论最猖獗的时代里，毛泽东对亩产万斤的质疑也时不时见诸于报端，则为厘清毛泽东在这件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责任敞开了一条思想的门缝。

稍微考察一下当时历史就不难发现，大跃进、吹共产风、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穷过渡等，这些作为这段历史的标志性词汇和运动，毛泽东都不是创造者和始作佣者。而这些名词和运动的最早推动者和发明者则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如果由刘周邓发明创造，由毛泽东推动鼓励的话，您不觉得太抬举刘周邓的理论水平了吗？有据可查的事实是，以上这些歪风的最早、最坚定纠正者恰恰是毛泽东。

二、大饥荒发生时期的中央领导体制

研究历史不能忽略其中每个领导个体的职位权力和责任。一个基本原则是，说直接负责的领导人对错误没有责任，反而是一

位不直接负责的领导人来承担全部责任，是荒谬的。大饥荒从酝酿到惨祸发生的关键时段里，中共高层各主要领导的职权需要有个厘清。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斯大林身前拖着老迈的身体事无巨细参与一线决策,而没有为身后的权力过渡预留时间，导致斯大林死后苏联出现重大的政治转折和高层政治斗争。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教训极为警惕，于 1953 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即毛泽东退居二线，其他领导人处于领导一线。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则是对这一设想在领导机构方面的具体落实和确认。

“八大”正式选举出几位中央副主席，确立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领导职务。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八大”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则在本次大会当选为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一邓小平中央日常事务领导体制由此确立。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参加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到了人事安排的问题。他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干个名誉主席……，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

毛泽东的这番公开表态及八大的高层领导职务安排，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解决“接班人”问题。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与赫鲁晓夫谈到他不当主席

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接着他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中共党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这一接班人的顺序上取得了共识。

1959 年 4 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其照片开始和毛泽东并列于《人民日报》等媒体。明确宣示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E 用*　MX　*4　d 云　环水平



Hft　RM　“tfl 広　«　±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以“八大”为分界点，毛泽东退出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则继续领导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领域。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位置，不仅在体制架构上，还是舆论方面，都已经确立，并宣示天下。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领导中枢，包括宣传系统事务，以及任当时权力极大的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

长。而毛泽东则对自己一手推动的接班人培养机制给予充分支持。1961 年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客人问毛泽东是否有明确的继承人时，毛泽东明确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是公开对这一接班人安排的再次确认。刘少奇的升位是毛泽东主动让贤的结果，而不是被迫，更不会如后来某些人所说的刘少奇位置提升引起毛泽东的妒忌和不快。

固然，以毛泽东的威望，刘少奇虽然成为国家主席和接班人，但威望上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差距，但其接班人的特殊地位，以及邓小平的迅速崛起和总书记身份，决定了任何高层领导人和省区县领导都明白他们未来的顶头上司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个政治风向标如此明确，每个高层政治人物要想有安全的政治生命和光明政治前途，就不能不认真揣摩和顺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倾向和言论，自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客们开始向刘邓身边靠拢。同样的道理，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也必然具有方向性和舆论导向的影响力。因此，毛泽东在大政方针上的方向性指引的最终实施及执行效果，取决于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的一线领导集体的具体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要知道，当时邓小平身为总书记，是宣传系统的直接领导者。刘邓有可能很好执行毛泽东领导党中央制定的宏观大政方针，但也有可能念出歪经。

很显然，三年经济困难发生及前后的整个时间段，中央日常事务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及时任总理周恩来在负责，但毛泽东去世后提到这段历史时，整个中共舆论压根就不提刘周邓的具体责任。而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即当裁判也兼运动员，显然

不可能对历史有公正的评价。由此，笔者可以得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结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主导下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不可能客观公正的，必然有他自己的倾向性和选择性。明确了这一点，就为今日及后来人以“空杯心态”来重新认识这段复杂而荒谬的历史真实创造了条件，也必将为中共中央在邓后时代对新中国历史的再认识逐渐厘清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向。

山此可以看出，在邓小平主导下推出的历史总结性文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须进行检讨，必须把邓小平和他政治盟友如刘少奇等放在历史的天平上重新评价，才能对共和国历史有准确的描述。才能让人们对共产党和共和国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有准确的认识。

三、大饥荒发生的轮廓

先把大饥荒产生的粗略框架轮廓做个简单描述，以方便读者初步有个粗线条，再去探究每一个细节。轮廓可以让读者有个快速的印象，而魔鬼存在于细节里。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工业方面大跃进本处不谈，只谈农业领域。“共产风”和“浮夸风”下各地为攀比成绩，开始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但农业的实际产量达不到怎麽办？基层官员开始冒出一些谎报产量的现象。毛泽东对于亩产千斤、几千斤，甚至万斤的报告深感怀疑，他多次要求降降温，即使有高的产应也暂时不让报道，但在警惕浮夸风时，他又谨慎地要求不要打击人

民的积极性，这是政治方向的把握。由于各地攀比产量，必然导致粮食征购的高指标。到 1959 年，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把自己谎报的高产屋给掩盖住，不得不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交公粮指标，以至于把粮食种子都交上去了。接踵而来的就是不少地方产粮全部交上去，种子不够用，导致荒田万里，粮食断产，在口粮不济的情况下，逃荒要饭开始遍布全国，啃树皮、挖草根、饿死人的现象在一些严重的地区开始蔓延，直至失控。

国务院在人民生死线上挣扎的关键时期的 1959 和 1960 年还邪恶地出口了 680 万吨粮食。如果用这些粮食及时救灾，虽吃不饱，但可确保没有人被饿死，出口粮食多为优质粮，剩下的反而是瓜干面和玉米面等低热量的粗粮。当饥荒发生时，基层党委有些担心影响官职而隐瞒不报，没有及时请调粮食援助，有些基层粮库有粮，但基层干部不敢开仓赈灾，也不敢请示。缺少禅食种子，人民在饥饿中也没有力量劳动，导致灾荒持续时间延长。可以说，大饥荒的原因是：错误的政策、中央一群胡涂蛋、各级党委王八蛋共同导致的结果。基层欺上瞒下、虚报邀功，使中央无法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导致错上加错。

在这个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意识形态背景，就是极左路线执行和反右扩大化。前面已经有提及。人们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意识下，对浮夸风起到助推的作用。但这种助推作用一般会走向某个偏离科学的方向，但如何把粮食产量推到如此离谱到有违常识的地步，必然有高层的推波助澜，这是执政实施过程中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理论的必然。不难想象，只要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保持起码冷静，不去煽风点火，仅仅靠基层干部的浮夸，绝对不至于荒腔走板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省市县一级的领导即便有天大胆

量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地不顾基本常识而肆意乱来。举国高中低层干部的全面浮夸风必然有最高级别的舆论引导为凭靠。这是中共政治生态下必然的逻辑。

那麽当时是谁在助推这种极端荒谬的举措呢？各大媒体喉舌的编辑们在听命于谁的指令来大篇幅报道“放卫星”的舆论导向呢？这是必须回答的历史命题。

四、刘少奇：“共产风”的主要鼓吹者



先看看身为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和中央内部已经形成共识的毛泽东接班人刘少奇当时的作为。

刘少奇从工运走来，本身并没有农业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证据证明刘与农民有密切的接触与互动。但大跃进（“大跃进”这个名词首见于 1957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该社论只经过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而没经过毛泽东）开始后，刘少奇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上，却不断发出激进的言论。尤其是多次关于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论述，在全国逐渐掀起疯狂的“共产风”方面，他作为最高领导人发挥了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关于快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念论述方面，刘少奇是表述最多，也最激进。

1958 年 4 月，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曾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人一道谈共产主义，说“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

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谈话内容很广泛，如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等等。[1]

7 月 5 日，他在与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时曾乐观地说：

“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2]

1958 年 6 月 14 日，刘少奇在与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时说[3]

“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接着他举例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 500 多户人家，其中 200 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 200 多人作饭，办起食堂后，只需 40 多人作饭, 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 还节省了粮食。”他大胆地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

这就是导致巨大粮食浪费的“大锅饭”的根源，是由一线最高领导人刘少奇亲自发动的。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推动，很难想象“大锅饭”会风行全国。

7 月 7 日、8 日，他视察了河北武清、香河两县和天津市。他边听汇报，边与河北省、天津市和有关县委、街道负责人谈话，所谈内容据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说：“总的精神，就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4]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2、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3、见《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一文。
4、河北省档案馆藏《1958 年 7 月 14 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天津市委书

记处联席会议
记录》。

7 月 19 日，刘少奇在天津视察时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农业，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町以说，当时刘少奇的讲话体现了他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强烈期待。如果这种思考仅仅限于学术理论层面倒不是大问题，但不幸的是，刘少奇手握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一线领导大权，他的话就不可能只是谈想法，必然要进行实践的。即使他不去推，下面也会去做。

河北徐水县成了刘少奇共产主义实践的第一个试验田。[1]

河北徐水县是个穷县，土地贫瘠，1957 年亩产量才 200 斤。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1957 年秋末，徐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大兴水利建设（秋冬农忙结束后，组织农民开展水利建设是正确的，这种利用农忙淡季搞水利和修路，全国范围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这是必须肯定的），对全县十多万劳力统一调度，实行军事化组织与管理，打破乡社界限，搞大兵团作战。各单位自带工具，自备粮草。为适应日益高涨的“大跃进”形势，全县普遍实行了小社并大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幼儿园、敬老院、缝纽厂，使家务劳动集体化和社会化。

1958 年 2 月，分管农业的书记谭震林听了时任徐水县委第一

[1] 这部分内容参考了宋连生文章《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决策始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网站）、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中国干部学习网量 tp://study.ccln.gov.cn 等。

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到徐水考察，对大兵团作战兴修水利的做法很感兴趣。随后在河北省三级干部大会上大力表彰徐水。回京后，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赴徐水，系统总结经验，准备全国推广。谭震林的表彰与推荐，对提升徐水经验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正人于 3 月 14 日给中央的报告肯定了徐水经验。毛泽东读了报告觉得很好，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1]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亲临徐水视察。毛泽东视察了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看到庄稼长势喜人，听说小麦获得亩产 754 斤的大丰收，毛泽东感到由衷喜悦（对于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来说，这个亩产量令他激动兴奋）。赞扬了徐水的工作，尤其是对组织、管理军事化大为赞赏。他的谈话随兴而发，经媒体报道便迅速传遍全国，并深刻影响着各地的"大跃进"进程。但毛泽东从来没有讲共产主义的只言片语。毛泽东对徐水的赞扬被一些人利用来指责为毛泽东支持后来的共产主义实验。

8 月 6|」，也就是毛泽东视察后第三天，陈正人再赴徐水，传达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等，他还传达了刘少奇的一些具惯指示，如在徐水摆两座大工厂，全县可搞一个大联社。[2]

有刘少奇这位最高一线领导的指示，中央、省委、地委和县委组织了有 100 多人参加的规划班子，参与制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徐水县委于 1958 年 8 月 22 日绘制出宏伟蓝图《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

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2 徐水县档案馆藏《1958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副部长在徐水县
乡、社干部座谈会上提出一些指示》。

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 1963 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1]所规制的共产主义前景诸如：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1963 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1959 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 2000 斤，食油 20 斤，肉类 50 斤。1963 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1959 年，30 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 1963 年，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过 5 年，30 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成为专家。[2]

在这篇“共产风”原始方案的“规划草案”公布不到一个月，徐水县委于 9 月 20 目又向全县人民颁布《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草案规定：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3]“试点草案”的基本精神是吃饭不要钱，干部、工人、职工、农民不发薪金，每月只给几元钱的补贴，服装、日用品都由公社统一发，连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都由公社统一包起来。“试点草案”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的工作人员。“试点草案”公布后，举行了群众游行，抬着“庆贺全县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匾，敲锣打鼓，高喊“拥护供给制”、“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 E 义迪进”的口号，开始啦“共产主义生活”然而这种推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共产主义试点”，仅两个

1《河北党史资料》第 15 缉，119 页

2《河北党史资料》第 15 辑，120 页

3《河北党史资料》第 15 辑，162 页。

[4] 见《徐水日报》1958 年 9 月 19 日。

月就面临物资供应和资金短缺问题而草草收场。

这里有个关键事件值得留意：

在徐水“共产主义实验”高潮时的 9 月 10 日，刘少奇来徐水视察工作。联想到上述徐水县委于 9 月 20 日颁布的“全民供给制草案”，很难想象，如果刘少奇视察期间稍微降点温，这样的“全民供给制草案”是否会出炉。或者换个角度理解，由于该“试点草案”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在 8 月 22 日编制的《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所以，“全民供给制草案”和刘少奇的视察时间刚好是“前脚走后脚制定颁布规划”的时间顺序。虽然笔者没有找到刘少奇当时的完整讲话，但刘当时有这样的话“全民所有制还并不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显然，刘少奇认为徐水在上述规划草案里没有跳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要真正走向共产主义，也只有全民供给制了。从刘离开到颁布草案的中间 9 天的时间空间用来制定和征求意见，是非常紧张的，笔者有理由相信，“全民供给制”是刘少奇的要求下起草的，否则，县级党委吃了老虎胆也不敢如此“大跃进”。有些人企刘少奇的这句话说成是刘少奇的提醒和告诫，以此为刘洗脱责任，则不符合逻辑，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完全无法想象刘少奇前脚刚走，县委就敢违背刘的讲话精神而着手起草“试点草案”。

对徐水的实验，毛泽东有所警惕。1958 年 9 月，毛泽东把身边的 18 名工作人员派往徐水实地调查半个月（下面将提到的毛泽东令田家英等秘书室人员去四川种地来了解实际亩产量，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管控下媒体报道信息已经不太有把握）。反映了徐水县普遍存在的“共产风”和强迫命令等问题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0 月 15 日至 17 日，毛泽东连续 3 天在天津听取

徐水、安国、唐县 3 个县的第一书记和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对徐水提出了警告和批评。10 月 29 日，河北省委开会讨论徐水工作和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问题。此后，徐水把一县一社改为三级实权制，干部、职工恢复并补发了工资，房屋仍归原主所有。那一年的秋粮本来长势很好，但由于受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冲击，收获时丢榊烂现象严重，入库的粮食远没有预想的那麽多，公共食堂被迫开始定量，“津贴”也没有了。虽然毛泽东顾及到刘少奇作为接班人的体面而没有彻底否定和取消徐水的实验，但这个疯狂的实验就此不了了之。

但从全国来看，“共产风”和浮夸风还将继续。刘少奇不会因为徐水实验的失败而有所醒悟和冷静。刘少奇的极“左”和“共产主义梦想”似乎已经根植于他的意识之中。他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宣示在徐水实验的同时和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

据《光明日报》1958 年 8 月 4 日报道,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来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玉米，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不但对如此荒谬的浮夸风不予压制，还对此给予鼓励。

《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30 日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亩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一时全国上下纷纷放卫星，产量成了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个讲话一出，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一千几百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 年 9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穷过渡”，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证据。这篇社论没有经过毛泽东审阅。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纯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社论公然把 8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1

1958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 月 24 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 9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严重脱离实际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预备条件。刘的讲话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惯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

[1]摘自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中国干部学习网量 tp://study.ccln.gov.cn。

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 1958 年 10 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从上述一系列刘少奇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罔顾组织原则，严重脱离实际，不顾中国人家庭伦理需要，大搞共产风，而他视察并发表讲话的河南，也就成了百万人民惨死的重灾区。

以刘少奇的身份，他的讲话是对“共产风”和浮夸风最有效的煽动，从各级领导到基层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当成政治纲领或行政命令。尤其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强力进行反右扩大化的背景下，各级党委如果不跟着接班人刘少奇的话去做，那等于找死，随时会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因此，从刘少奇的讲话不难看出，他作为一线最高领导人，对大饥荒和一系列荒谬现象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雠 L

1 毛泽东：《在北数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116 页。
2 摘自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中国干部学习网量 tp://study.ccln.gov.cno
刘为啥不在

中南海和自己家人那里先这样试点？中共高层几十年来的通病就是，对社会最底
层的农民随意行政。

第三拿大碱荒解折

人“条

HENM1NKIBAO

床城建国一祉出现 kF®-H1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福产-万零 it 百多斤纪#

五、邓小平：背负历史罪责而罔顾正义

邓小平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执掌中枢机关，他成为二代核心后又放任民众和舆论对毛泽东的过分责难，他的角色同样有必要做一下整理。

1958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关于邓小平李富春 9 月去东北视察的报道。报道如下：

《邓小平李富春视察辽吉黑三省时强调说，东北要大挖潜力支援全国》

新华社 30 日讯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和赵尔陆等同志，9 月 10 日至 29 日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视察了工作，对东北地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城市公社、整风等方面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 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作者点评：令人发指的邪恶政治指标）

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国农业增产的经验，概括说来就是水、肥、土、种、密加上田间管理齐头并进。这是农业生产的“宪法”，

是毛主席的“宪法”[1], 是事实证明了完全正确的“宪法”，是已经创造了奇迹的“宪法”。东北的某些领导人和广大地区没有坚决执行这个“宪法”，而继续执行着宽垄浅耕、广种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结果使农业生产大大落后了。这个事实，反映了农业生产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还很尖锐，说明农业方面还有白旗未拔，思想还没有解放。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幸福社和太阳升社的时候指示说，每一个社明年都应该指定一两个耕作区作大面积丰产试验。可以把现有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一些，集中力量搞好密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样，既可以增产粮食，又可以使一部分土地绿化，一部分土地轮休。

据河北日报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等同志，于 10 月 8 日至 14 日, 在河北省城市和农村进行了视察。邓小平同志在视察过程中，还谈到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 6 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了 5000 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问题作了若干原则指示。

[1]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是毛泽东根据我国农
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于 1958 年提出来的农业八项

增产技术措施，
对实现科学种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发挥 20 多年的影响力。但在 1958 至 1960
年"大跃进"期间，浮夸风推动下歪曲和误解了农业"八字宪法"。

据《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2 日《坚决执行农业生产“宪法”永吉县拔掉思想白旗，深耕运动出现高潮》一文报道：

中共永吉县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坚决贯彻农业生产的“宪法”，领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就深耕问题闋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红旗，全县出现了深耕高潮。

邓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这个县明年农业生产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8 日报道：《抢在封冻前翻完秋茬地东北三省坚决执行农业“宪法”力争明年粮食产量至少翻一番》（本书作者按：这篇报道是对邓小平指示的细化）

本报哈尔滨 27 日电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同志视察辽宁、吉林、黑龙江时，对东北三省农业生产所作的重要指示，在东北三省千百万农民中已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三省农民正以每天深翻地五百多万亩的进度和严寒冰冻赛跑。

在东北地区广阔的田野上，白天到处都是千军万马，夜晚是灯笼火把，连夜苦战。各地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昼夜不停制造绳索牵引机，以加快深翻地的进度。黑龙江省已有好多县，平均每一百五十亩地就有一台绳索牵引犁。除此以外，拖拉机、畜力犁、人拉犁、翻地的铁锹等都一齐上阵。城镇居民也全力支援农业生产。大部分县城机关只留几个人驻守，下乡干部不仅是田头办公而且和农民一起翻地。即便是沈阳这样的工业城市，钢铁等生产任务十分紧张，仍然有八万人编成连队，分赴十一个县（市），大战二十天，帮助农民翻地。哈尔滨市区十万多职工、学生、驻军，上星期天冒雨到郊区参加义务劳动，一天帮郊区农村深翻地三万六千亩.



铁的证据：1958 年 10 月 8 日邓小辛在天津接见亩产十一万斤先进代表时留影。戴帽者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他旁边光头是刘澜涛，黑衣者是邓小平，邓小平身后白视衣者为杨尚昆°

东北三省今年农业生产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增产幅度，分别为 30%到 52%。但和关内各省农业增产一倍以至几倍以上的情况相比还没有彻底翻身。根据各地总结经验、教训，必须全面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水、肥、土、种、密、害、工、管”这个农业生产“宪法”，才能使农业得到彻底翻身。为了使明年东北三省粮食产量至少要比今年翻一番，各地首先抓今年执行农业“宪法”中比较薄弱的土和水两个重要环节。先抢深翻地，使耕地普遍深翻一尺以上；改进和推广去冬水利施工经验，利用冬季大干水利；同时抓紧积肥和准备好足够密植需要的良种。

作为农业生产方针重大革命性的措施，黑龙江省明年耕地面积比今年要缩减六分之一，即减少播种面积一千六百多万亩，变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一部分县和人民公社开始酝酿，使现有耕地生产粮食、休闲、种树各占三分之一，实行“种的少，种的好，收的多”的农业生产方针。

三省各级党、政领导人分析了过去东北三省对农业生产“宪法”执行的不全面，主要原因是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唯条件论”、“习惯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因此目前正在深翻耕地的高潮中，普遍发动农村干部和群众，在田间地头学习讨论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就农业生产的彻底翻身进行了鸣放辩论，通过鸣放辩论来发动群众，以大搞群众运动，推进农业上的彻底革命。

从大量的当时报纸报道中，可以看出农业方面完全外行的邓小平对农业问题随意指示，盲目减少耕地面积，追求高指标，更恶劣的是,还动辄将达不到高指标上升到政治认识和路线斗争层面，在反右扩大化的恐慌阴影下，这是最让各界官员和知识分子忌惮的，因此，邓小平“浮夸风”指示往往具有极大的震慑力，甚至具有强制命令的效果。这类对邓小平视察和讲话的报道，不是其他领导人可以来“抢功”的，因为当时《人民日报》这类党的喉舌和中宣部直接领导者就是总书记邓小平。而他领导下的报纸在记录他的活动的同时，也将他的历史罪责清晰记录在案而永远无法抹去。邓小平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给他的权威性和对各级官员的震慑力提供了“核武器”，因为他以反右主帅的角色可以对任何不配合和达不到指标的干部扣上右倾的帽子。当然，对于那些积极配合他讲话精神的地方领导，则不论正义邪恶，都大加支持和保护。

邓小平是如何保护那些搞浮夸风最恶劣的地方酷吏的呢？

在导致大饥荒的省级领导层面，有五只吃人的“老虎”，分别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中华大地出此类妖孽，真是民族之大不幸）

在去庐山会议的路上，田家英曾向李井泉提及四川饿死人的事，李冒出了他的名言：“中国这麽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李对民众没有任何的同情之心，没有任何的责任承担，自己管理“的省份有饿死人发生，他居然没有任何的羞愧和廉耻感此导丧心病狂的政治恶魔是如何在共产党体制内生存和升官就；“真是个可悲的现象。

「。

庐山会议结束后，他利用批评彭德怀还没有向下传达的间隙，故意来考验四川干部对彭德怀谈看法，那些认可彭德怀的人都被他打成右派或严惩。这种下流的手段，也只有他能用的出；彭德怀毕竟是国防部长，是元帅，在中央没宣布对彭德怀的批判之前，基层干部和民众自然对彭德怀多一份尊重，但李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引蛇出洞。1959 年他强制四川的粗票作废，将群众辛苦积累的保命机会切断。据杨继绳调查，邓小平曾对李井泉讲：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所以李井泉有了尚方宝剑来大量抽调四川粮食支援全国，四川白姓的命就这样被牺牲掉了。所以，四川虽然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之一，但李井泉在后来的清算中却得以过关。李井泉不仅是邓小平的铁杆政治盟友和执行者，两家也是通家之好。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做了自我检讨而难以过关，邓小平则出来表态："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邓小平对家乡四川大量死人，如此两个"多了些"，真的是"举重若轻"）邓小平丝毫不提李井泉的罪恶不仅仅在调粮，而在"放卫星"方面，李为全国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邓小平复出后，中央讨论对毛泽东的定位和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李仍然是受邀参与讨论的高级干部之一，让这种残害百万四川人民的刽子手来讨论一位伟人的历史评价，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

另一个超级混蛋就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通过在河南大搞反右扩大化，大炼钢铁和没有科学论证下的大修水利等基础设施上的乱来行为，在农业上"放卫

星”，在信阳地区用残酷手段对付饥饿的农民，河南饥民逃荒要饭遍布全国，大量人口饿死，官方数据显示河南饿死 150 万，特别“信阳事件”就死亡大概 120 万。

吴芝圃这个双手沾满河南人民血泪的王八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揪斗清算（“文革”被打倒的并不都是好人），死于 1967 年，这本来是因果循环的必然。吴对自己的罪恶有清醒认识，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俨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他至少还有半点廉耻和自醒。但吊诡的闹剧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上演。

1979 年吴芝圃被平反！

1979 年 1 月 24 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颠倒黑白如此，党性、人性、原则何在？就连吴芝圃自己都承认犯下极大罪恶，对河南大量饿死人负有责任，但邓小平却将此称之为“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河南百万死难同胞的亡魂就这样被再次戏弄！！邓小平在大赞吴芝圃时，不可避免地捆绑了他们共同的历史片段，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参考联想的空间。

笔者没有找到吴芝圃和邓小平之间亲密合作起于何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大跃进期间吴芝圃在河南反右扩大化和疯狂“放卫星”时正是邓小平主抓中央日常工作并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之时，邓小平是吴芝圃的领导，他们二人在罔顾客观经济规律

而在推动浮夸风方面，都“战果辉煌”，一位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之职（副组长是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彭在第二代成为五老之一，与和邓小平的政治盟友合作历史有关），利用他管控的党的喉舌媒体煽风点火；一个则在中原大省的实际操作中，充分实现高层意志和精神，将刘少奇对河南的指示彻底贯彻，将浮夸风吹到无以复加的极端。没有邓小平在浮夸风中的支持，吴芝圃断没有胆量如此狂妄而不计后果（庐山会议后，吴芝圃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而没有任何收敛），没有邓小平对吴芝冈深体“圣意”的高度赞赏，就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对吴芝圃的平反。在平反冤假错案时，以吴芝圃当时的官位，实际上是不可能劳动得了时任副总理和具有最高政治影响力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平反和亲自致悼词的，但邓小平一反常态地做了，而且给予吴芝圃极高的赞誉。由此可以判断，邓小平和吴芝圃在那并不长时间内形成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进而形成政治上的捆绑。邓小平对吴平反和高度赞誉，恰恰暴露了邓小平的政治人格中那令人遗憾的污点：为了个人的好恶完全不顾原则，放弃党性乃至人性。

我不会因为邓小平的历史污点而否定他对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但我同样不会因为他晚年的贡献而对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视而不见。邓小平的政治人生，有人评价为举重若轻，大智大勇，“钢铁公司”等美誉，但看他毛后时代公开鼓励军队经商而对人民军队进行了精神上的摧残，公开释放大贪官进而导致贪污盛行等行为，结合上述历史事件，我更倾向于认为，邓长于术，而疏于道。



六、周恩来：　　明哲保身下任由苍生倒悬

再看一下另一位核心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当时做了什么。

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是中国经济社会决策与领导执行的最高领导机关。笔者掌握的资料中没有可靠的关于周总理推动还是抑制浮夸风的证据。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放卫星”和粮食征购没有任何的反对和抑制措施，使得他无法逃脱百万人民惨死的领导责任（征购粮食是国务院的直接责任），虽然他的具体责任只有等历史档案解密后才能一窥其貌。

这位备受人民爱戴的总理，在如此荒谬的浮夸风面前，居然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来证明他曾对浮夸风做任何的抑制和警惕，而关于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控制“文革”的破坏和如何保护科学家的历史片段则耳熟能详。一个最高政务官在关键历史时期不作为，说好听点是明哲保身，说难听点是不负责任，对万民倒悬置若罔闻。如果当时周总理哪怕私下在毛泽东面前稍微表示自己的担忧，毛泽东在抑制过热的浮夸风方面也不至于孤军作战。在百姓最危难的时候，周选择隐身，而不做哪怕是基本的责任承担。当人们对他吃着农村带来的难以下咽的窝头而感动万分时，似乎没有去追问，在农民被基层官员像疯狗那样抢走手里最后一粒粮食时，身为人民的总理，您在哪里？人民需要的不是几句温情的语言和几滴眼泪，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关键时候对民众的强大责任和担当。

无论如何为周恩来开脱，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周恩来在

明知饥荒蔓延时，非但没有利用他的职权紧急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当时各地粮仓实际上是有存粮的，据我父亲讲，我的家乡山东曹县孙老家公社当时的党委书记，就敢于拿出公社储存的公粮救济灾民，才使得孙老家公社饿死人情况没周围地区严重），在饥荒最严重的 1959 年和 1960 年，还继续大试征粮，并出口了 680 万吨粮食，用赚得的外汇于 I960 年进口了大量黄金。周恩来很清楚这些黄金可以挽回多少农民的生命。

不论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们多麼好，对底层农民的无情、一一想想那些种粮的农民一个个家庭在饥荒中消失的惨况，使得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无法对他产生一份感动。中国精英阶层对底层人民的漠视，周恩来也没能免俗。

在关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是否要下马“两弹”问题上，同样找不到周恩来的任何表态。

当然，笔者对周恩来当时的处境有几分建立在揣测下的理解，不排除作者有小人之心的可能性。

当时刘少奇已经被公认为是毛泽东接班人，刘少奇的照片已经和毛泽东并列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任何要在中国政坛生存下去的政治人物，都不得不考虑刘少奇这位未来顶头上司的言论和思想，不论您是否喜欢。周恩来可能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接班人的坚决支持下，他否定刘少奇的言论与思想，即使在毛泽东那里也可能未必得到支持，但却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周恩来具有很强的政坛生存能力，他不表态支持，似乎已经表明了他的反对态度；但这种沉默并没有任何的力量，最多只是给热爱周总理的民众带来些许心理的安慰，以及对他的理解与宽容。这种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带来的如此严重后果，则让人难以平抑

内心的那份矛盾和责备。

在“文革”期间刘少奇被打倒，周恩来是赞成的，至少表面上如此，第二代领导人时期出现不少所谓“周恩来赞成打倒刘少奇是违心的”的说法，笔者持保留态度。且不说大跃进期间刘少奇所作所为对于聪明如周恩来者，岂能看不出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也排斥过周恩来。刘、周不是一条道上的政治伙伴，但却不得不在一个屋檐下共事，使得周恩来在刘少奇被确定为接班人之后变得格外谨慎也就不难理解了。刘少奇在历史上整人的“辉煌成绩”，和排除异己的铁血手段，高层不少人应该多少有点印象和自保意识。

杨继绳提到，在 1961 年底，针对到底饿死多少人的调查，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要求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可能有两千万人。周伯萍说，周恩来看了报告，要求赶紧销毁。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问他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

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做事风格。他也许是个不错的协调人，但在笔者人到中年仍然还不失率真的性情中，就是不欣赏这种中庸处事风格。周恩来的做法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社会需要担当,领导需要原则和作为。

豪情从来就难容中庸！伟人必然勇于担当！



1966 年刘周邓最后的聚首

七、毛泽东的作为和责任分析

在谈论毛泽东对待农业的立场，不得不提一个由毛泽东发起制定，并获得党代会和人大通过的重要文件《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55 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为迎接并推进当时预期即将来临的农业生产高潮，毛泽东在 1955 年 11 月间，先后同部分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共同商定了《十七条》。随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将《十七条》扩充为《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56 年 1 月 23 日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公布。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原则通过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作必要的修改。1960 年 4 月 10 日经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此纲要而奋斗。

《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内容有：

（1）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巩固起来，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2）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从 1956 年起，在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下列水平：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150 多斤增加到 400 斤；黄河以

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2955 年的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1955 年的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简称为“四、五、八指标”。这是纲要的基本点。棉花亩产（皮棉）由 1955 年全国平均的 35 斤，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 40 斤、60 斤、80 斤和 100 斤。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下，积极发展纺织原料、油料、糖料、茶叶、烤烟、果类、药材、蔬菜等。G）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其中包括：1967 年达到农村平均每户养猪 2〜3 头（不养猪的少数民族地区等除外），12 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等。（4）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增产措施的主要项目是：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大力增加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扩大复种面积；多种水稻、玉米、薯类等高产作物；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保护和繁殖耕畜；防治和消灭病虫害；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5）兴办农村各项事业。包括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广播网、电话网、邮政网、商业网、交通运输、信贷合作、气象、水文以及农村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事业等。（6）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村人民收入，改善居住条件，增加粮食储备，除四害（指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以及保护妇女儿童等。（刀城市支持农村，工人和农民相互支援。

上述纲要内容符合国情和农业农村实际，是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科学策划和高瞻远瞩的指引。笔者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要″跨黄河″（亩产 500 斤），″过长江″（亩产 800 斤），就是

该纲要所提亩产量目标的形象化。从该纲要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业的准确认识，没有任何好高惊远的浮夸气息。如果当时的一线领导集体能够按照该纲要的指引来科学施政，中国农业和农村不仅不会发生大饥荒，而且会有个不错的发展。但在 1958 年 5 月刚刚党代会通过，刘少奇和邓小平们在两、三个月后就狂吹起“共产风”和浮夸风来（见前面内容），视党代会决议文件如无物。

毛泽东对待虚报粮食高产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作为唯一真正种过地的高府领袖，根本不相信这种产量。但八大之后，递交给毛泽东的文件都要经过总书记邓小平，毛泽东事实上是被他信任和任命的同志所屏蔽，他应该看到什么，不应该看到什么，已经由不得他了。这是毛泽东政治悲剧的开始。[xv]

1958 年 11 月 2 日开始至 10 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 300 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 9000 亿斤粮食，最多是 7000 亿斤，把 7400 亿斤当数，其余 1600 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

[xv]笔者对邓小平当时作用的了解，是从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到（忘记作者和标题）。该文介绍聂荣臻为向西北原子弹项目参与部队请调粮食而给毛泽东写报告，他为了避免邓小平将报告压下或拖延，而不得不将请调粮食的部分写在最后，因为他知道邓小平是坚持原子弹工程下马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一些细节，很意外，也很震惊。当然，这篇文章是否是历史真实，有待考查确认。

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他强调：“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本书作者提醒：请读者留意毛泽东这个讲话的时间点，与徐水实验和刘少奇河南讲话、邓小平地方视察时讲话的时间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实际上在警告和纠正刘少奇邓小平们已经和正在犯的错误。但可惜的是，毛的警告没有被一线领导集体重视和尊重，毛与一线领导集体已经分野成两个不同的思想中心）

紧接着，1958 年 11 月 21 至 27H,毛泽东又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他强调：“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

有那麼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 3700 亿斤，今年先说 9000 亿斤，后来又压到 7500 亿斤到 8000 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 7500 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本书作者按：请参考前面所提 1958 年 8 月 4 日《光明日报》报道刘少奇同志表扬山东寿张县的话）。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11 月 25 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本书作者按：邓小平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在浮夸风中所发挥的作用，前面有分析，与此处毛泽东的批评对应。“千钧重担”显然是指高层的指标压力），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本书作者按：毛泽东一直强调“生活”，与刘少奇把农民家庭分开搞大兵营式居住形成鲜明对照）

毛泽东在 1958<|-：11 月连续在郑州和武汉会议发声，再联系到 10 月中旬对徐水共产主义实验的批评，作为退居二线的领导人如此密集发声来喝止和降温浮夸风和“共产风”，苦口婆心，也难以让刘、周、邓这些一线领导人有所警醒，他们继续带领全国疯狂奔向大饥荒的悬崖。他们在毛泽东的警告后哪怕稍微有所收敛，那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也不会如此惨烈。但毛泽东已经不

在一线，他在批评一线工作时又不能不顾及对自己培养的接班人的尊重，他有威望但在中央高层的实际权力已经被架空，他的话被人用来“锺墳打鬼”，但也被“鬼”用来打人。

面对全国各地上报的离谱的粮食产量，毛泽东高度怀疑，他不得不自己来亲自收集农村的真实情况（真悲哀）。为了搞清楚实际的亩产量，采取了一个不得已的措施，就是让自己最信得过的秘书田家英带领秘书室的戚本禹、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1959 年初亲自到四川农村去种试验田（前面提到，刘少奇河南讲话后，毛泽东曾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等带队去河南了解情况，毛刘最后决裂的种子已经在悄悄埋下）。作为诺大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不得不用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来了解实际的国情，是一种悲哀，整个秘书室下基层也必然影响到毛正常的办公，但不是因为万不得已，毛泽东怎麽会走出如此无奈的一步。作为他的同事和下属的其他高层领导，难道不是失职吗？不觉得有辱自己的职业使命和职业道德吗？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四川，是因为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报的四川最高亩产量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

毛泽东要田家英等五人去四川省，找一块最好的地，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方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播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打下的粮食也要自己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能少一斤，回来上报毛泽东本人。[1]

这一行五人，在四川新繁县大丰人民公社分散到不同生产队种植早稻，戚本禹是其中农业耕作经验最好的，最后实际亩产量

1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此处只提取精简内容。

是 500 多斤。这在当时是较高的产量。最后，由戚本禹等三人向毛泽东提交了亲自种植考察报告《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毛泽东因此对李井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问题是，李井泉谎报产量如此之离谱，身为一线最高领导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主抓农业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为什么就没有发觉？这是无能和渎职，还是因为李井泉满足了自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理念而盲目乐观？

邓小平身为总书记，是下面信息上达毛泽东等领袖的中枢，不能为身为党主席的毛泽东提供准确一手国情资料，无论如何解释，要逃脱不掉最轻的谴责：渎职。中国之大，如果每个行业都要最高领导人亲自派身边人员去基层调查才能获得准确的国情资料，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根本做不到，国家治理就失去了可靠的数据依据。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被浮夸风下的虚假信息所包围，就连刘少奇等高层都在为这个虚假的亩产屉而提高期望值。刘少奇是毛泽东支持的接班人，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必须顾及这位接班人在领导集体的尊严和体面，以强制命令式的方式要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对浮夸风降温，有违毛泽东确定的一线二线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的冷静与客观已经很难经过国务院和媒体转化为实际的执政措施（《人民日报》甚至胆敢不登载或删减毛泽东的讲话）0 面对农村愈演愈烈的浮夸风,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等多种场合三令五申的关于“实事求是”内容的讲话精神（讽刺的是：邓小平后来高举“实事求是”的大旗剥夺华国锋的权利，以此为旗帜开始疯狂的非毛运动），根本贯彻不下去，整个中央似乎已经架空了这位主动让贤的党和国家创建者。各种不切合实际



《人民日报》曾刊登这个亩产万斤的照片，小女孩坐在"密植”的麦垛上。毛泽東从报上看到道位小女娃嘻戲地站在稻秧上的照片时，当即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还接着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 10 万斤，堆也堆不起来麽！（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 138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

的疯狂“指标”照旧压民，“浮夸风”及“乱下命令”的风气依然严重危害农民的利益和党的声誉。在万般无奈之下，毛泽东只好越过所有制度层级，向全党各级干部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

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

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事无巨细，体现了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深度理解和担忧，同时又有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前瞻性考虑，其中看不到任何冒进的成份。尤其特别的是，信中特别提醒各基层不要听上级的指标。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居然公开要各级官员违背组织原则不要听上级关于密植、浮夸的指标命令，在世界政治史

上都是罕见的（笔者怀疑，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摧毁组织

原则，鼓励造反有理，与这些背景有关）。毛泽东写此信时对农业和口粮问题的深切担忧，对高层领导盲目施政的无奈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跃然于字里行间。

但是，当时中央决策层和媒体已不在毛泽东手里。如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能从这封信获得一些警醒，1960 年和 1961 年大饥荒还来得及制止。但这一切都是假设，中央高层和他们最欣赏的那些冒进省份的领导人继续在极端不负责任的浮夸下将本省人民拖入到家破人亡的深渊。

笔者人到中年，并不容易为政治和历史事件而动情绪，但读到毛泽东的这封信时，却禁不住泪眼模糊。作者身为农民的儿子，父母兄姐都曾在那个年代挨饿，毛泽东看到国家的危机和底层民众的痛苦，而整个信中又不便于使用命令的口吻批评自己支持的接班人，他本来期望以他的个人威望能够扭转乾坤，但在那个他已经无法掌控的中央权力体系中，事实上他已经难以靠这封信来挽救万民于水火。笔者一直坚信，毛泽东通过这期间与一线领导集体不成功的合作，在他的内心里埋下了对高层领袖的不信任，这为后来发动“文革”，宁可相信工农群众和红卫兵也不相信身边一起闹革命的同志，埋下了伏笔。是的，他身边这些因他的伟大领导而得以登堂入室，名垂青史的领导们太令他失望了。

后来动辄指责毛泽东要承担起大饥荒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和民众，请你们仔细多读几遍毛泽东在大饥荒出现苗头时写的这封信，将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与感受。当时中央一线领导完全辜负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栽培和期望，用他们的愚蠢和盲动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段黑暗的历史。

但他们转身就将所有责任推给了对浮夸风一直保持警惕和批评态度的毛泽东。

政治的厚黑，莫此为甚！

八、将大饥荒推责给庐山会议太牵强

有很多人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庐山会议，是不客观的。因为通过 1958 和 1959 年的浮夸风，饥荒已经发生，饿死人现象已经出现。1959 年 7、8 月间庐山会议召开时，各地荒种现象很普遍。实际上，庐山会议的目的是在纠左，结果却成了打倒彭德怀军事集团的继续反右。

打倒彭德怀有着更复杂的原因。很多人以为彭德怀的“万言书”抹黑了大跃进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进而改变了庐山会议的本来议题。这是毛后时代政治宣传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真实。

为避免分散本章主题，关于庐山会议的历史分析将在下一章讨论，读者可以与本节内容相互参考。本节主要厘清庐山会议之后与大饥荒有关的关键细节。邓小平王政后, 在舆论上将大饥荒加深的原因导向庐山会议，又将庐山会议没能纠“左”的责任，导向彭德怀“万言书”刺激毛泽东借批彭继续大搞极左路线的方向上来；这一逻辑和历史解说已经成功洗脑成全民“共识”。因此，分析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是否真的放弃纠“左”就变成历史真伪的判断切入点。

毛泽东本人的理性头脑并没有因为打倒彭德怀而变糊涂，他同农村工作中极“左”行为进行斗争并没有停止。

除庐山会议前他给六级干部的上述公开信，会议后的 1959 年 12 月 27 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1960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1960 年 3 月 30 日，毛泽东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中央在一九六 0 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1960 年 11 月 150, 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 年 II 月 28 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第三•奄大几荒解析

1960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作者董玉振评：能够想象毛泽东当时泣血的焦虑，对自己的党和各级领导的乱来，已经到了咒骂“不如地主、资本家”的地步）“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961 年 3 月 13 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刘、周、陈、邓、彭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

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麽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

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裏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

毛泽东在 1961 年 6 月 120《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有如下论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麽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 0 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

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指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只要读者有时间好好读读当时毛泽东的讲话和他主持下会议通过的文件，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对各种歪风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批判，并试图去制止浮夸风和极左路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毛泽东的这类讲话很多，这里就不一一抄录了。但从上面说列举的时间间隔可以看出, 毛泽东的谨慎是一贯的。

毛泽东的农业经验和对“放卫星”的理性怀疑，多次要求冷处理超高亩产量新闻，无法转化为中央执行层的施政措施，这个一

线领导层是他本人亲自挑选和支持的，使得毛泽东无法逃脱一定的领导责任。但反右扩大化中，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以其铁腕手段对反右扩大化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一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这位邓小平极其欣赏的地方大员在庐山会议之后还何等地胆大妄为，就该明白，将一切推给庐山会议是不合理的，当然推动浮夸风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已经将全国推上了一条“持续高烧”的不归路，除非他们倒台，靠一次会议来扭转当时的局势很难，因为一旦确认过去浮夸风的极端错误，那必然有中央高层领导要承担责任，有关责任人必然不会轻易就范。打倒彭德怀，对毛泽东来说是政治上的考虑，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持续不断对浮夸风和农业发展极“左”行为的斗争，有大宦颁布日期很频密的记录，都足以证明毛泽东不得不亲临一线对这个一线领导集体所造成的危机进行纠正与焦虑。

毛泽东本来是退居二线只抓意思形态，但从给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和后来的一系列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不得不涉足本来由刘周邓负责的一线事务和具体行政管理措施制定和执行层面。尤其是 1959 年饿死人事件开始发生，他密集发声，对国家困局表现出极度的关注和忧虑，尽力制止浮夸风和极左行为，但他栽培的一线领导集体已经听不进他的话了。刘少奇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不会以批评的口吻对刘讲话，但从《反对两个平均主义》那封信已经将刘少奇列入批评的对象之一。在给六级干部的信颁布后，I960 年初共产风再度刮起，刘周邓已经难以逃脱历史的谴责，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完全置若罔闻。

第三章大做荒解析

在将大饥荒主要责任推给毛泽东的理由中，有一条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根据吴冷西着《忆毛主席》记述，针对 1956 年出现的“反冒进”，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都成了反“反冒进”的会议。吴冷西在其著作中也认为毛泽东反“反冒进”是错误的。但仔细研究毛泽东发起反“反冒进”的原因，是毛泽东对“反冒进”口号这种激进宣传手法的批评，正如《忆毛主席》第 48 页所说：毛主席认为，一个时期搞得快些，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指出《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0 日反冒进社论（题目叫《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错误的。吴冷西本人也认为，毛泽东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

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整个革命生涯，始终把调动民众和民众参与作为主要政治目标和手段。党的喉舌以社论形式“反冒进”，毛泽东的批评算不上过错，更没有因为反“反冒进”就必然要走浮夸风的道理。正如当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经济上一放就乱（通货膨胀），一抓就死（通货紧缩）一样的道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各地都有过各种“热”，最被人诟病的是房地产热，但中央从来就没有，也不应该，以社论和中央文件的形式来“反房地产热”。这种激进的降温手法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毛泽东提倡多快好省的背景下，“反冒进“的旗帜举的太高，将势必让民众和各级党委无所适从。如何算冒进，如何算不冒进？1956 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功告成的背景下，全国人民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各条战线上人民忘我工作，这个时候您《人民日报》高唱“反冒进”，对全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必然造成危

害，人民都不知道是否还应该甩开膀子拼命劳动了。

1956 年反“反冒进”与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共产风扯到一起，将相隔两年的两件事视之为因果，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夸风的真正根源是“共产风”，而不是“反’反冒进’”。

吴冷西老先生，您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辜负了毛主席对您的信任和期望，对鼓吹浮夸风，您将毛主席的忠告置之脑后，犯过大错，这次您又错了！您在书中对没听毛主席反浮夸风的话而后悔，说明您老人家还是位有自省精神的人。

九、大饥荒分析小结

作为一线最高领导人和“共产风”主要鼓吹者的刘少奇，无论是其所处职位，还是其所说所做，都清楚表明，他必须对大饥荒的发生负有主要罪责。他本应该主动来承担起领导责任，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却义正言辞地大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避而不谈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毛泽东则勇于承担：“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毛泽东主动就自己的领导责任承认错误的情况下，刘少奇却没有跟进认错。邓小平更是来个大而化之，人人有责式的淡化个人错误。邓小平不仅个人是浮夸风的主要鼓吹者和领导者，更因其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而加大了他所作所为对饥民的杀伤力;他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掌中枢,直接领导和协调媒体、

下情上达、毛泽东指示的宣传和执行等重要功能，使得他的罪责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洗脱，他同样逃脱不了百万人民饿死的重大罪责。而其他领导人则以刘、邓马首是瞻，也必须承担起部分责任。周恩来在历史关键时期的无作为和渎职，为其政治人生留下了无法被洗刷的污点。

从对大饥荒的教训总结和主要领导人的整个表现看，毛泽东最大的错误是选择刘少奇作为接班人，让邓小平任总书记并同时廉任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无论是个人能力、对国情的认识深度、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刘邓都不是理想的人选。毛泽东对用人失察是必须承担责任的。

周恩来这种高情商政治人物，正因为其看上去的完美，与悲惨的国运不匹呢，使得我很难对他的完美肃然起敬。面对百万个家庭走向灭亡，他居然还去出口粮食来购买黄金，让我试图为他寻找谅解的努力变得毫无价值。但我一遍一遍地读毛泽东那些频密的大力呼篩和纠正浮夸风的书信与文件时，我能够感觉到毛泽东情牵百姓安危的那份焦虑，甚至让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但我从周恩来（还有刘邓）身上怎麽也看不到百姓的踪影，更无从获得一份毛泽东带给我的那份感动。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一些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而成为美谈，那就让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去对他好好感谢吧，至少，占人口大多数农民身上，看不到周恩来智慧和大爱的体现，无论是大饥荒时期，还是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方面，没有毛泽东的督促，周恩来处理农民问题上的智商接近于零。周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对广大农民缺乏感同身受的那种亲情。

毛泽东爱邓小平之才干，晚年还给邓机会复出，但毛万万没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个刘少奇的盟友在毛身后再次登上权力中

心，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彻底的动摇，通过释放沈图、宽容高级干部及家属特权将毛泽东教育培养的共产党干部的党性和党悟推向悬崖，通过国有企业的改制更是将大量国有企业免费送给权势阶层，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分赃，让一部分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而上千万曾经忘我工作的工厂主人翁成为下岗工人，转眼回到解放前，变得一无所有；甚至放任对毛泽东本人进行了污蔑与诋毁……，这就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新中国吗？这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吗？大饥荒导致的千万同胞死亡的惨剧难道仅仅需要一个对历史真相的刨析吗？

千万同胞的亡魂必须让后人牢记并保持警醒：政治权力必须保持足够的透明，并给人民监督和参与的机会，对各级党政部门与领导必须有严格的监督与民意反馈机制，才能政情民情畅通，以民为本，避免大范围祸国殃民事件的重演，指望共产党干部的个人自觉是不靠谱的。但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各方面的经历，又不能不让我们看到，这条从通往政通人和的道路还远远没有畅通！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第四章 不一样的“廬山會議”[1]

庐山会议是指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31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 月 1 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日程，乂临时决定自 8 月 2 日起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至 16 日正式结束。

当前关于庐山会议的已有认识是：上山为了纠“左”，但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而激怒了毛泽东。彭德怀这位耿直的军事将领，立下不朽功勋，却仅仅因为说了真话，揭露了饥荒的真相，而被毛泽东打成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连同他人一起被打成反动军事俱乐部成员，本来纠“左”的目的反而旁落，继续在极“左”的道路上前行，加深了大饥荒的危机。

这个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识”，笔者本人在很长时间内也对此深信不疑，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第一版时没对庐山会议进行起码的探讨，笔者始终秉持着学者的一份责任和研究论述方法，那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不能因为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而对他的错误做刻意的辩护。

1 本章为第二版新加内容，参考了《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着）、戚本禹着《戚本禹回忆录》、《彭德怀自述》、《德怀列传》（刘亚洲着，传阅资料）

等，不一一细标。

但在最近几年逐渐掌握的资料中，尤其是写大饥荒一章的内容时，开始激起我的怀疑和好奇，并在逐渐掌握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庐山会议”。

一、庐山会议的疑点及毛彭关系回顾

疑点一，彭德怀的“万言书”所描述比毛泽东对当时局势的判断还要榊糕，但至少都是在对当时极“左”政治的质疑和批评，也就是说，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判断，只有程度不同，而没有方向性对立，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方向上做了不同程度的判断而已。因此，说毛泽东被该信激怒，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疑点二，彭德怀如果因言获罪，那也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彭德怀的最后批判关键点在搞“军事俱乐部”，而且会后他的军队领导职务被撤销，连带被批判的还包括总参谋长黄克诚，这和“左”右倾相比已经偏离太远了，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中压根就没涉及军事。

彭德怀和毛泽东是一对长期共事的革命战友，又因为各自强烈的个性而不是很合得来，他们之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虽难免恩恩怨怨，甚至不少误会，但因为共同的理想和彼此都对中国革

命所作的贡献，而能放下私人好恶，相安无事。彭德怀因为支持毛泽东抗美援朝并立下奇功，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官至国防部长和副总理。从彭德怀的职位任命中，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胸怀气度，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彭德怀称毛泽东“老毛”而不是“主席”，甚至可以径直冲进毛泽东的卧室。这是几十年长期合作下形成的战友关系，即便谈不上亲密，但至少对彼此有较大宽容度。

彭德怀个性耿直，这种个性令远距离的人们有好感，但却让靠近的人不舒服。尤其是在政治环境下，高层领导人言谈的影响力决定了，耿直有时候具有极大破坏力，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就拿彭德怀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有关的谈话，简单罗列如下：

1959 年 1 月 30 日，他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典礼上讲到：“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在当时的环境下，以彭德怀的身份，这样的讲话虽然正确，但很不得体。毛泽东即是彭德怀的上司，也是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喊“万岁”也是一种表达崇敬的传统方式。

几天后，他在回顾共和国建国史时说：“不从客观历史上研究，结果就会夸大个人的作用。毛泽东是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但对整个历史，他不起决定作用。”彭老总的话同样是真理，毛泽东也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彭老总有必要做这样的阐述吗？

诸如此类的讲话不少，不一一列举。这类讲话对于深知彭德怀的毛泽东来说可能不是个问题，但对于听到这些讲话而又对毛泽东无比崇敬的人，则感到不舒服；从追求党内团结，党外民众对共产党领袖的崇敬角度来看，又具有破坏力；对于那些有意整彭德怀的政治对手，这则是授人以柄。从庐山会议到后来文革期

间，彭德怀的此类言论就成为别人攻击他的“武器”，很容易获得认同。到毛泽东晚年，彭的此种表现则令毛泽东对自己身后彭会否成为政局不稳定的因素而有所疑虑。

做这样的背景介绍，有助于了解毛、彭这对战友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因为毛岸英牺牲而毛泽东委责于彭德怀，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只能将这种揣测理解为“小人之心”。

彭德怀庐山会议之后命运的悲剧种子，其实在会议之前就已经埋下。至于何种因素发挥了作用，还是多种因素叠加下的结果，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有价值的梳理的。

会议进行到 7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谈了形势、团结等问题，强调“总路线”是正确的，从全局来看，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7 月 14 日，会议印发了《庞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截至此时，毛泽东的典型领袖处事风格得到体现：认清和解决当前问题，但肯定方向和路线。虽然现在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如果深入研究不难发现，毛泽东当时不论形势如何，都不能否定总路线和“三面红旗”，否则，必然导致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并影响到中央的团结，这在国难当头之际，显然是必须避免的。如果路线有错误，那也只能逐渐调整，而不是推倒重来。

庐山会议纠“左”议程结束时，毛泽东于 14 日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根据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并不是很生气。从彭德怀后来抱怨毛泽东不该公开此信，可以看出，彭德怀这封信压根就不是针对毛泽东的，但他不想此信被公开，似乎可以理解为：彭很清楚这封信对其他高层领导人带有明显的,有针对性的批评（彭德怀后来说，他这封信的主要批评对象是刘少

奇，虽然没点名）。毛泽东收到这个信后，毕竟是来自于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信件，而且彭并没有注明为私人讨论信件，毛不可能把信当成私信来处理，所以，毛泽东公开此信也无可指责。但该信的公开使得彭德怀立即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一线高层领导和几位搞浮夸风最疯狂的省级大员，立即如芒在背，该信所揭露的严峻形势如果形成中央统一认识或会议决议，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甚至下台。

很显然，一线极“左”领导集体不可能坐以待毙，现在这些身负大饥荒罪责的领袖们就等毛泽东的态度了。他们在毛泽东表态前，其实已经向彭德怀频频发难。根据权延赤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回忆，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 1。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

7 月 20 日凌晨，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

至此，毛泽东的讲话还温和而就事论事。

’杨尚昆着《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但 7 月 23 日，毛泽东的讲话风向开始发生变化，甚至谈到“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等，从此会议开始转向。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毛泽东对彭德怀态度的大转弯呢？

如果仅仅是这封信，毛泽东不论是何态度，都不至于将这位带刺的老战友置于被公开批判的地步。另一件事则更可能是毛泽东转向来批判彭德怀的动因。

二、“彭赫秘会”导致的信任危机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访问苏联、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中间一些插曲，则可能成了彭德怀要被打倒的关键动因。

在这次访问中有个插曲，就是赫鲁晓夫和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撇开中方翻译进行了一次单独会晤 1，按照中国外交纪律，外事活动不能一个人单独进行，必须要有同伴参与，而且这类外事活

[1] 有些渠道则说是彭德怀与苏联高层领导人在访问莫斯科时举行了单独会晤。本章内容有关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资料来自于很多渠道，包括回忆录和外国人着作，但都不是官方公布的资料。彭后来否认有此事。彭德怀出访的随身翻译在接受调查时否认彭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有单独会晤，称彭根本没有条件和时段可以隐瞒其他中国随团人员而和赫鲁晓夫单独会谈。因此，只有等中俄两国政府解密相关档案后才有可能被证实或证伪。高层有人借彭的不谨慎来陷害彭，恶意编造向毛泽东举报的可能性并非不可能。我倾向于认为，苏联

试图分化中国高级
将领来推翻毛的企图是存在的，彭对当时的中国内政不满意，和苏联领导人在互
动时可能言谈有些不谨慎，但是否真做对中国不利的事，我不敢贸然揣测。这里
之所以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概因读者需要多个视角来审视那段特殊历史和彭德怀
晚年的悲剧。而打倒彭是毛被舆论诟病的内容之一，需要多元化内容给读者参考。

动必须要向中央汇报，毕竟外交无小事。

彭德怀并没有将与苏联领导人的私下会晤向中央汇报，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难免引起毛的揣测。彭德怀身为副总理和国防部长，苏联又是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交对象国，当时中苏关系又极为敏感和不稳定，这麽重要访问中的一个没有预先安排的会晤，您老人家到底在隐瞒什么？这难道只是谈美食聊文化的随意闲聚而让彭老总觉得没有汇报价值？还是莫它别的原因？尤其是当时苏联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极其反感的背景下，任何中国领导人和苏联的单独互动都极其敏感。我坚信彭老总不会听从苏联人的安排来做对国家不利的事，但对于毛泽东所处的位置，这不能简单地用“相信”来解决了，他掌握的情报资料要比局外人多的多。赫鲁晓夫在庐山会议前向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嗫的要求而被毛泽东拒绝，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却对此有些暧昧。[XVI]

问题还不只是如此。

彭德怀在去庐山的路上，谈了他东欧访问的所见所闻，看到祖国的惨状，他说出了一段“大逆不道”的话：“中国问题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气话被密报给毛泽东，自然毛泽东不会等闲视之。这毕竟是从手握枪杆子国防部长口中讲出的话。而且又发生在上述秘密私人会晤之后。

如果仅仅这样，毛泽东还不至于在庐山会议上下决心整肃彭德怀，更不会把其他几位一起整肃成一个反革命军事集团，因为还有另外一件加码的导火线。

在庐山会议期间，陈毅在北京留守中枢。这期间，苏联驻华

---

[1]此信息来自《戚本禹回忆录》，暂时找不到另一个可靠互证来源。



彭德怀和妻子浦安修

武官拜见陈毅1，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在庐山开会，您在北京可以乘机将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很警惕，立即报告给了毛泽东。

陈毅传来的消息，和上面彭德怀的两件事结合起来，毛泽东就无法再等闲视之；毛泽东这个时候应该自己也心里没底，到底苏联人还在动员分化哪位高级将领来推翻他，以及彭与苏联领导人的私人会晤是否属于此类。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在试图分化拉拢高级将领来对付毛泽东，则已经是迫在眉睫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庐山会议期间，恰恰发生了彭德怀、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周小舟、田家英、张闻天等人在一个不开灯的小黑屋里聚会的宁，其中还有李锐，后来这事被李锐告发给毛泽东。李有声有色地告诉毛泽东说，彭德怀骂毛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2]

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个体事件，无法不让毛泽东有所联系，毛所掌握的情报肯定比公开的要多的多。将上面这几件事结合起来，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打倒彭和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位为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军事集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笔者认为，“打倒”看似极端了点，但如果不用这样的霹雳手段，就没

1 另一份非正式出版物里提及邓力群回忆，说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拜见陈毅。
2 李锐还揭露田家英如何骂毛泽东，加上田家英后来政治上倾向于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导致毛泽东对田家英失去信任，可能成为田家英后来自杀的远因。

有充分理由剥夺他们的兵权，这是毛泽东当时所追求的目标。[1]

毛泽东心中对彭德怀有个“里通外国”的疑问，但无法用“疑问”来剥夺兵权，因为无法对外对内交代。在信任动摇后，彭德怀继续掌握兵权看来是不合适了，不论是否冤枉彭。至于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剥夺彭德怀的兵权，那就只是个借口的问题。“万言书”的分量可能连个“借口”的威力都算不上。但彭德怀得罪了另外一群浮夸风的主要责任人，则使得“万言书”有了强大的威力，促成了反彭德怀的“高层群众基础”；彭德怀在国防部长职位上的粗暴处事风格，批评刘伯承和粟裕这两位有广泛军政高层群众基础的将领等，都让他树敌众多。对毛泽东来说，以“右倾机会主义”来打倒彭德怀，在高层内部容易获得支持，对公众和国际社会来说，也是可以拿来作为宣传的“幌子”。

笔者没有查到陈毅将苏联武官的话反馈给毛泽东的具体日期是在彭德怀递交“万言书”之前还是之后（笔者判断，最可能的是在 7 月 23 日的前一两天）。如果是之前，毛泽东已经准备下山，那麼毛泽东可能准备到北京后找彭德怀沟通一下他在出国期间的私下会面细节再做定夺，毕竟剥夺抗美援朝英雄和国防部长的兵权，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尤其是涉及到苏联，也无法向公众和各级官员公开这些内幕，毛泽东也担心会给民众一“鸟尽弓藏”“一言堂”的糟糕印象。但“万言书”道出了极“左”路线的破坏，得罪了一群当权派，以及彭德怀的火爆脾气上来对着毛泽东“骂娘”，进而给了其他人攻击他的把柄，

1 总参谋长，而黄和彭从平江起义开始共事，有密切的关系。黄代替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粟裕任总参谋长，而黄克诚被连带打倒与他和彭的个人渊源有关。两位手握军权的重量级将领这个时候搞到一起，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倍加小心。

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以顺应“民意”，通过打倒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来剥夺他的军政大权；这至少比对外讲堂堂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涉嫌“里通外国”来的体面。

三、“万言书”引发浮夸风集团反击

在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中，毛泽东的表面角色被广泛传播，但庐山会议的另一面则被官方媒体完全忽略。而这个“另一面”构成了彭德怀被打倒的重要推动力。

庐山会议的核心议题“纠左”，“万言书”揭露了当时中国的灾难，这与会议主题是一致的。但问题就出在，以这样的猛药来纠谁的“左”，导致中国陷入灾难的一线领导集团就成了“万言书”的冲击对象。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定位是纠“左”，而不是批“左”，或斗“左”，根本上是希望纠“左”的错误，而不是深究谁的责任，毛泽东很清楚，一旦针对个别领导人问责，将引发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而偏离纠左的当务之急，毛泽东和刘少奇一线领导集团的决裂就是必然的了（而且涉及面太广。这种党内决裂延迟到“文革”爆发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准备否定刘少奇这个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也要继续维护刘少奇的威望和体面，因此，庐山会议第一阶段没有针对任何领导人来纠“左”和追责，而只是个解决当前现实问题找思路和方向的纠“左”会。刘少奇刚在当年四月的人大上接过国家主席的职务，只要纠左追究到个人，刘少奇是必然逃脱不了的，这对于

党和国家的形象及政治稳定都是致命的。因此，毛将庐山会议定义为“神仙会”是有道理的，即解决当前急务而对事不对人。

想必彭德怀看到庐山会议似乎没有解决问题才写那封信。彭德怀的耿直和倔强,与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奇怪地发生了不和谐的对接。

彭德怀的“万言书”把问题赤裸裸地摆出来，对导致这个局面的一线领导人就太难堪了。他总结的问题第一条最后一句“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这句话点到事实，却否定了整个一线领导集体，打击面太大。

他总结第二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右的错误。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1] 这个总结同样到位。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层面，有点太严重了，甚至有路线斗争的意味；虽然当时一线领导人的作为比这还要严重。这两条总结已经将整个一线领导集体摆在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与毛泽东当时以团结中央领导集体来解决当前问题为目标的“神仙会”定位相冲突，

可以想象，那些浮夸风的主要责任领导，成为批评彭德怀的

[1]《戚本禹回忆录》里提到，据田家英回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张闻天建
议彭德怀加上去的。张这次和彭德怀一起被打倒，可能与此及黑屋聚会（李锐举

报）有关。但毛泽东对张还是了解的，张后来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这句话与
赫鲁晓夫的批评大跃进的用语相同，连累到张闻天也不令人意外。

急先锋。

由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于历史问题的选择性叙述，使得人们对庐山会议的印象都是毛泽东如何初道地对付彭德怀，如李锐的《麻山会议实录》就是个典型的叙事手法 1,其他领导人当时对彭德怀的态度细节则很少披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会有更多的内容以各种方式浮出水面。

当时会议进程也可以看出点眉目：

7 月 14H,彭德怀将“万言书”递交毛泽东

7 月 16H,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一些人表示强烈反对。

7 月 23 日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但这次会上毛泽东对彭的批评开始变得激烈。

7 月 31H,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并没对彭做出决议性批判。

8 月 1 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突然改变主张。

8 月 2 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

8 月 1613,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是什么因素导致毛泽东在 8 月 1 日改变主张？而且一下子将会议的规格从“神仙会”提升到八届八中全会的层次？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

1 笔者因此对李锐的为人和他对待历史问题的客观性持怀疑态度。他能有机会一直那麼活跃，与他和第二代的舆论倾向高度配合有关。这个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活跃的政客，通过他的书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叙述更加歪曲了历史。李锐加深了人们的偏见。尤其他还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对信任自己的毛如此玷污性渲染，可

见其人品实在不敢恭维。他和李志绥可归入同类，都属于卖主求荣奸邪之徒。李
锐把自己卖给第二代领导集体,李志绥卖给了美国反华反共集团。

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这里能影响毛泽东的“有些领导同志”是谁呢？一线核心领导人中，陈云和邓小平当时没在山上，周恩来和朱德都不可能主张用激烈手段对付彭德怀，唯一有影响力，又有充分动机的只有刘少奇了。后来回忆文章指，刘少奇甚至建议将彭德怀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不同意而作罢。刘批评彭德怀有“魏延的反骨”，以一线最高领导人来对彭德怀做这样的评价，等于政治上判了彭的“死刑”。

虽然我们能掌握的庐山会议上主要领导的讲话细节不多，有待未来的档案解密，但彭德怀对极“左”的批评受到当时极“左”代表性人物的反击则是不可避免的。笔者判断，刘少奇要彻底打倒彭德怀，除大饥荒问题，还有个更长远的考虑：刘少奇在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情况下，刘没有军队根基，必须培植自己在军队的团队才能确保接班的顺利，而彭德怀是首只拦路虎。

四、彭德怀晚年悲剧的必然性

毛泽东不是心胸狭隘之辈，在剥夺了彭的军事权力后，毛泽东还给过彭机会，甚至还安排彭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只要彭能消除“里通外国”的嫌疑，我相信，毛泽:东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与百团大战时彭德怀所犯的组织错误相比，还只是停留在情报层面。之后毛彭之间还有着多次接触。但彭德怀倔强的个性下，始终没有和毛泽东有过推心置腹的沟通来消除毛对他的疑虑。毛

对于那些坦诚认错的同志，一向极为宽容。在七千人大会上，当刘少奇讲到：“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1 可见，彭德怀自己根本意识不到他的私人会晤（也可能诬陷）和去庐山途中的随意讲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一信任危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彭曾向毛泽东写过一篇八万字的信为自己辩护，就与苏联接触这件事，彭不承认“里通外国”，但毛泽东掌握的情报则无法支持彭的自我辩护：彭德怀在苏联访问时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一些政策方针；之后苏联安排一位华裔情报人员单独与他联系 2；赫鲁晓夫于庐山会议期间刚好在美国访问，公开表示对彭德怀的认可和支持。据彼得•琼斯等着《中苏关系内幕纪实》描述，赫鲁晓夫 1959 年 5 月至 6 月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会见了彭德怀；彭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份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备忘录；而

[1] 刘少奇于 1962 年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道出了彭德怀被打倒的原因，尤其是毛泽东"没有国际背景”的插话（另一份非正式出版物则说毛泽东插话"只要不里通外国”），已经把根本原因点明了。但刘的这个讲话在收入《刘少奇选集》时被刻意删除这部分，以维护刘的形象，使得打倒彭德怀成为

毛泽东个人"一言堂”的结果。这也暴露了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极其荒谬之处：
让他们最应该感恩的对象毛泽东来背负建国以来所有错误的贵任；这种忘恩负义
之举，到了必须纠正的时候了。中华民族如果容忍忘恩负义，将难称"伟大”。

[2] 引自《戚本禹回忆录》。

第四伞不一样的"底山会议"

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与彭德怀的“万言书”内容相似……。我相信彭德怀没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但他外事活动和日常讲话的不谨慎，授人以柄。

彭的八万字长信内容没有公开，但从一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该信主要为自己辩护，彭德怀被打倒也引起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反弹，这是毛泽东 1962 年批驳“翻案风”的原因。再后来的吴日含《海瑞罢官》被理解为是映射彭德怀的庐山反抗，进而引爆中国政坛“原子弹”。面对这些历史的曲折片段，在毛又不愿意公开彭德怀“里通外国”嫌疑的情况下，只能任由后人去对毛本人来胡乱指责了。那些身居局外而又自以为是的书生们哪搞得明白高层内部的风起云涌！

据黄克诚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将帅猜忌如此，还有将的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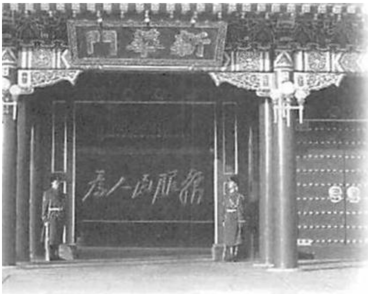
“文革”期间彭德怀被迫害致死，作为普通人，我和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对彭德怀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但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彭的最后命运又是那麽的必然。现在一个创业老板在年老时还在担心子孙们是否能够继承和兴旺家族企业，一个小家庭家长年老时还在考虑儿孙是否能团结友爱，毛泽东一生为建设一个理想的中国弹精竭虑, 在他年老体衰时，他最顾虑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儿女们会否当官发财，而是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共和国是否会变颜色，百姓是否会遭二茬罪，国家是否陷入动荡, 在北面还有个虎视眈眈而又贪得无厌的苏联随时准备侵略中国的背景下，任何可能内外勾结的风险因素都必须消灭在萌芽之中。和毛泽东一起干革命的这一代领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毛不能不担心他死后谁能控制得了这些已经被列入不信任对

象的老帅如彭德怀者。站在毛泽东的深邃思想面前展望未来，能怀妇人之仁吗？

有人说是彭德怀功高震主，未免太小看毛泽东了。因为仅仅靠军功来“震”住毛，似乎忘记毛泽东的军功了。毛将林彪紧急征召到庐山，很多人说是毛搬救兵来对付彭，其实毛不缺少这一位救兵，但毛泽东确实需要一位信得过的将帅来随时接管彭德怀手上的军权，林彪毫无疑问从能力、军功和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身份，以及与毛的信任程度上，都是一个看来不错的人选。

读史难免会为历史人物而伤感，但读者真能做到把自己置身其中，您可能首先感受到的是刀光剑影，不论是权势的争夺，还是对宏大理念的执着。但历史人物能以公心用权，不论结果如何，都应该得到后人的起码尊重。毕竟，在毛泽东的所有政治斗争中，不论多麽残酷，从来没有一次是为自己家人的利益，甚至都不是为个人的权力（否则他就不会六十多岁壮年时就指定刘少奇为接班人并放下大部分实际权力）。这和现在为了家族财富而弄权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彭大将军的军旅生涯站对了队伍，有毛泽东这样的统帅，使得彭德怀比杜聿明、廖耀湘等人幸运，他的军事生涯光彩夺目，名垂史册。但朝鲜战争之后，他站错了位置，他是杰出的军事将领，是战场上的强者，但不是政治家，是政治智慧的弱者；他不懂得急流勇退，在一个并不适合自己个性的舞台上踏空了舞步，最终摔死在舞台上。这是个人的悲剧，因他的伟大光辉而又成为民族的哀痛与遗憾。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类似片段，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第五章民主与独裁[1]

毛泽东时期的政治体制与理想中的民主政体还有不小的差距，而毛泽东后来出现的所谓“家长制”作风，似乎更鲜明了否定了他所建立的政治体制的民主性；是否因此就可以说毛泽东是个反民主、热衷于独裁统治的大独裁者呢？这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涉及到对中国未来民主化方向的探讨。

要了解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和新中国政治体制的设计，乃至政治运动发动的动机，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给了一个最高的理论概括。其中，他对中国的“民主和独裁”有一些精彩描述：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独裁”性质的准确描述。他进一步解释：

1 本章内容除个别文字和段落，基本保留第一版的内容。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我们不难认识到毛泽东对中国民主概念的独到阐释。这种民主中的独裁和独裁中的民主的结合，说明了毛泽东的民主理念和形式。这和现在的泛民主和大民主存在重大的差别，也必然在体制设计和具体操作上的迥异。这和美国式的金钱支配下的民主更有着本质的不同。他的理论在强调民主的同时，也强调打击反动派，将维护社会公平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毛泽东的上述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在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未来政治形态的深邃研究。

因此，我们据此可以说，不论在后来的具体操作上毛泽东做T 哪些反民主的事，也不能否定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家, 他提出了中国基于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民主发展的独到思路。



第五车民主与独裁

一、毛泽东政治独裁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有关中共能不能跳出几千年的兴衰周期率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从几千年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其深的环境下根本不好用，导致袁世凯复辟和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书生造反"的色彩。至蒋介石执政时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毛泽东对战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建立多党联合政府的构想，他在《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H）中指出：

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

序吏亨冬主处迥平，

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认为

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很希望能和蒋介石组成联合政府，真心希望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愿意以议他政治斗争代替武装斗争，毛甚至不顾他人劝阻和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一定认为：如果国共再开战，毛也许可以在战场上取胜，但国军力量比共军强的多，战争要持续很多年，导致生灵涂炭。无论从共产党的利益、自己的政治抱负（毛毕竟已是 52 岁的人了，再打十年结果难测的苦战，岁月不饶人，毛也没有料到后来的内战打得那样顺手）、还是民族利益出发，组成民主联合政府都是上选。因此，笔者不认为毛泽东要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吁是在演戏。毛泽东与美国特使赫尔利达成 5 项协议提出废止一党专政、统一军队、开放党禁、言论自由、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应是真诚的。国军和共军都是抗日主力，组成联合政府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可行的；共产党打了十多年为自己争得合法性和第二大党地位，也算成功。可当时蒋自恃拥有八百万大军，三个月可消灭中共而顽固发动内战，使中国错过了一个建立多党民主国家的有利机会。不少人责备 1949 年后共产党搞独裁，可“原罪”在蒋介石。1949 年后的大陆，共产党无论在历史贡献、付出的牺牲，还是力量上都一党独大，组成多党联合政府的环境已不存在，只能组成“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体。可以说，是蒋非置共产党于死地，导致中国错过了一个民主化良机，也使得毛泽东的民主建国理念不得不重新设计。海峡两岸后来各有一个具绝对优势的超级执政党，使得两岸的独裁成为可能。今日两岸分裂的责任自然不应由毛泽东承担。

1949 年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

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爱将宠臣及其它国民党人士。由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这一制度曾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共产党员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代表团中更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玲，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毛泽东时期发动的一系列运动虽然后来被批评为“大民主”，但它建基于毛泽东对人民的信赖和对自己政党的信心（如大鸣、大放、大字报，游行等），而这种信赖和信心自毛泽东之后则消失歹尽，后来的中共各级官员则将人民的不满情绪当作威胁而施以高压，维稳经费长期处于高位。这种信心的消失也阻滞了中共民主化的步伐。毛泽东时期的口号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今天这句话已经不再出现在中共媒体和官方语境中，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广泛使用的词汇一-“不明真相的群众”。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苏东巨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毛泽东本人虽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体系，毛泽东本人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也非常重视听取各方意见，但该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实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人来说，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参政重要。在毛

泽东时代，领导干部普遍的廉洁奉公使人民对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及民主体制建设根本没有兴趣，也认识不到它的必要性（今日民主意识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受贪官污吏的“推动”）。其次，毛泽东太高的个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赞成过的”，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在美国人特里尔所着的《毛泽东传》中，形象地描述到“当毛泽东思考时，他的人民已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分关闭”。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谈。“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出现将是必然的。

毛泽东的超凡智慧，造就了新中国的诞生，也带给中华民族独立、自尊和信心，导致他身边战友和广大人民对他的智慧和力量的过分依赖，进而导致民主环境的破坏和“一言堂”的出现。很显然，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更多地属于历史的必然。

“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这段话来自于“文革”时期人人必学的“老三篇”之一——毛泽东的《愚公移山》，说明民主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后来反毛人士批评“文革”是毛泽东摘的一场“大民主”，你可以否定“大民主”，但这个词汇中必须要有“民主”二字。•

实际上，“文革”时期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普及和实效比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选举”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选举当时拥有基层实际领导权的生产队长，而且自愿报名，差额选举，笔者


选队长（作于一970）

少时曾经历多次这类选举），但被后人完全忘却。好像只有当今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才知道民主的好处。

从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培养所表现出的勇于放手和信任，从另一个主线也可以反证所谓“毛泽东搞独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在 1956 年放手政府一线领导的大权给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当时毛只有 62 岁，比现在的很多高层领导都年轻。毛泽东的放权显然不是独裁者所能为。但刘的作为让毛失望而不得不换掉。林彪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放手治理军队，但林完全不顾形象而把自己毫无经验的儿子直接放在军队核心圈而大加培植，甚至最后要谋害栽培他的恩师 I 在毛泽东晚年，他感到时日无多，国家需要良将接班，重新启用邓小平，但邓小平这个反右时的极“左”头子，却突然右倾起来，为“文革”翻案。1975 年在“反唯右倾翻案风”中不得不再次打倒邓小平。毛泽东放手栽培的三个接班人都令他失望。1975 年底，自感时日无多的毛泽东写下了最后一首诗《诉衷情》抄给周恩来：

当年忠贞为国愁，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1] 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权势日盛之际，提拔太太叶群为上校，任办公室主任插手军政事务；刘少奇在″四清″时毫不避嫌地把王光美拉进权力中心，在这两位接班人大大咧咧干此事时，毛泽东还在约束着江青，直到″文革″爆发。可见，刘、

林都不是做统帅的合适人选，不顾影响，吃相太难看。毛晚年启用江青，重用毛
远新，可能原因是：在悉心栽培刘少奇而遭背叛后，身边没有多少可信任和可用
之才，尤其林彪这位相随信任半个世纪的战友的背叛对毛的打击太大了。



1976 年 5 月 12 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身恤虚弱，多数时间把头仰靠在沙发上。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短短几行，透雷出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先后经历过刘、林两位接班人背叛，又失去对邓的信任后，对接班人选择难题和国家未来的深深担忧，也可以让人们对毛晚年一系列行为有个更深层的理解：他老人家其实一直都在为政权的平稳交接和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而呕心沥血。独裁和专权从来就不是毛泽东的目的。

当邓小平在《决议》中批判毛“家长制”作风时，他自己也将犯同样的错误。以军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内撤换两个党的总书记，不能说没有“家长制”作风，而且更严重，至少毛有“家长制”作风时自己正在“家长”的位置上。毛的“家长制”带有明显体制色彩和历史因素，而邓的“家长制”则更侧重于人治的色彩。无论哪一种“家长制”的出现，都揭示了体制中的重大缺陷。

二、“一国两制”基本思想的首倡

毛泽东拥有民主开明思想的另一例证是于五十年代末，在海

峡两岸统一问题上，首次提出台湾实行三民主义，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即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两岸各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思想。1974 年，耄耋之年的毛泽东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斯时，曾就未来香港问题做出类似的表示（当时邓也在座）。然而，今人已将“一国两制”的发明权毫无疑问地送给了邓小平。如果说海外华人、华侨的这一失误还有情可愿的话，那麽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则是令人费解的。作为毛泽东时代主要领导人，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有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这一重要精神。但面对群众误送上来的荣誉，中共中央并没有作任何的纠正。

当然，邓小平作为第一位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领袖，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历史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三、中国民主化的出路

在追寻民主化的道路上，中国已拖着沉重的脚步探索了一百多年。至于如何评价过去的民主化成果，另当别论；可以肯定的现实是，中国今日的政治环境离民主政治还有太大的差距。如果说毛泽东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民主建设道路上的一大进步的话，那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值得炫耀的成果。如果说党中央高层的“集体领导原则”还算是一个民主的尝试，那麽同样肯定的是，这一制度本身只能是权宜之计，因

为参与这一“集体”的人员产生过程没有任何规范的制度，“集体”内部的责任承担和职责安排也被模糊，结果是：对一系列问题议而不决，同时也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而这个“集体”并没有给“集体”外人士的参与提供合理的管道；即使强调维护“核心”的重要，但因“核心”本身产生的过程及其个人的操守和能力，也给这个“核心”的权威带来不确定性。与过去不同的是：个人的独裁转化为“小集体”的独裁，当今中央高层的产生和运作始终没有从落后的黑箱作业中解脱出来；个别领导人的上升和下降，根本上与他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而与治国的能力和贡献没有关系；这必然导致“逆向淘汰”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悲哀。“集体领导原则”和突出维护“核心”只能是权宜之计, 而不应，也不可能成为中国高层政治的常态。而集体内部的拉帮结派，难免形成占优势的组合，则可轻而易举地摧毁内部的民主氛围。

在探索中国民主化道路时，必须首先明确的是，中国民主化道路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不能考虑对共产党本身执政地位的挑战；这与是否喜欢共产党无关。否则，不仅无助于民主的发展，很可能导致中国民主化的停滞，甚至倒退，看一下“六•四”对民主化进程的破坏就明白了。中国经受不起“推倒一切，从头再来”的冲击；其社会成本的高昂将与民主化本身的目标效果背道而驰。这并非刻意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实，即使在笔者加入共产党的发展会上也坦率地承认：本人首先是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础是“中国”两个字。

在笔者深思国家未来出路时，从来不把共产党的利益作为考

虑内容，而国家和民族利益才是唯一考球的对象；而共产党不过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工具罢了。但在考虑具体的民主化步骤时，共产党当今的执政现实和形态是必须要考虑的，否则，再好的民主化设想也无法变成现实。至于五百年后是否应政党“轮流坐庄”，只有未来才能知晓。如果按照共产党的理想，到时也许已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一一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就连共产党本身也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更别谈多党制了。

其实，多党制固然是民主政治的一种，但是否真能达至民主的社会效果，仅看有几个党是不够的，各政党自身的素质实际上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如果各个政党内部运作是非民主的，各政党领导人和参选人的产生过程中有明显的反民主色彩，政党对外又缺少对舆论的敏感和有效反馈机制，那麽，不论哪个政党能成为执政党，它组成政府的民主素质也必然值得怀疑，因它缺少民主的素养，仅有一个民主的外壳而已。看一下当今世界上不少多党制政体的运作质量就能明白这一点。

因此，当今中国民主化的首要任务，不是去争论是否建立反对党，而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化建设，和外部的人民及舆论监督体系的确立。这实际上是个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落实过程和落实方式。只有明确了这一目标,才能把握中国民主化的正确方向，同时又不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当然，如果这一过程进展顺利的话，中国共产党将成为真正服务和来自于人民的政党，将吸引所有优秀分子加入该党中去。使他能在凝聚民心，激发民志，社会动员，精神建设等多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而现有多党制政体中，政党仅仅是选举的工具。

至于中国共产党民主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此处无意多谈，因那是较为遥远的课题。当前，中国共产党民主化建设的首

要任务应该是处理好以下一些理论课题：

第一，如何理解“党领导一切”？

“党领导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执政特点，组织建设上反映在各级党委的存在和对大小事物的最后裁决权。可以不夸张地说，在今日中国大陆，包括厕所、坟地、生孩子、丧葬、学术职称评定、职工福利、法律裁决、军队等，共产党无所不管。按照现有大学的职称评定制度，大学党委书记有权干预教授职称的评定，问题是，一个学术水平一流的学者，共产党可以剥夺他的“先进个人”评定资格，但无权否定他的学术造诣，而“教授”的职称则是建立在学术水平的基础上。同样，他是否应被分到三室一厅的房子，同样是根据他在科教方向的贡献，而不是“是否跟着党走”，否则的话，那杨振宁和李正道这些“反动学术权威”被清华大学聘请为教授只能说明，清华党委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属被打倒之列。城市区或街道党组有权决定公共厕所的建设。而党的主要领导对司法的干预，也成了中国法制化建设的根本障碍。

这种对国家大小事务的无所不管和过分干预，实际上是对“党的领导”理论的严重曲解。在共产党的任何…个理论中也找不到这种无所不管的理论根据。由于这种过分干预和领导，并没有一个规范的体制，各级党委书记就成了实际上的各级“土皇帝”，为党的领导带来了强烈的人治色彩。由于各级党委绀成人员素质的制约，更严重地败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和社会基础，为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因此，中共中央对共产党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弱化对具间行政事务的干预，而将“党的领导”定位在对国家重大事务和

发展方向的把握上，同时在先进文化的宣传、民众动员、拥军优属等方面继续扮演关键角色；适当削弱基层党委的行政职责和权限。就一个县如何引进外资而言，“党”的职责是，肯定引进外资的正确性，但对如何引进，引进什么，实在不该在党的管辖范围，这是个纯粹的行政和经济问题。当然，党本身对各级行政部门的行政质量，尤其是党员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具有监督的权力和职责；各级“党鞭（纪检委）”的作用当然不能削弱，甚至应加强。

如果能本着上述方向弱化对基层具体行政事务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将可以立即实行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精简，甚至可缩小三分之二的党务人员编制，为各级财政节省大笔的开支。农民的负担也将随之大为减轻。

上述改革思路，不仅不会挑战“党的领导”这一核心问题，而且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考虑这样一些简单的问题：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为所欲为，如果削弱他们的权力，对中央高层的个人利害有什么不利影响呢？当中国的国家政权继续掌握在共产党于中, 那麽，基层党委权力的削弱是否就破坏了中国的政权性质了呢？答案应是显而易见的。[1]

如果回避这一改革，各级党委和行政之间的扯皮、责任推谈、分工不清、奖罚不明等弊端，将会长期地持续下去。中国法制化建设的步伐，没有快速前进的可能，因共产党成为一捆紧双脚的脚缭。

中国在过去几年搞的最著名的民主化改革是“村民自治选举

十九大后将武警权力收回军委，就是对基层权力的弱化。过去各级党委书记利用武警涉足强制拆迁等不少坏事，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制度”的建立。但至今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除各级党委和政府督促不够，还有个更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缺陷。

现在，中国农村行政村或大队（“大队”是农业集体化的产物，一般包括几个自然村。现在的行政村仍以“大队”为基础，农民仍习惯使用“大队”一词），主要领导有“三大员”：党支部书记、主任和会计组成的村委会。村民自治选举制度所选举产生的干部是“主任”这个角色。由于“党领导一切”，在三人中，党支部书记是实际的“一把手”，而主任只是“二把手”。这样，村民兴高采烈地选出来的是个没有最高领导权的“老二”。只要“一把手”对村民选上来的人不满意，这个民主的“产物”就别想开展工作，他手中的民意将分文不值。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很好地处理“党的领导”，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将寸步难行。即使仅就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完善，而弱化行政村党委书记的权力，让人民选举出真正的“一把手”，中国基层民主化建设也将取得根本性的进步，基层贪污之风将会得到有效遏制。同时，民主的“种子”也将通过几年的选举而在人民心目中生根发芽，为将来更大范围的民主化建设准备社会基础。

只有当民主的概念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中，“民主”才真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否则，它将永远停留在政治理念和学术的层面上。

第二，如何处理“反对党的领导人”和“反党”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处理的好坏，将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舆论监督和民主制衡的态度取向。

第五章民主与独裁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的斗争很多是党的领导人之间领导权的争夺，而和“路线”没有关系。而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更被冠以“反党”的天大罪名而永远不得翻身。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历史的一大污点。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在处理个人和组织关系上的模糊，和对组织名誉的滥用。

最近十多年的一个可喜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正逐渐摆脱过去的铁血风格，变得更加理智、中庸和对政治对手的宽容，使得赵紫阳成为共产党铁血传统的最后一位受害者，当然，也是最后一个“党的分裂分子”。中国军队在国家权力安排中角色的淡化，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也是中国军人和军队建设更加成熟的闵现。

中央政治局同样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某省委或县委书记的危法乱纪行为被媒体揭发的话，是否会影响到共产党整体的威望呢？对您本人又会有什么伤害呢?他可能是您栽培和提拔的，但他后来的违法乱纪和当初的提拔是两个并不一定矛盾的问题；不能因为您的提拔而对他个人负永久的责任。作为中央高层的领袖也应看到，对一个声名狼藉的贪官进行袒护，本身就是在毁灭您自己的威望（这样短见的高官比比皆是）；为一个不值得爱护的下属而毁掉自己的清誉，是否太不明智了呢？很遗憾，当今中央高层的领袖们，有几个人没做过这类胡涂事？自毛泽东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很难再找到有这种基圭远区的领导人。

笔者在思考中国的民主化方向时，从来不把“人”看成是理想的，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被理论上看成是有私欲的，而不是共产党传统所宣扬的理想革命者；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稳定而有效的民主体制。因此，上述请中央政治局委员考虑的问题，也顾及到对他们自身群体利益的伤害程度；否则，再好的民主化改革建议，也很难通过高层那一关。这是无奈的，但又是负责任

的和非对抗性的，最终将比激进式的改革更能实际推动中国的进步。“六•四”之后中国民主化发展的停滞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是渐进的，而不是跳跃式的。

第三，有效舆论监督体系的确立

第一章谈到国有企业的出路时，曾涉及到舆论监督方面的问题，之所以没有深谈，是因为根本问题在于：舆论监督体系有效与否，不仅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也涉及到中国民主和法制化建设上是否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这实际上是个关系全域的问题。

随着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和重组，昔日的直属各级党委的形态将会有所改变，将会为舆论的监督提供更宽阔的活动空间。如果让《河南日报》揭发河南省委书记亲属的违法行为，显然是困难的，但如果让它成为全国发行的大报，进而去揭露贵州和黑龙江省高层的违法乱纪行为，则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中央应栽培并鼓励一些有较好基础的媒体集团向全国发展，并鼓励它们将报道的内容覆盖全国，这样，各级领导人在胡作非为时，必然要面对更大的风险。而中共中央也应考虑让全国人大拥有一份较具独立性，同时又是全国性或大区性的报纸。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对各级党政部门及领导人进行更有效的监督。很显然，这丝毫不会威胁党的领导地位，但肯定会影响个别领导人的地位。

全国政协也可考虑设立独立媒体，除议政外，重点监督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质就和操守。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否允许舆论充分监督，实际上是党和政府的运作是否要民众参与的问题，这将决定执政党的本质。

第四，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启动方向应遵循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两个方向。

所谓“从下而上”，是指从基层作起，如上述村民自治选举制度和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弱化。如果能同时伴随基层党组织自身的民主化建设，如党干部的党内选举和群众评议制度建设等，那麼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执政素质和威望将会有大的提高，也将为党内民主化发展作必要的测试和准备。待行政村级民主建设稳定后，再逐步上推至乡镇和县。在城市，则从街道起步，进而上推至区和市级。

所谓“自上而下”，是指从中央高层作起，其中包括党中央高层权力架构的完善，党政职责的明确化，权力交接制度的确立等。这可能会面对较大的困难，但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困难不在体制的设计，而在高层领袖自身的胸怀和远见，正如上文所说，笔者不把他们当成是理想的革命者，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自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就中共未来领导核心成员的各种传闻也可看出，中共高层体制的改革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地步。让中南海里那几个人“搅得周天寒彻”，未免带来道德的质疑。“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随时有变成“党内一小撮”的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省一级党委和政府的民主化改革将是最后，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边据少数民族聚集省区的过快民主化，可能带来地区“政治和民意孤岛”的潜在问题，进而影响到边疆地区的稳定和统一；对此就不赘述了。但这并不应成为回避舆论监督、放慢法制化和党鞭体系改革的借口。

上述改革思路肯定不是中国改革的长远目标，只能是在现有基础上的第一步，而这一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跳过或回避的。如

果能在不久的将来完成上述初步改革，未来改革的方向将视具体改革的效果而定。上述党内改革，配合党外监督渠道的加强，以及人大作用的强化，如果能产生不错的民主效果，未来的改革方向将侧重于完善已有改革，并在原来的大方向上予以深化，直至整个共产党系统的民主化改造完成。如果能在五年内达至上述初步目标，十年内完成整个共产党系统的改革和完善的话，那麽，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来说，将是一个质的飞跃，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如果上述改革完成后，党内民主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力，党外监督无法有效运作，那麽，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化改造”将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过于强大，且党国一体，要在中国培育反对党将异常困难和漫长。最快捷且能保持意识形态稳定的“法宝”就是：将共产党一分为二，成立两个左派政党，他们拥有同样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但各自独立运作。在具体民主化的游戏规则上，本处就不做细谈了，因这一天是否会来临还是未知数。

当今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们，如果要避免未来的不得不分裂的命运，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快自身的民主化改造，并以较宽宏的气度为党外监督创造条件。

第五，司法和纪检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不论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方案，保证它能有效实施和运作的关键要素是司法体系和党鞭的有效性。

当今中国的司法体系和党鞭系统，是由各级中央和地方党委会领导下运作的，这必然带来的问题是：纪委在监督领导自己的

党委操守时的失效，以及法制体系维护社会公正和国家法律尊严上的局限性。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各级党委必然成为拥有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宣传资源、司法系统、武裝力量的实际上的地方山头，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建立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中共当前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将现有的司法和纪检体系的横向领导割断，全部改为纵向领导。法院和监察体系的最高领导机构，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而纪检委则直属政治局常委会。这样，虽然离完美还有距离，但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将迈出根本性的一步。配合上述监督舆论体系的确立，打击贪腐和特权的制度基础也就初步确立起来了。

自习近平为代表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上台以来，大力反腐倡廉，力度之大古今罕见。老虎苍蝇一起抓。但现实是，老虎抓不少，苍蝇群体大的多，抓的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中央大力反贪，省级总体上应付，地市级和县级只传达文件。即高层力度到了基层就是强弩之末。笔者认识一位市纪委副书记，整天没事做，就是玩书法艺术之类的。我很好奇他为啥这麽轻松，他答：投诉很多，信息很多，但市委书记不批准调查的案子，纪委不能贸然调查，他就只好落个清闲。这是 2016 年的中国基层反贪的荒谬现状。可这样的市委书记遍布中国大多数城市，但一个都没有因为不反贪而被以“不作为”之名予以撤职。如果以后高层反贪高压减弱，基层贪腐必将卷土重来，只会更加猛烈。所以，没有制度的完善，我对共产党的未来不敢太乐观。[XVII]

中央可以参考人民银行设立大区行的思路，考虑设立大区级

[XVII]这部分文字为第二版新加内容。

法院、监察和纪检体系，以取代现有的省市区县级部门。今天一有大案要案都要中央直接插手，显然是低效率的。

第六，各级人大的功能强化，和各级人大代表产生过程的民主化。

当今的人大体系，虽然从宪法上讲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但因“党领导一切”而带来具体操作上的非民主色彩，导致了功能的弱化。各级人大其实是各级党委的橡皮图章和民主化的装饰品，实际的监督作用根本没有发挥。人大代表产生过程缺乏民主程序，很多劳动模范成为人大代表（这在人大代表中还算不错的呢），但与民主无关。让这些劳动模范成为社会的道德样板无疑足仃意义的，但让他们左批评和监督向他们授「•荣那的领导干部，则有些难以操作。由于人大代表产生过程的非民主，导致 90% 以上的大陆人民不知道代表他们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是怎麼产生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是谁。

另外一个荒唐的现象是：各级人大的例会（全国人大除外）很少受到关注，他们都讨论些什么内容，也无人知晓。笔者这种极为关心国事的人，也不知道省、地、市、县级人大一年中，除每年一次的例会，是否还有其它的例会，如每季度例会等，以及人大代表都对哪些事务提出过议案或进行过辩论。

更荒唐的是，大陆的城市街道、乡镇和行政村一级，没有人代会式的法定议事和监督机构（如，村民监理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缺少了这两级的议会体制，基层的民主化就根本谈不上7, 基层人民利益的维护和当家作主权力的行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很显然，这是大陆民主制度建设中的一大疏漏。

面对世界发展大势，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将是世界注目的大

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创立文官制度和考试取仕制度的国家，中国朝廷的执政素质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保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今天，面对必须要走的民主化道路，只要中国共产党领袖们能更高瞻远嘱，具更博大胸襟，一定能建立起世界最完善、最科学的民主政体。它不仅具有西方民主政体的民本性、开放性、包容性，同时也将具有西方民主政体所欠缺的高效性、前瞻性和全域观，尤其避免西方民主政体所固有的选举型或短期利益追求型的执政特点。

四、对台湾民主政治的一点看法 1

台湾在借用它山之石的基础上，已进行了积极的民主化改造。不论当前台湾的民主政体有多少问题，笔者从来不准备嘲笑。但阿扁当选那天的晚上，实现了政党轮替，因统独问题也引起广泛担忧。我从战略高度深度分析后，似乎发现了阿扁的个性对于国家统一的难得机遇（当时给中央高层写了封建言信，但中央对陈水扁的判断与我不同）。

台湾在民主化道路上已取得一定进展是不容置疑的。虽然今天还有立法会骂人的现象，但比蒋介石时期的坐牢，和李登辉时

[1] 该部分内容第二版增加最后一条。有兴趣了解作者对姜湾问题观点的读者可以
进入微信公众号"南洋智库"或作者新浪博客
blog.sina.com.cn/nanyangbook，参
考里面的九篇台湾系列文《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



期议会的肢体冲突，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作为一名积极探询中国命运的大陆知识分子，笔者对台湾的民主化之路从来都给予由衷的祝福。毕竟这是建立民主化中国的一部分。

但过去两次的大选所发现的一些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台湾各政党必须进行内部的民主化建设。

没有执政党内部民主的确立，不论台湾的政党轮替多麽热闹，都难以避免行政作业上的反民主动作。因为当选人当初能代表自己的政党参选，只能说明他在党内高层人际关系运作上的能力，而和治国能力、政治远见、全体党员中的威望以及民众基础等毫无关系。1 虽然选民投票给他，有相当比例是“看在党的面子上”，而不代表对当选人本人的认同。而日常政治运作的时候，党的参与又是非常有限的。

其实，从上面对大陆民主化的思路也可看出，政党内部的民主化和外部的民主化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对于国民党来说，下次大选如果能以党内公开选举的方式产生候选人，无疑将是国民党的一大飞跃。但对于讲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让马英九和连战争这个位置显然是困难的。所以，在党内民主体制设计上，照抄西方的公式，看来会遇到可操作性的问题。

[1] 2016 年台湾大选，笔者借助于脸书全程参与了洪秀柱的初选阶段，正因为对国民党内部文化的了解，我很早就预测到朱立伦可能造反"换柱"。果不其然。之后我曾宣扬洪秀珠应该独立参选，但她很显然对国民党继续抱有希望。而后来的党主席任上座位没坐热即被替换，进一步凸显了洪秀珠的理想主义：对于肌体病入

嘗肓的政党抱有希望，除了失望，不可能有作为，只是浪费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支持者的热情。

但如果不迈出党内民主选举这一步，国民党的彻底内部改造将遥遥无期。对于连战来说，是否参加下次大选，或是否当选台湾最高领导人并不是关键问题，如果连战能完成国民党的民主化改造，为台湾留下一支高素质的政治力球，那麼连战可以笑对国父和苍生了。而把盛负民意和年龄优势的马英九推向前台无疑是值得考虑的。

连战希望为国民党夺回在自己手里失去的江山，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在下次大选前向外界表明：如果自己当选将只干一届。到时，以此为契机，启动全党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候选人（连战不再争取候选人机会），马英九应能通过选举而代表国民党出选（不能因为马英九的民望高而放弃民主选举的过程，这涉及到一个新制度的启动）。那连战对国民党的贡献将足以名垂青史。而国民党作为民主和高素质政党的辉煌时代，才能真正来临。

台湾其它党派同样面临党内民主化改造的问题。

第二、从选举制度上确保当选人能代表多数民意。

上届大选，虽然导致了政党轮替的民主表象，但当选人陈水扁以不足 40%的少数民意当选，则成为这次民主选举的一个缺憾，也对民主的素质和效果提出了挑战。

实际上，参选人超过两组情况下，这种结果早晚都会出现。当台湾引进美式选举制度时，忽略了美国实际上的两党竞选体系。如果要找参考样板的话，欧洲国家的第二轮选举制度，才比较适合台湾的政治现实。即，在第一轮选举中，如果没人得到超过半数选票，得票最多的两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选举；这样，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必然超过半数选票，代表多数民意。

希望阿扁是最后一位在不到半数的情况下当选的“总统”。

第五拿民主与独裁



拯救台湾同胞

当然，如果引进第二轮选举制度，民进党如果不放弃“台独”党纲，当选的可能性将大幅度降低。而“泛蓝政团”应利用当前在“国会”中的优势，促成“第二轮选举制度”的立法。这样，即使未来国民党和亲民党合作失败，不得不各自参选的话，“台独”党派也少有在第二轮胜出的可能。

第三、舆论监督水平的同步提高，是台湾民主化建设走向成熟的必然环节。

由于存在着“统独”之争，导致了岛内舆论的分野，并和岛内各政党的“统独”倾向搅在一起，从根本上动摇了舆论监督本来应该具有的中立地位。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了舆论的中立，民主监督的效果必然受到削弱。比如，倾向“台独”的媒体，面对民进党政府的错误，总不可避免地从正面进行阐释和包装，而对统派阵营的言行，则尽力从负面进行报道和分析。很显然，指望这样的媒体监督民进党政府，是不可能有效的。

在报道与大陆有关的新闻时，这很显然是台湾必须关注的话题，台湾媒体几乎都倾向于进行负面解读，给台湾人民更好地了解大陆提供了带倾向性的内容。如：在统独问题上比较中立的《中国时报》，在“集集大地震”期间曾在头版头条刊出一则新闻，指大陆阻止俄罗斯对噪湾地震的救援。然后台湾媒体全面转载了这则新闻，给台湾人民的心理造成很坏的影响，也必然影响到百姓对大陆政府的看法，对两岸之间的理解和谅解带来必然的破坏。但后来证实这则新闻是错的，于是，该报在内页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个更正启示，而不是在头版显著位置，但对海峡两岸

交流的负面影响已经造成。

这类例子在台湾媒体中并不鲜见，至于大陆政府方面的一些善意言行，更被传媒经常忽略。大地震时大陆政府随时准备援助台湾的表示等类似情况，台湾报纸则低调处理。

在台湾加入国际性组织问题上，这类处理手法更是明显。台湾有那麼多国际法专家，不少台湾人具有开阔的视野，他们很清楚大陆必然阻止台湾加入任何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组织，即使让台湾媒体的编辑大人坐镇中南海，他们同样会加以阻止，但是台湾媒体遇到这类情况时，从来没有冷静的分析和对民众的劝谕，相反，都是对大陆政府情绪化的指责。很显然，在促进台湾人民理解大陆，增进谅解方面，台湾媒体是非常失职的。

台湾媒体舆论监督的质応和层次，不要说跟上民主社会舆论监督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要求，即使在职业道德建设方面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至于启动社会思考，引发思想交流，积极地探询社会、政治和民生问题的功能，就更不要奢望了。

甚至可以说，如果有朝一日两岸关系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台湾媒体从业人员将无法逃避历史和良知的谴责。

至于台湾在大陆的民主化建设方面是否能扮演“复兴基地”的角色，实在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两岸的政治现实、社会基础、民众文化素质、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存在太大的差距。台湾因政治体积较小，即使民主化改造出现失误，损失将是有限的。而大陆则经不起政治上的大波折。在一定层次上的民主集中混合体，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大陆民主政治的模式，也适合大陆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超级复杂状态。虽然没有台湾的民主精彩和热闹，但一定程度上的有限独裁对大陆却是适用的。

实际上，大陆制度中的独裁成份，为海峡两岸在谈判的基础

上寻求统一提供了较从容的环境。如果大陆真正实现了总湾式的民主，在两岸统一谈判中大陆政府再也没有能力轻易地做出让步。

至于台湾是把握还是错过这个机会，让时间去回答吧。

第四，两岸统一是台湾民主政治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目前台湾深蓝和深绿选民占选民的比例分别达 20%。这个 40%的选民是基本不看政纲和行政质量的，只看统独倾向或颜色决定选票投向。这是各阵营的选票基本盘。就是说，豪湾民主体制对行政质量的监督只有最多 60%的有效性。在这 60%中，有部分浅绿和浅蓝选民，在评估行政质球时又加入了自己的蓝绿倾向。还有一部分对政治彻底失望的选民，抱着“选哪个苹果都是烂的”思想而懒得投票。可见，在统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台湾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民主实效，不论其制度多麽完善。只有将这个 40%基本盘的力量完全从统独情结中跳出来，专注于施政质量的监督，台湾高素质的民主政治才真正有可能到来。



信儿捎给台湾的小朋友(1974)

第六章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1958 年，毛泽东在北钺河会议上提到：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法案条例靠养成习惯才能遵守；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表明他对政府作为最高教育者角色的态度。从第一章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已经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惠，也为他政治生涯中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了最好的注脚。

一、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反右

毛泽东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请文化界德高望重的人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槌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德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

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稻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以著名的学者梁漱溟教授为例。他曾在延安对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抗日的悲观符法，与毛泽东抗日必胜的信心成鲜明对照。他固然是位铮铮铁骨的学者，一代大儒，有着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他的“九天九地”论体现了对农民命运的愤愤不平，但他对城市工业化的消极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差距太大。他在《乡村建设大意》里强调和追求的“农民自觉”，对教育程度低、一盘散沙的农民来说，根本是书房里的幻想。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要组织起中国的农民，并发动他们的群体自觉性，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的“乡村组织”建设构想更是有趣，指望靠“商量着办事”，既没有任何的可操作性，也没有理论价值，与现在的民主思想更不沾边。他在 1953 年的政协会议上和毛泽东的当众争论，固然表现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特立独行；但他在大会上对正得意非常的毛泽东（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各类旧社会毒瘤被铲除，抗美援朝取得胜利）提出公开“挑战”，在方法上则太有问题；即使美国反对党国会议员，也不会以挑战的口吻不分场合地对付美国总统。如果拿他当时的语言放在后来的邓小平和江泽民身上，等待他的很可能是秦城监狱。毛泽东不是个圣人，而是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学者提个思想或发发牢骚不难，也应该给予这个权力（可惜这种权力并不总是存在的，尤其在寻求全民思想上高度统一的时候。这种权力也不应该在任何场所，任何情况下都给予满足），政治家必须考虑到更多实际的问题。但“文革”结束后，

人们将二者决裂的全部责任推给了毛泽东，是不公平的，也是毛后时代极有代表性的处理手法。

遗憾的是，这些老学究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进城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文中的“牢骚太盛防断肠”，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而柳亚子对自己有“夺席谈经”才学的自负和不被重用的牢骚，突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投机钻营；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天下、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银: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得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教授曾一针见血地谈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时代的问题”。作者曾在新加坡某公司工作，有一次当从报上看到几位日本议员要登钓鱼岛的消息，公司的几位来自山东的工人（中学文化程度）均义愤填膺，纷纷表示“如中国和日本开战，立即回去参军”；公司的一名来自中国、拥有本

科学历的工程师则有另一通高论："回去干什么？中国那么多人，没有你们就没人打仗了吗？"此类精明人在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他们随着知识的丰富，并没有同步建立起更高的个人素养、道德价值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但原来身上的那份宝贵的纯朴已消失殆尽。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让毛泽东惊醒，他要充分广开言路，为共产党提意见，化解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积累的矛盾，避免东欧事件在中国重演，所以，他 1957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该讲话后来被正式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央文件颁布），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共产党官僚主义提意见，帮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讲话创造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宽松气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抱什么政治企图，但少部分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对共产党领导的质疑随之出现，甚至出现歌颂赫鲁晓夫及其"秘密报告"的情况。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声音中，不乏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

很显然，上述现象超越了学术争论和向共产党提意见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

四”前部分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当然，反右是中共中央集体讨论决策的，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专断，最后的发展也超出毛泽东的预料。但现在把反右的“屎盆子”扣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是不公平的。

反右运动开始后，需要一个指导性文件，毛泽东把他的讲话，结合高层的意见后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文件是纲领性的，在政治上是开明的。但具体的执行效果，还要看执行层而的操作和掌握了。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彭真任副组长，来具体领导反右工作。刘少奇当时已经确立为接班人和一线最高领导人地位。反右扩大化的具体责任在谁，您还能都怪毛泽东吗？根据一些回忆文章 1 毛泽东当时认为全国右派有四、五千人。而邓小平以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提出按照 10%的比例打右派，而且后来全国各单位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执行的，一下子打了五十五万右派。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

[1]这部分第二版做了调整补充。由于缺乏官方资料，目前关于反右的文章都是回忆类文章。笔者无法肯定反右扩大化中各位领导的责任，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主政后所有关于反右及其扩大化的描述都具选择性，这一点和前述大饥荒情况类似，因反右时期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和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邓小平、彭真不仅是直接责任人，也是政治盟友，他们主导下的舆论不可能公正。因此，可资参考的回忆文章可能有倾向性，但邓主政时的宣传则肯定有倾向性。期待中央解密这段历史档案，才能对有关领导人给出公正评价。邓曾说自己对反右扩大化是有责任的，但具体贵任不详。当时他和刘关于反右的讲话很难找到，这与他们所处的一
线位 H 很不相称。身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他有执行和反馈之责，有具体执行“度”

的控制权力。他又有总书记身份可以直接插手党媒,因此，要说登叼、平. 对

反右扩大化负有主要责任，不会与事实偏离太远。

再说，现在不宜平反。（以笔者理解：反右扩大化是邓小平主导，如果刮起平反之风，邓担心自己被追责，所以，无限期拖延下去就是邓最期待的选择。拖到毛死后，他把所有责任推给毛）

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将正常向组织提意见者也给予打击，是令人遗憾的。“反右”过程中，一些文人借机打击对手的做法就不值一评了。

令人痛心的是，“反右”并没有制定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导致投机钻营者借机爬升，打喂异己，而耿直的知识分子则受害者众。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可悲之处，直接导致政治运动实效和目标的偏离。

毛泽东逝世之后，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将毛泽东提出上述“双百方针”和后来的反右联系起来，并将其视为毛泽柬有意采取的“引蛇出洞”手段，来达到整肃异己的目的。毫无疑问，“双百方针”的提出，激励了一些学者的言论胆量，并导致后来的反右，但这种因果关系是否为预先设定的圈套，实在没有任何的可靠证据加以证明；只是后人为否定毛泽东而任意地发挥他们的丰富想像罢了。

从一些回忆文章及越来越多披露的资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讲话并没有在党内预先讨论，而只是毛泽柬个人提出的观点。他的讲话在党内引起很大抵触，不少人对毛泽东这个讲话是有意见的，毛泽东为此很是苦恼；所以，当后来一些人借机来和共产党分权时，毛泽东受到了来自党内同志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反右。

知识分子以政治的理由遭受打击，从政治上不论多么可以理解，

都是令人遗憾的，这是几千年来间隔上演的悲剧。这里面存

在着统治文化进步程度的制约。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全面民主化、开明化和理性化。没有文化的复兴和为此配套的政治环境的改善，中华民族的新盛世将只能是一个幻想。这有赖于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和信心。当然，如果知识分子以理想主义的心态思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以同样的心态诉诸于政治上的行为，则未免太轻率和冒险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不能认识自己的局限，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对立将长期存在。当我们责备秦始皇坑儒，终结了“百家争鸣”时代的时候，最好不要忘记这些儒生们对“分封制”的鼓吹，和对郡县制的嘲讽。今天回头来看，不得不承认，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是对的，他确立了中国万年一统的基业和文化，为中国百姓奠定了安居乐业的政治基础。而那衍儒生们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当毛后时代的知识分子评价毛泽东时，到底有多少是基于个人的得失，又有多少纯粹是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去把握？“千万不能得罪读书人”，这已为千年政治史所反复证实；这除了说明知识的力量，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读书人的狭隘和自私。当中国知识分子评价毛泽东时，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一下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感受，以及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得失，而只以自身及大城市的受害者作为唯一考察对象，甚至大城市的工业化成就和工人福利政策也被忽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对于诸如刘邦、朱元彰、毛泽东等人能成为帝王，而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这样的“幸运”感到遗憾和不能理解。其实，如果余教授能认真地内视一下中国读书人的

那份文强志弱、心强体弱，就该理解到：在朝代更迭之际，中国读书人如果不拖后腿已经是万幸。像到了民国时期

还留着辫子，为男人纳妾和女人裹脚辩护的大学者辜鸿铭先生，他那样的学者在中国任何时代更迭之际都大有其人。中国读书人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更多地扮演了解释历史的角色，而不是创造；即使有些思想的开创，也缺乏行动的心力。而刘邦、朱元彰、毛泽东等人，则能果敢地和过去道别，并以坚强的意志和远见推动历史的前进。刘邦攻打匈奴失败，立即嫁去公主，汉匈和亲，为最终的崛起创造了可能，并为确立中国在东方的千年统治地位保留了机会；如果不是刘邦这样一个“小流氓”，而是大学者当皇帝，那么他放得下知识分子的面子而把公主嫁给别人吗？对毛泽东和对手的巨大实力差距，哪个书生能无惧地面对并取胜？如果余教授不幸生活在秦始皇或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很可能也是被“坑”或被“反”的对象，因您看不到朝代开拓者的力；i:之所在，认识不到知识分子自身之不足。

当然，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更加成熟，重新启动由秦始皇终结的“百家争鸣”的时机也许已经来临，政权主要关注于人民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应更多留意国家全面发展的机会。一个政权只强调生存权，而忽略人权更广泛的内涵，那么，人的价值和动物有何区别？法国启蒙运动的价值在于赋予了人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等普世价值的广泛认知，同时也强化了巴黎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和世界主要的文化之都。虽然法国自启蒙运动以来历经兴衰，在欧洲政治版图上的地位也历经升降，但巴黎的文化中心地位始终得以维持；直到今天，法国人民仍从中受惠。这本身也说明，精神文明

具有比物质文明更强大、更持久的生命力。

中国自身的历史是个更好的例子。几千年来的分合兴衰，并没有阻断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相反，正是中国优秀文化的强

大功能和生命力，才使得中华民族从多次的分裂和衰败中成功崛起。所有这些都说明，文化的兴盛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元气所在；而物质文明的繁荣则有阶段性和暂时性的特点。

当然，文明的进步与专制、文字狱等是相互抵触的。文明足够强大，必然会瓦解专制；而专制的存在，必然阻碍文化的繁荣。当中国人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建立一个缤纷多彩的文化中国，就成了执政党和文化界义不容辞的新任务。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修养的提高与否，将根本上决定中国文化复兴的走向和成败。这是“本”之所在，而政治力量的介入也许会有所帮助，但始终是“末”。到中国大学的人文科学系、艺术院校，看一下那儿的一些年轻学人的颓废及物质化的精神面貌以及过去二十年中国学术界弥漫的歪风邪气，似乎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离“成熟”和“高尚”还差得远呢。一些学子们甚至连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平都达不到。中国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和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不把社会带向混乱和颓废已经是万幸。



二、知识分子的改造

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教育青年人的重要尝试。

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

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看一下过去二十年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媒体的媚俗化、社会学家政治家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漠视和无知，也可看出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合理动机。

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因他们中不少人将对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笔者自大学一年级起，即对政治等国家发展事务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经常利用节假日自觉进行多层面的社会考察，并尽可能利用课余时间博览群书，在广泛的专业领域充钗自己，提高对社会的认识分析能力。在多个理工科、社科、文学等领域都有了一定知识积累，为更好适应社会和认识社会提供了知识储备。然而，社会科学方面的学子们，又有几人能主动自觉地做到这一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地研究和借鉴。这种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思路，可以进一步完善，但不应该简单否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大国来说，没有对社会的深刻研究和生活体会，要正确地把握中国的国情是不可能的，也自然影响到国家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四九年后，中国教育体系受两千年来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



重知识传授、重书本知识、重师道尊严；而受苏联模式和国家工业化意识的影响，教育结构上存在着重理工，轻文科的倾向。学制长、课业重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对于这种传统教育体系的第一批判者就是毛泽东。在 1964 年的春节座谈会上，他尖锐指出："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摧残青年、摧残人才，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对传统教育体系所进行的多次"革命"，有许多左的错误和有违教育规律的简单做法，但其中包涵的带有革命性的精髓是不应被简单抛弃的，值得中国教育界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实际上，只要看一眼现在小学生背上那沉重的书包即可发现，今天的教育现实已远比毛泽东所声讨的五六十年代教育状况严峻残酷得多；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

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1972 年），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按要求拣粪、割草、采集中药材。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质量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甚至连青少年时期应该具备的一份基于爱国主义的理想和对未来人生的美好憧憬，也在家庭、社会及教育失败的影响下而越来越庸俗化；孩子们的那份纯真已受到社会大环境的污染而没有得到学校教育体系的有效呵护。

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尤其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内的不良气氛，似乎在提舰着人们，中国知识分

子的自我改造和完善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而毛泽东不过是在用教鞭敲打读书人的脑袋时，用力稍微大了些，且敲了一些不该敲的人。但不能因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改造中的偏差,就否定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毛病，和知识分子自身改造的必要性。

毛泽东去矣，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和完善步伐不应该停止。当然，今天任何试图用政治的手段促成这种改造都是荒唐的，中共中央高层也没有这样的道德力量来推动知识分子的改造，那么，就只好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觉了。

(随想：自中苏关系恶化后，核战争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在毛泽东头脑中一直盘旋。“保存骨干力量”是否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机中扮演一定角色？很显然，如果中国的知识阶层全集中在城市，一旦受到核武器攻击，中国最后生存下来的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山区农民，那么能领导和组织起这些农民的力量就不存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能是一种人才上的“三线”战略。当然，笔者的这一随想没有直接证据，毛泽东也不可能将他全部的思路表达出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仅是部分动机，也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三、再探“文革: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则可能是毛泽东试图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尽管它出现不少的偏

差。而“破四旧”则作为“文革”期间的一项主要行动贯穿始终。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现在已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原来或现有体制下，没有政治运动和舆论的推动，要避免腐败是不可能的。止水必然积污）。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也使得毛泽东对内对外都保持高度的辔惕，对内追求认识上的统一和革命队伍的纯洁。“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蠲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普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67 年 2 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书记处书记希斯尼•卡博时，谈到“文革”的意图：“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一次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看这气魄和自信，天下执政党和政治家谁堪一比？毛泽东政治人生的最大特点就是相信群众，依赖群众。对党内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属于最具忧患意识的政治家），“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

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大跃进”失败后，他试图寻找其它途径加速中国的发展。尤其是，49 年建国后国家一直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难有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因此，毛泽东试图通过纯洁人的精神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

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可能是另一重要因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戲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纲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从

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理解和同情即可看出毛对知识分子的痛苦感

受；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愚昧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上面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发动人民思想“革命化”改造的强烈愿望。

“破四旧”（伴随“文革”开始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号召的一场文化运动）在“文革”开始后即迅速展开，对人民进行精神文化改造的企图非常明显，也具有强烈的文化革命的色彩。笔者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名字由此而来。

“破四旧”运动从动机上来说无疑是积极的，但在操作上没有认真规剌，放任“红卫兵”的打砸抢，对私人收藏的文物和一些文化古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是令人痛心的。就连笔者孩童时玩的一对小铜锣也被“革委会”当作旧文化没收，至今下落不明。

但“破四旧”的积极意义是，它确实推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一些极为落后的风俗传统和迷信泛滥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表现了其革命性的一面。毛泽东来自社会的底层，他非常了解底层人民的这种生活方式，他挥舞巨大的拳头将一切旧风俗、旧文化打碎，将人民从落后和愚昧中解放出来。

比较一下印度社会中的种姓制度更能说明问题。虽然宪法已明确否定了它，但至今仍深植于印度人的思维和生活之中。不少印度学者认为，毛给中国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太好的社会基础。而建国之初，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地方势力、宗教问题、语言、农民问题、城市贫民等。但毛泽东用暴力和政治的手段，打碎了一切思想、地域和政治上的篱笆，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的一个伟大贡献；虽然暴力的使用难免会导致血泪和个别的偏差，但

琴今亨二知.蜱分子、反右与J文革”

这个运动规梭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窟义.

却为后人的欢笑打下了基础。

因此，从“文革”“破四旧”对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和观念的影响来看，说它是完全$败的并不客观。（关于“破四旧”及毛泽东对中国人观念的改造，请参阅第八章第一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灿烂的文化中并非没有污点. 中痛思想的泛滥，服从和忍耐意识的普及，虽然为国家保持长期的稳定提供了文化保证，但其负面影响也是不能回避的。中国底层人民的苦难，从一定意义上讲与此民族特性密不可分，一个贪官可轻而易举地对几百乃至上千的百姓进行盘剥而不会受到强有力的反击，就是一代表性的例证。这一民族特性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捍卫社会正义的懦弱，和对丑恶的妥协。这种国民性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人民可以当家作主的时候，仍然保留着这份积累千年的“劣根性”。使得公民意识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始终难以居于较高的位置。邹容在《革命军》中更直接地称这种超级服从和忍耐的国民

性为“奴隶的根性”。鲁迅当年在日本学医的时候，因从教学电影中看到中国人的麻木而弃医从文;至今还不时发生一些流氓强盗公开作恶，百人园观而无动于衷等，都体现了缺乏组织的中国民众性格的极端懦弱。这种国民的特性在 49 年后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毛泽东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底层，有着对中国民众的了解和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人民的懦弱和服从性格进行革命，是否在发动“文革”动机中扮演一定角色呢？毛泽东的“造反”运动，并不仅仅是砸烂过去，更重要的是塑造未来；他要打碎由儒家思想和漫长集权统治下所塑造的中国人的服从和忍耐性格，

摧毁旧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秩序，建立一个人民真正思想解放和当家作主的新秩序。当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们勇敢造反，人民砸烂泥像石佛，打倒高官显贵而昂首挺胸走向街头，他老人家是否曾为民族的新生而感到欣慰？

三年经济困难结束及经济逐渐恢复之后，许多不良现象逐渐出现，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特权现象抬头，使得毛泽东看到中国每 7、8 年就需要一次政治运动的必要性；尤其考虑到他取消军衔制的动机，似乎组成了毛泽东思维中浓烈的反精英主义和平民化色彩（看一下当今城市权贵及富有阶级的腐朽，就该对毛泽东的平民化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现在看到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了，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1963 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四清”（在农村）和“五反”（在城市）运动。这些运动的效果，毛泽东并不满意，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产生和复辟的担忧一直存在。就拿当时一些人的不正常高收入举例说明：

“文革”爆发前，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收入高得很不正常，生

活方式与时代很不协调，他们包括不少原私企管理层、文艺界人士以及昔日资本家手下有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工作人员。当时一个身经百战的师长的工资才 170 元左右，毛泽东的工资为三百多元，请看当时一些人的收入：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 1,000 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 200 元。上海万里造漆厂一般职员张志坚，月工资 538 元。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 24 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单位工作）工资拿 400 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那些参与私人企业公私合营改造的中共干部也被资本家以高薪水腐蚀。

文艺界高报酬现象尤其普遍和高的离谱。

著名艺术家周信芳月工资 1760 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他录音三小时，得酬金 3000 元。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 1366 元。当时热演的戏剧《千万不要忘记》作者丛深，成书后得稿费 7,000 元，这位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每天翻报纸看哪个单位演出了他的作品，就去信催版税，他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文艺界普遍的高收入，不是偶然的，而是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陆定一和周扬领导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在这方面发挥了极其恶劣的领导作用。1964 年 12 月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 10—15 元，青年作家

6—8 元，

（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 2,000—6,000 元；短故事片 1,000-3,000 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 300-800 元；

短故事片 150—400 元>歌词每首 50-100 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 500—1，500 元（长故事片）或 300—700 元（短故事片）。

这些高收入者不仅有高的离谱的收入，还拥有不少政治特权，在各级人大、政协、青联等都有他们的身影。联想到当时一个刚毕业大学生月薪只有 40 多元，中专生（在当时属于杰出人才)20 多元，以及当时多少工人和科学家完全不计个人酬劳在大西北、在偏远三线等地忘我工作，文化部放任文化界如此高收入，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挑战和践踏，在经济收入上埋下了资产阶级复辟的种子。

这些拿高工资的人不少保留了在旧中国养成的臭毛病，追求高消费，与当时全国



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极不协调。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照样毫不掩饰地享受奢侈的生活，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 750 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经济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髮馆剪毛。[1]

可以说，“文革”前的“高薪制”中，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在剥削他人。这些人奔侈的生活方式对那些追求思想进步和奉献精神的年轻人带来思想的腐蚀。那些资本家们在平反后只字不提他们在举国挨饿的时候毫不掩饰

的奢华生活。在毛后时代检讨“文革”错误时，陆、周都变成没有任何政治缺点的受害者，而所有的过错全是毛泽东的（陆、周搞出上述《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他们汇报的上司是刘少奇。没有刘的批准，这样的政策文件不可能出炉，而毛泽东是不可能批准这样的文件的。因这属于具体行政事务，是一线领导集体的职责范围，刘少奇难脱干系）。后来文艺界成为歇斯底里反毛的急先锋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没有“文革”，这些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可能再次沦为特权阶层的欢乐场，而多敝人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加上当时高干阶层特权行为的抬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18][19]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文化进行改造的尝试。也许这就是为

[18]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1960 年代）。

[1][19]第二版加注：毛泽东所担心和极力避免的，在今天的中国真的发生了，而且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今天文艺界所享受的高的离谱的收入和天量财富，对青年人是误导，对努力打拼的中老年人是讽刺。这些高收入的文艺界人士，同样已经遍布当今的人大和政协了（我真不明白这些名演员和歌星到底对中国社会有多少了解，能提出多少高素质提案）。“文革”力求否定的已经卷土重来，到底是“文革”不该否定他们？还是我们这个时代错了？还是“文革”有它的合理性？

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和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刘少奇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至于让他将此列为最自豪的成就之一。更何况，拆除观音庙显然与刘少奇是否被打倒没有任何的联系。而刘少奇被打倒后“文革”并没有马上结束，也可证明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发动“文革”的核心目的或唯一目的。如果说权力斗争可能是起因之一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并不发挥决定作用的内容。

中国在遭受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排挤的情况下，“文革”则极大地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左派组织和青年学生，触动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中国几乎成了国际共运的新中心。尤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学者中，毛泽东及其“文革”已成为他们追逐和学习的新内容。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里，不少青年学人被“文革”所吸引。在此抄录一段美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对“文革”的评论，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方学者对“文革”的看法：“毛的文化政治 [11]。体制，提供了一种新型政治允诺……它从传统的阶级范畴中解脱出来”。杰姆逊将毛主义看成是“一种用来打破古老的卑微顺从习惯的战略，这种习惯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阶级那里业已内化为一种附加的本



日本年輕人響應文化大革命

性”

不论今天对昨天的“左”派如何看待，不可否定的是，这些左派以青年和知识分子为主，他们聪明而对社会有理想和抱负。尤其是当那些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追随毛

泽东及其“文革”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人都是幼稚而被蒙骗的，相反，今人更多地思考内容应该是：毛泽东和“文革”到底是哪些内容吸引了全世界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这些内容对改造我们社会的弊端是否有参考价值，尤其是，中国当时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又是长期被西方社会看不起的“落后文化”环境下，毛泽东和“文革”必然有极其突出的魅力，才可能打动这些一向自我中心主义的西方社会的才俊们。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政治家，尝试赋予人民最大的权力，同时，彻底改变中国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内容，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则极力维护和利用中国人的服从和懦弱性格。

在 20 世纪，对中国国民性格最深入了解，并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格改造的代表人物，在文化界当属鲁迅，而在政界则首推毛泽东。他们的强烈个性和执着决定了，这两个人也许很难共事（鲁迅如活到新中国时期，很可能被打成右派），但都在自己能够发挥力量的人生阶段，最大限度地去影响了中国民众。当然，鲁迅作为一个文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也只能在知识界和读书人中传播他的理想，但只有毛泽东这种可以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的政治家，才真正能够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思想的革命化改造，发挥有效的作用。

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江泽民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说：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毛后时代有人假设：如果毛泽东在“文革”之前下台，中国就会避免这一悲剧。这个假设经不起推敲。顺便在此作个假想：



如果按照当代西方国家所惯用的民主选举的方式进行投票，毛泽东是否会落选呢？以他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和在百姓中的威望，中国人民知恩图报的民族特性，毛本人的政治智慧和煽动能力，笔者实在想象不出，当时的中央高层领袖中谁会是他的对手。要想推翻毛，唯一的手段就是“阴谋”。

假如毛泽东在“文革”前被强制夺权的话，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机遇呢？对于机遇，肯定不会有“文革”的发动，但更严重的危机将会接踵而来，甚至有可能彻底断送中共的领导，乃至整个国家来之不易的统一和前途。首先，毛泽东毕竟曾领导中国共产党、军队和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革命，在普通党员、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极个别高层军官例外）和人民的心目中，毛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除非通过舆论否定整个中共的革命历史。“文革”前毛泽東的地位和影响远比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的情形强的多。毛泽东被推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多具有军旅背景，也自然带有铁血风格，即：要么被打倒，要么继续掌握领导权，并不存在目前政治上的灰色地带），必然会引起毛泽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并将轻易导致一场新的内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如果当时的高层领导人真的在策划一场推翻毛泽东的阴谋的话，那无意将是一个极为轻率的惊天冒险。

其次，即使考虑到“文革”期间，中国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简直不可想象（参考“毛泽东与个人崇拜”一章第二节）。在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高超的外交手段是弥补国力不足的主要途径；除毛泽东，无人具有那种在复杂艰困的国际环境下，驾御全域，纵横捭阖，

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

因此，如果历史重新演绎，那么，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和毛泽东被推翻这二者之间作个取舍，您会作何抉择呢？

“文革”初期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文革”爆发前两年很严重，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荒唐行为更超出他的预料。这成为“文革”备受诟病的方面之一。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对此负有领导责任，但真正的原因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支持。考虑到第二代时期的舆论倾向，根据已有的公开资料来判断武斗兴起的原因可能出现偏差，所以，在论据不充分情况下，本书不在此探讨武斗的起因。只是论述一下毛泽东对此的态度。请着毛泽东关于武斗问题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20]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襄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

[20]该信原刊于 1968 年武汉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此处抄自马克思主义文库：

www. 量 arxists. org/chinese/量 aozedong。

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的这封信已经非常清楚表明了他的态度，甚至将搞武斗的人上升到“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高度，要求依法处理。由此可以判断，武斗绝对不是毛泽东授意或能够接受的，相反，这是他坚决反对的行为。后来人们诟病“文革”时将武斗之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甚至用各种方式暗示毛泽东是允许武斗的，使得历史真相被淹没。

“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二、三千万之众，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泽东及其政党的残暴。但据作者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村庄和县城的墙上或树上经常贴些标语和口号。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忆苦思甜”，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哈尔滨、北京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足蒙冤。

量
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考虑的话，

三千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60 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极力批判“四人帮”时，甚至捏造谣言予以抹黑，根本没有压低数据掩盖“文革”丑陋的动机。

当然，即便哪怕只有一个人蒙受不白之冤，也是社会的悲哀。科学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遭受的干拟和破坏，是一笔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尤其当联想到“文革”期间发生的诸如遇罗克、张志新、老舍、吴晗以及我们身边的老师等的不幸遭遇，要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文革”和毛泽东时代，并非易事。但从对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和宏观把握的角度来讲，虽不能忽略这些不幸，但又必须能适当超越这些不幸。

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又有多少人因没有权势或没钱送礼而蒙受不白之冤呢？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是建立在不同政治理念基础上的，且蒙冤的大多数是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而过去三十多年蒙受冤屈的人数更多，但多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就政治道德而言，过去二十年并不比“文革”高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个改革开放。

第二章第五节中提到毛对“卫生部只为城市大人先生们服务”的不满，可以看出他对建国已十多年后仍然存在的社会不公的愤恨。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中国部分高层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存在日益严重的趋势。“糖衣炮弹”的威胁已经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即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今天看来，这种担䖎绝非杞人忧天，甚至更糟，因为今日激内出现的已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那么简单，更确切地讲，是宗派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腐朽思想“五毒俱全”的

集大成者。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宣传画)

四“文革”十年中国人在干什么?

要以该书有限的篇幅罗列这十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还要专节谈论此事，只是希望强调：我们对“文革”十年的“一刀切”看法，存在对事实的严重扭曲。

提起这十年，在今人头脑里的印象不外乎：从不停息的阶级斗争，没完没了的忆苦思甜，老干部和不少知识分子被批斗，人与人信任关系的破坏，文物被毁……，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人正经搞经济，没人搞科研，没人好好办教育，中国的发展乏善可陈。事实到底是这样的吗？或者说，这十年中国人到底在干什么？

由本书来特别谈论这个不得不谈的话题多少有点可悲，因为过去这段历史离我们今天太近，清楚了解这段历史并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不少才到中年。然而，又有谁去认真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呢？不谈历史研究，也可不论对毛个人的评价，但如果不能对这段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形态有个正确评判，后人将面对良心上的谴责，因为我们完全抹杀了这十年当中我们的先辈、兄姐为祖国富强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有关中国在这十年之中的经济、文教、卫生、军事等方面的成就，在前面一些章节中已有提及，在此不再重复。就“文革”对中国正常发展的巨大破坏来看，1966 年后半年至 1968 年上半年

量



的一年多的时间内，非常严重；各种后来倍受指责的荒唐事，也主要发生在 这 段 时 间 。 即 使 从 经 济 发 展 数 据 上 忼 的 应 侧 也可看出这两年经济各方面的急剧下滑。

但是，自 1968 年，“文革”一些极大破坏正常经济和社会安定的激烈行为受到制约，经济发展也很快有了恢复性的快速增长。“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教育，虽然有一些负面作用，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更大程度也发挥了统一人民思想，激励作社会主义新人的积极性，并直接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请看以下“文革”期间两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三五”期间（1966 年至 1970 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 9.95%，工业年增长 11.7%，农业为 3.9%。

“四五”期间（1970 年至 1975 年）：基本任务是：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色、各自为战、大力协调的经济协作区（作者按：出于备战考虑。原子弹摧毁一个地区后，其它地区工业生产不会因产业门类配套问题而停顿），初步建成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 1969 年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使得这五年中国拿出大量的资源进行备战，虽然影响了其它门类的发展，但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成。这五年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 7.76%，工业为 9.196，农

业为 4.0%。

这两个“五年计剌”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或接近“五五”（7.64%)和“七五”（7.9%)期间。从“三五”执行情况来看，虽然其中有两年受到“文革”初期政治运动的巨大干拟，但后来的恢复速度也异常的快，整个五年计划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相当高（中国规模庞大的社队企业和第一章所谈的“人本经济”

创造财富，根本不可能在统计资料上反映出来，因此，“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数据只会被低估，而不会被高估）。国民生产总值在这十年翻了一番。

不是说“文革”期间大家都在搞运动吗，怎么会有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否搞错了？如果说有错的话，那是当今人们对这十年期间大多数人民敬业精神的完全忽略。请看一下 1969 年 9 月，首钢向武钢、包钢、太钢、重钢提出的开展革命竞我的建议，竞赛倡议主要有：一、深入持久地开展大批判，促进“斗、批、改”各项任务的完成；二、所有干部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到定工、定时、定量、定质；三、根据国家需要和本单位情况，把一切机器都转动起来，把所有矿山都开起来，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力求产品都是高质量的；四、逐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保证安全生产，最大限度地保证一切设备不受损失，按照不同的条件和各厂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节约燃料、电力和原材料；五、大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创造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光。

以上竞赛倡议中，除第一条有明显的“文革”色彩，后面的具体行动方面和改革开放后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有的话，那是当时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和中国产业工人的高度主人翁精神。今天人们对“文革”期间各项事业的发展视而不见，是对客观历史的无知和对中国亿万人民无私奉献的根本否认。

下面再列举一下“文革”时期，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具体事例，当然，在这里要列举所有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1966 年 10 月，第一次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成功实验。

1966 年 10 月 17 日，第一座合成苯车间在上海建成。

1966 年 12 月，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

种有生命活力的蛋白质。这是生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但因是集体成果而无法获得诺贝尔奖。

1967 年 1 月，中科院完全利用国产组件，研制成功最新型半导体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



1967 年 5 月，氢弹爆炸成功。

1968 年 1 月，第一艘万吨轮“东风”轮建成，采用国产 8820 马力增压发动机。

1968 年 12 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9 年 7 月，“红旗渠”建成。

1969 年，国家决定加速“二汽”建设。

1%9 年 9 月，第一台世界水平的 12.5 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研制成功。

1969 年 9 月，第一台矿用重型 32 吨载重汽车制造成功。

1969 年 12 月，第一套全自动长途电话设备投入运营。

1970 年 4 月，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同年“运十”飞机立项。[21]

---

[1] 据一些资料显示：运十因是“四人帮”支持搞的，后来_个大人物竟然将其污蔑为“王洪文那小子在上海搞了一个波音七〇八”，有些领导人提不起发展的兴趣。而民航局、航空部等着发财的高层则以“专业”眼光拒绝使用国产飞机，财政部拒绝给予三千万元拨款等于宣判了运十的死刑。首贪为八十年代收取麦道公司两千万美元贿赂的民航局长沈图，被捕后扬言要揭发有关人员而被邓小平所放，移民加拿大延续着富足而肮脏的人生，后来回国养老，居然没人再追究，好像从没发生过，得以颐养天年，死于北京（真是奇葩政治时代）。邓小平以此案终结毛泽东的廉政时代，开启中国高官贪污卖国大门。运十于 1980 年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继美、苏、欧之后成为世界第四个拥有百吨级大型干线飞机研发能力的国家，研制费用仅六亿元，略高于当时一架波音 747 的价钱。如果继续进行十多年的货运飞行测试和完善，继波音和空中巴士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飞机制造公司已经在中国崛起。可以说，运十的夭折是美国公司和中国汉奸联手的结果。1985 年麦道对《时代》周刊表示：〞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和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后来组装量D-90,（接下页下）



蒸蒸日上（1972）

量

1970 年，开发辽河油田。

1970 年 5 月，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竣工。标志着规模浩大的淮河治理工程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1970 年 6 月，治理大清河工程提前完成。

1970 年 7 月，成昆铁路建成。

1970 年 12 月，中国最大的金雅城钼业生产基地建成。

1970 年 12 月，开始建设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1 年 1 月，改造都江堰工程完工。

1971 年 6 月，第一艘两万吨的“长风”号货轮下水。

1972 年 1 月，6000 马力液压传动内燃机车制成。

1972 年 8 月，武钢 1 米 7 轧机引进。

1972 年 10 月，902 公里的湘黔铁路建成，沟通西南三省和京广铁路大动脉的联系。

（接上页下）国家付出 40 架的技术转让费，结果只生产了两架，航空公司拒绝采用；这是波音和中国航空公司高层再次联手的结果。后来和空中巴士 100 座飞机合作计划，中国民航的官员宣称不需要 100 座客机，可联合研制告吹后中国某航空公司立即订购空中巴士 100 座级的 A318。过去三十年，民航系统一再误导否定国产飞机计划，肥了不少贪官，但断送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中国民航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大、最成功的颠覆组织。念及运十和民用航空工业过去 20 年的坎坷命运，令人叹息，更加怀念毛泽东时代那为官清廉、人人讲奉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如果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世，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非把运十搞好不可；周总理一定会

亲自搭乘运十出国访问，这一直是他的心愿。自私的官员和短见的高层断送了中国航空工业腾飞的契机=运十项目下马导致研制队伍的培养学费付之东流，30年后国家上马 AW21 和 CA919, 虽然整个工业基础已经大为改善，国际合作更加便利，但运十所要经历的每一步，AFU21 和 CA919—步都不能少，只是白白浪费了 30 年时间。只要看一下外国对中国技术封锁最彻底的航天和军用飞机领域在过去 30 年的成就及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就更能体会第二代中央的短见对民用飞机工业所造成的破坏。


工厂劳模

1973 年 9 月，大慶至秦皇島 1152 公里輸油管建成。

1973 年及以后两年，和日、美公司签订 13 套大化肥项目，彻底改变中国农业用肥的结构，为未来农业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1974 年 5 月，大港油田建成。

1974 年 6 月，长城 203 台式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4 年 9 月，胜利油田建成。

1974 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3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制成。

1975 年 2 月，石景山发电厂高井电站应用计算机控制 10 万千瓦热电机组获得成功。

1975 年 12 月，800 公里的焦枝铁路建成。

1976 年 1 月，中国第一台原子钟研制成功。

1976 年 I 月，秦皇岛 7 万吨货轮码头建成。

1976 年 2 月，第一台激光手术刀研制成功。

1976 年 4 凡自行设计制造施工的京沪杭通讯干线同轴电缆建成

1976 年 5 月，海上石油平台“渤海一号”诞生。

1976 年 5 月，贺兰山煤炭工业基地建成。

1976 年 6 月，大连新港建成。

1976 年 8 月，中国第一艘 5 万吨级油轮下水。

简单罗列以上事例，至少已经证明：所谓“文革”十年没人搞生产和科研的论调是多么的不堪一辩。仅 1%6 年至 1973 年底建成的大中型水电站就有 20 多座，小水电 5 万座 3 这 10 年共建成 8 大铁路干线，化肥施用量增长 3.1 倍，用电 VI:增长 4.7 倍，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建成多个大型能源基地和重工业基地，完整工业体系建成。仅军工系统中的飞机项目就有歼 6 甲、歼 7.1, 2、歼 8.1, 歼 1 2 歼 教 6 轰 教 6« 水 蹦 S 轰 6 丁、强 5 乙, K，1L 运7,8,10，11、

直 6、直 701、延安 2(直）、靶 6、长虹 1 号等 20 多项（如此密集的新机型研制和改进，在世界航空工业史上是罕见的，考虑中国当时的基础，尤其不可思议），以及新型常规潜艇和战略核潜艇、洲际导弹、巨浪 1 潜射导弹、一箭多星、回收式卫星、多种战术导弹、新型驱逐舰等也在这十年内完成或启动研发。后来批判“十年动乱”时，犯了“把澡盆里的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严重错误。除了“文革”刚开始的一年多，后来八年的经济发展和科研，都取到巨大成就。后来的几年里，学校教育工作也发展很快。而中小城市受到“文革”运动的冲击更是微乎其微。在“文革”冤枉少数人时，却使全国大多数人的思想得到革命化教育改造，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使得“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已不是什么典型。

这段时期，内陆三线企业的大发展带来了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缩小了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而全民备战期间修建的，遍布各中心城市的地下防空洞，能够容纳大中城市总人口的 60%，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防工事。仅北京就有一个至今对外保密的地下城市，而哈尔滨在八十年代中期将位于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改造成地下商业街，进入这个三层的地下社区，即可一窥中国民防设施建设的成就。这些防空洞虽然没立即排上用场，但确保了中国是世界所有大国中抗核打击能力最强的国家。当美国总统在核战争中登上滞空时间最多二十几个小时“空军一号”时，中国的军事指挥系统和人民，已经转移到更安全的庞大地下

一笔可用上百年的财富。

当城市知识分子批判毛泽东的“文革”错误时，在
中很难找到知音。实际上，“文革”十年，是中国基层教育事业爆炸式发展的十年，也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的时期，也是县及公社卫生院大发展的时期，县及社队工厂也在这期间有了巨大的发展，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崛起作了必要的准备。而所有这些成就，使得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和中小城市居民受益匪浅，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口的整体文化和健康素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是无论如何夸张也不算过分的。

当然，本书无意为“文革”进行非分地辩护（也无意过分苛责，因为它的影响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更清晰的认识），同样反对对这十年历史认识上的一叶障目。毛泽东对人民的教育和思想改造，极大地激励了大陆人民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高涨的劳动热情，并直接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抓革命”的目的是“促生产”。人民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听起来很荒唐（发生在“文革”开始的两年），但这和当今各类宗教有多大区别吗？毛泽东确实给人民提供了一种宗教般的信仰，使得人民在跳完几分钟的“忠字舞”和“早请示”之后，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中去，并激励人们做出成绩，否则，这“晚汇报”可就没法汇报了。笔者读书期间经常写《决心书》和表“理想”，但这一点没有影响到课业学习，却对少年时人生观的塑造，发挥了正面的作用。当今日的人们批判“红卫兵”（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红卫兵不但没有干多少坏事，饮际上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造反派”时，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遍布各行业的群体——劳动模范和技术革新干将，还有学校里的少先队员。当批判“文革”初

期的打、砸、抢时（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忽略了遍布各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建设大会战、劳动竞赛和技术比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产业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技术能力（像各行业产生的高级技工，如八级工）。“文革”十年的发展成就虽然不能归功于“文革”本身（但“文革”期间通过“破四旧”而极大地解放了人民思想，人们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空前高涨，不知是否算是“文革”的成果？），但完全忽略这十年社会各方面的辉煌成就，更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和对先辈无私奉献的褒济。简单地以“十年动乱”予以概括是不客观的。

五、毛刘之争——林彪事件的预演[1]

在本书第一版出版时，笔者不认为打倒刘少奇是“文革”导因。但过去几年的研究，开始对这个观点有所修正。

“三年经济困难”一章已经对毛泽东栽培刘少奇为接班人，并给予大力支持做了阐述。几百万人饿死的惨剧，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检讨并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作为一线核心领导并承担主要责任的刘少奇并没有主动跟进承檐自己的一份责任，相反，刘在这次大会及以后多个场合，还动辄义正言辞，大有将责任转嫁给毛泽东的意涵。后来刘少奇甚至对毛泽东讲：人相食，你我都是要上书的。总之，刘少奇的语言永远义正言辞（可能是邓小平时代

刻意为之，以达到粉饰刘少奇，嫁祸毛泽东的目的，但效果往往相反），作为扶持他作为接班人并主动让权的毛泽东不仅得不到刘的感恩与尊重，而且还不得不替刘背黑锅。在刘少

本节为第二版新加内容。后面的原第一版各节的编号相应后延。

奇没有主动承认错误情况下，也很难有人主动发难来逼迫刘下分。

几年的合作表明，刘少奇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接班人，无论是能力（包括对国情的了解程度）、胸怀，还是勇于承担的责任心，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刘少奇的局限性。关于毛刘的分歧，各类论述文章很多，从对“大跃进”的看法，到 1964 年对“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5],到农村“三自一包”等，毛刘的分歧越粮越多。

作为全撤已经形成共识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在刘少奇主导一线领导权的几年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刘为核心的当权派，毛泽东的让权，并没有换得尊重，甚至有被架空的风险。“大跃进”期问毛泽东在大饥荒毡延时批评浮夸风的多次讲话根本引不起重视，甚至发生中央媒体擅自删减或不报道毛泽东重要讲话的事件。考察历史不难发现，在封建皇权时代里，皇上和太子的关系经常是很微妙的，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你死我活的关系，即便是骨肉亲情也时有发生。毛刘之间构建的接班安排，是建立在共同的治国理念和信任基础之上的。但当一系列合作中的矛盾产生，理念严重不合，这种接班人架构不仅面临解体，而且双方都可能因长期的理念不合而动摇对彼此的信任，那更糟糕的可能趋势就是你死我活了。如果认为刘少奇压根就没动过打倒毛泽东的算盘，那只能是浪漫主义者的幻想，而不是残酷政治环境下的

写生手法。[22]

1964 年发生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毛泽东住处丰泽园安装窃听器一事，就是个值得玩味的“战前插曲”。

笔者最早知道与杨尚昆有关的窃听器事件，是《北京日报》2007 年 6 月 19 日登载的由巴人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始于 1958 年 11 月由叶子龙和杨尚昆主导的秘密录音，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但后来毛泽东在 1959 年 11 月的杭州会议上明确要求不能录音，从此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停止了机要室跟随毛泽东录音。该文提到这个录音建议是叶子龙倡议的，但叶子龙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敢不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做出如此大胆的行为吗？1961 年春毛泽东专列安装窃听器被毛发现，又是谁干的？

1961 年 4 月 26 日晚，正在保定市调研的中办主任杨尚昆突然被紧急招回京。杨尚昆在当晚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4 月 27 日下午 5 时 20 分，杨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〇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

[22]关于“四清”运动的话题，是个大题目，与后来的“文革”兴起及刘少奇命运有关联，为避免分散本书主题，本处不多谈，请读者自行搜索有关内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不仅开辟了高层夫人参政的恶例，而且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刘少奇极左路线 s 践和“文革”的一次预演，很多极端手段被广泛采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第二代领导人开始的非毛扬刘舆论方向下，决定了目前大多数网上的官媒文章和回忆录都带有明显倾向性。本书即使想细谈，也缺乏全面的资料支持，只有等中共解密有关档案后才能有个更详细的梳理。

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5 月 2 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薅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5 月 8 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

这是一篇很怪异的报道。由于杨尚昆曾任国家主席，属于第二代的元老之一，权势极盛，突然杨去世多年后官媒出来上面这样一篇文章，大有值得玩味之处。

这里值得琢磨的疑点有：

（一）杨尚昆极其紧张，但最后却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严厉惩罚，谁在保护他？他没有责任的话，那紧张什么？

（二）杨是中办主任，按照现在说法是中央的大管家。这个管家本来首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党主席毛泽东，但毛却成了被窃听的对象，杨监守自盗。那是谁授意杨进行窃听的？杨自己去窃听毛不仅没有必要，而且风险极大。他的后台是谁？

（三）杨从保定回京，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这个最高领导人显然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已经点出来了），可报纸却刻意隐去，了解中共舆论的都该知道潜台词了。

（四）如果杨尚昆不是被刘少奇或搭档如邓小平（时任总书记，杨尚昆的直接上司）授意窃听，那么刘、邓为了避嫌必然将杨尚昆往死里整。但杨不仅没事，而且后来成为国家主席。其中的远近亲疏一目了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历史角度看，杨尚昆和彭真都是刘少奇 1930 年代末在天津主持北方局时的核心班底成员，这种渊源往往是最可靠的信任关系。中办主任是刘少奇的人，而不是毛泽东的，这是个值得玩味的安排。

（五）叶子龙回忆录中所谓因窃听事件被迫害，很滑稽。当时负责对有关人员（不排除替别人背锅的可能性）进行惩除的是

刘邓周，后来平反他们的是邓，有点错乱。窃听毛泽东被惩除也叫“迫害”？是罪有应得！让后来的中办主任窃听邓小平、江泽民或习近平试试看！

中央授意写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文章，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直到几年后，当我看到《戚本禹回忆录》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该文的目的是“狸猫换太子”，试图转移视线来掩盖另外一件发生于 1964 年的两杨尚昆执行的窃听毛泽东的事件 I 抄录书中内容如下（有些不必要的用省略号）：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裹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 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 1966 年 7 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

在 1964 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 1965 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23]了书记处书记。……

1966 年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66)277 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窃取党的机密”。

毛泽东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不会不清楚杨尚昆背后是谁。尤其 1964 年窃听器事件后杨还能在中南海走动，没有刘、邓的保护是不可想象的。在毛发脾气后，刘、邓还是没有立即惩罚杨，而是外调广东任职。由此可以看出，毛的权力不被尊重和被架空，也可以看作刘、邓的权力傲慢。中办主任是刘邓的人，邓又是总书记，毛被架空不可避免，研究历史不可忽略人事安排。

通过以上两次窃听器事件，毛泽东已经感觉到刘少奇这个党内二把手已经不再是值得信赖的同志，相反，是个极其危险而且不择手段的对手。将 1961 和 1964 年两次窃听事件联系起来，刘少奇的政治操守和黑暗手段是无法让毛泽东放心的。如果刘成为最高领导人，中共政治生活会否成为斯大林时代贝利亚风格，窃听和暗杀成为高层权力斗争常用手段，就比较令人

[23]我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北京日报》的这篇文章，发现也有故意透露某个信息的可能性，因为杨去世十年了，可能有人要揭盖子了，通过该文为历史真相打开个缝隙。故意露出破绽也是一种手段。

不放心了。很显然，毛、刘政治斗争上的你死我活，将不可避免的上演。

1964 年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到各地游历。1965 年 I I 月直到 1966 年 7 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周游各地达 7 个多月之久（广为人知的只是毛回京前在湖南滴水洞居住十多天），笔者判断，一是毛泽东是在深入思考未来的政局走向，二来毛泽东担心自己久居北京的安全问题。因为刘少奇羽翼丰满，毛不能不有所顾虑：刘是否有比窃听器事件更严重的策划，毛不能不防。与后来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沿京沪和沪杭铁路的南巡做个类比，也许可以发现

一些相似轨迹。毛在军队的威望使得仟何军方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对自身安全的担心不会是杞人忧天或猜忌，必然有一定的可靠信息来源。1966 年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钤议上，指贵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虽然当时和第二代核心时对此辩解为：当年 2 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了••个团的部队给北京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但这种说法能说服得了谁呢？尤其是与贺龙关系密切的廖汉生当时正担任北京军区政委，让毛泽东怎么能安心待在北京？他们可能真是冤枉的，但瓜田李下的，在人人首先追求自保的前提下，站错队，表错态，往往是不可挽回的。

据曾任北京市长和政治局委员的吴德所写《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在 1966 年 7 月毛泽东回京前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令周恩来筹组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剑英任组长。该文提到：

该工作组不仅负责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公安局，甚至包括北京市委\叶帅对吴德讲：“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做好

前，毛主席不能回来”。可见，建立工作组的首要目的和任务是保证毛泽束回北京的安全。换句话说，就是防政变，防止党内高层和其他人对毛泽东搞政变。

在周恩来领导的“首都工作组”完全控制了北京后，毛泽东才于 7 月从湖南滴水洞小住后返回北京，8 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位置被林彪取代，刘的排名降至第八位。[24]



很显然，如果毛没有抓到刘的把柄，这样重大的人事调整难以服众，更别说刘很快被打倒了。
刘在中央一线最高位置上沿篇 [5] 毛主席革命路线姓利前进多年，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这样的铁杆盟友不在少数，对中共领导机构进行彻底清洗是必要的，否则，万一毛先刘去世，那刘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对毛泽东来说，这是必须要杜绝的，甚至比庐山会议后他对彭德怀的不信任还要严重的多。在刘少奇被夺权后，毛泽东放任红卫兵对刘的批斗就不足

[24]作者董玉振注：北京市委过去是彭真的大本营，而彭和刘邓关系密切。彭真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于 1965 年 12 月被毛泽东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彭在邓小平主政时期成为元老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为奇了。

刘少奇的最后惨死也自然在命定之中。但毛泽东对刘的盟友邓小平手下留情，则给自己埋下了身后被“鞭尸”的祸根。

由于刘少奇在高层耕耘多年，所以，他被打倒对高层政治格局几乎是连根拔起，推倒重来，受冲击的干部之多自然不难想象。

虽然这些受冲击的干部不少是冤枉的，但政治倾向性和“站队”本身在政坛就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不存在对错问题，甚至不存在冤枉与否的问题。就拿贺龙来说，和刘少奇有密切的私人关系，甚至传出差点成为儿女亲家 3 贺龙 1964 年 9 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曾说：“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的总司令是刘少奇。”这番话即显示了贺龙与刘邓彭的密切关系，也显示了在军队有巨大影飨力的贺龙政治上的不成熟，提到王光美这个高官夫人更凸显了贺的明显倾向性。毛打倒刘少奇必然要打倒其党羽，尤其是掌握枪杆子的将帅，贺龙不幸而必然地被纳入刘的同党，最终被批斗惨死。贺龙冤枉吗？以普迎人的角度看可能是冤枉，以政治斗争的角度行则无所谓冤枉与否了。

这和历朝历代政权更迭时的情形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错在哪里，他和彭德怀情况类似，都是战场上的巨人，政坛的矮子，都没掌握好进退。

今天，人们很容易对刘少奇等人的晚年迥遇产生同情，但历史无法随意演绎。如果刘少奇没有被打倒，万一毛泽东被打倒或被暗杀，那中国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人们是否又会一面倒地同情毛泽东？刘少奇如果打倒毛泽柬，一样会对亲毛派进行大清洗，一样会有一大批干部蒙受“冤假错案”。以这个逻

辑不难理解，邓小平成为二代核心后，通过迅速恢复靠边站的干部（多数是刘邓派）职权来取代亲毛派，对毛泽东亲密追随者的打击一样不手软，毛泽东至少还放王光美一条生路，而邓小平直接要判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死刑；而且江青最终死于狱中。在第二代的舆论惯性下，谁又会为毛泽东夫人的悲惨遭遇掬一滴清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邓小平再次演绎这个政治“箴言”，几亿自以为是、满腔愤懑，以为终于抓到真理而起哄着枇判江青和毛时代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过又做了一次被人利用的道具罢了。

看待历史人物时，请暂时放一下我们的那份同情心，而应多一些理性的态度，也许不会有太大的认识偏差。比如，刘少奇搞窃听毛泽东的做法，不仅有违政治伦理，也破坏正常的合作与信任关系，这种做法只会把政治搞的丑陋与恶性循环。但即使批毛最激烈的岁月里，也没听说毛泽东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的同志。我不想在这里用“光明磊落”来形容毛泽东，以我的智商能够判断到的层次是：毛泽柬深知用窃听和暗杀这种手段将彻底破坏组织原则和高层信任关系，和蒋介石就没什么两样了；有问题摆出来，有错误就承认错误，才能有健康的合作关系。而大||1:的事实都表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确实是这么做的，他的队伍中有大量曾经批判、整过他的人，甚至犯过严重错误，违反命令和组织原则的人，后来都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周恩来（参与剥夺井冈山根据地开创者毛泽东的一切权力，将毛泽东辛苦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搞跨，被迫长征，损失掉几万红军，此罪够大否？）、陈毅和朱德（朱陈在井冈山时期都曾反对过毛泽东）、彭德怀（百团大战明显违反组织原则，彭对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的死，及其袁王队伍被迫投靠国民党负有责任。袁王

是毛开拓井冈山根据地的功臣，对红军有恩）、林彪（遵义会议时曾建议让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辽沈战役时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要林彪打锦州，林公然不听毛泽东的命令，在毛几道“金牌”的督促下才勉强服从；后来林反对抗美援朝。有人说，林彪违抗毛泽东的命令的次数超过其他几位老帅）等。毛泽东身边能够聚集一大批军政方面的非凡人才是其成功的保证，这些人才不可能靠窃听来维持忠诚度，而是需要胸怀和责任承担。蒋介石手段耍尽，他的军统更是窃听暗杀无所不用，搞到人人自危，人心丧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完全在政治斗争的逻辑之中。至于贺龙去世后毛泽东说“看来搞错了”，那是在威胁消除情况下给几十年革命战友的一份身后体面，正如毛泽东一直不公开批评彭德怀“里通外国”一样的道理。

至于刘少奇被定位为“叛徒、内奸、工贼”，比其他被打倒的领导人多出这些“头衔”，可能有些历史的原因或误会。可以佐证的资料：“文革”开始前后，毛曾秘密下令调查刘在白区工作时是否叛变。笔者从一位退役的军界朋友那里听说（此人曾陪同首长参与和见证了 1980 年《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在延安时期，陈毅就曾向毛泽东抱怨说，刘少奇可能是内奸，原因是刘在新四军政委任上整了很多干部，包括原叶

挺的老部下。当然，这些因为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只能当成是“坊间传闻”，或者掺杂着个人的恩怨。但刘少奇在新四军时发现了粟裕的军事才能并重用之，是对中共的一大贡献。

林彪试图暗杀毛泽东失败而被定性为“反党集圃”，刘少奇试图对付毛泽东失败而被打倒，但却被邓称为“冤假错案”。这只不过是成王败寇逻辑下两次相似的历史事件，贬低林彪或美化刘少奇是权力阶层“站队”的结果。作为智者，更应取冷眼旁观的姿态才能看出真正的热闹和一些政治人物的百态

。



六

毛 Ulii 顼

六、“文革”的点滴启示

作为今日的领导人和科教工作者们，是否能从“文革”中捕捉到某些有用的信息呢？

那些曾在欧美大学有研究经历的中国学者，都会对那儿自由的学术空气有深刻的印象。反观中_研究机构中的论资排辈、权威遍布、攀权附利、学阀作风、大树典型的现象，实在令人感到强烈的反差和遗憾。甚至一个党委书记，都有权让一个优秀的学者活得不自在。那些曾经作过开创性、奠基性工作的学者们理应受到后来者的尊重，但这种尊重是一种纯粹人际关系概念，而与科学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科学的殿堂里，是不应该有权威存在的。而学阀作风更体现了某些学者的尔道和狭隘。在今日的中国大学里，两个学者可能因毕业于不同学校、或对某一领域的

发展有不同的看法而相互排斥（比如在系主任等领导岗位的争夺、在相关学会的理事职务分配上）的现象并不罕见。

至于研究机构里“树典型”的现象更是滑稽。如果说雷峰、孔繁森这样的典型对推动社会教化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研究机构里“树典型”（培养权威的主要方式之一）则应格外谨慎。

中国研究机构“树典型”的一个特点是：“典型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所有好处，而他人要得到其中的一样好处也会非常困难。当然，如果“典型”们真的那么优秀也就罢了；问题是，

他们能被树为“典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往往是和院系领导有着不一般的关系，或者作过学生干部，而非在学术的领域里有什么特别的建树。至于那些才华横溢的“怪才”们，只有在这些成为学术带头人的“典型”手下默默耕耘的命运。当然，这些“典型”们不久就可以成为新的“学术权威”和博士导师，以证明领导人当初的栽培是多么的有知人之明。至于他们在成为权威的过程中剥削了多少别人的劳动成果，已没法深究了，因为他们有权在其领“导”下的任何一篇论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不管他们为此论义的完成足•否给过建设性的指导。

记得台湾歌星周华建在评价香港“四大天王”和其本人“天王杀手”的“封号”时表示：媒体这种“封号”的方式不利于新的优秀歌手的出现和成长。看来中国科研教育界的领导和权威们的认识水平，并不比一名流行歌手来得高。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又何尝不存在类似的弊端？！当然，对国家的危害也更加严重。在公务员中的“跨世纪接班人”及“梯队培养制度”，和八十年代风行的中学生分班制度有着相似的弊端。自由和公平竞争意识的缺乏，将极大地制约中国的复兴。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鼓励或默认年青人“造反有理”，“打倒权威”固然不可取；但年青知识分子应勇于打破常规思维，勇于怀疑和挑战“学术权威”，不正是中国科技界目前所缺少而又至关重要的一种精神吗？中国目前遍布文化科技界的一些“歪风邪气”，除体制方面的原因外，知识分子本身难道没有责任吗？中国知识分子应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这，也许是毛泽东及其“文革”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课题之一。

对“文革”十年采取“否定一切”的作法，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它使我们放弃了对“文革”期间一些有价值的创意进行整理和继承。哈佛大学商学院某学者对发明于“文革”期间的“三结合”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改革开放后中国高校的校办企业受到政府的鼓励而得到巨大的发展，将科研和生产结合起来，这和“文革”期间的“三结合”有什么区别？今天人们忽略了“文革”期间中国各类学校大最校办工厂的涌现和发展）。美国一个小镇为遏制严重的偷盗行为，采取将捉到的小偷游街示众的“文革”手法，取得明显效果。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呢？作为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一场实验，“文革”从总体效果上讲不算成功（如果“破四旧”，以及劳动热情的空前提到而带来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伟大成就都不算“文革”的成果的话），正如一次失败的科学实验一样，它其中一些有价值的片段是不应被忽略的。至少，将那些贪官污吏在他的单位和家乡游行批斗，从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上予以打击，应能产生更好的阻吓遏制效果。

“文革”中最受诟病的如“划清界限”、“儿子告老子”等，被认为是对中国人价值伦理和信任关系的最严重破坏。如果这些行为不是以阶级斗争为指针，而应用到当前极力推行的

法制建设，那么，这不失为一项值得参考的法制建设思路。当今中国虽有法律条文对知情不报和窝赃予以治罪，但当用到罪犯家人身
上，该法律条文似 f •没有很好地发押:威慑作用。尤其对当前汹涌澎湃的贪污浪潮，如果一人贪污，多数情况下都会株连全家，无疑会增加贪污的机会成本；但如果一人坐牢（运气好的话则未必一定坐），几代豪门，那贪污的诱惑就太大了。当前的贪污行为中，贪官家属的角色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儿子告老子”、“划清界限”作为人民法制意识加强的 1 目标予以宣传，不失为一项有益的尝试；它将提供挽救自己多数亲人的动力和渠道。

这实际上关系到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建设，应该从中小学阶段开始灌输，贪官的孩子以父母贪污为傲将对一代人伤害巨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是“文革”期间的一大发明。“文革”结束后不久，即被中共中央完全否定。固然，“三大”在文革期间发挥了一些不健康的角色，但在民主化建设的今天，当人民没有合适的信息反馈渠道，这“三大”是否可以在一定范围加以利用，并扮演言论自由、揭处腐败、民间自我调控的补充角色呢？

毛泽东时期的另一伟大发明——赤脚医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医疗条件（见第二章）。但今日城镇医院辩疗费用的高昂，已使农民获得医疗服务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面对越来越多的医科毕业生，国家可以考虑对赤脚医生和基层卫生体系理念进行改造和推广，这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

当然，“文革”给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国家的命运是不应寄托在个别领袖身上的，不论他多么伟大。毛泽东这

样的伟人，尚且会不小心踩着我们的脚，何况他人？民主、法制和教育，才是避免“文革”式群众运动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没有民主政治的确立、法制体系的完善、全民教育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公民意识的建立，人均收入不

论多尚，中国也不能算是一股流的现代化国家，看一下高收入的石油输出国的状况即可一目了然。



U毛杂抓表龄无量s
学万期

七、中国已走出“文革”的阴影了吗?

赵紫阳一夜之间从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分裂党的分子”；各级党委干部的为所欲为；十六大前一年多时间内，有关未来高层领导权力安排的各种传闻；江泽民有关“阴谋家”的谈话，及由此引起的揣测；舆论控制和其巨大威力，使得法轮功顷刻瓦解……。从这些事件中，今日的中国人是否能捕捉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呢？

舆论的单一导向，领导干部任免和交接班的非制度化，党对各项事务的全方位领导，党政干部凌驾于法律之上，等，今日中国所缺少的唯一与“文革”不同的要素是“人”，即领导人的个人威望。很显然，国家仍然停留在危险而不确定的层面上，“文革”爆发的党、政环境基本上没有改变。

丘吉尔和戴高乐在二战后黯然退出政治的中心，为欧洲一体化和德国统一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尔败给施罗德。然而，在中国的现有体制和文化下，这类事情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哪天中国真的出了个这样的领导人，解决了现在困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进而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那么，一场类似于“文革”式运动的发生，将不令人奇怪。至少，在钳制舆论、个人独裁和

gg 六:%..知进彳子.反右与“文笨，:

打击异己方面，他将不会受到强有力的制约而所向披靡。

看来，中国要完全避免另一场“文革”，或“文革”式政治事件的话，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而在相关体制改革方面，除了邓小平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外（很遗憾，在关键的党和军队领导职位方面留下个不易割断的尾巴，不知未来是否会有个领导人主动解决这个本来不难解决的问题，其实只需一点自知之明和责任心就够了），自“文革”结束二十多年来，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进步。



八、读书人的毛泽东情结

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背负着国家的兴衰和家族的荣辱，有人会投靠权贵，也有人潦倒一生或壮志难酬，但在读书人的内心里永远都有一份对无知权贵们的本能轻视。但面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手不释卷、出身寒微、战功卓著、生活简朴、哲思远虑的领袖，中国的知识分子难免会有一种亲近感。毛泽东身为一名博学的大知识分子，他身上嗅不到中国传统酸臭文人的腐

朽，也没有一些依附权贵者的猥琐，更没有哗众取宠文人的乖谬，有的是朴素、恢弘、博大的气势，散发着泥土和墨香的浓厚气息，以及和劳苦大众的无间接触。而毛泽东的胆略和意志，又弥补了中国读书人缺乏而又渴盼的领袖性格。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发表的瑰丽诗篇《沁园春•雪》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造成巨大影响和吸引力。中国知识分子们

对文采飞扬的毛泽东的心理向往，自然强于武夫形象的蒋中正，如果抛弃政治理念的话。这样的政治家恐怕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难于再现。无论是喜欢打桥牌的邓小平，还是多才多艺的江泽民，都难于像毛泽东那样对读书人具有恒久的魅力。有位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的朋友，在首次出国时，在笨重的行李里只带了两本书：一本《英汉词典》，一本《毛泽东诗词》。

在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蒙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极为不俗的一面。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组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颗 颗 红 心 向 太 阳

第七章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崇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情感形态。它不同于尊敬和佩服，而是远超越之。是对崇拜对象的崇高德行、健康心态和强大力量所产生的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无上钦佩，对被崇拜者有强烈的难于企及感。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一条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刻意追求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泽东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有时对来自人民的崇拜热情抱

持认可的态度，并认为人民的热情不可打击。从毛泽东时期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可以看出，这种对毛泽东的崇拜其实已使共产党直接受惠，也直接推动了国家的建设。一美国学者称：

“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在几十年中给人民以使命感”，部分说明了个人崇拜对新生共和国的积极意义。尤其联想到今天中国人的“谁也不服”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以让后人更清楚地看待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拜情结对统一全民意志，激励爱国热情的积极意义。

一、对毛泽东崇拜情结的由来



1976年9月11日，法國巴黎群衆舉行游行，哀悼毛澤東主席去世。標語上寫著毛主席語錄“群衆是真正的英雄”。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

建国后，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国，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试想想：国家经过百年的纷争终于实现大统一局面，卖淫、嫖娼、吸毒、黑社会组织等丑恶现象一夜根除，外国在华势力和一切不平等条约被彻底终结，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穷人家的孩子无发地走

进学堂……，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七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厘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所有这一切以前看来不太可能的事，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了。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涵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察世界上一些主要宗教的形成过程，我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斗争以极大鼓励，推动了后来风起云涌的全球反殖民化浪潮。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而二战初期国军在东北和华北的无能表现更令世界对中国军队不以为然。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毛泽东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强权世界没人当真，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的民族能凭一句口号就能站起来。

但韩战的炮声则让全世界惊呀而清晰地认识到这句口号竟是如此具体！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曲于祖国的百年虚弱和任人宰割，海外华人从南亚到欧美，无论穷富，都是政治地位低下的二等公民。但韩战正酣的 1952 年，美国加洲废除对华人诸多歧视性州宪法条款）

抗美援朝确保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后来中美冲突的避免。它也标志着中国已从民国时期的被动防御，转化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主动防御。如果放弃抗美援朝，则中国在鸭绿江北岸长期大规模驻军的开支将不会比参战的代价小，而且直接影响东北重工业和能源工业发展战略的制定。韩战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振奋带来了直接的推动，并为后来的高速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今天有些^者埋怨什么“韩战耽误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海峡两岸分裂至今，等”，根本是缺乏全域观和发展观的无稽之谈。

二、超凡的智慧和胆略



1971 年 4 月 25 曰，美国学生在华盛顿国会大楼前单起毛泽朿尽陈及挥舞越南南方民族解故陴线国旗.抗沭越南战争。

韩战之后的二十多年，毛泽东一再用他高超的智慧为国家谋取最大的利益。在此列举几个建国后的军事和外交事例，到今天

仍看不出任何的瑕疵。即使最傲慢的人在毛泽东的智慧面前也不得不保持一份谦卑。如果您认为可以做得更好的话，您绝对应到中南海报道，“上书房行走”，那必将是中华之幸。

例一，对印反击战

从 1958 年中印边界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围绕边界划分问题，中国谋求外交解决。朝鲜战争后的中美对峙和美国对中国的弧型包围，中苏关系也进入了一段微妙时期，中国太希望能有一段和平建设的时间，绝对不希望再得罪印度这样一个大国 1、但印度自以为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不结盟运动的首领，如果和中国冲突，必会获得国际支持。而且印度人对中国一点也不了解，英国的占领让印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中国是极端落后的，即使朝鲜战争也没能改变印度人对中国的看法。直到今天，印度有些网友还在谈“印度要好好干，千万别让中国赶上”、“中国照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就能赶上印度”等，印度外交部长在 2002 年来华访问前扬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是假的，不可能那么快”。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和对对手的轻视往往是战争爆发的心理根源。当时印度政府显然把中国的忍让当成软弱，把中国的三年经济困难当成机会，而完全忽略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经历过无数战争磨练出来的中国军人的超强战力。到 1962 年，印度步步进逼，中国被迫反击。

这场反击战是一场成功的闪电战。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摧毁了印度军人的全部防线和信心，毛泽东训练出来的这支队伍的英勇[25]

[25]好像只有当今的政治家才知道韬光养晦的好处，而深研历史的毛泽东好像不知道。事实是：毛泽东也不喜欢打仗，但中国的崛起让别人不自在，这不是他的错。没有毛泽东打下的国威，今天的中国还能大张旗鼓地“韬光”吗？

令印度军人闻风丧胆；9这和解放军历次战争比较没什么特别之处。极为特殊的是结束战争的方式。中国军队在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迅速撤退以结束战争。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它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然后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甚至麦克马洪线以南部分领土继续让印度占领[2627]，

---

[26]解放军的勇猛迅速瓦解了印军的精神防线，大部队不战而溃。有一解放军战士单人击溃印军一个炮连，缴获四门大炮。八名解放军战士俘虏 180 名印度兵。半个连的 30 名战士，硬是在邦迪拉外阻击了装备齐全的 3000 印军，印军打了几次冲锋，死了几百人还是无可奈何。还缴获一车美国援助的最新武器。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电视系列片来如实地展示中国军人那让世界军事史上任何英勇军队不好意思自豪的神勇。这是继美国后第二个大国被解放军搞得举国恐慌。

910 这场战争及以前中国实际拿回的领土面积，应该是将清朝以后西南边界陆续丢失的领土大部分拿了回来。中印争执的面积约 30 万平方公里，它包括东西两部分：一块是东段藏南围绕麦克马洪线附近领土，另一块是位于新疆和印控克什米尔接壤的阿克塞钦地区，还有锡金的归属。毛主席于 62 年战前会议曾说："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小学课本里写着呢，连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里就成了 930 万平方公里，凭空少了 30 万平方公里，你们不能让我背着卖国贼的罪名去见祖先"。也就是说，在 59 年的中方实际控制线已经圈进了这 3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部，至于是什么时候拿来的，肯定是解放西藏后。因中印边界环境复杂，驻军不便，历史上这条边界在大部分地段没有明确划分过，是历史形成边界。肯定的是，战争前后，在西线中国全部拿回自己的固有领土，约 20 万平方公里（印度则要求按英国人搞的一条传统线划分，中国当然不答应）；锡金继续让印度占领；东线则以连旺至下察隅往南部分由印度占领（这也是 59 年贸际控制线），中国宣称有 9 万平方公里，可笔者怎么也量不出这么多，大概约 4 万多平方公里。总之，中国前进麦克马洪线以南不少距离。中国一直强调中印遗界谈判应以 1959 年实际控制线为基准，是否说明中国已经拿回属于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这种边界问题，政府必须考虑历史和现实以及未来谈判策略等要素，没有哪国政府会声称自己已满意了。本书以印度还占着中国九万平方公里的便宜来论述。

在美国弧形包围，蒋随时反攻大陆，和中苏关系出现危机之时，（接下页下）

表明中国谋求中印边界和平的诚意

这一招令不少人费解。一位英国学者在其《中印边界战争》一书中叹道：中国在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没有提出任何的赔偿和领土要求是奇怪的。曾参加过这场战争的解放军将士至今还有人难于接受。笔者本人也为此生毛泽东的气达十年之久，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精妙之处。

毛泽东在战争指挥上从来就不是个喜欢手下留情的主儿，打歼灭战，“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是毛泽东的偏爱，但这次却如此的宽宏，内中必有隐情。

在股市上有一个说法：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在战争上同样如此，常胜将军固然伟大，但善败将军更显智慧。而毛泽东在对印反击战上不仅常胜，而且更是善退。

中印边境远离内地，交通极为不便。如果从西宁运一车的弹药去中印边界，那么需要有一辆油车跟随，且通西藏的公路穿越不少的复杂地理环境，经常导致交通中断。再看印度一方，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势平坦，铁路直达中印边界。毛泽东作为一名军事家，对这样的后勤保障条件不会忽略。何况，在韩战时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受到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后勤保障一直困扰着前线部队（按一美国军官的说法：如果中国前线部队能保持一个月的后勤保障，而不是仅一周，韩战早结束了）。

（接上页下）印度又来挑战，使得当时领导人在解决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上有迫切感，导致这期间边界划分上的仓促和太多忍让是非常遗憾的；但承认缅甸对江心坡的主权则构成这代领导人在领土问题上最令人非议之处。可如果和缅甸关系搞僵，导致缅甸投靠其它大国，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周边安全环境将急剧恶化。这是衰弱的历史留给这代领导人的难题。如果中国不能和周边国家解决领土问题，我们将得罪所有邻邦，因和几乎所有邻邦都有领土争执。当时江心坡在缅甸控制下，不通过战争很难拿回。毛泽东当时也可能认为缅甸早晚会成为东方“苏联”的一部分。

因此，中印之战



只能是有限规模的速决单见如朵变成长期的消耗战，对我方肯定不利。因此，发动战争易，如何体面地退出战争就变得格外重要。

事实证明，毛泽东退出战争的方式是妙不可言的。

首先，中国暂时没有拿回部分属于我们的领土，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拿回。如果坚持控制这块领土，中国既无力完全消灭对方的力量，又难于和平地控制这片领土，中印之间肯定陷入长期边境战争。这显然不是中国所愿意看到的。何况，在中印战争时，苏联偏袒资本主义的印度，标志中苏关系破裂的表面化，而赫鲁晓夫在欧洲访问时，已公开谈论“黄祸”。如果中印战争不能迅速结束，中国将陷入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在北方对苏关系不明朗的情况下，和美、印两个大国同时对峙，中国是一定要避免的。

了解印度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是必要的。

印度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基本上是恼火，窝囊，难于理解。难于理解印度的军队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其实并非印度太弱，而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太强。恼火的是，印度再也没有机会一雪前耻。中国在结束战争时采取的手法是如此的宽宏和大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如果印度继续进击的话，颇有“给脸不要脸”的意味，在国际舆论方面将遭受另一场彻底失败。其实，中国在 1962 年战争爆发前，争取和平解决领土问题的诚意已为国际社会所认可，这也是为什么对印反击战爆发后，印度期待的国际舆论支持并没有出现的原因。

中印战争就象是一场拳击矜，中国在第一个回合战胜对方，然后拿起金腰带就走，声称自己赢了。问题是，一场拳击矜的输量 要经多个回合的较量才能分出胜负。很显然，毛泽东巧妙地修

改了游戏规则，以便自己在第一个回合取得胜利后就结束战斗，再不给对方机会。这无疑令自尊心脆弱的印度人有说不出的恼火和窝囊。

至于那几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何收回，就看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了。尤其在印度导弹的射程越来越接近北京的今天，中印之间解决领土问题的合适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如不解决，未来将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在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目标时，忽略其它稍瞬即逝的机会是非常可惜的。如果印度的导弹无法打到北京，中印战争发展成核战争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笔者实在怀疑中国当今和未来的文官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中国现有的高层领导干部的权力交接制度的不规范，党、政、军权力的人为分割，那辩领袖在五年的任期里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搞权力斗争，哪还有工夫策刺如此重大的战略课题。[28]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印度国际地位的急剧衰微，尼赫鲁和不结盟运动留下的那点外交老本也消耗殆尽。不可一世的尼赫鲁两年后郁郁而终。在亚洲两个大国的相对国际影响力较量中，中国迅速占据绝对优势。在中国的阴影下，10 亿人口的印度的声音已引不起国际社会的兴趣。

中国也在这场战争之后，顺势坐上了“丐帮（第三世界）帮主”的破椅子。当然，这个破椅子比任何沙发都舒服。

毛泽东在 1962 年的智慧构思，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没能参透其

[28]在 2017 年洞廊事件发生后，我曾撰文《中对印战略及当前对策分析》（共九节，2017 年 8 月），发表在笔者的新浪博客 blog. sina. co量. cn/ nanyangbook 和公众号“南洋智库”。被网友广泛转载到一些热门军事论坛。

中的奥妙，智慧的差距可见一斑。

例二，反击苏联的核威胁

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给苏联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而美、苏戴维营协议的签署，也使美、苏的对抗出现了一段相对和缓的时期，使得苏联希望借助美国与中国对立的时机，于 1969 年计划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摧毁中国的核武器基地、军事工业和政治中心北京。形势的高度紧张，使得中央高层的一些官员出于安全考量，而在国庆 20 周年到来之前离开北京南下。很显然，中央领袖们如果在建国 20 周年之际停留在北京，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但如果毛泽东不能届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全国人民的心理将带来巨大的阴影。

热中于时尚和表演欲过强的勃烈日涅夫，显然低估了毛泽东这个深藏不露的对手。1969 年 9 月底，中国在西北进行了两次百万吨级的核试验（一次地下，一次大气层）。之后，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发布公报，而是保持沉默。这令外界对核试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并导致诸多猜测。一位西方人士称：中国的核试验看来不是为了获取某个实验数据。两次核过验也必然给苏联领导层带来了极大的震慑和心理压力，传递了中国已有所准备的强烈信号。

10 月 1 日建国 20 周年的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满面春风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笔者于 1992 年在一本书中读到上述历史秘闻时，心中有一种难于言表的感受。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的力量 和突然崛起令全世界不习惯，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险境，他都能领导我们成功跨越，而我们对此全然不知。人民在没有任何担忧的和平环境里生活，可我们是否想过他老人家为此所付出的心力，和所承受的巨


紧跟毛主席 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大压力？当他没有离开北京而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人民群众不过多喊了几声“万岁”而已。就是这声“万岁”却成了毛泽东的一大罪状。难道他不配这声“万岁”吗？如果没有毛泽东，结局会怎样？建国 20 周年来临前的北京城，必然是一片领导干部们和其家属外逃的人流车海，并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心理带来严重的挑战。当周恩来急速跑到中南海游泳池旁将苏联核打击企图的紧急情报告诉毛泽东时，周的紧张是自然的，而毛泽东的回答显得格外轻松：“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9]

就是这个“不称霸”，给刚上台的美国尼克松政府传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促使尼克松政府在中苏之间倒向中国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三个字让美国人相信，毛泽东并不是好战的，中苏决裂的责任在苏联，以及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还是苏联，而非中国；虽然当时的美、苏关系相当缓和，而中、美之间还处于对

[29]1969 年苏联对中国核打击的风险下，毛泽东做出了疏散高层领导人（包括靠边站的中央高层）到外地的决策，以确保万一北京受到核打击时可以保留核心领导力量。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重病在身的刘少奇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表被送到安徽合肥。这本来是毛泽东基于国家安全利益而做的安排，自己承担最大的风险。但毛泽东之后，这段历史被严重妖魔化，邓小平的亲信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甚至写成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牛棚″，日子过得有多苦，受到何等的迫害等等（牛棚配厨师？）。他们似乎忘了，历史是人民来写的，历史的真实可以被暂时扭曲，但不会永远被掩盖。高层政治人物的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断，其家人亲信为先辈做不符合 H 际的″美容装饰″，只会起到反效果。毛泽东在国庆节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承担的风险比江西的″牛棚″大得多。何况那个″牛棚″本身就是虚构的。颠倒黑白，忘恩负义，莫此为甚！

峙阶段。这个信号也促使美国出于自己的全球利益，在最终彻底结束苏联核说诈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非常痛心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对毛泽东当年的“深挖洞，广积粮”以及大力发展“三线”的全国备战说三道四，说什么“毛泽东错误地判断了国际战争形式，夸大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等。对于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说，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两个：首先是生存，而且必须自尊地生存下去，然后才是发展。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领袖，如果面对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美国对中国实行弧形包围，南大门的越战正酣，西南面与印度敌视时，不做万全的准备将是极为轻率的。

避免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战争没有爆发，并不能说明当初的备战是错误的。毛泽东不可能采取蒋介石曾对日、苏、法的妥协政策。多数老百姓人云亦云可以理解，但中国的不少学者和高层政客也在不动脑筋，就未免有些悲哀了。

第三，毛泽东发动历次民族战争的战略考量

毛泽东 1949 年之后的历次用兵，固然有冒险的成分，但没有一次的军事行动是轻率的莽撞行为，或意气用事。

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因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而中、苏有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否“好吃”不得而知，但符合毛泽东要求的“好看”，“同盟”两个字是毛泽东要求加上去的），美国断不敢对华全面战争，进而可能导致苏联在欧洲的行动。因此，毛泽东加入韩战，除出于国家的长期安全考虑，也必然有信心地认为，这将只可能是一场局部战争，而不太会发展成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美国虽然有原子弹，但苏联也在韩战爆发前八个月，原子弹试炸成功。

对印战争之时，虽然中、苏关系已出现问题，但还没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苏联当时不可能量 助资本主义的印度，否则，苏联在社矜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和形象必然受到摧残。而美国人当时根本不相信中、苏会决裂，不相信苏联会放弃中国这样一个对东方阵营极为重要的力欧\只要战争很快结束，中国所冒的两面作战的危险是没有的。

中、苏珍宝岛战争道理是相同的。苏联也绝对不会冒和中国全面戦争的风险，因为北约和华约之间的对立不可能根本消除。欧洲部分因靠近苏联的政治、人口、经济和军事中心而成为苏联国防的重点。苏联一旦陷入和中国的长期战争，必然导致自身力量的消耗而难以解脱，欧洲方面随时都会给苏联带来不测。北约和华约不可能达至什么互不侵犯条约，也没有任何互信基础，无论出于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历史文化的因素。

虽然毛泽東对美、苏都信不过，但对自己的智蒽和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性对立还是有把握的。他高明地利用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作为自身的资源，适时地对准他们的“软肋”痛击。

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冷战中最大的赢家。在这场当代“三国演义”中，以苏联解体，美国背上沉重的国债而收场。中国国力最弱，但却通过军事和外交的手段，不仅金身而退，而且冲破雅尔塔格局，成功确立了中国的大阈地位。

毛泽东敢于直面这一系列的威胁，概因艺高人胆大。[30]

---

[30]据美国一些著作揭示，一直到珍宝岛战争，苏联计划对中国核打击，美国政界才确信中苏之间真的已经破裂，在这之前，西方不少战略家怀疑中苏之间所谓关系恶化，可能在策制一个重大的战略阴谋。这也反衬出赫鲁晓夫和勃烈曰涅夫这–代领导人战略眼光的短视。



1976 年 9 月 17 日，瑞典群众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游行和追悼会，悼念毛泽东逝世。这是游行队伍举着毛泽东遗像和红旗，走向追悼##场。

例四，苏联解体的强大推手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人都会提到美国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认为是这一计划带来的军备竞赛拖跨了苏联。暂且撇开其它的原因，如苏联的内政问题等；就外因而言，没有中国因素的存在，单凭“星球大战”计划就能拖跨苏联，是不可思议的。

自美国鼓噪“星球大战”计划至苏联解体，只有八年的时间。然而，苏联应付东部和中国接壤的边界防卫则自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苏联不得不保持一支百万大军，专门对付来自中国的压力（压力总是相互的。从 72 年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可知，苏联在中苏边境的驻军比欧洲部分还多）；同时大力支持越南，入侵阿富汗，以达到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虽穷，但毕竟是个大国，不同于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当苏联和中、美两个大国（集团）为敌时，必须为同时应付两大军事强国的两面作战做准备。它人口数 4、经济规模、军事力量和过分漫长的国境线相比，难免捉襟见肘，也必然给苏联政府和国民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并进而影响到苏联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因此，当赫鲁晓夫带着俄罗斯传统的沙文主义色彩而得罪毛泽东时，已经决定了苏联必须面对历史上最重大的战略灾难。中国在东方的存在，从苏联的东方屏障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对手，突变为苏联东方的恶梦，使得苏联的国防负担无论在物质上、人数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成倍增加。而毛泽东在处理对苏、对越（珍宝岛战争，西沙之战）和全球发展中国家关系上的强势作风，更使得苏联不敢掉以轻心。同时代的全球政治人物

没人怀疑：毛泽东是个什么人都不怕，和什么人都敢干，且能干赢的超级对手。北约拥有财富、科技和全球影响力，而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意味取之不尽的兵员）、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凝聚力，胆大包天的领袖和不怕死的将士，以及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显然都是苏联的短处。这种四面楚歌的外部环境决定了，苏联的国力不论多强，也不可能持久。尤其是毛泽东启动“乒乓外交”，拉近中、美关系之后，一加一大于二的局面形成，更加剧了苏联的国防噩梦。

今天，不少大陆学者对毛泽东失去苏联而对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说三道四。我们无法确定毛泽东当初的想法。毛泽东当初对赫鲁晓夫的沙文主义和意识形态言行不太客气，当然有对沙文主义的本能反感，从他 1957 年访苏时对克里姆林宫的马桶和床褥的诸多挑剔，人们怀疑他是对当年到西柏坡的苏联特使要求吃新鲜鱼的报复；毛泽东这个“丛林里来的战士”（赫鲁晓夫语）对生活可从来没什么奔侈要求。当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沿海建设潜艇通讯台时，更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斥责。笔者认为，毛泽东也可能是认准苏联不舍得失去中国而能做出些让步，进而为中国谋取更大的好处，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取得平等地位。但他打交道的已不是斯大林，而是没有战略眼光的“二楞子”赫鲁晓夫；这正是打麻将不找臭手的道理。而苏联在中国经济最困难时要中国偿还韩战中苏联提供的军火债务，加剧中国的饥荒；更表露了北极熊的无耻和不义，使得毛泽东对苏联彻底痛恨和失望。

但从长远的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苏决裂对中国的危害非常有限，但对苏联的危害是致命的。如果中苏关系不破裂，中国也许会得到进一步的技术支持，但已不可能象斯大林的“蜜月时期”那样亲密；中国的国防负担也不会那样严重，“文革”也许

不会发生（其它政治和文化改造运动肯定钤有）。但如果不割断和苏联的联系，中阈的核武器、航天工业等军事和相关民用工业的发展不会那样紧迫，当然也不会取得后来的巨大成就；中国工业的制造能力虽然有了初步的基础，完全独立地走向自我发展的道路将会推迟，后来中西部地区的大三线建设高潮不钤发生，或推迟发生（“三五”和“四五”期间完整 1:业体系快速建成，与中苏决裂直接相关）；苏联的国防负担也不会成倍增加，苏联的解体甚至不可能发生。当然，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将难以实质开展，中美、中日及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的改善将极大地推迟，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本来更严重，对抗更直接。中、美走到一起完全是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那么，没有中、美在苏联解体前二十年的合作，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基本信任和了解，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今日经济的腾飞将不可想象（无论是经济和商业管理理念，或者是后来的 1T 工业的能力，苏联都远逊于美国。苏联只能在某些领域给中国技术援助，而中国从美国可以学到更多，虽然美国技术上封锁中国）。苏联解体后，美、俄关系的似热还冷，似亲还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没有长期共同利益上的合作，要在两个文化迥异、曾尖锐对立的大国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谈何容易。当苏联解体后，美国准备将枪口对准中国时，中美之间无论是 K 间交往方面，还是官方关系方面，都已经渡过了最初的童年期；看一下苏联解体后的布什政府高层和中国的友好交往历史就明白了。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好感和认识，也有了初步的基础。

当中国迅速崛起，中、苏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一是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二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山不容二虎”。毛泽东在中苏关系最好且苏联给予巨大援助的时候，也拒绝和苏联签署边界

条约，让斯大林很不舒服。在苏联给予极大帮助的情况下，毛泽東却断然拒绝苏联提出的在海南岛建橡胶厂和在东北建罐头厂的要求，除他老人家的民族主义情节，也可能与他对苏联的由历史形成的本能不信任有关。他老人家也可能看准了斯大林绝不舍得失去中国。

苏联解体虽然让世界和平受惠，但受益最大的实际上是中国，毕竟，中国的边境上失去了一个强焊的对手。只有中共理论家和无知政客们才会有兔死狐悲的哀叹。中国宁可单独对抗美国，也不希望在中国的边涡有个强大的苏联。美国肯定会令中国头疼，但苏联则会让中国亡命。“美国能够毁灭世界，苏联则敢于毁灭世界”（尼克松语）。

苏联解体，是俄罗斯几百年来强烈沙文主义和俄罗斯民族强悍个性的必然结局。一百多年来身受其苦的中国，在不经意间为苏联的解体扮演了必不可少的推手角色。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正在北京读书的笔者特意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告诉他老人家北邻的巨变。这一结果虽超出他的意外，但其中有他的智慧和胆略，使得毛泽东的中国成为苏联解体过程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

顺便提一下苏联解体后，中国错失的一次潜在机会。

当苏联解体后不久（约 1992 年底），笔者曾给高层去信，建议借机通过购买或发动有限战争的手段，夺回从图们江往东至绥芬河西岸的一小段领土（不包括海参崴）。目的在于：

一是为打开东北的海洋出口，推动东北经济发展，及木材、榀食、煤炭外运的便捷通道。使得黑龙江省不再是“盲肠”。

二是为了切断朝鲜半岛与俄罗斯的地缘联系。中国尊重朝鲜半岛的主权独立，但任何强权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争夺，均直接影

响到中国的重大利益，使得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如果切断朝鲜半岛和俄罗斯的地缘联系，将自然加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分量，朝鲜半岛将无须顾虑俄罗斯的利益和干涉。中国在朝鲜半岛不需要谋求任何的特权，如果没有外力的参与，朝鲜半岛自身将不会主动挑战中国的利益。

三是为了大大缩短从中国领土至日本心脏地带的空中距离，进而取得对日本的战略优势，为未来解决分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日威慑，创造条件。今天，从日本西部和硫球群岛军事基地至北京和上海的距离，要比中国山东和江苏的军事基地到东京的距离近很多。如果打开东北的通道，从柬北的空军基地至日本所有大城市的距离，将比从江苏和山东的空军基地至日本重要目标的距离近得多。这种距离的缩短对中国带来的好处，和日本对我预矜时间的挑战将同步增加。

在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后来又去信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因他和俄罗斯作生意很成功，在俄有广泛人脉，四架飞机的易货贸易更使他名扬天下，且在发展满洲里仓储业务，以及委托俄罗斯发射卫星业务。他派了一位高层官员到访笔者位于北京清华大学 19 号楼 407 室的宿舍，听了上述分析，很感兴趣。笔者向他保证：只要能买回这片领土，即使花一百亿美元（当然分期付款），中央也会全额支付，南德无需花分文钱，即可掌控这片土地，并把它发展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中央要的是国家的战略利益，南德要的是商业好处。

虽然这一策刺似有理想的成分，但只要认真观察一下当时俄罗斯的处境和人民的心态就会发现（苏联解体后最大的冲击就是人们心理的瓦解），将这一策划变成现实并非不可思议。对中国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只要中国在

战争推进的同时，配合外交努力的缓冲，不夺海参崴，不主动攻击对方的城市，让俄罗斯清楚中国战争的目标，那么，发展成全面战争和核战争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而这场战争因目标明确而有限，双方都无意升级，因此，中国海空军的劣势不会太大影响战争的结果，中国陆军的优势将发挥作用。在俄罗斯货币严重贬值之时，百亿美元也是足以令人动心的巨额外汇。如果军事和银弹攻势配合应用，既让俄罗斯看到保住这片领土的代价和难度，同时又有金钱铺就的下台阶，那么，问题的解决可能更易。这可能会令中国的经济发展推迟五年，但相对于收获，五年的损失是值得的。中国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应该置宝贵机会于不顾。

很遗憾，机会稍瞬即逝，除了毛泽东复生，没有人敢于尝试笔者的这一战略策划。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笔者明知不是作公务员的料，后来还是报考公务员，包括这件事在内的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笔者从不谦虚地认为：祖国将会因为我而更好，将会因失去我而损失。知毛者，振也；知振者，何人？

后来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出在中、俄、朝交界的图们江三角洲发展成东北亚的特区，令笔者终日提心吊胆：如果特区设在中国领土上，并疏浚图们江\或中俄在波谢特湾或图门江入海口共[31]

[31]笔者长期感到奇怪：中国拥有图们江主权，为什么没有用来发展航运业务，以开关东北的海运通道？苏联曾一再要求中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属于苏联，遭到中共历届领导人拒绝在苏联解亲中俄关系改善后，是否有可能开辟这条航线呢？但惊闻如下消息，令人震惊和欲哭无泪：1999 年底，江泽民和叶利钦签订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因至今没有在媒体公开报道此条约的细节，希望能进一步查证），承认图门江出海口属于俄罗斯，封死了进入日本海的通道。同时为保住珍宝岛而不惜丢失几十个江心岛（不保珍宝岛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但他们以为百姓都

第七乘毛泽束与个人崇外

建港口，那么这个计划对中国有利；否则，中国不该参与。没有中国的参与，该计划就没有成功的可能。行当时国内的权威舆论，对此一片叫好声，甚至喊出“打造东北亚的香港”，真担心冒出几个有决策权的傻帽。至于如何打开东北的海洋出口，就看他们的智慧了。

例四，乒乓外交

当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传到中央高层时，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外交部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估和研判，以决定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最后，周恩来向毛觉报了研判的结果：时机不适宜邀请美国人来访。对此毛泽东陷入了沉思，最后干纲独断，决定发出邀请。

今天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这一事件，不论如何赞美这件外交经典之作也不过分。在当时中、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周恩来和外交部作出那样的研判结果是非常正常的；而这更反衬了毛泽东的伟大和非凡。

然而，外交部门在评估国家的外部形势和谋取最大国家利益时，如果不能作到必要的超越，是非常令人不放心的。即使看一下在过去十多年中共在外交和台湾事物上的表现，就能明白，要达到毛泽东那样的高度，还真的不容易。[132]

是傻瓜）。如果上述条约内容属实，历史终会唾骂第三代领袖。毛泽东之后十几年这些人的骨头就软了。希望未来全国人大能否决这个条约，毕竟它还没锻全国人大1 过，也就景. 说遣没有法律效力。

[32]第二版补充：2015 年，印尼主动就南中国海九段线西南紧邻的纳吐纳群岛做出主权声明，中国对此机会完全没有利用就循规韬矩地宣布承认印尼对该群岛的主权要求，这是又一次按照常理出牌的结果。笔者于 2015 年 11 月在博客 blog. sinaxo 量. cn/nanyangbook（公众号″南洋智库″转发）发表《中国在处理印

尼纳土纳群岛问题上的手法令人痛心》，分析了借此次外交事件中国可以抓住但却错过的机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公众号或博客参阅。

例五，中美关系和对台问题上的战略把握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了《基辛格秘录》的部分内容，并给予评论。其中提到：在对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在 1973 年和 1975 年两次对基辛格提到“台湾问题可以等一百年”，但强调一百年后非要不可，打仗也得要。值得注意的是，毛说这些话时，美中关系正常化停滞不前，双方的关系已颇冷淡。此时毛的健康也很坏，讲话已很困难了。毛泽东完全是从高瞻远 W 的大格局思考，那时中国的头号敌人是苏联，在联美制俄的大战略上，台湾自然退居次要位置，毛才说出“我们能暂时不要台湾”的话。周恩来、邓小平的眼光不如毛，所以会在解决桌湾问题上显得急切，1972 年周与尼、基会谈时，触及和平解放台湾时，就直接对基辛格说：要十年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太久了[12]。

从以上例子中不难看出，作为大外交家的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的智慧面前，总摆脱不了小格局的局限。毫无疑问，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外交家，是外交政策的一流操盘手，但是，毛泽东才是国际大战略的一流玩家。当举国人民把那么多的赞歌献给周恩来（周恩来也许无愧于这些赞歌），那么多的指责和漫骂送给毛泽东时，是否曾自问：没有周恩来，中国将失去一杰出的外交家和国家领导人，那么没有毛泽东呢？

中国将要失去的是更广泛、更深远的国家利益！

不，也许无所谓失去，因根本不可能得到。

毛泽东的令人敬佩，还体现在哲学、诗词文章等方面。任何研

究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学者，都不可能忽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章中，充满了闪



为伟大领袖毛
主席争光
始伟大社会主
义祖国争光

光的哲学思辩。他的军事思想更开创了新的战争形式，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无人可以企及。

当这些广博的学问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佩服已经不够，“崇拜”也就是自然的了。

至于诗词方面，一首《贺新郎•别友》，通篇没一个“爱”字，却使得诗人和妻子杨开慧的爱切情深布满字里行间，溢于诗词之外；一句“眼角眉梢都似恨”让中国最浪慢的现代言情诗人想“恨”而不知如何再“恨”。“战地黄花分外香”（摘自《采桑子•重阳》）让战地诗人们回味无穷。即使从大学者如郭沫若、柳亚子和毛泽东的诗词唱和中也能明显感觉到毛泽东和诗的更高意境，和谴词造句上的更深功力、

就连香港的算命先生也惊叹道：毛泽东真是高不可测！将开国大典放在下午三点后举行极不合常理（人们一般将庆典安排在早上太阳升起后举行，而没人安排在下午太阳西下时），但却是一天中最好的时辰，主早年多波折，国运日隆之相（但愿如此）[33][34]。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

---

[33]请参考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和郭沫若原诗《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和柳亚子原词《浣溪沙》（1950 年 10 月 3 日）。

[34]笔者 2016 年去暨南大学参加第十二届《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偶遇一老者，随意聊起此事，他不仅知道，而且更多的内容从他口中流出。之后，他带我去他住的酒店，将一本他写的与毛泽东和共和国相关的书签名赠我，并叮嘱不可外傳。该书在香港少量上市后即停止销售，以免造成误导。看来毛泽东在天之灵，有意做此安排，自己早期引用的文字居然 14 年后与原创者偶遇，玄妙！

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

据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数十亿册，成为历史上发
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之一。其中约有上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
政府对外宣傳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
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和欧洲
大学校园。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著作是西方“左”派
青年必读的书，甚至一些学生团体利用节假日上街分发毛的
“红宝书”。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
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
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之信
仰深感惋惜。在毛主席纪念堂筹建时，一位匿名的台湾同胞
甚至辗转寄来了一个材质精细的大理石。今天它已被雕刻
成花盆永置于毛主席纪念堂里。至少它说明了，即使在最反

1975 年 9 月 10 日.
左异青年在意大利
罗马挥舞写有毛泽
東语绿“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



毛、反共的环境里生活的中国人，仍然能对毛泽东为中华民
族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崇敬。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知

道它是谁寄来的，仅知道它来自于台湾其实已经足够。

三、人民曾今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世界历史的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
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五七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评价到：“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 1789 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以及“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直到 2002 年的今天，委内瑞拉那位在政变中反败为胜的民选总统查韦斯，公开承认毛泽东是他的导师，毛泽东的著作是他的政治教材。

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直到今天，仍有那么多西方国家的学者能超越意识形态，在了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失误后仍给予毛极高的评价。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

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该文刊登在《参考消息》上），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

的评价太低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和中外历史上的其他政治家、军事家的一个重大不同点在于：毛不仅是一名军事领袖或政治领袖，在相当长时间里，他更扮演了中华民族精神领袖的角色；而这即体现了他的伟大，也赋予了过重的责任，同时也必然导致人民对毛泽东的长期精神追随。也难怪，中国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无助，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软弱无力感，不可一世的文明故国所遭受的国破家亡的苦难，使得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国度里，在帝制消失以后，又多么需要一个能凝聚全民的精神支柱。

而毛泽东的出现毫无疑问地填补了人们渴望已久的精神需要。毛泽东那厚实的肩膀，让被洋人和地方官僚豪绅欺负怕了的中国百姓，暂时找到了安全的凭靠。而志士仁人追寻民族复兴的百年悲歌，总算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凯旋的曙光。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宣传画，1965）

第八章　中国人灵归何处？

一、毛泽东对中国人的精神改造

要详列毛泽东对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改造贯穿于毛泽东政治生涯的全过程。在长征期间，他利用一切机会，教导农民“打地主，分田地”，传播平等和共产思想；后来建立新中国，他反对一切精英主义思想，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铲除了一切特权，赋于民众更大的权力，将中国建设成世界罕见的高度平等的国家，使得平民意识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做了价值观的铺垫。

毛泽东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置入了辨证唯物论的思想。从中、小学开始的政治课学习，马克思的辨证唯物论都是必修知

识，不论学生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不能避免唯物思想的影响。经过毛泽东几十年的改造，今日的中国人虽然会靠近甚至加入某种宗教，但要完全剔除已根深柢固的唯物论思想已不可能。在美国的一些教会中，中国新移民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教会的神

职人员大都明白，要让这些中国人虔诚地投入到宗教中，非不可能，但实属不易。虽然唯物论思想给一些宗教的传播带来不小的挑战，但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迷信思想或宗教极端思想的泛滥。使得本来对宗教信仰就有着强烈实用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现在要非常投入地信奉一种宗教，或像西方人那样为宗教献身，变得更加困难。当基督徒宣称上帝在六千年前创造了世界，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否反共，都会一笑置之。

当然，唯物论思想的传播，因是自中、小学时代就已开始，因此对中国的回教徒等有宗教背景的人并没带来很大的不自在，但却使得中国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群体与国外相比，较多地表现出中庸的色彩。如果一个回教徒不表明自己的宗教倾向的话，中国的其它民众已很难分辨出他们与其他人在个人行为和价值观上的明显区别；而中国的回教徒在宗教仪式和生活习俗上，也不像其它国家的回教徒那么严格（中国的回民被视为一个少数民族，则是荒唐的。回民实际上是信仰穆斯林的各族，包括汉族，经过千百年融合的结果，如果按信仰分民族，那么，佛教徒、道教徒和基督徒呢？因此，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

应该取消回族）；如华东和华北一带的回民，并不忌酒，除猪肉外其它皆吃，女人也没有带头巾的’。对中国国家整体而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之间具有较少的行为和价值观差异，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它有助于避免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基于宗教的冲突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

可以说，毛泽东时期奠定的辨证唯物论思想和平民化意识，已从政治的意识形态范畴溶入到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成为中华



文明的一部分。当年修建京沪鐵路时，因担心动到龙脉而避开曲阜向西绕道兖州，这样荒唐的工程方案再也不会出现了。

砸烂千年铁锁链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推动的公有化和集体化道路，也直接带来了中国百姓集体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建立和强化。虽然集体主义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从来没有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对集体主义有如此切身的体会。而集体意识是建立健康公民社会和大工业化时代必须的社会基础。可以说，长期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带来的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被终结。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对中国人思想改造影响最深远的当数“文革”，以及伴随“文革”而来的“破四旧”运动。关于“文革”前面已有论述，这里详细谈一下“破四旧”的积极意义。

过去科学的落后，制约了人们对人类社会、自然及宇宙的认识，产生了无数的带有宗教或迷信色彩的门派和相关信仰活动；各种文化的交叉融合，使得其中不少的宗教门派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中国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又为这类宗教迷信活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理据。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延续，同时也积累和延续了大I」!：的文化糟粕，影响着世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后，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要求思想觉悟的相应提高，毛泽东显然无法容忍这些制约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和习俗继续存在下去。“破四旧”运动的发动，既是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展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动机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1965年回复法国前驻华大使马尔劳的信中，就中国妇

1975 年作



姐姐，兄弟姐妹中最聪明伶俐，却没能上学，从 6 岁起照看弟弟，洗衣服，送他们上学。因一字不识，一个人出远门都难，更别说做生意了。如果“破四旧”和“文革”能早点开始，姐姐的人生将完全不同。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亿万女性和弱势群体的大恩人。

女解放的问题写到：“从开始便给妇女法律平等，但到现在一切仍然有待完成。造成旧中国妇女地位低落的那些思想、文化和习俗一定要消失，而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和习俗必须出现。中国妇女还未存在于群众中；但他们已开始要求存在”[341。这段信虽然是关于中国女性解放问题，但清楚地表露了毛泽东对“四旧”的关注和“破四旧”的部分动因。任何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都能明白，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极其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中国旧思想的巨大不良影响。如：虽然当时读书几乎免费，但农村家长就是不让女孩子上学，总认为女孩读书没用，不如在家帮助做点家务，笔者的姐姐保华（父母六个儿女中唯一的女儿，排行大哥之后）、几个姑姑和堂姐等一大批大家庭的女孩子成了这一传统陋俗的最后一批受害者；但老爹却慷慨地花 150 元买了一架当时凭票也不易买到“上海牌”缝纫机，让姐姐学习裁缝；这笔钱在当时足够资助两个学生完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全部教育。而我的大哥和姐后面的四个弟弟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家乡靠近曲阜，传统的力旧:尤其巨大。毛泽东敢批“孔老二”实在胆大，但实属正确，儒家思想带给中国文明的秩序，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破四旧”的积极意义是，它以政权的力量推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一些极为落后的风俗传统和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表现了其革命性的一面。

在“文革”之前的北方农村，每逢春节，晚策都要给长辈叩头。面对越来越多的长辈，年轻人越来越头疼，因他们实在心疼

自己的那条过节日才舍得穿的新裤子。听父母讲，一个春节下来，硬是跪的两腿酸痛；那些辈分低的人就更别提了，因全村大部分人都有资格接受他们的磕拜（读一下《金瓶梅》，对中国民间的这一磕头陋俗就会有更充分的了解，抛开里面的色情描写，该书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百科全书”）。除了给活人拜，还要拜祖先。还不能忘了那众多请到家里的“爷”，如老天爷和老天奶奶（人们有板有眼地说这对最伟大的神圣夫妻姓张，当然端坐在堂屋正厅；估计是姓张的编造的）、财神爷（设在堂屋里的门后，有求财不露之意）、灶王爷（设在厨房里，腊月二十三号重点照顾对象，要好好给祂老人家拜拜，因为这一天他要带民间调查报告上天庭汇报，从小就听我爹讲，这天要念“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二十三日去，三十五更回”，得罪灶王爷，祂在老天爷那里说您点坏话，可不是闹着玩的）、牛王爷（一般设在牲口棚里，保证你养的牛肥马壮。中国祖先太人道主义了）……。白天还必须叩拜众多的庙，在笔者家乡附近三公里之内就曾有观音庙、牛王庙（拜牛王爷的）、泰山庙（拜泰山或东岳大帝的）、关帝庙、土地庙（拜土地爷的）、火神庙（拜火神爷的，这是很厉害的神）等，不出 7 公里还有城隍庙、天宫庙和一间龙王庙（拜龙王的，较大的河流旁边常有这种庙）等。翻一下中国地方地图，就能发现那众多叫“什么庙”的村镇，就是围绕当地的庙宇形成的地名。山东一带直到“文革”之前还有“朝泰山”的习俗，老人和家长要走几百里去泰山朝拜（《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大老婆吴月娘去泰山朝拜，就是这一习俗的写照。可见，不论文化精华还是糟粕，都极具生命力，没有强大政治力量的介入，五百年后中国人还在去拜泰山呢！）。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哪个“爷”都不敢得罪，哪个庙都不敢错过。

1975 年作

毛泽东来自社会的地层，他能忽视这一社会现象吗？当他带领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迈进时，还能容忍这种陈规陋俗继续对人民思想和行为的钳制和束缚吗？他挥舞巨大的拳头将这一切打碎，将人民从落后和愚昧中解脱出来。如果不是政治力量的强制介入，以中国人的厚重传统和中庸性格，不太可能解脱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好面子的中国人，谁也不愿意被说成不懂规矩或没有教养。

但除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又有谁拥有这样的能力、远见和魄力，来推动这一影响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对延续几千年的强大传统习俗的伟大“造反”运动？唯有毛泽东！

当今信仰迷失，以及人民的信仰重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可能要求毛泽东具体告诉我们到底是拆除观音庙呢，还是拆除火神庙？在毛泽东时代，他为人们提供了充实的信仰，人们并没有因摧毁了泥佛土庙而承受精神上的痛苦。

今天，陕西某村又建了一座庙，其中供奉的是毛泽东像，北京的汽车司机也在挡风玻璃处挂了毛泽东像，据说可以保平安。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本人的丰功伟绩和创造的精神食粮，使人们对其他“神”的依赖大大减弱。今天人们对毛泽东自发的祭拜，在于毛泽东一定程度上成为人民需要的精神寄托对象，这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逝世前已有的精神寄托基础上，经过二十年社会变迁和考验后，人们精神的一种回归和延续；尤其当今中国社会的乱象，领导人的软弱无能，更让人们对过去那尊穿中山装的“神”深深地怀念。当然，要比原来的“崇拜”理智和现实的多。

当毛泽东逝世，尤其是全面否定“文革”之后，人们在精神



上陷入一种脱节状态，在新的信仰体系没有确立之前，人们的价值观在部分保留原来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基础上，也进入了一个相对迷茫的时期。尤其是商业社会的来临，贪污腐化和特权思想的返潮，人们昔日的“革命理想”变得越来越稀薄，而改革开放后进入学校的年轻一代，已将“个人实现”放在了首要地位，“信仰”已变得无足轻重；可当人们失去了信仰，对个人欲望的苡现这种自然属性的侧重，也就是难免的了（第二代领导人其实也有意识地引导人们走发财致富的路，而且不择手段，从国企改制，到贪污腐化，真个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直白一点讲，您只要是捞到钱，抢到财富，不论是采用改制还是混合所有制，就是充分解放思想的榜样，“三个代表”中至少你能抓到一个）。今天有些人将信仰迷失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和“文革”，根本是颠倒黑白。至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弱势群体绝对不接受这种对毛泽东的诬赖。

毛泽东时期对人民思想的教育改造难免有些粗糙的地方，但却是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一次大清洗。只有将那些毒害和钳制人民精神的迷信内容彻底或大部分铲除，才能为建立更健康的信仰体系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没有毛泽东时代对人民思想的“革命”，在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的国家里，各种邪教或会道门都可轻易找到乘隙而入的机会。象台湾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小岛上还曾发生过以宗教骗人的事件，何况人民整体教育水平不局的大陆呢。

简单比较一下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人民，如埃及、中东、希腊、印度等，至今受制于传统习俗，而现代化思想的传播却困

难重重，就不难明白毛泽东对中国人思想改造的巨大成就和意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为中国曾拥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骄傲和侥幸。人们也许为“破四旧”中被毁掉的破庙和几幅近现代名家的字迸而伤心；中国艺术精品层出不穷，但几千年来又有哪个皇帝在认真切 ff地推动民族思想的进步改造？和整个民族的精神解放比起来，那几件名家字画或拆除的庙宇又算得了什么呢！？（毛泽东推动“破四旧”本身没错，也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在执行过程中被一量执行者把“经”念歪，导致一些文物被毁，是令人痛心的）

另外一个值得参考的资料是：随着毛后时代人们道德意识的降低，90 年代以后文物被盗的数量比过去几十年被毁的文物多出数倍，而且价值要高得多。但却没有领导人为此受到指责。


现代民间自发的对毛泽東的供奉与崇拜

二、中共对待人民精神需要的误区

笔者长期受共产党教育，自认为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看到他人烧香拜佛的时候，既没有嘲笑（这是基于对他人信仰的一份尊重），也没有特别的感受，更谈不上认同。笔者也参加过一些不同宗教的宗教集会，看过一些宗教类的书籍，但是以更好了解他人或其它国家的文化背景为目的。但人生中的一段特别经历，才促使笔者对宗



新加坡四马路观音堂

教，尤其是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和出路这类重大课题，有较直接的感受和较深入的思考，也促成了本章内容的写作。

1998 年中，当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出站后，面临未来个人发展方向的选择、由于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研究方向较为“邪”卩发展前景暗淡，对在工业界求职也没有任何概助。而自大学一年级开始的作公务员的梦想又看不到实现的可能。同时，个人经济上也面临严峻的困境。这是笔者人生中最暗淡的一段时光。唯一能给予鼓励的是那句老话：“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膺，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除了没挨饿以外，差不多全经历了。一位在困难中给于物质和精神支持的老友感叹：“你真行，居然还笑得出来”，概因“天降大任”这一空头支票的鼓励（中国文化的伟大也许正体现在这些人生哲学上）。本书的雏形（即《为毛泽东辩护——兼谈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和本来面目》[35]

---

[35]在读博士期间，曾听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副所长做关于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报告。这个讲座弥漫着无奈和焦虑，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看不到追上发达国家的希望。1998 年在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出站前后，我向新加坡所有的大型半导体公司寄简历，希望以自己机械和电子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来认识和探寻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发展道路。但当时赶上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企业聘请新人很谨慎，而我的学历高，却没有半导体行业学历和经验，没有企业聘我。直到 1998 年秋，看到一个美资半导体公司招聘操作工，我才隐瞒硕士和博士文凭去应聘，最后获得个助理工程师的职位。并在半个月后抓住机会，以自己的机电一体化的能力在二十分钟修好一台全自动晶圆洗刷设备而证明自己的专业素养（该设备瘫痪几个月了，制造商来人都修不好，在我的请求下，那位获得美国电子电器博士文凭，在德州仪器工作过的老板允许我这个机械系本科背景的助理工程师去撞运气），在老板大感惊奇时，我才亮出博士文凭，从此开始了 4 年半导体行业的工作。直到该书第一版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自己无奈成立出版社来出版此书为止。这次经历是自己国家情怀的一次体现，同时也证明，个人能力而不是名校文凭才是立足的根本。

这篇八章网文）就是当时花两周的晚上完成的。那时能深刻体会为什么司马迁不坐牢就不可能完成《史记》。当然，笔者无意鼓励把所有的才子都关进监狱。

这种无业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当世孔明”已束手无策；在老友的鼓励下，决定求助于宗教的力量。

对一位无神论者，深感为难的是该去基督教堂还是去佛堂呢？曾参加过不少基督教集会，也和朋友一起“礼拜”过，可能因为对《圣经》中一些内容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也可能因当今世上有太多虚僞的基督徒，影响了对基督教堂的选择；中国世俗文化受佛教的巨大影响，这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最后去了位于新加坡四马路的观音堂。当时笔者的紧张程度决不亚于第一次和女孩约会，虽然那位慈眉善目的观音娘娘比那个女孩好伺候的多。

可是，当人进得庙里，香烟缭绕之间，突然虔诚起来。上香三支，跪拜摇签，得一不错的签，言及时运不到，机会在秋冬等。当笔者试图在计算机上键入该签几十字的内容时，连续死机三次，无法存盘，甚为罕见，可能天意不可泄之故，故不能抄录于此，难以与读者分享。

当天的中饭不禁胃口大开。然而，回到家后即陷入了沉思：笔者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加入共产党的那份一晚完成的几十页《入党申请书》，被一向严格的系党委副书记称为几年来最好的入党报告；笔

者的入党也是经过长期的考虑和思想准备后提出申请的，绝非那帮政治投机分子可比。本人对于共产党理论和国际共运的书籍閲读量也不会亚于中央党校的毕业生。然而，在笔者最困难的时候，这份信仰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章》都不能带来点滴的安慰；至于“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更不可能带来

任何的精神鼓励——自己面临人生的闲虽关头，哪还有工夫镇助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这次经历让笔者不禁顿悟：一个国家拥有全民一致的政治信仰无疑能推动国家的进步，但如果试图让政治信仰在人民的精神领域里发挥统治作用，将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最终的结果是，人们对政治说教的厌烦，和精神世界的迷失。而今日中共中央的错误就在于：继续试图以政治的信仰强迫代替精神属灵的那部分内容；而政治信仰越来越没有动员功效的情况下，人们精神依归的不知所向，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如何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应成为中共中央当前的新任务，它的重要性当不亚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必须跳出传统的意识形态范畴，以更恢弘的视野，看待人们的精神需求。

对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两个基本点应修改为：推动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和建立中国人持久的、健康的精神信仰体系。

笔者一直将上述经历视为天意。因为“天降大任”，先令笔者困苦不堪，然后进得庙里，再后来突有感悟，为世人揭示当今中国人的精神出路，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天”的智慧在于没有去选一位脾气暴躁的反共人士，或对中国人整体命运漠不关心的家伙，而是选了一位有点见识而又忧国忧民的共产党员。不过，

笔者对“天”的这份“厚爱”实在感到恐惧，以后再有什么需要“厚爱”的话，去找别人吧。

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基本能解决当今中国人面临的大部分精神世界的问题。如，本人上述



开展对《水游》的评论

经历，当时非常后悔之前没有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老庄哲学，如果能对《周易》有所认识，可能会带来更直接的帮助。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在于其实用性。中国重要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只有几千个字，其分量不亚于西方任何的哲学体系。《论语》、《庄子》等都是薄薄的一小本。学术界也可能会讨论它们的宗教性或哲学性，但对学术圈以外的中国人来说，它对人们普世价值观的塑造确是直接和有效的。

被全世界“左”派政党视为最高哲学体系的马克思《辨证唯物论》，提倡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等，然后还给出了一个对规律认识和利用的方法论体系。至于马克思哲学体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指导人类的活动，它的可操作性如何，是令人存疑的。而马克思哲学体系对人类精神活动的指导没有多大价值。但《周易》就不同了，不管是唯物还是唯心，是物质还是意识，完全忽略一切表象的内容，在这里世界由阴、阳组成，表现了比马克思哲学体系更高的概括性，更能表现出哲学对普遍规律的研究目标。至于世界万物怎样组成，靠八卦和六十四卦推演而出。笔者在学习计算机理论课时，发现用〇和 1 来表达八进制数的表达方式居然和八卦完全相同，在模拟信号数字化成功，并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对大自然各类运动或现象进行运算处理和预测，实际上意味着〇和 1（在易学里就是阴和阳）是可以用来描述世间一切事物，并可以进行运算的。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具有极高可操作性的哲学体系与当代计算机技术高度吻合，马克思那套理论乃至当代各派哲学体系，相对来说，过于概念化而有失可操作性了。

至于用《周易》“算命”是否可能，如果按马克思哲学体系推论，



人的命运如果是一种运动的话（当然是），它当然是有规

律的，既然有规律，当然是可以认识的（否则就陷入反动的不可知论），因此预测人的命运也是可能的。笔者的这个推论曾让一位严肃的党委书记不知所措，也肯定让“左”派原教旨主义理论家感到痛苦。很显然，《周易》在可操作性方而，比马克思哲学强得多。当然“易学”并不是仅仅用来算命。但《周易》已被打入纯粹的学术领域，或在民间被引入“胡乱算命”的歧途，其哲学的内核已被忽略。

当今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已将教育定位在纯粹解决现实科技和社会问题能力和谋生手段的培养上。如果说系统性的人文教育，也是以意识形态的考虑为出发点，这直接导致了当今中国大学生知识结构上的严重缺陷——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的残疾。理工科专业培养出的大部分是高级技工。而社会科学培养大量脱离实际的自大狂。

今天人们信仰的迷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理应肩负起人民教化职责的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无视这种“迷失”的存在，而继续以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宣传手段对人民进行洗脑。问题是，今日的中国政治环境已今非昔比，今日的政治人物，如果不让老百姓讨厌的话已经是万幸。昔日毛泽东曾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人民的精神支柱，人民对毛泽东的教导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不论毛泽东的教导是否正确，人民毕竟有了一个精神的凭靠。但今天人民对于中共中央的宣传已具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在这样的环境下，能把政策宣传下去就已经不错了，还奢谈什么精神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自身文化定位时，所犯根本性的错误在于只看到“共产党”三个字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将“共产党”名



字前面的“中国”两个字给忽略了。这两个字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它共产党的特点，也决定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必须以中国

少数民族地区供奉毛主席像

的文化为基础，否则，中共在文化上的角色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共的理论体系和说教也自然成了空中楼阁。今天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36]

当前国家的法制化建设只能为人们5%的日常行为制定规范，但95%的内容，法律无法触及。法律可以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但无法教育人们应该做什么。只有信仰的建立，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规范和引导。当没有任何信仰时，人们的行为将很少受到约束，私欲横流难免，那么，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社会就未免有些太可怕了。（其实看一下南洋出版社出版的书如何被猖獗盗版，而本应明是非的读书人却毫不在乎地去购买盗版，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和信仰转化为人们自觉行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中共中央必须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以新的思维方式，寻求精神和道德重建

新的出路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为第一版所写，在……然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以来，大力推动优秀民族文化建设，本书第一版的内容也没必要随时代而修改，毕竟该书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而不是随时代需要而动。不可否认，本书 2003 年出版时，本书触及的诸多社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三、中国人的信仰重建和宗教改革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去粗取精，并以学校教育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教育学习，应是中共必须着手开展的工作，这实际上也是中共“三个代表”之-“代表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谁敢说不先进？）。

对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已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他们对精神引导的需要。传统知识分子不少报着“既读圣贤书，何须敬鬼神”的自信。孟子更狂言:“华夏之无君，胜夷之有君”，正是建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教化功能和华夏民族文明程度的信心。但对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来说，《四书》、《五经》可能还不够，这是世俗文化的功能性缺陷所至；宗教则可扮演补充的作用。当然，也只能是补充辅助的角色。中国在 1949 年前大沿带有宗教色彩的学校，在今日的中国已不再需要。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置入世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对他们识别、抵抗迷信和邪教的诱惑是必要的。至于他们成人后的信仰选择，会以他们较为成熟的心智作出判断。

与世俗文化的教化作用相比，宗教的力量在某些方面显得格外突出，并能为社会提供特别的精神需要。

一门宗教往往包括下列基本结构：一、该教的伟大或合理性，对人前世、今生和来世做出揭示；二、劝人向善和忍让，如果加入该教且遵从教规，扬善止恶，会有哪些好处；三、如果不加入

该教，或不向善，会有什么可怕后果。

上述宗教结构，造就了宗教的强大功能，第一点构成了宗教的美丽外衣和吸收教徒的功能，也构成宗教的神秘感和威慑力；第二功能构成了宗教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也赋予该宗教高尚的道德形象；第三功能则直接针对人类的自私本性和懦弱，做出强力的规范和制约。尤其是第三点，为世俗文化所欠缺。正是第三功能的存在，才导致第二功能的有效性。

宗教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出发点：人是自私和野峦的，而同时又是可以教化的。宗教不同于世俗文化，它丝毫不回避人类的本能弱点。宗教必然有唯心的成分，否则，它的力量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将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管理完全放开。为了充分利用宗教的教化功能，而同时避免宗教传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中国政府还是宗教界人士，或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可以有所作为，共同构筑中国自由、健康、多样化的信仰体系。

就中国常前宗教的传播来符，中共各级党委对传统宗教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如禁止建设佛堂或道观等，但同时，基督教各派别在民间的传播则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这对佛教和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传播是不公平的。那些追随罗马教廷，而不接受中国天主教“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天主教徒，另当别论；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管制是必要的。毕竟听命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会，曾对中国人民作过太多的坏事，声誉已坏，岂是旦夕可以恢复？2000 年，梵蒂冈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人民的感受，对那些于过去一百多年中在中国干尽坏事的神甫封圣；罗马教廷在苏联解体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天主教徒的执着和对教廷的无条件服从，等。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谨慎。

下面就各主要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及出路，做进一步分析。

中国缤纷多采的民间信仰暂不多谈，它们构成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如拜关公、财神、妈祖、灶王爷等，有些被纳入道教，而有些则是以“散兵游勇”的方式在民间“活动”。笔者反对将此简单列为迷信。实际上，如果没有了这些内容，中国文化的哲学内涵不受太大的影响，但文化的平民性和表象将肯定受到破坏。笔者家乡每到过春节时都要有一系列祭拜活动，极大地增加了节日的气氛，使得春节成为不同于一般日子，拥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日。尤其当笔者在城市度过几个春节后，更加思念家乡的春节。虽然本人总是破财，但并不影响过节时给财神上柱香的积极性，这是人们求个吉利的方式之一；至于财神是否肯帮忙，那就看祂的了。

首先谈谈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值得注意的问题。

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在唐初，当时叫做“景教”，后来唐武宗灭佛，景教也一同被灭。至明朝时以利玛苻为代表的西洋传教士东来，基督教才又登陆华夏。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贡献和孽债，让专家去研究吧。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流行宗教之一。尤其最近三十多年，在中国政府及文化界宝力宣传西方文化时，不小心拉近了基督教和中国人的距离。基督教已逐渐深入到偏远的乡村。笔者家乡的小村庄也有了基督教团体，笔者的奶奶、伯母等 20 多位中老年人成了最初的基督徒，这给笔者提供了机会，以近距离观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方式、特点和效果，也

产生了一些担忧和希望。笔者在海外期间频繁接触基督教，是希望通过观察和比较，发现基督教可能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和影响。当然，这个全球十亿人信仰的宗教，其对推动人类进步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否定的。

但必须肯定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肯定有所不同。因为，基督教进入欧洲时，欧洲并没有强大的文化体系可以对抗，而基督教的传入则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进步。而今日的中国则拥有强大、系统、根深蒂固且极具生命力的文化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不论对基督教多么虔诚，都不可能避免中国世俗文化对价值观的影响，甚至是居主导地位的影响，不论中国基督徒是否承认这一点。只要将一位欧洲基督徒、一位中国基督徒和一位不信上帝的中国人放在一起，就可轻易发现，那两个基督徒之间拥有比两个中国人之间更显著的不同。虽然我接触的华人基督徒都拼命感恩耶稣，而不是孔子。

就传播方式上来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最具有强烈进攻性和排它性的宗教，因此也导致了至今未了的宗教冲突。只有自己的是正宗，其它都是迷信或邪教，要彻底摧毁（在《圣经》上类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恐怖字句多处）。正是基督教的这一特点，导致历史上一系列对人类其它文明的摧残甚至毁灭。如，古罗马帝国对埃及图书馆藏书的彻底销毁，切断了埃及文明的延续’；西班牙登陆中南美洲后对当地异教徒的屠杀和对书籍的焚毁，使得中南美洲的灿烂文明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人类文明的永久伤疤。在人类文明的几大源流中，已有两大源流被基督教所切断。

也正因为如此，当今基督教传播虽然已没有了过去的血腥，但引起宗教冲突的根源是值得留意的。笔者对此产生高度警偈是由以下事件引起的：

笔者的伯母加入教会之后，请教会人员到家里“清理门户”。结果，所有与基督教信仰相冲突的祭拜物品全被抛弃，包括祖宗牌位、香台、灶王爷像等；春节等节日也不再摆贡品，门神也不贴了。这引起了家人的极大不满，允其是高龄的伯伯对不拜祖先很是恼火，节日的情趣也荡然无存。伯伯后来一病不起。他儿子气愤地讲：“宣传‘在主’（即：信主）的人什么时候能死光啊！”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这个小家庭里变成了现实。至于当初她和笔者的奶奶是如何被基督教吸引进去的，说来可笑，和法轮功的宣传手法类似；就连当地的小孩都学会唱“在了主，不生病，不受苦，不打针，不吃药……。”这没法不让高龄的妇女着迷。这些从没读过书的人，总算学会了一个字——“十”。

后来在海外参加的一些基督教活动，教徒们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自身宗教的优越感，这没什么，但也都表露诸如“佛教、道教搞迷信”之类的语言。很显然，基督教的这种传播方式和对其它宗教的态度，与过去对埃及和美洲文明的摧残相比，具有不同的程度，但有相同的性质。

因此，基督教广布华夏带给人们精神充实的同时，如果也为国家、人群、家庭带来文化的冲突和打雕，中国的民俗文化因此而被“清理门户”，那么，基督教对中国的登陆就未免有些敌意了。毕竟，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没有基督教的哺育，耶和华神的眷顾，炎黄子孙们生活得很好，甚至避开了西方和中东两千多年来绵延不断的宗教战争和思想压迫。就让他们的后代死后都去地

狱吧，中国的列祖列宗因不信上帝和耶酥都去了地狱，他们的子孙理应到地狱陪伴在侧，干吗非要去天堂享福？他们在现世能不因为信仰而吵架已经不错了。

从宗教宽容性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排它性较强。佛教从来不谈其它宗教的长短，不论对谁皆以慈悲之心待之，大乘佛教更“高尚”到要普渡众生。相对来说，基督教只“渡”信上帝之人，而不信者皆被打入地狱，不论他是否象雷峰一样勤于助人，乐善好施；这还不罢休，最后还要末日审判；至于信上帝者，即使犯十恶不赦之罪，也有进天堂的机会，这多少降低了基督教的社会教化作用，甚至道德形象；因此在过去两千年间，西方基督教国家之间和对外域的残酷侵略就不令人奇怪了。道教更宽容得彻底，在新加坡的道教场所，甚至摆放着专门介绍孔子和耶酥的小册子。道家追求反朴归真，回归自然，与儒家的礼教思想有些对立，老子更不客气：“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令孔子的门徒可能不太舒服；但正是宽容精神的广泛存在，使得文化百家和各宗教流派能在中国大地上和平共处。很难想象，如果先知穆罕默德嘲笑讽刺耶酥，这两大教派之间的冲突将更加严重。由于耶酥为犹太人所害，苻一下基督教徒两千年来对犹太民族的态度就明白了。

因此，基督教的上述问题如何面对，基督教如何传播和发展，是基督徒、文化界和中国政府应认真对待的课题。当然，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基督教会本身，如果中国政府不强力规范的话。政府被迫出面，显然是最糟的处理方式。

任何一位基督徒读到这儿都不应怀疑，笔者对基督教没有任何的偏见或恶意。佛教传入中国对丰富中国文化和教化人民发抓了重要作用，同样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没有理由受到中国的

刻意排捞。如果它能像佛教一样完全溶入中国大地并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这肯定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另一个发现使笔者保持对基督教在中国傅播的高度热情：在老家虽然发生了上述伯母家不愉快的事，但大部分信徒在加入教会后都有明显的改变，甚至一些性格怪异、自私自利的农夫，在加入后变得乐于助人，懂得忍让，笔者每次回家都会劝一些经常吵架的小夫妻加入教会（当地缺乏有组织的佛教团体）。基督教的强大教化功能是笔者看重的，本书对基督教的严苛剖析，只希望它能变得更加完善，为满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提供一多样的选择，做出更好的贡献。

关键是，基督徒们是否为此做好准备，还是准备在中国对其它信仰和民俗文化赶尽杀绝？笔者出于对中国人信仰的选择，和基督教在中国与其它文化的“和平共处，特向一些博学的宗教人士请教：“《圣经》是否可以做些改写，没有任何错误，因为那是上帝的活动和谈话的记录”“基督教可否象佛教那样不否定（当然不须肯定）其它信仰？”“对中国人来说拜祖先是传统民族文化和道德的一部分，贴门神虽有鬼神传说的背景。但隼竟是民族文化一部分，对此基督教可否持宽容态度，甚至自己家过春节时也贴上神以渲染节日气氛？”、“基督徒甚至反对祭孔，是否有点忘本的嫌疑？”……。

如果基督教会不能很好地处理上述问题，文明的冲突，以及自身信仰和教育背景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结识的一位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的神学博士，对上述问题的答复是：“《圣经》不可改，没有任何错误，因为那是上帝的活动和谈话的记录“，“世界只有唯一真神, 其它宗教什么都拜, 确实是错的”，“信上帝就不能再拜祖先、孔子和其它”……

后来从其它基督徒得知，这种说法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答案。至于《圣经》不可改，以下内容至今没人给出合理解释 [1]

例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开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处混沌，渊黑暗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因起初地是混沌状腹从后面的段落中可以看出，此时“天”还没有产生，空气和水还没有分开（后面的第六段为道：“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形成了。神将空气为天’”），因此，在起初不可能有水面的存在。只有在有了“空气’后，水面才可能产生，“地”不再“混沌”。

例二，《就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 26 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指的耶和华和谁？得到的解释是：三位一体，“我们包括耶和华和圣子耶酥和圣灵；虽然这不符合上帝的习惯,因上帝创造宇宙不需要和儿子及“圣灵”商量；这个解权当通过。那么，亚当是照着神的模样造的，可夏娃呢？由于男女身体差别很大，而耶酥也是男的（是圣子不是圣女）,因此，夏娃没有原形。“三位一体”的解释同样值得怀疑，在很难再找到耶和华用“我们‘，是否上帝还有位夫人，如果是这样,夏娃的模型就找到了；不过是和中国的“老天爷、老天奶奶”有点巧合。再者，没有“上帝夫人”，何来圣子？当然，如果创造万物的还有位“夫人”，“唯一神”的说法就多少有些问题了。到时候可以将“三位一体”修改焉“四位一体,以作辅正。

[1]请基督徒者谅解，笔者无意挑战基督教，而是读书时的坏习惯，那就是对任何书都挑毛病，当然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这确保了本人是个很好的读书人，但对信仰宗教和共产党的政学习治点不可救药，这本一反中共和学习界普遍认识而写的书，就是笔者一惯独立思维方式的发现 o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中，叙述夏娃和亚当生该隐（人史上第三个人），再生亚伯（人类史上第四倘人）；后来该隐般了亚伯。上帝要流放该隐, 该隐对上帝说：″……我必须有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从这一段很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世界除了亚当和夏娃这一家子，肯定还有别的人，而且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随处都可能有人，这些人从何而来？ 《圣经》中对家族的世代传人都有不厌其烦的交代，

“唯一神”的说法就多少有些问题了。到时候可以将“三位一体”修改为“四位一体”，以作补正。

例三，《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中，叙述夏娃和亚当生该隠（人类历史上第三个人），再生亚伯（人类历史上第四个人）；后来该隐杀了亚伯。上帝要流放该隐，该隠对上帝说：“……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隠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隠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从这一段很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世界除了亚当和夏娃这一家子，肯定还有别的人，而且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随处都可能有人，这些人从何而来？《圣经》中对家族的世代传人都有不厌其烦的交代，而创世纪初期，如果这些人还是亚当、夏娃所生而不做任何交代，是奇怪的。该章中提到该隠和亚伯时，反复用到“兄弟”，如果那些人也是亚当、夏娃所生，理应用“兄弟”，而不是″人”来称呼。

至于“诺亚方舟”，宗教界和考古学者相信，当时的那场大水是发生在五千年前的幼法拉底河洪水，可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生活的好好的。除了诺亚一家，还有东方大地上的这群已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群生存

下来。当然，基督徒全部否定同位素年代测定法。因为这个太致命了。中国大地上拥有高度文明的考古发掘已经到一万年前。

让我们接着分析《圣经〉〉有错的可能性：

基督徒们相信，《圣经〉〉是上帝说的话或活动，通过信徒的手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信徒是人不是神，而人总会犯错误。在信徒记录上帝的话时，有两个犯错的机会：一是耳朵没听清楚，或没记准；另一个犯错的机会是记录的时候写错字。很显然，这两个环节出错并不奇怪，这不是上帝的过错，而错在人为。

另一个对原意的扭曲是翻译的过程。《圣经》最先由希伯莱文写成，后翻译到希腊文，再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和中文等语言，而语言翻译的过程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保持原意，尤其是这种宗教或伦理方面的书籍，并不象科技、经济类著作那么容易翻译。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对受英文教育的华人能否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优秀的价值观没有把握，曾问哈佛大学的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教授:如果不会中文而通过翻译，可否准确掌握儒家思想?杜维明教授回答：不可能。很显然，这是杜教授在美国多年研究教学经验的心得。这巩固了李光耀在推动新加坡华人学习中文方面的决心。当然，这与儒家思想的世界性并不相矛盾，只是存在一个认识“度”的区别。如“仁”字的字意，中国人可以意会，但不易描述。要找一个能准确反映原意的英文单词和它对应，根本不可能，就“仁者爱人”和“杀身成仁”中的两个“仁”，足以令最傲慢的翻译大师伤透脑筋。

不会中文的华人（他们好歹还会些广东话或福建话，词句结构基本相似，且价值观在家庭环境里已有所学习），在只经过一次翻译的情况下，尚且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祖先文化的内涵，何况《圣经》经过了两次且时间跨度巨大的语言转译。其中词汇的应用和经意的扭曲是不可能避免的。

而如果在《圣经》里有人为过错的话，虽道也不可以修改吗？

如果写和翻译《圣经》的人不会出错，这实际上是在神化人的能力，

和对上帝真神的间接亵渎。如果《圣经》是可以修改的，也应该是可以修改的，那么其它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可能。过际上，《圣经》中文版出现过多个版本，目前流传较广的有两个晖本，当然两个版本不少文字是不一样的。请所有超级顽固的神学士和所谓“《圣经》不可改”的堪督徒们告诉我：这两个版本哪个是错的？如果该书一个字不能改，那这两个版本肯定有一个翻译是错的！如果都对，那如何解释两个版本那些不一样的文字？

上面提到中外基督徒之问明显差异的存在，概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当听到基督徒对祭孔的非议时，笔者甚为难平。在推动教育平民化，强调读书的教化作用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或先哲像儒家思想和孔子那样的重视。这也直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和发展。

我曾问一位执着向我传教的华人基督徒朋友：一个欧洲基督徒及一位华人非基督徒，您和他们谁的价值观更接近？她可能意识到问题的陷阱，咬紧牙关说和那个欧洲基督徒更接近。我又问：世界上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新加坡到处是菲律宾女佣，您是否觉得和她们最接近？我看到她略显尴尬而微红的脸。这个故事其实道出了一个华人信基督教的根本原因：发达的欧美白人所体现出的文明，和他们在教堂宗教活动的优雅，以及华人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但这些是欧美物质文明和科技发达的结果，衣食足而知礼仪，而从俄塞俄比亚和菲律宾可以看出，这不是基督教传播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是在长期的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成长的，因此而对基督教有亲近感，但这不是这个宗教的本质特征。华人不能因为信基督教而对自己祖先减少半点感恩敬重。

实际上，通过笔者长期对教会的考察发现，华人基督徒有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不懂得感恩民族先贤，将一切美好的都归功于耶稣，存在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他们对自身文化知之甚少。更有甚者，华人基督

徒把犹太人看作上帝特选子民，普遍把犹太人看得高人一等，自觉成为精神上的二等人。笔者最后一次参加

四海，乘风破浪，布威于天下；郑和及其将士们的胸怀，岂是当今凡俗信徒可比？面对后生这突如其来的香火祭拜，定会大赞曰：

“后生可教，故国当兴矣！”

那么，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宗教和文化传播方面，是否有值得参考的成就呢？

有，那就是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李洪志以高中文化程度，并不精彩的语言，和拼凑的《转法轮》一书，能在十年的短时间内，在大江南北，全球各地吸引上千万的学徒，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博士硕士、著名医院院长、共産戴的领导干部，仅用中国现在的信仰真空来解释是不够的。无论如何，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在中国的宗教传播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笔者本人出于对所有能影响多数人的文化或宗教的强烈好奇，认真阅读了《转法轮》一书，参加了七个晚上的学习班，以学习李洪志广州教功的录像。对于习惯了国内政治学习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个负担。当然，也参与了一些练功活动。《转法轮》一书，基本上是将佛、道、民间宗教和神鬼传说集合在一起，对于读书喜欢挑刺的笔者来说，该书的漏洞就不说了。李洪志的讲“法”，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但是，李洪志相当高明地将本章所提的宗教基本结构，劝人向善、好处、报应等，完全地包括进去，这就构成了一门宗教的基本架构。由于他开始打着“弘扬佛法”的旗号，又有不少佛教的内容，而大多数人对佛法实际上又知之甚少，因此，法轮功的吸引力也就在所难免了。毕竟中国佛教界从来没•采取过这样近距离的方式，生活化的语言来传播佛学（李洪志的演讲虽然不动听，但比共産党那种空洞乏味的自言自语更



吸引人）。而佛门中人惯用的玄妙佛语，对弘扬佛法没有任何的用处，只是少败人梦呓的专利。

正因为法轮功的完善宗教结构和佛教幡旗，对所有参与的人构成了行为上的规范和制约，这就不难理解，在法轮功的练功场所，当学员离开时，都能将自己坐的报纸等物清扫干净，宗教教化的效果也就显现出来。

而将宗教传播和练功强体一起“推销”，则增加了额外的吸引力，也成了他的一项独到发明。

但李洪志毕竟不是佛门中人，当学徒越来越多，他自己也飘飘然起来，“一个俗人”的本质逐渐表现出来，不甘于一代“高僧”的成就，要把自己塑造成新一代“佛祖”。从他广州教功的后段内容中已表现出来。一直穿着西装似乎有塾不像，又做了一件袈裟披上，却留着长头髮不舍得剪掉。更要命的是，开始自不量力地对抗起世俗政权，焉有不败之理？当然，李洪志在中国的失败是早晚的事，因他自己还远没有修炼成佛，但又误以为成佛。

笔者虽然对李洪志后期的演讲和《转法轮》一书的内容不敢苟同，但笔者在海外参加法轮功活动时，无意揭示其中的诡异，因为看到法轮功学徒能积极向善，中国民众在世风日下的时代，总算有了一个可以依赖的精神凭籍；对于忧国忧民的笔者来说，曾寄予过希望；毕竟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宗教。只希望李洪志能逐渐完善他的“学说”，把自己真正放到弘扬佛法的正确位置真能如此，那么，李洪志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亚于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马丁•路德。

很遗憾，也很痛心，俗人毕竟是俗人。

法轮功已被中国政府打倒，但他的传播方式肯定有值得中国政府、文化界、教育界和宗教界注意的内容。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不能简单地一“批”了之。如果中国政府能在推动世俗文化教育、宗教界能在宗教信仰传播方面，学习李洪志的经验，那么中国人民的精神依归也就可以期许了。

如果中国宗教界能在宗教传播的角度上，稍微向世俗方向倾斜（法轮功如果专心于佛教传播的话，将是个宗教世俗路线的成功案例），将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教化效果，虽然这面临操作的问题。而宗教界本身也能保持进退自如的空间。在这方面，佛教和道教不存在太大技术问题，但对基督教来说则是个不小的挑战。如果不慎与世俗文化的唯物色彩和科学精神産生强烈对抗，宗教传播的负面效果也就在所难免了。自新文化运动引入科学精神以来，中国的发展大受其益，对科学的倡导始终应是中国社会的最强音，宗教界不应该抱任何的雄心壮志，来挑战甚至颠覆科学的意义。尤其对于基层民众整体教育层次不高的中国大陆，这一点尤其值得宗教界的重视。中国政府可考虑立法规定：任何宗教不得劝导、接受 20 岁以下的中国人加入该宗教，或参与宗教仪式；对于回教家庭的孩子，在 20 岁之前，其父母不得强制孩子参加回教仪式；严禁宗教进入大学，等。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都将，也应该保持强大的世俗文化的主体地位。



北京城墙的残迹

第九章城墙残垣的哀怨[37]

1998 年，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西安以大唐的礼仪来迎接远来的贵宾时，摄像机将那世界独有、隆重而典雅的入城式传遍全球。那时最感失落的要数北京人了，因北京的城墙已被拆除。

不少北京市民立即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将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埋怨了一番。

北京，千年的国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垣和都市规划。您只要想一下紫禁城太和殿的龙床正好位于北京城的中心点上，就能感受北京城市设计师们的匠心独运。任何人，不论是明朝的昏君，还是清朝的明主，只需往这个点上一坐，帝国中央政权君临天下的威仪，立刻显现出来。

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廓，也是最能体现中国大一统文化的都城。然而，当我们迎接民族新生和复兴的时候，它的厄运也将随之来临。

[37]本章大部分文字没有做调整，虽然第一版出版后的这十多年，蒞城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但并不是说该书内容已经不合时宜，曾经的荒谬也是历史一部分，而荒谬还不断发生，比如，过去十多年金融街规划和建设，就是城墙被毁之后北京城市建设史上最荒谬的行为（第二版加入）。要完全杜绝这种荒谬，前途漫漫！



孤零零的前门箭楼在昭示着北京城曾经的辉煌

一、古都的困惑

1948 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身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托人请清华大学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一张军事地图上标明北京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为的是万一和谈失败，解放军被迫攻城时，能够保护好城内外千百年留存的文化遗産。

就是这些曾在战火之中竭力保护的古建筑，却在和平时期的城市建设中被毁掉了。1950 年代，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另辟西郊行政中心区的方案。按照他们的设想，古代文物建筑集中的北京城，应该成为“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环绕北京的城墙应该尽可能保留，并改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但这一建议被拒绝，理由是梁思成的建议不切实际，建新行政中心超越国家财力。

1951 年，政务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拨款 15 亿（法币）修缮城楼专款，这笔钱修缮了城墙和后来被拆除的东直门、安定门、阜成门等六座门楼及箭楼。1953 年开始，拱卫北京数百年的古城墙开始被拆除，到 60 年代北京考虑建造地铁而将城墙连根挖掉，消失在故都的地平线上，只有那几座孤零零的门楼和角楼，还在昭示着北京城曾经有过的高贵、气派和风华。

梁思成抱城砖痛哭，不仅是在哭城墙的死去，更是在哭一座充满城市规划最高智慧的帝都的消失，及一系列中国古城行将来

临的厄运。

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憧憬：不久的将来，前门一带将布满了烟囱[38]。笔者完全能理解毛泽东一代领袖们对国家工业化的期盼心情。但对城市建设的盲目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拆除城墙，不论是否毛泽东的主意，他没能加以阻止而不能逃脱领导责任。笔者对此曾长期不得其解：解放北京之前尽力避免战争对它造成伤害，和平时期为什么容不下一座城墙？[39]

在对毛泽东及其一代领导人批评之前，有必要作点稍微深入的思考，毕竟，毛泽东的智慧和文化素养并不比你我差。

城墙不同于故宫等名胜古迹，在五十年代的很多人的心目中，

---

[38]第二版加注：毛澤東的這段話，我沒有找到原始出處。這是 1980 年代談論北京城墻話題時，媒體上常引用的。1950 年代初期，政府對城墻的處理原則是：外城因城墻質量差，原則拆除，內城（即現在二環路所在位 S)建築質量高，城門樓宏偉，予以保留。毛澤東的暢想其貿與城墻沒關係，前門一代屬于外城。只是與城市規劃理念有衝突，算不上多大問題。這褒維持第一版時的陳述。

[39]第二版加注：關于拆除北京城墻的領導責任,筆者找不到官方資料。目前找到明確提及此話題的正式出版物是 2016 年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城：我與北京的八十年》，作者孔慶普，曾任北京市政工程處總工程師，參與 1950 年代的城墻修復和後來的拆除。該書第 123 頁有如下描述：最後張友漁（時任北京副市長）同志說，有一件事情向大家下點毛毛雨，少奇同志說，北京要建設成为一座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妨礙建設的建築物，城門和跨于街道上的牌樓、門樓都要拆除。該書第 151 頁有如下描述（時間是 1956 年 6 月 16 日）：大家對拆除一座好端端的、才修繕四年半的城樓很不理解，鏝得十分惋惜。大家議論說，劉少奇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看來劉少奇是要把北京城一掃光啊！難道總理和毛主席也都同意？單士元說，據說彭真曾找過毛主席，主席說"我分工管黨內事，政府的事少奇同志分管” 。該頁最後兩段有"拆除城門是劉少奇下的命令，彭真同志并不同意拆除城門。趙鵬飛說，五百多年歷史的北京城竟然毀在劉少奇手褒！"

以上內容为孔慶普回憶內容，只供參考。準確的答案唯有等政府的檔案公開。

城墙很难被列入文物的范畴，万里长城除外。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有城必有墙，是处处可见的城市防御工事。就连家乡的小县城也曾有一圈城墙环绕，为刘、邓大军攻城带来不少的麻烦。由于清朝较少修城墙，留下来的城墙大多是明朝建造的。在北京拆除城墙时，除著名建筑大师如梁思成等，反对的声音非常弱。而普通的百姓和知识分子没人看出拆除城墙的错误，或保留城墙的意义。这本身才是中国后来一系列古城、古建筑被毁的真正根源，也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之一。

而这种悲哀的细菌至今在华夏大地肆虐。这也是本书涉及这一话题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笔者于 1990 年曾在北京的亲戚家小住数日，和那位身为满清贵族遗少的姨夫聊起北京城的变迁。他对拆除城墙的看法是：一座破墙，留着何用，且影响交通；改成现在的二环路多好！

1984 年笔者上大学时，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憧憬北京光明前途的文章。文章详细描绘了未来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北京的远景：北京将是摩天大楼林立的大都会，而故宫和天安门广场将成为北京的“盆地”……。杂志的编辑看来为这篇文章描绘的景象所陶醉，甚至在该文的最后加了一幅手绘插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故宫周围、人民大会堂及历史博物馆的后面，是清一色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只能从摩天大楼之间的空隙中，才能部分看到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笔者能记住这篇文章和插图的细节，概因该文描述的景象给笔者留下实在太深的印象；笔者曾幻想：我伟大祖国的未来能真的变成这样，那该多好！

今天看来，在热情和美丽的幻想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性愚昧和无知。

在 1984 年的舆论环境下，能在数环有限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决非一般书生，杂志的编辑也必然代表主流或官方。但除了极少数的建筑大师，哪个中国人敢说自己未曾在这方面无知过？下面的例子将会使您发现，这种无

知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并曾经或将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时间已到了公元 1989 年，中国人已多进步了三十多年，在天安门广场西部不远处的宣武门一带，一座高耸入云的大楼拔地而起，这座大楼的主人是人才荟萃的新华社。没人敢说新华社的人没有学问，新华社里也没人对自己办公的这座大植是否唐突而发出疑问。

这还不算太过分，尤其荒唐的是，在天安门和王府井之间，除 70 年代建的那个什北京城市建设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北京饭店新楼，到了九十年代又冒出一座十层高，可俯视紫禁城的大槌，它既不是高雅的文化殿堂（如果不算在里面附庸风雅的话），也不是什么政府机关，而是一家灯红酒绿的俱乐部。该大楼的主人在其推介的资料里甚至骄傲而厚颜无耻地提到“可俯视紫禁城”。请相信，笔者绝对不是因为自己没钱弄它张会员证而和它过不去。

和北京城市在最近二十年逃受的摧残比起来，上述几座大楼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北京除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她还不满足，在发展成那么多“中心”的过程中，已使这座故都重荷难负。如果说巴黎和东京因国家地狭人稠而不得不建成功能多样化的大都会的话，那么对于地域辽阔的中国来说，北京的城市功能如此多样，且集中了中国和华北的那么多“中心”，则是难于理解的，也是不明智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更显愚锰了。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没有太多钱来糟蹋



这座古城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北京的官员们已有足够的资本来拿这座城市随意地挥洒。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显然没有悟透北京城市发展的合理目标，及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合理规刺；他们更发挥了庄家和暴发户的″蛮劲”来对待这座独特的都市；用中央的财政支持，加上他们的魄力和有力的大手，在北京中心城区拍板了一条条大道，一座座高楼。市中心的容积率越来越高，人流和物流也越来越大。他们似乎远没过瘾，又在本来应该有一份宁静肃穆气氛的天安们广场地区，人民大会堂的背后，建一座将带来巨大人流，且奇形怪状的蛋形歌剧院，似乎在以此来证明领袖们对艺术的重视和鉴赏能力。殊不知，这根本就是对文化和尊贵的亵渎和骚扰。

有时真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将他们无与伦比的魄力能分一些用来反贪，该有多好！

如果他们对文化和艺术真懂,或一点也不怖而只好给专家更大发言权,也肯定比知之皮毛，却因拥有重权而忘乎所以来得强！

就连故宫这样的场所，也驻进了一家美国咖啡连锁店。如果故宫管理人员真想设立个游客能够休息而自己又能赚钱的场所，也该设个明清仿古茶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咖啡馆的背后要么有一群盖章的笨蛋，要么有人受贿。很难想象法国人会同意在梵尔赛宫开设一家麦当劳！

到陈希同时代，他似乎有所醒悟，对“大盖帽”突然情有独锺，不小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大大小小的楼房上都不忘加至少一个中式屋顶。以至于游客见到一座古建筑时怀疑它是否真的那么古老。如果您有机会站在复兴门立交桥南望，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楼（国家经贸委大楼），上而至少有五个“小盖帽”，

既破坏了大楼的现代气息，也没能体现出“大盖帽”的气势，更象是在一座现代化大厦屋顶上，奇怪地长了几个蘑菇。

笔者每次回家都要经过北京西客站。这是在领导钟情大屋顶的非常时期建设的非常建筑。在这京九回归线的起点，这座现代化的建筑顶上，加了一个毫无用途、耗资八千万元的中式阁楼。它没有任何的创意，也缺少其它建筑组件的合理衬托，只能孤零零地架在空中，空着个巨大的肚子，吐纳着五湖四海的人群。如果建筑师和领导人真的希望将中式风格熔入现代建筑当中，这本身没什么不对，那正门两侧伸出的两个巨大而毫无实际用途的钢铁桁架结构又意味着什么哪？这种有趣的后现代风格和那中式屋顶放在一起，更显得滑稽和格格不入。从这座庞大的建筑物上，能强烈感觉到中国建筑师们在传统和现代、长官意志和个人创意之间的苦苦挣扎。

笔者并不反对偶尔建设个古色古香的建筑,象民族文化宫等民族风格的建筑一样美伦美幻。更无意否定不同风格的相互融合，但对基于“领导喜欢”而随意堆砌，则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最近几年，北京新建了不少的大楼，设计日益多姿多彩。位于复兴门内大街的北京国际金融大厦(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大楼)，现代风格的建筑物上却用了极为简明的中式窗户，形成完美亮丽的结合。笔者丝毫也不怀疑，中国建筑师们只要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一定能为城市建起一道道动人的风景钱。但这建基于中国建筑学界整体人文素养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审美意识的升华。

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房地産和商业的发展为北京的历史遗産构成新的威胁和摧残。由清华大学著名建筑大师吴良墉教授主导设计的“菊儿胡同”，作为四合院改造的成功典范，它的示范作用显然难于吸引房地産发展商的注意和兴趣。当然，即使是“示范”，也不应该让所有的四合院都走这样的模式，必须将大量四合院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北京的故宫及皇家园林、四合院及胡同，构成了皇家显贵和平民生活的历史文化见证。今日，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正在商品经济和短见政客的操作下加速消失。法国《费加罗报》这样评惯中国拆

除胡同的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住这场文化自杀，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

笔者在游览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后，更坚定地认为四合院和胡同必须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这一信念；无论是欧洲城市的古老街区，南洋一带传统建筑（古老的不过百年），虽然看上去破旧不堪，但一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则从这种破旧中散发出来。如果和欧洲及南洋一带的传统民居建筑比起来，无论就历史悠久，还是文化内涵方面，北京的四合院、江南水乡的民居、上海的部分石库房，各地的少数民族建筑，有着更浓郁的文化内涵。常年生活在这些破烂房子里的中国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中国城市管理人员的审美水平，和喜欢看城市大楼的那些首次进城的农民处于同一个欣水平上。

北京在拆除和改造四合院和胡同时有条理由，那就是汽车开不进去胡同。在欧洲城市鼓励用自行车的今天，中国的达官贵人却让历史为自己的汽车让路（不知是否因为中国人穷得太久，现在稍微有点钱就立即照抄西方的生活方式，而西方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对自然和传统的回归，则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如果说拆除城墙是因为它防碍公共交通还不涉及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上述拆除四合院的理由则未免有点卑鄙和自私了。如果中国的官员真想住四合院的话，就请你们贪污或浪费点公款，至 ij 近郊造些钢筋混凝土的四合院吧！如果嫌偏远，就再挪用点公款给你们家的大人孩子和宠物各配辆轿车，只要你能不糟蹋

老祖宗的这点遗產就行！挥霍光国库里的钱，人民还能再挣；可毁掉这些历史的财富，我们的子孙有再多的钱，也无法买到一睹其芳容的门票。

无耻的强盗总比没有教养的败家子稍微可爱一点。

北京市领导们最喜欢谈论的是金融区、中央商业区、中国硅谷等，似乎谁都忽略了这儿曾经是集千年荣耀于一身的一代历史文化名城。除了故宫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余的一切都不再赚得人们的关注和爱惜。在世界上，像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除了罗马、开罗、雅典等，实在太罕见了。

北京，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贵夫人，经她无知儿女的浓装艷抹和胡乱穿戴，已变成一个饱俗的老太太。

北京市政府的这辩疯子还不善罢罢休，一个显然缺少基本人文素养的建筑师 不知是出于哗众取宠，还是投领导所好，或为了个人的前途，提出了一个在亚运村建设亚洲第一高楼（双塔）的"宏伟”设想，任何一个对北京城市发展稍微有点认识的人必然对此嗤之以毋，然而却令北京市领导们和媒体雀跃不 已，甚至将大幅模型图像悬挂在亚运村的交通路口，印在申办奥运的资料里，不论多少人抗议也一概不理。北京始终有和上海竞争的意识，既然上海有了金茂大似，北京当然也要赶上。北京人见到上海姑娘穿了条超短裙，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华贵旗袍剪至大腿根部。

直到 9?11 事件的发生，北京才决定放弃这一自命不凡而又荒谬透顶的构想。如果它真的被建成的话，就象在那个已经艷俗不堪的老太太的嘴里，又放了一根恼人的雪茄。

北京市政府当然不会放弃建高楼的执着，因为他们的审美水平和个人素养基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要他们理解“高槌并不等同于现代化”是困难的。而中央政府显然缺乏足够的远见和魄力来阻止北京市的胡作非为，只要看一下北京对那么多“中心”的热衷，就不难发现中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领导过失。在炒卖“中央商业区”概念时，北京市政府又准备在三环路与二环路之间，国贸中心对面建一座 300 米高的"标志性大楼”（国贸大厦 A 座），它不远处就是古观象台和古城墙东便门角楼。北京这样一个遍布辉煌历史建

筑的故都，今天居然需要固卖弄风骚的现代高楼作标志，实在荒唐得很。如果巴黎的标志建筑不再是埃菲尔铁塔、罗马不再是古角斗场、伦敦不再是泰晤士河塔桥、雅典不再是巴特农神庙，而都改以现代摩天楼作为标志，那么，人类回归野蛮时代为期不远矣。这座高楼建成之日，天安门城楼会为之哭泣：满负历史沧桑的高贵和荣耀，居然不敌一个靠卖身为生的写字楼。

固然，旧城保护和改造是个世界性难题，但很少有像北京这样文化荟萃的故都，具有不难确定的发展方向。可是，当我们从五十年代至今多进化了五十年，还在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制造更多的悲剧时，我们有什么资格对北京城墙的被毁而指责他人？！

在看《雍正皇朝》的时候，其中九门提督的角色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不过是把守北京九个城门的领兵首领，却能在宫廷的斗争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而成为炙手可热的要角。如果放在今天，此人一定能成为国防部长的当然人选。这令笔者忽发奇想：当年毛泽東拆除北京城墙，是否基于这方面的顾虑？深研历史的毛泽东，对九门提督及历史上的相关事件，应有所了解；他是否担心：北京城墙的存在将为共和国政权的稳定和生存制造某些不确定因素？很显然，只要封锁北京的几座城门，并阻止直升飞机的进出

（这并不难），并切断电力和通讯（这同样不难），中央政权将立即面临倾锻的危险。

当然，这仅仅是个永远无法被证实的联想。

也许，定都北京本身就是个错误。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读点书，使自己有点修养，并穿戴整齐的时候，就贸然闯入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博物馆，并将里面的″旧铜烂铁” 随意处置。

今曰北京的发展方向如不立即改道，中国政府早晚都要考虑迁都的必要性*。否则，北京市政府一定会利用首都的优势，继续更多不明智的行为。当年美国人设计燕京大学时，梁思成设计清华一至四号楼时，贝聿铭设计香山饭店时，他们小心地选择建筑风格和高度，但今日的这些三流工程师将继给

随意而自信地挥洒他们的庸俗。

工商业和政治集中在同一座城市里，本身就是极其不理智的，这必将导致首都工商业内部竞争的不公平性，和首都与其它地区竞争的明显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政府拥有巨大不受监督权力和掌握大部分国家资源分配权的情况下，这类商业竞争的不公平将更加严重。而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健康市场经济的基础之所在 1。

1 第二版加注：2003 年笔者所作的判断，随着北京市政府迁往通州，雄安新区规划，以及北京去非首都功能的启动，已经得到证实。笔者无法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得意，更多的是一种悲哀。雄安，是否在战略定位和规划上能够真正高瞻远嘱，经得起千年的考验呢？但愿吧！城市规划必须战略研究先行与支持，但战略研究根本就不是任何名牌大学可以培养的专业，是需要一群高资质个体组成的团队，及广博和跨界的知识结构培养，才可能具有宏观把握的战略眼光。当代大学教育出来的这些“大师”们能胜任战略的策划吗？玄！

北京金融街规划和建设，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古城保护与合理规划的一次大破坏。[40]

当今天的北京市民为城墙被拆而惋惜时，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老北京的糟蹋，如果说过去的糟蹋方式只是一座墙，几座楼的乱来，那么和北京现代史上最夸张的糟蹋——金融街规划建设相比，都小巫见大巫了。笔者写此书第一版时，还以为北京这个古城不会再糟到哪里去了，万万没想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们居然进行了如此大规模而不可逆转的大破坏！天哪，他们真的疯了！

1993 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在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集中安排国家级银行总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北京金融街应运而生。金融街占地 1.18 平方公里，是北京城市六大功能区之一。2007 年 10 月北京市市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关于对金融街区域拓展和功能完善的意见》，提出要将金融街核心区从原规划的 1.18 平方公里拓展到 2.59 平方公里。至于北京规划该区的原始动因，是学习纽约华尔街，打造“中国的华尔街”的宏大抱负密不可分。

这个规划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有问题。

二环路和北京两条东西主干道本来已经拥挤不堪，下班高峰时成为大停车场，这标志着北京市中心的承载能力已经超越极限。因此，北京城不论如何规划，都不应该在二环路两侧规划大

型高容积率办公区，这将加剧本来就超载的中心区道路，严重削弱城市效率。

[40]关于北京金融街这部分为第二版新加内容。在第一版写作时，北京金融街刚刚启动不久，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所以没有触及。随着过去几年笔者在城市规划和战略及産业咨询行业的经验积累，以及去北京贸地看一下金融街后，开始意识到这个规划错误之严重。

如果北京非要搞个金融业集中区，也只能向东三环 CBD 的外围拓展，因为当今城市各业态中，纯粹的金融区在全世界都不存在，即使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华尔街、香港中环、新加坡莱佛士也不是纯粹金融区。华尔街金融街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但是，那衍领导和规划师们只懂城市规划，而缺乏產业业态特征的深度认识，铸造了北京金融街这一个怪胎。金融街事实上已经和 CBD 难以分割，两个大型办公区应是毗邻，或者金融集中区本来应该是 CBD 的延伸功能区，但北京东施效颦，硬是分割开来，中间隔着个本来就高度拥挤的二环内区域，即加重了北京的中心区负担，也弱化了两个大体量总部办公区之间的沟通。

好啦，北京市愿如何乱搞功能区规训，即使不请我做顾问，我根本没功夫生气；但你们万不该以拆除二环路内侧的大片四合院来搞，那些破四合院有我这个炎黄子孙的一份。在首都搞一个大型功能区空间布局错误已经够荒谬，现在却以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作为垫背。

金融街建筑以其高大体 4 对二环内的四合院社区造成压迫和天际线破坏。可以想象，过去在西二环的立交桥上行驶，一侧是繁荣的现代都矜，另一侧是宁静低矮树密、视野开阔的古老四合院城区，一条西二环隔开了古老和现代，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城市感受。但这种感受已经永久性地消失了，只有两侧的高楼大厦展示着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街道景观。整个泾渭分叨的二环路城市分割带总算被这帮短见的家伙彻底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北京市的这些精英们进化到对玻璃大楼已经不再觉得了不起时，他们才会发现，成片的古老四合院社区将是多么宝贵的财富，但那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就像北京城墙、

济南老火车站、中国无数的城墙和古宅等，只会在中国糟糕的古建和古城保护史上再添加几份遗憾而已。同时记录下的是背后那些政客和规划师们低劣的素养。



被誉为“从白令海峡至马六甲海峡”之间最漂亮的建筑（中间圆顶），今天被一群现 ft 高楼所包围。

二、上海风华的残影

中国的其它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

上海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上海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産物，除了周围的松江和原来的上海县，及徐家汇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徐光启之外，这个城市和周阅的小兄弟如杭州、苏州等比起来，似乎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历史。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上海在城市发展和规划方面，具有很少的历史包袱。果真如此吗？

就城市老城区的规划和发展来看，这个曾被几个流氓占山为王的城市，是中国领土上典型的“怪胎”。由于各租界各自为政，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城市整体规划，要找一条直一点的街道也不容易。和北京的道路比起来，上海完全可用“乱七八糟”来形容。正是在这些横七竖八的狭窄街道两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诞生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近代交通运输、近代通信、近代文化艺术的先驱，也培育了后来影鞸全中国的新生活方式。即将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发展的核心政治力量——中国共産党也在这里标上个红色的起点。它也曾是日本统治时期，韩国流亡



这样的穿插，感觉如何?

政府的临时首都，以及犹太人的二战历史记忆。

因此，如果忽略这些街道两侧灰蒙蒙的建筑里发生的历史，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轻视和亵渎。

上海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毕竟它是中国近代史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不论它身上曾经承载的血泪还是希望，都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海特殊的历史进程和曾经带有苦涩的辉煌岁月，也为上海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城市建筑。可以不夸张地说，在全球范围内，找不到第二个城市像上海这样，拥有几乎所有主要建筑流派的经典作品。上海是当之无愧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它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直到 1949 年彻底赶走了帝国主义，才抢回了这些用中国人民的血泪打造的建筑财富。我们抢的问心无愧。但我们是否能管理好呢？

很遗憾，我们没能管理好，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完全意识到上海老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1982 年笔者到上海读书时，上海中心城区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模样。尤其是外滩从延安东路到苏州河沿岸的精华区，不论建筑的风格还是建筑的质蜇都在展示着昔日的辉煌。后来笔者有机会游历南亚、欧陆和美国，在比较中才发现上海昔日的繁华和不同凡响。上海的建筑即使放在欧洲和美国的任何一座城市的中心区，也绝不逊色，至于南洋一带就更不可相比了。如新加坡，虽然曾是英国殖民地和海运及贸易枢纽，但新加坡在同一时期的建筑和上海比起来，更象是个屯子。

至于上海建筑风格的多样化，更令其它城市望尘莫及。仅从延安东路到苏州河沿岸的外滩一带，就有带拜占庭式屋顶的原汇丰银行大厦(后曾为上海市政府）、外滩地标的钟楻、带有别具一格绿色钻石屋顶的和平饭店北

楗、有中国民族风格屋顶的中银大垃、以及美国二、三十年代建筑风格的摩天大楼——上海大拟（原百老汇）和外白渡桥，组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城市天际线和标志建筑群。如果站在外白渡桥上，还可发现位于四川路上带有钟楼的邮政大楗。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外滩建筑群无疑奏出了最动人的旋律。

从联谊大厦建成至今，浦西精华区内大景毫无风格的高楼所形成的噪音，已搅乱了这难得一闻的雅乐，从今以后将再也无法听到。站在外滩，看到那么多金碧辉煌的高楗大似和新旧建筑的反差，上海市民无不为自己城市的日新月异而激动。但不久之后，等他们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角度，或者在海外周游一圈回来，他们将会为今日不当分泌的肾上腺素而后悔。曾令他们得意的“昔日和现代”在外滩的交融，将变成不伦不类的杂货铺。

从外滩沿南京东路、延安東路和苏州河往西，一直到人民广场、国际饭店和四川路的邮政大楗一带，如果进行饵城改造的话，在高度上应严格控制，向外延伸的地区应采取高度递增的方式。上海人口密度大，地价昂贵，多建高楼是正常的，但还没到无土地可发展的地步。上海市建委应对上海老城区进行彻底的普查，将浦西精华区和一些特色建筑的街道、地区及历史意义的建筑及周围街区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但很遗憾，他们显然是失职的。

直到今天，在大陆范围内一向最自信的上海市民恐怕很少认识到，他们熟悉的城市已经失去了一些最宝贵的内容。

本书引北京和上海为例，概因这两座城市有着中国最高的市民整体素质，和最强烈的自信。当北京人和上海人相互傲视对方的时候也许没有发现，他们谁也不比对方高明。



笔者于巴黎新凯旋门前(1997.9)

三、来自巴黎的眺望

当笔者在巴黎艾菲尔铁塔观光时，吃惊地发现不远处一座高耸的现代建筑蒙帕纳斯大垃，在全是传统建筑的巴黎市中心显得格外刺眼。后来特意留意了

相关的资料，发现巴黎市政府曾有过在市中心建设多座高层写字楼的计划，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办公需求。

但巴黎市民不干了，他们群起抗谦，最终逼迫政府放弃了原来的庞大计刺，而改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战西端郊区建设巴黎新区。

今曰的巴黎新区已经成为巴黎这类文化名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范例。尤其是那作为新区标志、和著名的巴黎凯旋门遥向对应的新凯旋门，更算得上是点睛之笔。在互不干扰的传统和现代之间，靠两座巨大的凯旋门遥相呼应。

至此，笔者不禁幻想，如果当年的北京也能接受梁思成的建议，在京西建新的行政中心的话，北京将变得格外迷人。但今天的北京及不少历史名城，已变成了一个嘈杂的兵营；而其城市建筑，更象是在博物馆的青铜器旁边，摆了个铜火锅销售概检。

巴黎能，为什么北京、上海不能呢？至少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首先，巴黎全体市民能认识到政府的错误，而北京、上海的市民为什么不能？固然，北京有过梁思成，但一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只有全民人文修养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负起责任。即使梁思成顾得了北京，也肯定顾不了全国。只要看一下当今中国大城市居民和年轻读书人的功利心态，就能明白今日国人的浮夸和浅薄，他们已没有兴趣作稍微有点深度的思考。

其次，从北京、上海到巴黎，似乎一再发出可悲的消息，那就是政府经常做些愚不可及的事；这很正常，公务员并非各领域的专家。问题是，政府官员是否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拥有了权力，你可以拥有荣誉、财富，甚至一切（对窃国大盗而言），但并不会使你自动拥有智慧、学识、眼界和品味。

巴黎市民的不满，能有效地传达到政府的耳朵里，并形成舆论压力。中国民众的意见，是否有可行渠道表达出来？即使表达出来，政府不听怎么办？

在最近几年，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正逐渐对城市建设有了较成熟的认识，如对人民大会堂后面的那个光蛋歌剧院，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强烈反对，但政府继续我行我素。拆毁定海古城的动议被披露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反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的许多专家一致发出了“刀下留城”的呐喊，要求立即停止拆迁。而舟山市的群众也自发行动起来，努力阻止拆毁古城，还愤然状告有关部门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新闻单位在报道古城蒙难的消息时也发出了强烈呼颢。这种上上下下为保卫古城奔走疾呼的情景，被当地百姓称为“第二次定海保卫战”。定海，历史上的炮声曾唤起国民觉醒的古城，却最终在短见、商业利益、愚昧和长官意志面前，难逃被毁的命运。当定海古城被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替代之后，定海将和别的城市没有两样，虽然新的定海城将会崛起，但文化的定海已经死了，因其“历史神韵”已经消失。[41]

---

[41]笔者 2013 年做産业规划项目时曾去定海，那褒虽然有点茵建筑的保留，但已经不具备一座古城的古建规模和氛围。事贸上，后来去漳州古城，有同样遗憾。全国范围来看，最近 30 年古城大破坏的损失，超越十个"文革"。

领导们看来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习惯把自己当成是个普通人。然而，在一片拍马屁的叫好声中，多数人都难于摆脱人类的本能弱点，指望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自我，似乎有点难为他们，他们将继给用糟糕的书法去污染大好河山，用空洞乏味的说教占据各类电波的黄金时段。要让他们清醒一点，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一个体制，当他们自以为是时，将碰得头破血流。到那时，他们才真正能够“深刻领会”舆论的力和自己的平凡。

固然，中国人口稠密，需要较多的发展用地，但是否一定要让历史为后人让路？清华大学的吴良镛院士说，“无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只把其当‘地皮’使用，无异于拿传世字画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废铜！”即使从人口密度来看，欧洲很多国家不比中国低，即使在古城之中也可以进行改造和保护中的开发。欧洲到处存在的宁静小城，它们的魅力正在于历史的色彩，它们同样没有阻碍生活在那儿的人们享受现代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虽然不是本之所在，但在过去和将来相当长时间内，将扮演重要角色。

在中国，当面对权力时，科学和文化的力量经常显得苍白乏力。这突显了中国在适向文化复兴的道路上，还有太多的“人性”障碍有待克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

但是，这不是说中国人只能选择宿命和回避。知识分子的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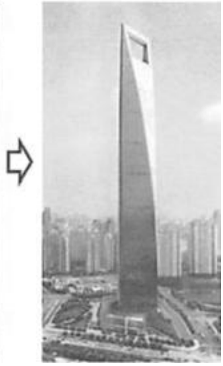
喊，不论政府是否理睬，发出这声呐喊本身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将唤醒亿万民众的智慧和思考。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什么是‘爱国主义’

一个空泛的概念，你要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首先就要爱你的家、爱你的城！你必须�得文化遗產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所產生的巨大凝聚力！”



1995 年公布浦东环球金融中心效果图



1995 年后半年上海市建委要求重新设计确定的设计效果图

1995 年，笔者从《文汇报》上看到一则简讯，谈及日本财团将在上海建设最高的建筑——环球金融中心。从模型可以看出，该大楼的上半部分有一个三角形切面，而三角形的上半部份有一个巨大的圆孔，成了该建筑的鲜明标志。当时笔者立即联想到：如果在该大圆孔里用红色灯光打亮，同时用白光照亮三角形切面，那么一个如假包换的日本国旗将悬挂在上海夜空的最高处。也许日本人并没有准备这么做，但笔者还是将自己的这一疑虑写信给清华大学土木系的刘西拉教授（给刘教授写信，只因听过他的一堂课，得知他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时将《毛泽东选集》列为参考文献，断定此人不俗）。刘教授很快回信，肯定了笔者的想法，并将信转交时任上海市建委主任（刘教授的同学）。一年多后得知，上海市建委已迫使日方改变了顶端圆孔的设计。

这件小事提醒我们，个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个体，对国家事务常有无力感。个人的精力和学识不足以应付中国所存在的一切问题。中国的事要靠全体中国人的努力。全民公民意识和素质的整体性提高，将从根本上避免以上各

种悲剧的重演，才能将“爱国主义”转化为切责的行动。

当笔者在拿破伦的家乡，站在巴黎艾菲尔铁塔最高处观景染

上不禁遥视东方，穿过万里云雾，似乎看到昆命的白雪、长城的残躯、草原的牧马。心中不禁自问：腾跃世界舞台几千年的东方雄狮，您何时才能完全苏醒？

可曾听到，梁思成抱城砖痛哭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将在北京城墙的残垣上空永远回荡，以唤 IW 更多的人们对先辈文明迫鹿的认识和珍视。他痛哭的泪水已浸湍大地，必将浇灌出文化复兴的遍地花朵。



新家（国画，1973）



视安长:工舰

第十章日本侵华与中共的胜利

“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就能消灭共産党”、“共産党保存实力不积极抗日”、“没有日本侵华，共産党不可能在内战中胜出”……，这是在台湾及反共华人当中极有市场的观点。即使在大陆和亲共尊毛人士当中，对这些说法也有桀种程度的认可。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团结抗敌、民族自救的重要事件。毫无疑问，在蒋介石领导下，国民党军队为打败日本的侵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不论其战争的战略战术运用是否得当，战役是否取胜，都不应影响任何一个中国人对国军将士的尊敬和纪念。他们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优秀儿女。

那么，那些在共産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系战士，和在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理论”指引下发动起来支持抗战的千万军民呢？如果忽略了他们的牺牲和贡献，同样是非常不应该的。和国军将士们一样，他们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样永远值得我们感激和纪念。

本章的目的就在于，在理性探讨毛泽东胜利必然性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相，还所有曾为民族独立浴血奋战的人们一个公道，充分肯定毛泽东领导下积极抗日的千万军民为民族独立所做的贡献。

毫无疑问，这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思想框架，也远远超越为毛

澤東個人、共產黨及其軍隊進行辯護本身。



一、沒有“西安事變” 蔣介石能消滅毛嗎？

这是个历史假设性的命题。对此，用证的方法显然是不可能得出答案的，因无法重演历史。但如果以历史的轨迹为基础，加上当时的实际状态，并配合严密的逻辑推理，应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是在科学和工程上常用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上同样适用。

先回顾一下国共两军交战的历史轨迹，尤其是共産党一方在毛泽东掌握领导权时期国共军队对抗的战绩。对于毛泽东被剥夺领导权时期的战役，也在此以时间顺序列出，以突出毛泽东的军事才能。

战例一：1930 年 10 月底始，10 万国军兵分八路，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喂”之术，在江西境内 500 公里战线上，自北向南，围剿 4 万红一方面军，兵力对比为 5:2。

战前双方状态：红三军团两次攻打长沙，红一军团参加第二次打长沙，刚回师苏区不久，又奉命打 AB 团错误导致内讧。国’ⁱK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敌于运动中”的作战方

针。

战役结果：国军失失利，国军第十八师 9000 余人被歼缴枪 9000 余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将军被俘后，经公审斩首。国军撤退过程中，其第十五师的一个多旅被歼，缴枪 2000 件。整个战役，国军损失 1.5 万人共军缴获武器共 1.2 万件，苏区得到众固和扩大，武器装备大为改善。毛泽东有词为证：《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 年春）：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战例二：1931 年 2 月，毛泽东上首词吟声未落，蒋介石即命何应钦为主帅，调 20 万国军，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策，兵分四路，围剿 3 万 5 千左右红一方面军，兵力对比 6:1。同时配合对红军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战前双方态势：此时红军尚未从上述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疲劳中恢复。

毛泽東则制定“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之作战方针应对。

战役结果：经半个月的战斗，国军失利。共军歼敌 3 万人，缴获武器 2 万余支，共军乘胜追喂，占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并用缴获武器组建红军独立第四、第五师。毛泽东为此赋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1931 年夏）：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抢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战例三：1931 年夏，蒋介石"御驾亲征”，携德、日、英国军事顾问（蒋公似乎身遍经常有外国军讲顾问，请这些外国人在孙子的家乡班门弄斧，似乎有点信心问题。毛泽东对“共産国际”的人则从不买帐），采“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之法，率 30 万国军围剿共军。这时，中央根据地只剩 3 万红军。兵力对比 10：1。

战前双方态势：红军尚未从前两次反围剿的疲劳中恢复，且分散在闽西、闽西北、赣南等广大地区，分散休整，结果措手不及，只得以少数红军和赤卫队的配合下，迟滞国军正面进攻。

毛泽东继续用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运动中歼敌的战法。

战役结果：国军失利。共军歼敌 3 万余人，缴枪 3 万余支，这次战役因兵力极为悬殊，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也从此进入全盛时期。

面对巨大的胜利，毛泽东这时已没有心情再吟出优美的诗句，后人永远没机会欣赏《渔家傲·反第三次大"围剿”》了。

就在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在方石岭歼国军第五十二师全部，红军军长黄公略牺牲之后的第三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 20 万东北军不许抵抗，使 2 万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侵占东三省。蒋介石推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国面临着继续丧失领土和主权的危险。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毛泽东，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此时的心情不难想象，自己政党的胜利在国家存亡关头，已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了，哪

还有情调吟诗赋词？



战例四：1933 年春夏，蒋介石再次“御驾亲征”，何应钦为主帅，率 40 万国军围剿 7 万中央红军，兵分三路杀将过来。兵力对比 5.7:1。

战前双方态势：红军以逸待劳，但共産党已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毛泽东被共産国际代表周恩来、李德和博古剥夺了红军的领导权。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政委。国军的不利在于：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招致全国军民的反对，爱国将领已无心再打内战；国军第二十六军一万多人宣布起义，加入红军。

中共临时中央采取毛泽东一向反对的“主动进攻战略”。但在战斗过程中，朱、周主要采取了上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

战役结果：国军失利。

战例五：1933 年秋至 1934 年 12 月初，50 万国军围剿 12 万中央红军，兵力对比 4:1。

战前双方态势：毛泽东继续被剥夺军队领导权。蒋介石向国际借款采购飞机等武裝国军，但国军内部反战情绪高涨，战争过程中，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人宣布抗日反蒋。

红军完全放弃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作战思想，初期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失利后又采取“以堡垒对抗堡垒”、“短促突击”等毛泽东坚决反对的阵地战打法。

战役结果：红军惨败，大片根据地丢失，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红军 8 万 7 千人被歼灭 5 万人，留守红军 3 万余人



历尽艰辛为人民

被歼灭 2 万余人。

这是共産党领导集团在否定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后得到的最大苦果。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前，几乎成了没有明确作战思想的溃逃。

战例六：1935 年 1 至 4 月，40 万国军“围剿”黔北的 3 万 7 千长征红军，兵力对比 11:1。

战前双方态势：红军人困马乏，丧失根据地，难以补给；但优势在于：经“遵义会议”，毛泽東的军事思想被逐渐接受。国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战役结果：红军以 1 万人左右的代价突围而走，绕道云南渡金沙江北上。达到突围的目标。

这次战役前后的“四渡赤水”，智调滇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阖子，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从此，几乎陷入绝境，充满悲观情绪的红军，开始神奇般地恢复活力，变被动为主动。

这次战役是毛泽东重新取得领导权后第一次打仗，并取得胜利，终于诗兴再起，赋《忆秦娥•娄山关》（1935 年 2 月）.•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诗人对红军曾经历的重大挫折和当前面对的巨大困难，以及一切不得不从头开始的沉郁和感慨，表露于字里行间。毛泽东在解放后的政治斗争中果断出离，再不作任何妥协，笔者估计与毛泽东的上述惨痛经历有关。

1935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边缘的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的壮举。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罕见的壮举。它让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军事远征相形见绌。西方军事史上的“战略之父”，古罗马时代

的迦太基战神汉尼拔，15 天孤军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壮举和红军长征比起来，在斯诺看来，“更象是一次休假的远足”[113] o 领导红军克服重重困难，从失败走向胜利，从绝望走向光明的毛泽东，此时的奈迈之情和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壮丽诗篇《七律•长征》（1935 年 10 月）里表仑无遣：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战例七：1935 年 11 月，30 万国军（20 多万东北军和败万 17 路军），围剿陕北苏区的 2 万多红军，兵力对比 15:1。

战前双方态势：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数日，疲惫不堪；红 15 军团尚未摆脱肃反扩大化的阴影，内部矛盾尚未解决。

战役结果：国军被歼灭一个整师，和一个团，俘虏 5300 人，缴枪 3500 支。共军损失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共军的主力保存下来，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再次更大规模的剿共。

1936 年 12 月，50 万国军准备围剿陕北 8 万红军，兵力对比 6:1。

战前双方态势：红军三大主力已于 1936 年 10 月会师，士气旺盛，以逸待劳。红一方面军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后，通过东征和西征，扩大了陕甘根据地，有了较充分的物资保证。通过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极大地宣传了共産党的抗曰主张。而国军方面，张学良的东北军面对家乡遭受日军的蹂躏，无心内战。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正使全国人民失去耐心，各地抗议浪潮风起云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 1936 年 12 月即将发动的战役中，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实力对比差距，是过去六年历次战役中最小的；无论是

军事力内部凝聚力，还是民意倾向上，毛泽东的军队都拥有过去未曾有过的优势。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懷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而共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则获得越来越多阈人的认同和支持，大热血青年对共産党开始産生向往之情，奔向延安，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毛泽東夫人的江青。在国民党掌握主要舆论工具的情况下，共産党第一次在舆论方面变得较为主动。从反共的著名作家林玉堂的《中国人》（又名《吾国吾民》）也可看得出，林对共産党的认可和称许。

那种认为“面安事变”前红军走投无路、坐以待毙的论点，纯粹是对上述历史的不够了解，和对红军实力的估计不足。即使您不能接受共産党的政治理念，也不得不承认，那跨越 11 个省，历时一年多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惊天动地的壮举（台湾朋友则将长征看成是共産饿丢脸的溃逃。没错，开始确实如此，但能在敌军尾追堵截情况下逃跑两万里生存下来，这本身就值得人们的惊叹）。

长征，是对人类体能和意志的极限考验。一个经过了这一考验的群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要战胜这样的队伍又谈何容易？毛泽东领导下军队的强大战斗力，其精神的历史起点当为长征。

认为"'西安事变'导致国军丢失大陆"的论调，完全无视当时错综 ㄅ的胜利
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为蒋介石在抗战和内战之中的一系列错误开脱责任。蒋介石更将张学良作为代罪羔羊，将全部的怒火发在了他的身上。

单看蒋介石令国难家愁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去"剿共"，就不难明白蒋介石在用兵上的严重问题。在家乡遭受日军蹂躏的时候，东北军的热血男儿不能奋勇杀敌，却在忙着兄弟残杀，情何以堪！蒋介石派任何一支部队剿共，也比派张学良和失去家园的东北军来得高明。他连自己军队将士的爱恨情仇都不了解和不关心，又如何战胜对手？而毛泽东在一场新的战役开始前，经常多次电报来往，总要就战役的目的和战术尽力做说服和征询意见工作，直至前线指战员心悦诚服为止，而从来就不是简单地下道命令让对方执行；到西柏坡的苏联代表对毛的指挥艺术甚至疑问：这是军事命令吗？

蒋和毛比起来，高低立见。蒋介石在井冈山山区无法消灭共军，在沟壑密布的黄土高原，他同样做不到。因蒋介石既不知己，更不知彼。



二、共産党抗日的历史真相

国民党骂共军不抗日，说他们不打大仗，只有一次"百团大战"。国民党罗列了二、三十个会战来说明自己打的大仗。可是只要研究一下日军投入的兵力就会发现，除了早期的淞沪、武汉、徐州、太原等少数战役外，尤其是 1939 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在大多数"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的规模并不比敌后大扫荡大。
尤其重要的是，共军的敌后游击战争，虽然没有大规枚会战那么壮观，但其战争效能总和则是极为重大的。[42]

---

[42]台湾出版的文献褒虽然也提到诸如游擊队战术、共军为国军举办游击训练营等，但共

即使蒋介石的那么多“会战”，从战争的战略战术上讲，未必是正确的。看待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还要看对最后胜利发挥的实际效果。共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比国军进行较少“会战”，
而是积极开展运动战和敌后游击战。这战术上的差别，苡际上是建基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中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截然不同的认识。

自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开始前后，中国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
同的战争观：“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産生妥协倾向，后者産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41]。而毛泽东在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后，则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在具体战略战术上，毛、蒋之间的差距更是显而易见的。从战争初期的国军“大会战”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战争进程的理解带有速胜的企图心。但毛泽东则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

军抗战的详细资料却很难找到，因此，本章引用数据只能来自大陆出版物，尤其是抗战时期由共军将领写的文章。这是无奈的。本章并不完全依赖数据，更注重结合当时局势的分析。但台湾出品的如电视系列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第 28 集重点描述游击战时，引用外国军事家的谈话，独不提毛泽东这个世界公认的游击战宗师的理论。衷面提到游击战威力和牵制日军 60%力量，但唯独不提游击战中这些农民的组织者和培训者是谁，甚至采访的游击战士提到谁教他们制作地雷时，只说"专门人才”，唯独不提这些专门人才和指导员贸际上是共産党部队的事实。采访的一个浙东四明山游击队员，唯独不提她就是活跃于浙东四明山的共産党浙东纵队(国军在这衷没有部队)。采访的人士中，只有曰本老兵提到八路军，而在台湾的中国人则只字不提，要提也从反面讲。看完该系列片的 28、29 集，感觉游击队主要是国军领导打的，而共産党在游击战中的贡献似乎不足挂齿。直到 28 集最后才提到"延安是最大的游擊队基地”时(既然最大，为何到最后才提？大到领导 100%选是 80%游击战？)，立即提到“虽然抗日，但并没有放弃对国军的攻击"。甚至其中引用《地道战》和《地雷战》的片断的出处也不注明（但《血战台儿庄》注明了出处）。大陆的资料台湾方面不信，台湾方面则不提，或如上面这样的处理手法；提到“百团大战"就不忘提日军大扫荡对百姓的残害。台湾政治环境已很开放，应该比中共更容易做到对历史问题的洒脱和客观。看来，只有领教过游击战的日本的资料才能提供可信的参考。可笔者接触过有关日本和游击队作战的资料衷，却从没提到国军游擊队，而"八路军”的出现率高的惊人。

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 旳胜利 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域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ft..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能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请读者注意：后面将要分析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不满，理论根据在此）。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

精神和战斗力(请读者注意：毛蒋抗日观的根本不同）。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

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

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

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擊。填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1， 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败劈曼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禾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赞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

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赞略军出中国。”（请读者注意：没有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也必然能最后彻底战胜曰本，根据在此）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体现了对中日两国国情、军情和国际局势的准确把握，逐步推导出抗日战争的阶段性和战略战术，直至最后战败日本侵略的必然性。从共産党游击队在敌后对日军的沉重打击，以及从国共内战中，解放军大 h！:采用运动战，并最终战败蒋介石，说明毛泽东在敌我双方力扁:对比于我不利情况下采取运动战的有效性。从中也可看到，毛泽东对蒋介石“大会战”的阵地战打法，不以为然。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军有那么多的会战，而共军则采取广泛开展敌后游喂战和运动战的根本原因。在全面抗战初期阶段，毛泽东向华北、东北、华东、华南派遣了大量的军政干部，“分散以泼动民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尤其是发动农民的力量， 建立广布敌占区的抗日根据地，为后来战绩卓著的敌后全民抗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而蒋介石的抗战思想基本上是完全寄希望于军队，而将人民的力荡放在了一个较次要的、辅助的位置，这和毛泽柬“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显然南辕北辙。刘伯承曾批评蒋的抗战为“执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

纯政府的片面抗战的路线。”[15]

我们不妨在此作个假设：如果抗曰战争的中国统帅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中国抗战的局面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国军不会有那么多会战，而是预演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初期以消灭日本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会太在乎一城一地之失，在运动中歼敌，将日军分割到一个个据点，进而各个喂破，最后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全国战略反攻之势。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出兵，日本的投降也许会推迟，但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日本必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但如果按照蒋介石的打法，在没有共産党敌后游击队参与的情况下，从 1940 年后国军“会战”的地点、规模和战绩也许可以看出，中国战胜日本将是一条极为漫长的道路，当全民为悲观情绪所主导的情况下，中国
亡国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当日本占领并有效控制中国的大部分东、北部地区，中国的资源将能被日军所用，打败日本将变得更加漫漫无期。但毛泽东的敌后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决定了，日本即使占领中国的所有国土，也不可能有效加以控制和利用，因为日本不可能从人民战争的海洋中解脱出来。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评价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o 曰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特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曰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从战后几十年中，遍布全球的各国游曜队，在不掌握资源优势情况下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可以看出游击战术的
有效性和强大生命力。而作为全世界游击战宗师的毛泽东，在熟悉的中国大地上创造游击战的辉煌战果就不令人惊奇了。

举几个共军反“扫荡”作战典型战例：

战例一：1939 年 4 月，日军调集 8 个步兵联队（24 个步兵大队)和支持部队共三万余人攻喂晋东南。当地有八路军 6 个团，共産党领导的山西新军两个团，和国民党的骑四师。我军节节抗击，成功将敌军分割。集中四个主力团将日军主力白岐联队全歼于长乐村，并重创日军占米地旅团，毙敌 2200 余人。日军全线溃退，我军三个星期毙敌四千多，收复县城 18 座，晋东南全部光复。

战例二 1941 年日军调集十余个大队 15000 余人扫荡太行山区。共军以一个团抗击十倍之敌八天，毙敌 1000 多，日军疲惫不堪后撤时又被共军主力两个旅伏喂，半小时即弃尸 1500 多具，狼狈溃逃。

战例三：1938 年平型关大捷后，敌进犯忻州与国军激战。当时敌飞机二十余架从阳明堡起飞蹦炸国军阵地。路军 129 师之一部，奉乂⑽军总部命令，用一切办法炸毁阳明堡的敌机，以配合昕州国军作战。该部 769 圆营长赵子德率队于黄昏出发，杀入敌阵，将阳明堡敌森炸机二十四架全部烧毁。该营长光荣殉国。这证明共産党人与/<路军对国家民族之忠肝赤胆，与日月争光 [117]。

战例四：1941 年日军进犯浙江、福建沿海，国军溃败。共军敌后游喂队经一年艰苦战斗，粉碎日军对浙东的“清乡”活动，形成包括三北和四明山在内的浙柬游击根据地。

:的胜利

在 1941 年至 1942 年，是共军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和抗日政策的动摇，另一方面，日军开始将共军及其领导的游喂队视为头号敌人而集中 60%的主力予以"扫荡"（笔者一直怀疑，日本人将共産党的部队作为主要敌人，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间歇接触有关，使得日本人认识到蒋介石并不那么可怕）。1941 年 7 月至 1942 年七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作战 14648 次，毙伤俘日僞军 13.2 万人。八路军由 40 万减少到 30 万，根据地人口由 1 亿减少到 5 千万。

共军抗日的另一结果就是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四易主帅。

曰寇征服华北的阴谋始终遭受华北军民顽强英勇的反抗,不仅没有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而且拖住了敌人进攻大后方的后腿。这自然引起日寇极大焦虑，所以在六年抗战中，华北敌寇已四易统帅。1938 年初寺内啬一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代替了原来的华北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 38 年 8 月就又撤换了。继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者乃杉山元。当时抗日政权与游击队已在各地发展与建立，到处翻车破路，伏击截喂，予敌以极大威胁，敌寇认为是“击灭蒋政权的绊脚石”，故于占领武汉后回师华北。当时的敌人超过二十个师团，占在华北全部兵力一半以上。抗日根据地并未如杉山元所希望的被其消灭。又不得不在其上任周年纪念日（39 年 9 月）让位于多田骏。

多田到任不久，即提出所谓“囚笼政策”，沿铁路公路两侧挖成深沟高垒，实行严密封锁，割裂抗日根据地，敌寇依据这些占领之点线，向各根据地压缩。共军则发动“百团大战”，粉碎了敌寇“肃清华北、确掌华北”的迷梦。多田在这一惨败的教训下，提出改变老套战法，实行所谓“牛刀子战术”，即“集结极优势兵力突击一点”之意，结果又被我神 Hi 鬼没分散之游击战所扮碎。敌寇复提所谓“分散

配备、灵活进剿”，依然无效。至此，多田骏就不能不言十竭势危，宣告退休，于四一年七月代以号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郎。[17]

除华北主战场外，共军还在全国建立了分布广泛的抗日游击力：.!：，如著名的海南墩崖纵队、东北抗 t1 联军、广东东江纵队等。

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战伟绩，谱写了中国军民共御夕卜侮的壮丽诗篇，其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岂容在此一一罗列？

从侵华日军与东京的来往电文中，也可发现，自 1941 年始，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要对手不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共産党军队。曰本的作战方针，则是以“则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産饿军为目标”。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整个抗日过程中，国军出现了不少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除国军对共军的防范和直接攻击，还出现了不少投降和“僞化”的事件。汪精卫能在短时间内组建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并集结数十万的僞军（初期全部是国军“僞化”的），就是个明证。屯无疑问，共军和国军的兵员来源没有任何的区别，但他们所在部队的表现却有天壤之别。共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没有一起向曰军投降和“僞化”的事件发生。这只能说明阈共两党、两单在治军上的严重差异，也必然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差异。

“没有不好的士兵，只有不好的将军”。即使在蒋介石本人和其身遥•高层官员中，妥协气氛此起彼伏（蒋可能受到“百团大战”的刺激），这不能不说是问题的根源之所在。而毛泽柬和他的战友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日军占领我领土的情况下和敌人妥协的可能性。抗日的时候如此，49 年建国后的历次民族战争中始终如此。

八年抗战，共産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与日僞军作战 12.5 万

次，歼灭日军 52.7 万人，僞军 118.6 万人，缴获各种枪械 69 万余支，各种炮 1800 门，抗击了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僞军，收复国土 100 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2 亿。共军共 60 余万官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于那些在共産党发动下，积极抗战的千万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如

日军的“三光”政策），已不可能统计出来。他们已将自己的血肉溶入到祖国的万里河山。考虑到共産饿并不拥有国家资源，取得这样的战绩是极为惊人的。

蒋介石在抗战前“剿共”，从来不需要理由。然而，抗战结束之后，他不得不寻找发动内战的理由；没有共産党在抗战中的巨大贡献，以蒋介石的个性，就不可能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装模做样地伸出个塑料的橄揽枝。毛泽东的军队以卓越的战绩为己方争得了嚣码；争得可歌可泣，争得光明正大。

如果说抗日战争让共産党受惠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抗曰战争给了毛泽东及其政党和军队一个绝佳的机会，以证明自己的军事政治领导才能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而同时也给了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一个机会，以暴露其内部的一系列弊端。

如果把国共内战矜成是一种特殊形势的两党选举的话，那么抗曰战争时期则是一个预选的过程，它让人民看清楚，谁才是中国可以托付的力量，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领袖。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及其政撤。

人民投票的方式是国共内战时期的百万辆手推车和拥军鞋。

至于有人拿解放后毛泽东接见日本人时所说的“感谢曰本”的话来做文章，就未免有点太无聊啦。正如当今不少“鶏汤文”中常说的“感谢您的敌人”，搞销售的要牢记“感谢每个拒绝您

的人”等类似，道出了看待事物的格局与高度。毛泽东在和曰本友好人士打交道时，以他特有的方式表现出自信和洒脱。



三、“百团大战”及其

提起共军抗日，不能不提 1940 年的“百团大战”，这是共军抗日最具规模的一次战役。自 8 月 20 日起到 12 日 5 日止，历时三个月又 15 天的“百团大战”，以我敌后军民的伟大胜利、敌人的惨重失败而告终。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我敌后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 1800 多次，计毙伤日军二万多人，僞军五千多人，俘日军 280 多人，僞军一万八千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 258 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但从毛泽东在“百团大战”胜利后对此次战役的评价：“战术上是正确的，战略上是错误的”，似乎可以看出，作为共军实际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在“百团大战”发动前并不完全了解这次大规模战役，这是令人费解的。在资料里似乎难于查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在可查到的有关“百团大战”的资料里，均提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却很难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名字；这是不正常的。由于这是共産党抗日的最著名战役，共産撒似乎不愿对其中的细节说长道短，以免影响人们对共军抗日的认识。但在反毛高潮时，人们基于毛、彭之争中对彭德怀的同情而对毛泽柬就“百团大战”的上述评价进行批评，才暴谣了“百团大战”背后的这一独特细节。毛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彭德怀重提

这一事件，看来此事在毛泽东心中留下的阴影似乎很重。如果彭德怀真的没有将实际的作战计划和兵力调动情况通报毛泽東，其中是否存在着违犯纪律的嫌疑？

笔者以为，毛泽东的上述评价并不太超出预料之外，仔细分析，也许正在情理之中。八路军游掣队极大地牵制了日军。从对日作战的角度考虑，日军最头疼的莫过于找不到共军的主力作战，以便集中歼灭华北共军；而毛泽東军事思想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我军无处不在无处在，这使得日军的优势装备难于发拇作用。对神出鬼没的游喂队和运动中歼敌的八路军，日军又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方法。因此，共军一次将如此大规模兵力暴露在日军面前，似乎更符合日军的愿望，而有别于毛泽东所偏爱的战法。更何况，当时中日之间初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距离全面反攻还有很长一段路。如果战争的战术运用不当，或低估敌军的实力，结果将不堪设想。华北共军为迎接战略反攻所做的准备将会面临重大挫折，延误抗战胜利的时间。

万幸的是，这次战役我方赢了。

从当时国共两党的微妙关系来看，共军是否应组织这様大规模的战役同样令人怀疑。在蒋政府内部始终有一股妥协的力量！这股力量:有两派组成，一为再战必亡派，一为坚决反共派。而后者对共军在抗战中的迅速崛起及表现出的战斗力非常不安。蒋本人就基于反共的考虑而有明显的对日妥协动作，和日本的接触时断时续。“百团大战”的胜利，虽然鼓舞了全民、全军（包括国军）的士气，但对蒋介石的国共团结抗日政策却可能带来动摇。而后者对全民抗战来说才是最大的威锊，和最应该尽力避免的。

毛和蒋有长期打交道的经验，没人怀疑毛是最了解蒋的人。毛泽东苡际上是在抗日夹缝里游走，既要按照«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积极抗日，为最后的全面反攻做准备，同时又要避免国共团结抗战中途夭折，导致亲痛仇快。其中分寸的拿捏当属不易。

不记得是哪部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当蒋介石听到“百团大战”胜

利的消息，不禁皱眉："华北共军一下就集中了一百个团，海南、广东有几个则呢？"。这个情节是根据史实还是编剧的杜撰难以确证，但这样的情节并不离谱。只要回顾一下 1939 年底抗日正酣之时，蒋介石就在十一月调整了他们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力量，安徘了互相配合着的三路反共大军：一路是以它在太行山南部和中条山区的军队，配合阎锡山反对山西新军的活动，从南面、西面压迫共军，企图消灭太行山南部与晋南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一路是以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所部进到太行山北部，配合鹿钟麟等，企图控制冀西地区，割断共军太行和冀南的联系，尔后进取冀南;一路是以石友三部的两个军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等部，从东面向冀南、冀鲁豫共军进攻[17]。1941 年 1 月 7 日更爆发了震獠中外的"皖南事变"：蒋命令国军第三战区 8 万余人向九千人的新四军发起攻击，导致 6000 名新四军阵亡。之后蒋更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消番号，军长叶挺革职审判。"事变"激起了全国军民的强烈愤慨。在奥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 3 月 6 日宣布"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43

[43]快要亡国了，蒋总统还在剿共。台湾方面的普遍说法是：新四军为扩大实力主动攻击国军，与大陆的说法完全相反。上述石友山等部与共军的摩擦，台湾方面的说法也是共军主动攻击。到底是国军压缩共军地盘还是共军主动攻掣国军？何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呢？要判断这一点，毛的军政谋略将是主要依据，因毛并不是头脑简单，只知道抢钱极的土匪。对毛泽东来说，国共合作破裂并不符合共産党利益，当时国民党掌握舆论的主动，如果共産党敢这么做，无疑于将自己放在全国人民的对立面；更何况毛从来重视群众力量，这是共産党起家的本钱，如主动攻击国军，难道他不怕毁掉共産党的形象和失去人民支持？远离（接下页下）

乘蒋介石“围剿”共军之机，日军趁势扩大战果，袭击了共军的根据地，提起来就更令人伤心了。

不论蒋介石在北伐和抗日中做出了多少贡献，但他的一系列的作为却让每个国人深感窝旗。笔者刚出国时，曾打算利用在海外查资料的方便，而为大陆中国人专门著述，为蒋介石平反，但每念及老蒋的一系列窝囊事，都令人提不起说他好话的勇气[4445]。从政治远见、意志力、军事才能、民族精神等各方面来看，他都不适于成为民族独立和兴旺的寄托。

至于蒋打击新四军加紧剿共，如果是受“百团大战”带来的心理冲击，彭德怀和朱德的错误未免太严重了。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评语将更显准确。而毛泽东一直到“庐山会议”还旧事重提，就容易理解了。毕竟，这不仅涉及到纪律问题，也影响到上下级、中央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的

（接上页下）共军主力的新四军如主动攻擊包围着自己而且力量大得多的国军，无疑以卵擊石。毛泽东有这么蠢吗？而笔者阅读过一些美国人有关抗日战争的片断，从来没有共军主动攻擊国军的记述。这种说法只存在于台湾和反共人士之间，是否有些不太对劲？考虑到蒋介石在战前剿共、抗战中拒绝美国提出的将援助物资和共军分享、不许投降日军向共军缴械、拒绝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倡议等事贸来看，蒋在抗战中压缩共军地盘以阻止共军发展的说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45]蒋介石所做的窝囊事还包括后来请侵华日军将官作军事顾问帮助打内战，其中有侵华时间最长，罪恶最大，制造[1]‘济南惨案”和施行"三光政策"的侵华日军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据中央社 1949 年 1 月 26 日电："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之后连同其它 260 名日本战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被蒋介石送回日本。如果封蒋为抗日英雄，那么这个英雄的光环上有着太大的污点。毛泽东为此发布《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之后又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黛战犯的声明》中首次骂蒋介石犯下卖国罪（确贸卖国卖得离谱）。冈村 1950 年又被蒋介石聘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1955 年后，冈村纠集日本陆海军旧军人组织“战友会”，积极参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活动。日本今日对侵略歷史的态度与当时惩罚战犯不力密切相关。而日本天皇没有受到慜罚，蒋介石更难辞其究。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准备战后废除天皇制，并征求蒋的意见，蒋却建议让日本人民作出抉择（德国人是否有资格决定希特勒的命运？）：考虑到日本人的民族性，这等于维护了天皇制，使得最大战犯裕仁逃脱制裁，继续享受 40 多年的尊贵地位。蒋对天敌曰本战犯比对中共还友善，这和慈禧太后有何区别？蒋的亲日延续了蕒湾岛内的亲曰力量，为今日"台独"力量崛起负有责任。

信任（领兵将帅拥兵自重的嫌疑是很危险的）；而毛泽东却又无法对“百团大战”和彭德怀等人提出公开批评，否则会影禆到外界对他本人和共産饿抗日积极性的质疑。

毛泽东作为一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思想最强烈的政治家，让他面对外国的威胁和侵犯而不稂极抵抗，是不可思议的。从他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也可看到，当面对外侮时，他从不因为对手的过分强大而退却，那么，他在抗日战争中不积极抗战也就难以想象了。因此，当对毛泽东就“百團大战”的态度进行评判时，更应从军事和政治战略高度予以把握，而不能因为对彭德怀后来政治命运的同情而加入对毛泽东的偏见。否则，在毛泽东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那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又将如何解释呢？

那么，毛泽东何时才展开大规模对日反攻呢？根据《论持久战》和国共抗战的微妙关系，毛泽东会通过全面游掣战和运动战来推动对日包围和各个击破，当在中国大片国土（如华北和华东）上形成对日本的绝对优势，同时确保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蒋介石可能的背盟攻击（这事老蒋肯定干得出来）；只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才会组织大兵团作战，争取最短时间赶出日本侵略军，然后和蒋介石的内战也就很快登场。在这一天来临前，共産党只能选择游喂战和运动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共抗战统一战线的存

在，同时不断打击日军，扩大根据地面积。

.“百团大战”打得有点早了!

而“百囲大战”之后，日军将华北共军作为首要敌人，并集中大部兵力对付装备很差的游击队和游击队出没的村庄，使得在之后的短时间内，华北共军建立的敌后根据地损失惨重。甚至可以说，彭德怀发动的这场战役，很可能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规划。

如果毛泽东完全从自身政戴利益出发的话，那么，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之

后很难再在共産党内享有后来那样的地位。事实是，一直到“庐山会议”之前，毛、彭还维持着不错的合作关系。

四、蒋介石的遗憾民族的幸运

抗战胜利之日起，内战就已经开始，这首先是因为阈民党垄断受降权引发的。日本投降后次日蒋介石发出命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加强作战，积极推进”，“不得稍有松懈”，要求中共军队“应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于 1945 年 8 月 15 曰，蒋介石指令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求“听候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具体负责受降的何应钦在给冈村的指令中要求，凡非蒋介石或他本人指定之受降军官及代表和部队，日军绝对不得移交，并应拒绝其通过，防止其占领城市（在全球反法西斯国家中，只有中国人给予侵略者这样的待遇，其它国家都在利用最后的机会给侵略者以剧烈打喂和报复）。国民党企圆剥夺坚

持抗战八年的中共的受降权，显然是中共不能接受的。由于中共军队多在敌后，位置有利，在受降时迅速收复了大 W 敌战区及中小城市，控制了相当数带的交通线，使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百万平方公里。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远在大后方，在依靠空运接受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沈阳、长春、武汉、郑州等大城市后，对广大敌战区的接收，尤其是华北、华东部分地区，需要通过解放区，或者要接收的已经是解放区，这就不免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引发内战。

毛泽东要求“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编组正规兵糊。各解放区编成的野战部队合计近 60 万人。

上述受降情况回顾，_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中共军和游击队的对日作战情况；而处于后方的国军对日作战的机会以及给日军的威胁，显然不如处在敌后广大地区，与敌近距离接触的共军及其领导的游擊队。也表明了国共内战的不可避免。[1]

1946 年内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军队整编后共 36 个军 150 个师 400 万人（蒋介石当时号称 800 万），其中正规军 200 万。共産党有军队 120 万，其中野战军共 60 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 3.6:1。

请读者注意上面这组数据：后来日本投降后的缴械，用来换装和充实部队。那么，投降前共军游击队和民兵这 120 万军队（共産党没理由故意夸大这个数字）的装备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

抗战结束前夜，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谈到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构想（详细说明参见第五章第一节）。毛泽东真心希望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可当时蒋自恃拥有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大军，三个月可消灭中共，使中国错过了一个建立多党民主国家的有利机会。而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导致数十万人民的死亡和直到今日的国家分裂。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蒋的失败根本不值得同情。他的教训对今曰台湾执政者来说，是值得参考的。

论武器性能如何，至少每人应该有一支枪（包括部分自制土枪）；当然，蒋介石不可能如此慷慨帮助共军，共军本身没有这样的军工能力，苏联在抗战初期的援助给了蒋介石（斯大林指望蒋能协助对付日本），那么共军的武器主要可能渠道是战场缴获。如果这个推理正确的话，要取得这样庞大规模的武器配备，共军要歼灭多少敌人呢？至少 120 万人，而且都能由共军清理战场；共军自身牺牲人员的武器大部分都能由战友拣回来，且武器损耗很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节中有关共军战绩的数据，即：歼灭日军 52.7 万人，僞军 118.6 万人，缴获各种枪械 69 万余支（枪支数环的差额部分是苏联将缴获日军的武器给了共军），各种炮 1800 门，共军共 60 余万官兵献出了生命——这一论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八路军游击队和发动起来的人民抗日力 W 的抗日伟绩也就有了可靠的证据！

至于说共军乘日本侵华期间壮大，是显然的；但他是在积极抗日的过择中壮大，而不是在无所事事中发展，否则，这一壮大所需要的军需配备就揆有了来源（日本人也不会那么蠢，允许共军在自 B.身边壮大而不予打击)。而这种坑日中的发展壮大不仅不应受到指责，相反，应该获得所有炎黄子孙的敬重和感激！他们在如此艰困的条件下还能得到巨大发展，并牵制日军总兵力的 60%，这本身就证明了这支军队令人赞叹.的能力。国军为了扩大兵源，采取“抓壮丁”的方法（农村老一代的人皆知此事），造成百万家庭的苦难经历；而共军征兵则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从不强迫。据老人们讲：这些“土八路”的方法是“软磨”（类似现在的保险从业员的手法），一次说服不了会来几趟，甚至坐在家里不走，帮助打水、劈材、扫地等做一切能干的活，使得这些农民们看到这个军队的精神面貌，自己的娃儿跟着这些好人应该没

问题。等决心从军时，这些农村青壮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已经完成，共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且受到人民尊重也就不奇怪了。老农们笨拙的嘴都会说一句："毛主席的军队是好人"。（这种注重思想工作而非滥用威权的手段实在值得任何时代政治家、军事指挥员学习。）

就武器装备来看，双方对比有明显的差距。国民党正规军主要为美式装备，而共産党军队武器配备多为历次战争中缴获的，配备最好的是东北野战军，因苏联将缴获日本的武器给了共军。在以東北野战军为主力组成最初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时，仅步枪的口径就有 15 种之多；为减轻后勤压力，在入朝参战时选配了其中的五种。从武器上来看，共産党军队是一支标准的"杂牌军"。

就是这样的"杂牌军"，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里，如秋风扫落叶般将有美国强力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赶出了大陆。并在其后的短时间内彻底消灭了盘踞在大陆各地的一切地方武装，赏现了蒋介石执政时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的国家的大统一。

与美国对蒋的支持相比，苏联对共军的支持之微则是相对令人遗憾的。斯大林从反对毛泽东过长江，大使馆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斯大林从来就不希望毛泽东统一全中国。1949 年后苏联对华援助方面的积极配合，笔者一直怀疑与斯大林内心的这点对中国共産党的亏欠有关，使得他不得不表现出更大的诚意，消除中、苏两党间的历史心结。

从共军抗日和国共内战期间共军的战斗力来看，在相对力量对比明显處于劣势的情况下却能取得辉煌的战果，证明了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正确性。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没有日本侵华，拥有同样高超战略战术的毛泽东，就不能一步步取得同样辉煌的战

刂

果并最终战败蒋介石呢？

毛泽柬最终战胜蒋介石的根本要素，是毛泽东首先发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并通过“土改”最大限度地建立了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同时认识到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源动力——人民。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实际上是将人民的力!I[•与军事斗争联系起来，甚至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也可看到，“发动民众”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而蒋介石则更多地表现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夫形象，和完全依赖军事力蜇的军阀作风。二者的这些根本性的不同，决定了蒋介石没有战胜毛泽东的可能，而毛泽东战败蒋介石则更符合历史的必然，因毛依赖人民。

毛泽柬身上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也正符合积弱百年的中国所急需的领袖性格。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废除外国在武汉的治外法权，后来又陆续废除了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特权，虽然有国际环境于我有利的一面，但蒋介石身上仍然表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色彩；但在抗日战争前和抗战中后期的妥协政策，则极大地破坏了他本来不错的形象，让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倍感失望。他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对底层人民苦难的漠视、军队的嫡系旁系之别、高级将领贪污军费严重、对前线战士利益的漠视(国民黛军队的严重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读一下美国人写的文章、回忆录或评论。其中有些内容比中共反蒋的描述还可怕。如：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约瑟夫•W?埃谢里克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等）、他本人对战争前线具体战术的过分干预，无不暴露了蒋介石失败的必然性。

因此，打败蒋的有两个人，一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蒋介石



本人。

蒋介石的失败和毛泽东的胜利，

农民欢送子弟参加志愿军

也为今日中国执政当局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教材。但他们吸收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了吗？

随着中国贪污腐化的日益严重，军咎自军队经商以来所遭受的形象、内部道德和官兵关系的破坏（虽然还没严重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是值得中共当局认真检讨的。很显然，他们已将历史的教训全部忘却。

他们也许没忘，只是缺少行动的勇气、能力和道德力秘罢了。

顺便请谘者看一下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是毛泽柬于 1949 年 4 月 30 日，就英国军舰在长江上对解放军开炮所发表的声明，谴责英军的暴行：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四月二十六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柬，‘饮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阅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阈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阈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力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力。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阈政府来侵犯。”P5]

笔者之所以抄录于此，概因这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位中国

领袖对英国发表义正破词的谴责，而当时解放军距取得全国胜利还有一段距离。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呢？不说蒋在抗日战争中的那份心不在焉，在二战后，身为战胜国，也是世界四强之一的中国，为抗击法西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然而，我们的蒋大总统却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条约》，放弃外蒙，同意苏联驻军旅顺，共管大连和中长铁路等（这哪象是个战胜国）。甚至为了准备打内战，而放弃“开罗会议”已经达成的战后中、美双方共同派驻对日本占领军的权利。蒋介石的短见给中阈和东亚带来永久性、战略性的不良后果；否则，今日的钓鱼岛之争不会出现，日本也不可能控制琉球，相反，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琉球没有可能再回到日本人手里，更可能面向中原匕如果在东京周围有一支哪怕只有两千人的中国军队，日本在战后也不会那样狂妄，更别说参拜靖国神社了（台湾的亲日台独分子如李登辉，至少脑袋会稍微清醒一点）。日本投降后，中国军队解放越南，后来又阻止了法国试图对越南的重新占领，正当中国军人受到越南人民的欢呼和感谢时，蒋介石却在重庆和法国签约，将越南的控制权重新交给法国，中国军人浴血奋战的结果却是将对中国有着重大战略利益的印度支那重新交给战败者。在这种对比中应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胜出对提振民族精神，恢复民族尊严，具有比蒋更明显的优势，也更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一名英勇

[1]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曾两次建议中国接收琉球都被蒋介石拒绝，后来蒋对此的辩解是：唯恐美国人以为他有领土野心。唉，有这样胆小怕事，瞻前顾后的领导, 国家之不幸。再联想一下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就向斯大林提出收回外蒙，因此受到斯大林的冷落；虽然当时毛有求于苏联。蒋介石当时的心态在过去百年的中国精英群体中，具有代表性，那就是面对西方列强时，谨小慎微，谦卑恭敬，唯恐得罪西方国家。而毛泽东则是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唯国家利益是求。

的军人，在蒋介石这样的统帅麾下杀敌，有时难免感到窝炎。

直到建立新中国，才结束了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甚至连苏联“老大哥”的面子也不给。在毛泽东 49 年第一次访问苏联的 70 天里，虽然中国有求于苏联，但在国家主权完整的争取上费尽周折，并使得苏联同意在 1952 年底提前结束在上述《中苏友好条约》中于中国攫取的特权（由于韩战而推迟到 1955 年才撤出）。虽然毛泽东为蒙古问题做了一番努力，但苏联不可能做出让步。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和物资的支持下，于 1954 年“奠边府战役”将法国人赶出印度支那，消除了欧洲强权通过印度支那对中国南部的威胁，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

对不少的台湾同胞来说，由于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对蒋介石“怀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相当高的认同，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出现，蒋介石的这一政策在历史的评惯上将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当蒋介石的这一政策在抗战前被广大知识分子了解后，人们自然对蒋的“韬光养晦”和“远见卓识”産生由衷的敬佩，也对蒋的不抵抗给予理解，从学贯中西的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中可见一斑。

“懷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出发点是：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对曰抗战还没作好准备。在战前，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确过掀起了楅楅烈烈的大后方建设高潮，川江航道得到疏浚，多条铁路线加紧建设，东部部分工业设施西迁，陪都重庆和四川大后方的发展步伐也大大加快等所有这些都说明蒋介石确赍在进行认真的备战。



首批人朝的志愿军炮兵装备陈旧，多是骡马拖拽。这是在第二次战役中，炮兵将火炮拆开，把沉重的炮零件扛到阵地上去。

共産党虽然同时受到蒋介石的尾追
堵截，损失惨重，也从来没有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骂蒋为卖国贼。这是任何中国人都必须承认的事实。笔者虽给予理解，仍对这一政策的可行性有所疑问：蒋介石是否考虑到人民的感受和接受能力？民心可用而不可泄。日本人是否能等着你准备好后再扩大侵华战争？当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迅速向南推进时，已经证明了蒋介石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如果日军跨越黄河天堑，控制越来越多地区和资源时，中国备战增加的饩力，能否一定大于日本同时在中国扩大的实力，这本身就是个未知数。

另一个不可思议的是，面对两万日军对东三省的入侵，蒋介石却令 20 万东北军不抵抗，而拱手将东三省让给日本人，那么国防建设的目的何在？如果 20 万军人打不过 2 万日军也就算了，问题是中、曰之间根本没有认真交手，中国就无条件认输，将当时中国军队中属于最精良的东北军大量装备和东北丰富的资源拱手让给日本。对这一事苡无论如何解释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如果能向刘邦对付匈奴那樣，打得过就拒敌军于国门之外，打不过的话，到时再来一面“和亲”，“租借”东三省，一面“安内”兼“韬光养晦”，那您蒋总统的智慧和能屈能伸的气魄，无论如何都要被历史浓浓地赞扬一笔！

在蒋介石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十多年后，另一件由毛泽东主导的“好戱”，则彻底否定了蒋介石这一政策的历史评价，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个人的重大遗憾：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几个月后韩战爆发。毛泽东在全面权衡下，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下面就抗美援朝战争和“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战争的背景及敌我实力作个对比：

国际政治局势的对比：日本侵华必然对美国和苏联以及欧洲



志甩军二级战斗英雄王天保用拉-11 活塞式飞机，击落 P86 喷气式飞机四架。除了中国军人，还有谁如此"有种”？西点军校教官在总结'J 时谈道：蒋领导下的中国军人象一群鸭子，没想到在毛泽东统率下变成一群狮子。

在亚太地区的特权构成威胁。如香港之于英国，澳门之于葡萄牙，印支之于法阈，中国东北之于苏联，整个西太平洋之于美阈等。而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只有苏联的地缘战略利益受到挑战（不计中国，因此处中国为参战国）。而美国出兵朝鲜是在联合国的名义下进行的，并有四十多个阈家的军事参与或物质及后勤支持。这决定了中国抗日要比抗美援朝具有相对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曰、美前后两个对手的当时实力来乔：日本是东亚强国，但其综合实力与当时的亚太强权美国和苏联相比，无论是经济、资源、人口还是领土面积，日本不仅不占任何优势，而且具有劣势。而美国在二战中不仅毫髮无损，而且一跃成为世界超强，无论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都远超越苏联。美国有战略武器原子弹，日本没有具有特别优势的装备，虽然整体军备比中国强。

从当时国力来看：1931 年国内有 6 万“共匪”占山为王，控制区域不到半个江西省的面积，控制地区人口 150 万；“共匪”除得到共産国际的精神支持外，孤立无援。而 1950 年大陆有蒋介石残余部队及各地方武装近百万人，遍布在东南沿海岛屿和中西部省份；蒋得到美国的支持，伺机反攻大陆。至于国民经济情况，直到 1953 年大陆才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抗战和三年内战摧毁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基础。

从当时国共军力的相对对比来看：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就配备了飞机，而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还没有配备。蒋介石的武器主要是美

式和德式装备；前面已经提到，初期组成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东北第四野战军，步枪的口径就有 15 种之多；为减轻后勤压力，在入朝参战时不得不选配了其中的五种。当然，抗战爆发后，外国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以及抗美援朝开始后苏联的军备提供，在此不提。从日、美参战部队的战斗力和作战经验来看，不少日本军人是紧急征召的年轻人，日本战线长，而美国参加韩战的部队如八军、陆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禈当当的王牌军，且又刚打过二战，富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其它参战国派出的也都是他们的劲旅，如被志愿军击溃的英军第 29 旅皇家重坦克营等。

从战场"地利”和“人和”角度来看，抗日战争发生在中国自己的广阔领土上，无论是地利还是人和，我均占优势。而抗美援朝发生在面积狭小的朝鲜半岛，我方没有地利，也谈不上人和。

从民意上看，日本侵华激起全民抗日热情，而蒋介石抗日也得到“共匪”的支持和配合。而抗美援朝开始前，中共高层反对声音很强，蒋介石当然不会配合，反而会极大地牵制解放军的力以。入朝参战后，大陆掀起全民支持抗美援朝的高涨爱国热情，另当别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时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处境相比，在政治、物质和军事条件上并不占任何的相对优势。考虑日、美这前后两个对手的状态，毛泽东的相对劣势几乎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从敌我双方弹药的消耗也可看出装备上的差距和战争的惨烈：美国在 3 年时间内，在朝鲜半岛 22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消耗的弹药为 330 万吨，相当于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全球战场总消耗量(690 万吨）的一半，而志愿军消耗

15 万吨，弹药消耗为 1:22。而按中国和美国公布的己方伤亡数据，双方伤亡人数基本持平[311]。韩战胜利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不仅善于运动战和游击战，在阵地战方面同样一流；也否定了毛泽東的军队只善于人海战术的看法。[46]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辉煌战果，也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说：“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

[46]有关韩战各方伤亡人数，各方统计资料有些差别。但无论是美、韩、英、中的资料中，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都在一百万以上。1988 年中国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统计数据为：中朝军队共歼敌 109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 万余人（这个数据不同来源差别较大，从 4 万到 30 多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公布的 4 万多美军伤亡的数字有误；仅第一战役的西线第 8 集团军美 2 师一个下午就损失四千人，该集团军被瓦解，在聚慌逃跑时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车祸身亡；笔者一直怀疑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将沃克阵亡谎称车祸。东线长津湖一战，2 万人的美军王牌劲旅陆战一师被包围，最后损失一万一千人突围。第一战役的巨大损失使得美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征兵。如果 3 年仅损失 4 万人，刚经历二战的美国没必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韩军 66 万余人，其它国家军队 2 万余人。志愿军共伤亡 36 万余人（其中阵亡 11.5 万余人，战伤 22.1 万余人, 事故伤亡和病故等非战斗死亡 2.5 万余人），失踪、被俘 2.9 万余人（部分被强制送往台湾）。只有两岸一些中国人认为战争结局是平局，而脸皮最厚的美国人也认为美国惨败；因中美于鸭绿江交火，在三八线停火，美军被打退 500 公里，这哪是平局？更奇怪的是，不少人说毛泽东惯用人海战术，可他的军事生涯中很少有在人数上占明显优势的时候。这是失败者苍白无力的辩解。当然，在具体战术上，他一向强调“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局部战术的正确运用。只有白痴才喜欢用较少的力量对付几倍于己的敌人，只有上帝才能在这种情况下常胜。解放军在历次战争中"上帝”水平的表现另当别论；例如，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谭秉云一个人靠三个手雷，一支步枪，不顾头上流血的伤口，堵住美军机械化骑兵二师 8 小时，保证我大部队安全渡江，击毁敌人坦克两辆，汽车一辆。战斗英雄刘光子更"过份”，一人俘虏了 63 个英国兵（这些不识几个字的农民实在可敬可爱，就不知他们的能耐为什么会那么大？）。"上甘岭”就不用说了。



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産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了”。

参加过韩战的“常香玉号”飞机现国g在北京昌平的航空博物馆里展出

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人们对朝鲜战争的前因后果，或过程曲直会有不同的认识，但对中国来说，一个直接的收获是：奠定了东北工业基地的安全基础，确立了中国的军事和民族信心；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后来的中国人面对世界强权时的自信，

必然大大折扣。

在抗美援朝进行的同时，新生的共和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彻底摧毁了蒋介石在大陆的一切残余，及盘踞内陆各地的地方武装，解放西藏，过现了除台湾和个别沿海岛屿之外的国家大统一；彻底消除了卖淫、赌博、吸毒、黑社会、封建会道门等社会丑恶现象；在大陆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土改；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遏止了建国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暗流。大陆军民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考验和锻炼，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为将要起步的国家工业化和大规模基本建设奠定了坚的社会基础。

从战后美国人的表现也可看出，美国对这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战争”恨不得彻底忘掉。好莱坞的电影导演们，阑绕那场失败的越南战争和二战，拍了大m的电影，以表现美国大兵的勇敢、幽默和浪漫；但对朝鲜战争，面对更强的对手，理应找到更好的素材来证明美军的勇敢和善战。但很造憾，韩战后期，美军见到中国军人就投降，整个战争找不到值得自豪的战役，确过令编剧们泄气。即使想描述一下对手的残暴和无能，就像二战电影那样，似乎也不可能，正如“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一书中所说：“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

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又是文明的敌人”。麦克阿瑟狂言：如果中国参战，朝鲜战争将变成一场大屠杀；英国简氏国防周刊则讽刺道：如果武器来个对换，那将真是一场大屠杀。让好莱坞拍一部歌颂中国军人的电影显然是不好意思的。

但是，中国人对抗美援朝的“健忘”则是令人费解的。过去几年，中共中央花几亿元人民币拍描述内战的电影《三大战役》，中央电视台拍了大量的古装电视剧，一部《三国演义》就耗资过亿元，可对抗美援朝这种能极大激发爱阈主义热情，又是令每个炎黄子孙骄傲的题材却置之不理*。笔者强烈希望，趁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还健在，加速整理抗美援朝的每一个细节，并通过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抗美援朝战争即使在一千年后仍值得后代自豪。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一。

抗美援朝爆发后，全国青年争相报名参军上前线，一个人口两千万的浙江省就有 100 万青年人要求参军，一个普遍性的埋怨是：参军比选姗马还难；一百人报名只能录取一个。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通过增加産 1 环、义务加班、拣废钢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在半年内演出 170 场，省吃俭用，将收入捐献出来买一架飞机（这几乎超越体能极限，再看一下当今娇嫩而自负的“星”和“腕”们，就能理解“人民艺术家”和“戏子”的根本不同）。

’据了解，中央电视趸 ²ooo 年投资开拍的纪念抗美援朝的电视剧《抗美援朝》，但制作完成后被江泽民时期的外交部建议禁止播放，担心影响中美关系。美国人拍那么多二战的片子，怎么就没担心过影响美德关系？！一群孬种连自己家的体面和自豪都要不敢展现，让人徒呼奈何！中国外交部过去三十年的对外关系处理中，明显看到战略眼光的缺乏导致的恶例比比皆是。

重庆市 63 岁的劳动妇女彭淑贞，临终前将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 3 个金戒指、5 枚银元和一间房屋，全部捐献了出来。湖南湘潭县一位 76

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 8 元的收入，从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之日起，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捐献•谭楚云记”的字样，老人家说：“我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辽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 1200 余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中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 1200 多元，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截至 1952 年 5 月底仅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 5.565 亿元，相当于当时 3710 架战斗机的价款。对于当时贫穷的大陆人民，这笔财富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抗美援朝烈士杜西富的老父亲得知儿子牺牲后，去了已回国换防的连队，对团长说：“我有五个儿子，有三个参军，算这个死了两个，要是没有共産党我翻不了身，我还有两个儿子，你们再要兵，我还让他们来！”正是千万个这样的人民托起民族复兴的希望。

后方人民全体动员积极支持抗美援朝的动人事迹，展示了我们民族的可贵精神和巨大力量。还有什么题材比这些能更好地反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但大陆的艺术家和文化部门，对此置之不理，却将镜头始终对准中南海和清朝皇宫内的一切。

抗美援朝的胜利，为国家赢得了未来几十年的安定局面，使得一直到越南战争时，美国再也没有了当年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狂妄，面对中国的参战警告，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如果说蒋的“拣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因为他还没有为抗曰作好准备，那么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并取得伟大胜利，他 X 做了哪



湘谭县 76 岁的勤杂工谭楚云老人把挑水卖的钱存入竹筒，为购

逵准备呢？他一手懷外，一手安内，一面进行

常曰本!受，¥究共的，胜我

国家建设，用他的大手扫除了中国一百多年的暮气，挥洒出中华民族勃兴的新世纪。毛泽东用他的军事实践，否定了“落后必然挨打”的历史规律。

买武器作贡献。有这样的人民，证明意志的懦弱才是真正的弱者。

敌人想不输也难。

抗曰战争中，国军不少战役惨败给日军，日军在太平洋群岛上被美军打的晕头转向，包括内战中被俘、起义加入解放军的国军将士在内的中国军人在朝鲜把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打得屁滚尿流，这是为什么？这个闭环对抗链中唯一不同点是中国的最高统帅换成了毛泽东。

抗美援朝救了蒋介石一命，使得粟裕箭在弦上的“渡海舰队”（应该说是渔船才对）偃旗息鼓，导致海峡两岸直至今曰的分裂局面，并被昔日的手下败将美、日所利用。至于这是中华民族之福，还是遗憾，则取决于海峡两岸问题的最后解决方式：

如果能和平实现国家的统一，则蒋介石逃过的这一劫将间接成为抗美援朝的一大成果。因海峡两岸当时没能统一，使得台湾避免了大陆过去的政策失误，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对大陆技术和贸易禁运的情况下，台湾这个“反共基地”得以享受市场开放的便利和全球技术进步的成果，并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讯工业中心。至少在个别领域，部分地发挥“复兴基地”的作用。

如果海峡两岸以战争收场，则间接成为抗美援朝的负面后果，以及昔日的手下败将对中国的残酷报复。

可喜的是，海峡两岸的命运毕竟已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可悲的是，台湾总有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并不惜作别人手中的棋子；

遣憾的是，毛、蒋政治智慧带来的默契，在当今两岸政治人物当中已很难再现；欣慰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中国人，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还没有绝望。

（油画）

有必须声明的是：本书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对比，无意否定蒋介石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为统合破碎的国家所做的有效努力，无意否定他领导时期中阈教育和工商业发展上的成绩，更无意对蒋介石抗日的贡献提出过分责难，只是希望在这种比较中看清毛泽东的伟大，阐释毛泽东胜利的必然性，并从中提炼出对后代中国人有巨大参考意义的政治和军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没有毛泽东，蒋介石将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耀眼的巨人，但他很不走运，他遇上了毛泽东，使得他不论怎样努力始终都是错的。这是蒋介石政治人生的悲哀，但无论如何苻待，都是中华民族之幸。

看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阻强敌于朝鲜，斗沙俄于北疆，歼印敌于西南，收西沙于南海……，助临邦鏖战奠边府，驱赶美国佬，敌人再不敢一窥我河山；强汉之风再现，盛唐威仪初露，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的骄傲。您一生的追求在您的老对手“润之贤弟”的领导下初步实现，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中正，您老人家当含笑九泉矣；您个人中原逐鹿的失败相较于民族的崛起，又何憾之有呢？

二战中获得崇高威望的丘吉尔被毛泽东大骂为“战争贩子”

而无可奈何，英国却在欧洲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法国政府正陶醉在打败德国取得欧陆核心地位而得意，但因印度支那战败而在国内灰头土脸。杜鲁门迎接了二战的胜利和战后超级强国地位的确立，但却在韩战中为美国挣得第一次败绩，连带一群小兄弟损兵折将，也断送了自己的连任之梦。中印战争让高傲的哲学家尼赫鲁丢尽了自己与国家的荣耀和威望而郁郁而终，印度国家声望再也抬不起头来，并把宿敌巴基斯坦和中国推到一起。越南战争让约翰逊和尼克松两任总统损兵折将，承受千夫所指，且毫无收获。还是尼克松高明，通过和毛泽东的握手却奇迹般地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树立了纪念碑，为“从哪儿摔倒从哪儿爬起来”增加了最好的例证。赫鲁晓夫实在头痛和毛打交道，今天撤走专家，明天又送来米格 21，最终还是失去中国，也迷失了自己，为苏联造成最大的战略灾难。勃烈日涅夫则始终搞不明白该如何对付中国，核讹诈用了，但被毛泽东摔的两颗核弹给吓得没有讹诈到任何东西，反而把中美推到一起；珍宝岛也打了，可还是没有抢回来。麦克阿瑟，西点军校历史上公认最杰出的毕业生，却在背负满身荣耀的情况下，于朝鲜一战落得被撤职的下场。二战日军在各战场有不少胜迹，唯独和八路军游击队的交手中找不到任何的自豪。以上所有这些风云一时的人物、军队或国家，他们的耻辱和失败中总离不开一个人的影子，他就是毛泽东。因此，蒋介石的倒霉也就不足为怪，更无须遗憾了。靠贬低毛泽东来抬高蒋介石更显得荒唐，因要全世界相信蒋介石比毛泽东和同时代全球所有政治家都更伟大并不容易。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后，抗拒美国的压力而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台独”的图谋，保留了作为 20

世纪主要政治家的最后体面。但他留下的是 2300 万台湾同胞至今还在历史和现实、情感和理智之间的苦苦挣扎。



五、解放军的力量和潜在问题

2001 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国防部长辩称：中国飞行员为了显露自己高超的飞行技术，在跟踪美机时，经常飞得很近。

笔者虽然对美国官员谈话的客观性从没有信心，但这次笔者坚信那位国防部长没有撒谎说得坦率一点：解放军的将士们特别勇敢而且好斗。在全世界都怕美国时，解放军的勇士们却以超人的胆略向靠近国门的美军挑战。撞机牺牲的英雄王伟实际上向举国人民和潜在的敌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不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誓死保护祖国的每一寸领土，每一片蓝天。

如果一名外交官过于好斗的话，则肯定是个缺点。但对于军人来说，这则是极为宝贵的优点，也是军队保持强大战斗力的关键之所在；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军人精神。为了“炫耀”笔者对中国军队问题的发言权，在此介绍一下笔者亲属中的几位军人：王继民，笔者的姨夫，五十年代后期从军，并在军队入党。退伍后曾长期担任大队支书。计划生育开始时，他以身作则，率

先在自己的大家族中实现了“一胎化”，对于农村来说，这简直可用“伟大”来形容。也是当今中国难得一见的从不贪污的干部，家乡硕果仅存的真正共産党员。对今日共産党的现状常摇头叹息。让他大侄子参军，曾参加对越反哦战，头上的钢盔数次被子弹扫掉。他的大儿子王广现，秉持严父的传统，已确立自己的声望。从姨夫的身上，能看到军人党员的不同凡鞾。他是毛泽东时代中共党员的活化石，在他身上能清晰看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影子。



笔者与五弟(1993 冬)

张金友，小舅，曾参加对越自卫反蛾战。小腿中弹，荣立三等功。复员后在税务部门工作。至今两袖清风。

董凤轩，四叔，曾参军六年。刚就任大队主任。

董玉春，五弟，从军三年。属山东人典型性格，为人仗义。原大队领导介绍一种子商贩给村民，但种子不合格导致误农，老实的农民敢怒不敢言。在笔者的鼓励下，五弟挺身而出，联合村民告状，最终将该商贩判刑，大队领导受到批评。在四叔刚任大队主任不久，某项公务处理方法招致物议，遭到五弟的率先反对。看来，这位主任四叔即使想贪污，大家庭这一关也不好过。为了几个破钱让别人点脊梁骨，是难以容忍的。

介绍这些，概因在这本书里这是最令笔者骄傲的一页；毕竟，在祖国的万里国防前线，曾撒下了自己亲人的汗水和鲜血。从他们及其战友身上，对中国军队和军人的风采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笔者在大学也认真参加过一个月的军训，惭愧的是，7 发子弹打飞 2 发；因子靶时自己还在练习瞄准的违规行为，而被领训的解放军叔叔照屁股上踹了一脚，至今还隐隐作痛。

毛泽东时代创立的运动战术，是否还能适于未来的战争并不重要。军事上有千年不变的军事思想，没有千年不变的战略战术。中国的国防战略也已经从“诱敌深入”转化为“拒敌于国门之外”。但毛泽东留给中国军人永恒不变的宝贵财富则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必胜的信心；而打击强敌的辉煌战果，为这种信心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背景、作战案例和心理基础。毛泽东为中国军人确立的人民军队的特征，和不惜一切牺牲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争实例，已经成为中国军事文化的核心内容；它随着每年新兵的入伍，而一代代传承下去。

那么，解放军将士和其它国家以及台湾的军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区别是显然的。

笔者在海外期间，特别留意染湾及外国有军旅生涯的年轻人对战争的态度。明显感觉是，夕卜国及桌湾年轻人在从军的时候，普遍害怕战争。这没什么奇怪的，这是人类对生存的本肖 M 望。

那么，这些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解放军战士呢？

如果说军官喜欢打仗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高级军官；但在解放军里，对打仗的渴望之情遍布各级将士，一致求战心切。笔者遇到的退伍战士，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当了几年兵居然没打过仗真不过瘾。那些曾有机会参加战争的军人，如对印、对越反击战，在战争结束时往往愤愤不平和不能理解：司令部为什么令他们后撤，而不让取得更大的战果？

这种全球军队中罕见的战斗精神，有时可能会导致挑衅的行为，但这绝对是军队战斗力的最根本保证。狭路相逢勇者胜。可以说，在战争爆发前解放军已经先胜对手一筹。虽然中国的文官越来越爱财，但将士不怕死肯定是国家强盛的重要保证。这种精

I?

神加上指挥、军备、国力、政府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和民族主义等要素，决

定了解放军始终是全球最具战斗力的军队。

在和台湾国军兄弟比起来，容易发现，这是解放军相对于国军的最特别之处，也决定了两军战力的必然差距。尤其海峡两岸的兄弟们接受的是同样的文化教育，但却有如此明显的不同，突显了毛泽东给中国军人置入的这些宝贵基因。所以，台湾当政者以为多买先进武器就可以阻滞解放军的进攻，是对解放军的根本不了解。看来，当年国民党在大陆犯的错误，台湾当局并没有吸取教训。海峡两岸应避免一切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麼擦，不误判形势是重要一环。台湾执政当局如果希望避免解放军攻台的话，增加武器采购肯定是最无用、最白痴的做法。台湾即使花千分之一的武器采购资金在福建造几所“希望中学”，也肯定比几十亿美圆的先进武器能更好地阻止两岸的冲突。请“台独”人士不要误会，大陆那饼穷鬼还没到非指望您来捐钱的地步。如果简单地回顾一下国共内战和 49 年后解放军的历次战争，台辫当局就该明白，不论你的武器多么先进，也不会有任何的用途。看一下当年毛泽东面对苏联核威胁，美国、印度的敌意包围而不回避珍宝岛冲突，就该明白毛泽东训练出来的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但是非常遗憾，也非常危险，无论是领教过解放军的美国人，还是台济当局，都在不断地根据两岸的武器装备来判断双方的战力，而对操作武器的人，不予考虑。

这自然引出一个话题，那就是未来两岸统一之后，台湾继续保留自己的军队是否舍理？笔者无意质疑硌湾男儿的勇敢和爱国心，但类似解放军的军事文化是国军所欠缺的。而这又不是靠几本军事教材所能够掌握的。这涉及到部队精神与历史的延伸和传承。看一下台湾国军在“集集大地震”

后六小时才赶到受灾现场

救灾，就可看出国军在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上的严重问题；如果和解放军在地域辽阔的大陆救灾中的表现对比，这种反差尤其明显。台湾国军的问题并不出在士兵上，关键还在政府和军队高层。

现在解放军在部队建设上不是没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还不至于立即带来战斗力的明显下降，但如果不注意亡羊补牢，任其发展，可能会断送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建军传统。那将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最惨重的损失。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退伍军人的安置[47]

中国每年退伍的人数相对于整个就业市场，并不算什么。国家应考虑为每位退伍军人的就业提供协助，如鼓励薪金较高的企业界（如优秀国企和外企）接纳这批人员，并保证三年之内企业不得单方面终止雇佣关系。当然，这种安置并非必须是“吃皇粮”的工作。安排工作的目的是在退伍后的最初三年，能让这些年轻人积累一些基本的财力。国家当然不能担保他们永远有工作。但现在农村兵退伍后两手空空，即使想做生意也难有条件，一切必须从头开始。几年的军旅生涯给他们带来的只有物质上的损失，而没有任何的好处。退伍军人实际上是劳动力中的佼佼者，在冲劲、吃苦耐劳、诚信、眼界、遍布各省的战友关系等方面，决非一般民工可比。如果他们拥有一定经济实力，不少人在经济领域能有所作为。退伍军人安置在包括美国等所有大国中都是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服务。

[47]2018 年 3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这体现了对退伍军人事务的贲际关注。这之前各地发生的退伍军人抗议事件，贸际上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笔者 2002 年写这段内容时，对此事务有所担心和期待，总算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并采取实际措施。



酹毛泽亲挪妞 SH»群 JIE 槭锊銾搁榜 S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

这一现象虽不算特别严重，但值得军事高层的留意。这一现象在国外的军队中并不鲜见。长期以来，解放军在新兵训练上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上，如果不经常性地对参与训练的老兵予以强调，导致偏差的出现是难免的。这对新兵的心态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是需要留意的。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官兵之间的送礼问题。

由于解放军的士兵来自五湖四海，探亲回来自然也会带些地方特産，如果能大家分享一下，这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基层官兵之间的一些家乡土特産赠送，就带来了一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官兵的同志式关系，对职务安排、提衔、转志愿军等带来不公平性。长期以来，积极健康的官兵关系一直是解放军的治军特点，师团长和下士在一个食堂吃饭非常平常，毛泽东甚至一度取消军衔制，可能与此考虑有关。但如果受到现在社会大环境的破坏，对国家的损失未免太大了。在这方面，一向具有严明纪律的解放军，可否做出明文规定：对任何收受礼品的军官，不论多少，哪怕只是一只德州扒鷄或金华火腿，也必将被送上军事法庭。自毛泽东之后，中央军委在军队管理上过于放松，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遗憾。说句不好听的话，毛泽东之后的军队管理根本就象是娘们儿治军。

第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设立军队职业心理辅导员。

这前的一个空白。尤其是受计划生育影响的一代，在社会污浊的大环境下，军人心理的辅导是值得思考的

第五，高学历军人的训练培养和战斗力问题。

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人学历的提高同步进行。但对这些学生军增加的同时，是否能同时失去传统军人的优良传统，并带进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劣根性，是值得注意的（解放军将领普遍喜欢农村兵，概因农村兵朴

实易带，军纪容易保持）。最近几年，解放军在宣传建军成就时，常以多少军官拥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作为指标之一，这是否最终会导致学位本位意识，正如公务员们拼命业余搞博士、硕士学位一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英勇冲锋的排长反而不如一个军校生拥有更多擢升机会是不合理的。

最近几年，尤其是海湾战争之后，中国学者型军官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心理变化，那就是自信心的下调。面对美国的高科技武器，中国学者型军人看到美国军事科技上的强大而立即底气不足，而对基层将士们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视而不见，过去的那份必胜的信心有所动摇，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于别人的长处，否则就很难做到知己知彼。但必须不能忘记，战场上的最后决胜因素始终是人。看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民族战争就明白了。对高学历军人的思想教育、纪律强化和性格磨练至为重要，否则，他们操作先进军事武器所增加的战力，将被意志的薄弱、小市民气和知识分子的臭毛病等不利因素所抵消，他们有了知识，但失去了气概。因此军事高层同时可考虑：是否在各级军官中确保一定比例从基层上来的人员。tt 际上，不少农村兵的智商并不差，只是由于家庭穷或家乡教育落后而无法考上大学；如果把他们放在大城市，不少人具有上名牌大学的能力。

第六，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征兵问题和军人战斗力的保证。

无论中外，家中“独苗”的人生都倍受关注，对于有传宗接

代观念的中国农村家庭，独子的安危尤为关键。如果处理不好，解放军的未来征兵和战斗力必然受到影响。对此，可以考虑利用现在已非常成熟的人工受精技术，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得人们认识到独子的牺牲，并不意味着宗族传承的中断。国家同时在烈属和残疾军人的家庭生活保障方面进行立法。这似乎有点“狂想”，但毕竟是现斑无奈中的一种选择。当年计划生育开始时，农村到处播放人体生理和生育的电影，农村姑娘们各个低头做害羞状，城市姑娘也不敢喘一口大气；但是，今天如果在村头上听到小媳妇们大声说“明天上县医院带环去”，千万不要被吓一跳。只要成为公众习惯，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国家应该将未生育军人纳入精子和卵子冷藏储备对象。一旦有军人牺牲，可以通过有效机制启动为烈士培养后代的法定程序。确保从人工怀孕，到子女出生和抚养，直至大学教育和工作安置的金流程国家责任执行。

第七，军队的换防。

由于中阈的地域广大，解放军不同连队之间的生活和值勤条件差别非常大，大城市的驻军和在西藏边防值勤的官兵，他们的待遇和付出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连队内部，随着官兵关系受社会大环境的不良影响，也会导致一些偏差。中央军委可否考虑将军队的跨军区轮防，以及军区内部各驻地之间的轮防制度化；参考地域的环境、和岗位的艰苦程度，争取做到：任何军人必须在最艰苦地区驻防至少一至两年的时间，才能调往城市及内地驻军。如将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作为任何军人的“必经之路”，否则不能转业、转志愿军或调入机关工作，甚至军校生在毕业前也必须经过这一过程。这种换防的一个好处是，一旦边骝

发生大规模战争，可确保国家能有数 4 充分和曾经历艰苦环境锻炼的军队进行轮换；否则，将南京军区的士兵调往东北、新躺或中印遍境，他们将难以适应当地的严寒和高原环境，甚至可能导致冻伤等有损战斗力的现象发生。如果发生中小规模局部战争，一个济南军区作为战略总预备队是足够的，但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两场同时进行的局部战争或大规模的长期局部战争（如韩战），解放军的任何部队都应该具备成为预备队的能力。韩战期间，中国各省驻军几乎都经过了入朝作战的轮换，就是个例证。当然，如果和中印边境、东北中俄边境、新璐和独联体边境当地的气候条件比起来，朝鲜半岛的寒冬“好过”多了。

第八，军人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纪律建设。

当然，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各级军官能以身作则，首先处理好官兵关系，排除社会大环境的干扰。对军官的个人操守应密切留意。地方执法不严的现象，应避免在军队出现。

如果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军委的领袖们，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不能传承解放军的优秀建军传统，或中央军委在军衔授予方面不能严格把关而掺入太多权利斗争要素或人际关系内容，你们将成为真正的败家子和历史的罪人。一个自私而短见的将帅，或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毁掉几十年的建军成果；一旦损毁，是几代人都难以恢复的。毛泽东时代的民族凝聚力，在地方民众中已大为降低，解放军的精神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体项 P 当今社会风气对军队的不良影响，军队高层的懦弱、庸俗和短见，解放军高级将领在面对社会恶劣环境时的应对能力和对各种诱惑的抵御



能力，实在令笔者有些不放心。

第九，军队国家化的可能性初探

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共産党领导下的军队，简曰“党指挥枪”。在现代国家里，政党拥有军队很不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潮流，但不能因此而说中国“党领军”是封建的，因为中国共産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共産党对军队领导的必然性。但是否因此就认为当今军队领导的体制没有问题呢？军队国家化在当今党国一体的情况下是否就失去了意义了呢？非也！

只需要考虑下列问题，就能意识到军队国家化的必要性：

未来海峡两岸统一后，台湾可能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和解放军是互不隶属的两支军队，还是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的不同军区呢？很显然，没有军队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不仅没有实质的意义，也缺乏稳定统一的保障；尤其是台湾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且一些士兵受“台独”思想侵蚀，如果台湾驻军和大陆驻军之间没有统一指挥和协调的话，东部沿海的国防安全将面临挑战。因此，未来台湾驻军应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央统一指挥下一个台湾军区。这自然带来一个问题：台湾将士是否和大陆将士拥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擢升，甚至调入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或出任军委副主席这样要职的机会呢？很显然，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必须确保这种公平性，如果给台湾将士造成“嫡系旁系”的误解，那对军心的影响和堪济与其它各军区之间的协同作战肯定会带来负面影鞸，蒋介石失败的教训是必须吸取的。

今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虽然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则使得上述问题无法解决，因台湾杰出将



领没有共産党员。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将目前党的中央军委这块牌子摘掉，只留一个国家军委的牌子。这也是在体制上回归宪法。至于解放军目前基层单位里的党组织则可维持不变，国家中央军委内部可以设立党小组，以便在军事动员方面发挥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统一后立即选拔台湾军官进入中央军委。由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存在，如果不幸选择一个隐性台独的军官进入军队核心层，国家将遭受惨重的损失。但有必要为台湾回归及回归后十年内实现台济人进入决策层做体制上的改变。再者，军队国家化虽然对于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但至少在国家形象上将会有所帮助。至于统一后台湾军队的改革问题则有待未来的注意。

从长远来看，党、国、军最高权力分割的问题必须解决，这是确保国家稳定和高效率的保证。第二代军队和党、国核心权力的分割并不是健康的体制，这在全球大国当中也是罕见的。如果说当时的权力分割有国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邓绝对的个人威望和高龄的实际问题，那么江、胡时期中央党、国、军核心权力的分割则未免有些荒唐了，这是体制问题而与胡、江之间的个人关系无关。毛泽东时期毛刘之争和第二代领导人的邓胡、邓赵的教训至今还没有吸取。[48]

[48]第二版加评：本书上述议论，在经过胡锦沟时期江泽民肆意干政，大搞山头主义，导致军队高层腐烂透顶，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大整顿，是建立在习近平“红二代”的特殊背景之上的权威性，也有赖于胡锦涛的全退。有这种权威性的存在才有能力阻止军队的进一步腐败。但这衷有太多的偶然性。中国的国运不能寄托在这种偶然性身上，我希望习近平能善用天下之智，用好自己的权力，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建设一个系统长效的机制。



ML 女

第十一章毛泽东与女人[49]

一、毛婚姻生活的遗憾

毛泽东-生的婚姻生活是坎坷的。一些学者发现， 毛泽东对父母之命的第- - 次婚姻并不是传说的那样抗拒，实际上毛泽东对第-任辛苦持家的贤妻罗氏有着很深的感情，而她 21 岁过早地不幸病逝，让毛泽东痛苦不堪。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诗《虞美人.枕上》实际的写作时间并不是 1921 年，而是更早。笔者细读该诗似乎有所触动:

[49]在本书第一版写作时，本来没计划写此章内容，但当时正值《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热销之时，给毛泽东的形象造成巨大的破坏，笔者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增加本章内容。在第二版出版时，本章内容的前面两节维持不变。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和杨开慧 1920 年冬结婚，第二年即使暂时的别离，也不至于“堆来枕上愁何状”，更不至于能让一个革命青年“晓来百念都灰尽”这种痛苦到灰心而绝望的地步，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因此，有学者认为是后来故

意在时间上作了改动，以掩盖毛泽东实际上存在多年的第一场封建婚姻，毛本人可能也不愿意让人一窥他这个革命家内心的这段带有封建气息但情深意重的婚姻经历。那个贤良淑德的传统性妻子罗氏才是诗中的“枕遍离人”，而不是目前普遍认为的杨开慧。不论后面的婚姻多么浪漫，毛的朴素初恋应该用在这位“离人”身上。这种朴素的婚姻经历对重情而怀旧的毛泽东的影鞾甚至不亚于后来的毛杨婚姻。尤其是，毛泽东对母亲感情很深，而第一任妻子的辛勤持家，孝敬公婆，对于一个中国男人来说，比任何的鲜花美酒和撒娇更激起他的感激。后来毛杨婚姻是现代自由恋爱，杨开慧毕竟是现代女性，对于毛泽东这种还留有一定传统思想的男人来说，在陶醉于自由恋爱时，不可能没有和前面那个贤妻的对比。从《贺新郎•别友(1923 年)》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杨之间曾存在着不小的误会，而这种现代婚姻不可避免的磨擦，在和那位百依百顺的前妻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再看另一位才子胡适的婚姻观，就更容易理解他们这一代人思想上虽然高呼解放，但自己的双脚却还留在传统。如果因此而为两位古人喊造憾，则大可不必，给他们一位现代女子，未必一定是他们的上选。后来人们将″革命”随意加入毛泽东的情感经历和诗词的理解上，是学者们自作多情，也可能为了满足时代需要。毛直到 80 岁高龄时将这首诗凭记忆写下，并交秘书保管。人只有老了，才能放下“革命家”的外衣，表现出真性情。

当然，毛、杨之间的感情无疑是很深的，他 1957 年所作《碟恋花•答李淑一》中可见一斑。杨开慧和毛有事业上的支持，最后因毛而亡，令重情和怀旧的毛泽东不可能割舍掉对先人的感激和思念。但如果说毛、杨感情比第一次更深的话，则毫无根据。



斯诺着《毛泽東的离婚》日文版，对毛泽东和贺子珍关系的恶化有些记载：1937 年红军有几个月平静的难得战争间隙，这时史沫莱特将舞会引入，引起延安已婚妇女们的不满，毛贺之间的误会由此産生；贺子珍的强烈个性使得她经常和毛泽东吵架，最后不理毛泽东的再三挽留而去苏联看病。当毛泽东捎信让抵达迪化（乌鞸木齐）的贺回来，结果她捎给毛泽东一个写在手绢上的绝交信[1]。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她和毛泽东一次有关贺子珍的对话：毛泽東谈起贺子珍，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毛泽东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毛讲：“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毛还告诉曾：他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擊，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東》这本书里，也不含糊地将毛、贺离婚的资任归咎于母亲。有人认为毛对贺“始乱终弃”，显然是不客观的。毛、贺的不和是贺离国的重要原因，并为江青进入毛的生活留下了空间。

江青是在毛的事业有了一定基础或取得重大成就，取得党的领导地位后进入毛的生活的，虽能共同革命，但无共渡苦难岁月的经历。而毛和江青生活环境的迥异，知识和经历的巨大差别也使得他们能成为生活的伴侣，但曾经沧海难为水，婚姻中的爱情成分已不敢奢望。中年毛泽东需要的是个伴侣。当然，笔者不会

[1] 以上内容来自网上，笔者本人没有见到《毛泽东的离婚》日文版原书；本处敢于采用，是因为过去曾读到过有关毛泽东婚姻的类似文章中也提到这本书。


恩爱夫妻（毛泽东和江青）

无聊地对江青说长道短，毛的地位和形象决定了，他吸引包括江青在内的女性的倾慕也是人之胃常情。

从毛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义情调和对所歌颂对象的深情，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改造
也体现了他的深厚感情和理想主义。是否可由此推论，他对自己的婚姻有着某种梦幻般的期盼，这是基于同甘共苦、生死相守、相敬如宾的夫妻深情，这种婚姻远离事业成败得失、名辔权位、物质追求等一切世俗内容。很不幸，重情的毛泽东却在感情上一再遭遇巨大挫折；很造憾，他的地位和权力注定了后来没有人能给他带来这种婚姻上的满足。

当然，作者的上述分析绝对无意暗示江对毛的感情有任何不纯洁。尤其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本身，并不比一普通家庭中的女主人活得轻松。对“文革”中江青的作为，作者没有一些受害者的那种深恶痛绝，换了别人也未必比江青做得更好。当年江青从上海奔赴延安，应该说是一很有理想的艺术工作者。如不嫁给毛泽东，她很可能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衔度过晚年（看一下“样板戏”的水平就不该否认，江青对艺术的理解和创造意识非一般艺术家可比。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曾在 2000 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对江青的文艺水平给予坦率的赞誉。任何研究中国传统曲剧改革历史的人，都不应忽略江青这个名字）。但她嫁入了政治的中心，并在全民狂热的非常时期，不恰当地发泄了自己的权欲。

江青虽贵为“神”妻，但不搞特权；据一些回忆文章批露：江青爱好摄影，经常到中国图片社冲洗相片，每次都能分文不少地付钱；甚至部下从家乡带来的土特産她也要照价付钱。江青对自己要求严格并不是秘密。单就这一点，足以让后来批判她的人

汗颜。毛泽东对失败的对手曾经给予宽容，勾结日本的溥仪得以安享晚年，蒋介石的奉化祖坟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得到保护（而蒋的手下可未曾放过毛泽东的祖坟）。然而，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却被她“文革”时的对手判了个死缓，是否有点过分？[14]

毛和江的关系在建国前已触礁，他曾讲“要不是快进城了，非和她离婚不可”

[51], 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负责和无奈。

建国后，毛泽东的生活中是否出现过其它的女人，这是被议论较多的话题。

建国时他才五十五岁，和江青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如果他不是领袖，可以选择离婚（五十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次离婚高潮，尤其是进城的干部将乡下的老婆休掉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以他大诗人的浪漫、文学家的风采、哲学家的智慧、书法家的洒脱，再配上他那伟岸的形象，幽默的谈吐，吸引成群的美女当不成问题。然而他的地位使他放弃了离婚的权力，作为人而不是神，有个别其它女人出现在他空白的生活中应是非常正常的。在这方面，作为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炎黄子孙们，是否应对他老人家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呢？更何况在他放弃离婚的权力时，已同时体现了他牺牲自我而对国家负寅的高尚人格。很显然，以江青在同时代

---

[50]打倒″四人帮″后，•一些人不择手段地抹黑江青，说她过着资産阶级生活方式，纯粹是无稽之谈，更透露出政客的无耻。目前人们关于毛泽东和女人的资料有多少是客观的，又有多少是痛恨毛泽东的人的恶意捏造？什么″江青不顾翳生劝告而让毛泽东翻身加重毛的病情″、″毛泽东批评江青‘我死后别人非整你不可’″等此类有板有眼的传闻充斥市场。总之，一些人为诬蠛毛泽东和为打倒江青寻找支持，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就人格高度来看，后来猛批毛泽东和江青的急先锋们，并不比被批判者高明，甚至更加下作。

[51]毛泽东的这句话在打倒“四人辩”后被中共媒体频繁报道，以此来证明打倒江青在道义上的可行性。但这句话到底是否真的毛泽东说过，则没有找到确切出处。本书保留这部分，也是基于从最坏角度看问题的叙事原则。

政治家中的不受欢迎，即使毛选择离婚也不会影向他的权力，但却会在百姓中造成不良的示范作用；作为重情人和负责的政治家，毛泽东肯定不愿意。

作者必须在此声明的是，本人没有遇到任何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毛泽东有，或者没有其它的女人。即使他有几个女人，也丝毫不应影鞞后世中国人对他的尊敬和评价，因他对民族复兴的贡献之大足以让后人谅解他些微的瑕疵。实际上，作者对诸如毛泽東这样的伟人的私生活并不感兴趣，因在这种人身上有着更多值得注意之处。遗憾的恩爱夫妻（毛泽东和江青）是，当太多人抱着各种目的，以私生活来不负责任地攻击毛泽东，并已伤害到他的光辉形象时，作者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为毛泽东进行辩护。

二、李志绥的真面目

对毛泽东形象造成重大伤害的当数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辨生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据多位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书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描述李到毛身边工作之前的事，这部分内容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自己杜撰。从该书中可以看出，毛和李的关系密切到了可谈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程度，这与毛泽东的处事风格有出入。毛是一位颇有某种神秘感的人物，就连周恩来等相处大半生的人也不易把握毛富于超越性和跳跃性的思维；考虑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赖，他不太可能和李谈论有关党内斗争的事，毛应该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对毛和其他女子关系的描述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在毛不方便时，警卫员或生活秘书会允许李进入毛的房间去一睹内情？这是难以置信的。

当然，当时年轻姑娘们也不可能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当着李这么一个中年男人大谈“主席真伟大，样样都伟大”的地步。如果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小情人莱温斯基放在这个角色上，李的谎言也许会多一分可信度，尽管莱温斯基当时还没有出生。

假如毛对李的信任程度真的达到可谈重大政治问题，及特许李在任何情况下可径入毛的房间（我相信毛宁可将这种私人感情给农民出身、跟随他半生的卫士长李银桥，也不会给交往不久、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李志绥）。那么，李将信任自己的主子兼朋衣煎私$活抖露出来，又算什么呢？出卖别人信任的人只能是小人。一个小人的书是否值得相信和捧场呢？很遗憾，有不少人将《回忆录》作为攻击毛的又一颗重磅炸弹而反复使用；那不是出于无知和轻信，便是故意或别有用心。

出版商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则，出版商有权要求作者做一定的修改，如果作者一定要出版的话。《回忆录》的内容显然附和了一些西方人搞臭共産国家领袖和他们不喜欢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方向。要求作者对某些内容作扩充甚至夸张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更怀疑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此书的出版。

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宣传机器将自己的价值观推销给世界，当然包括对大人物进行美化整容或丑化。它不会放弃任何好机会将它的好恶强加于人。接收最成功美容手术的莫过于亚伯拉罕•林肯，他被美化为解放黑奴的英雄总统，并被全世界所接受。如果您还记得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所说：“如果不解放黑人也能统一南方的话，就不那么做（解放黑人）”，就该识破林肯头上虚假的光环。

毛泽东私人医生的特殊身分无疑颇具诱惑力，以此作为丑化毛的利

器将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毛的对手们怎能不善加利用？你只需读一下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Nathan)为该书所作的前言，看一下黎安友之流得到这本书的得意和咒骂毛泽东的那种歇斯底里，就能对该书的倾向有个大概的了解。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让黎安友这样一个美国学者如此仇恨，从他对李志绥的一段评价中可见一斑，他这样赞美李：“李医生那坦荡而带微笑的圆脸，在毛众多家臣的团体照中特别突出。他率直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洁的打扮，总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训练；李医生的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似乎即说明了他的才干，又说明了他的弱点，因此使他显得特别不可多得……”。

原来，毛泽东的智慧和成就开启了黎安友之类“西方中心论”者的恶梦；无论是朝鲜和越南战场、中国的发展成就、还是国际外交较量方面，是毛泽东第一次让西方人无法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为所欲为，这让黎安友等“白人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者怎能不恨之入骨呢？而李志绥不过是他们手中一只乖巧的木偶道具罢了。

当黎安友之流借一切机会诋毁毛泽东时，却又有不少美国学者在继续对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和非凡智慧给予充分研究和肯定。这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当然，黎安友这类人内心深处的文化优越感也使他们相信，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不太可能産生一位像丘吉尔和林肯这类“伟大民主领袖”；如果真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的话，那一定是个魔鬼。他说“李医生常瞧见毛手上捧着中国史书。毛爱读流传故事中权术倾轧和欺骗伎俩，他更是熟读伺机而动、声东击西、迂回

攻退之法。他善用‘引蛇出洞’法，鼓励别人表明立场再突而擒之。……”。这是多么无耻和无知的联想。[1]

毛泽东爱读史书是皆知的，他熟读中国历史，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历代文学、哲学著作，毛泽東无所不谱，且常有独到见解。看一下毛泽东在其谈话和诗词中对历史典故的熟练迪用，就可以了解他渊博的学识。在黎安友的思想里，毛泽东不可能在中国史书里学到什么优秀的内容，只能是些“权术倾轧和欺骗伎俩”；至于让其对手头疼万分的“伺机而动、声东击西、迂回攻退”军事战略战术，不过是些整人的权谋之道罢了。《回忆录》中对毛在男女关系方面的渲染和描述，确达到了把毛描绘成魔鬼的目标。至于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在黎安友之流看来，《回忆录》“既提供了第一手观察纪录，又呈现知人论事的洞见”。

像黎安友这类“半瓶子醋”的“中国问题专家”，到底能读惮几本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还是疑问，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骗碗饭吃还可以，但他居然厚着脸皮能对中国人都难以正确认识的毛泽东说三道四，他还能达到什么客观的，或学术的层次，尤其在预先掺入自己好恶的情况下？他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自己预设的框架内胡言乱语罢了。

李志绥写此书的全部目的是什么，只有他本人知道。但《回忆录》的最后还是仑出了两寸狐狸的尾巴。他先是描述了毛去世后，他在政治斗争的夹缝里所受的委屈和无奈，“我们共度的苦
难岁月终于使她（爱妻娴）倒了下来”等，然后，“一九九 0 年，中央卫生局写信来表示要没收我的房子。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们

[1] 真是奇谈怪论，丘吉尔和林肯这种人居然是伟大民主领袖！？您是否还记得：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前曾试图说服丘吉尔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以换取战后蒋介石的亲西方政策，狂妄的丘吉尔叫嚣：‘‘除非战争，英国永远不会放弃香港"。任何炎黄子孙都能识别黎安友之流心目中的“伟大民主领袖”是些什么货色；毛泽东没被他归入这类"伟大民主领袖”真是幸运。

还是将房子收回。我分别给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启卫局长杨德中、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及总书记江泽民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產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本书是为了

（然后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李写《回忆录》时，对自己为毛辛苦一世，落得一无所有的愤慨和报复的欲望，已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回忆录〉〉的内容。当他对毛泽东及其政党恶毒污辱时，也不可避免地羞辱了他无辜的祖国。

《回忆录》的出版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蹒动。李应能好好享受一下巨著畅销的成就感，大量美元的物质满足，报复和泄愤后的快感。但不久李即一命呜呼。是死于被人利用的苦闷，良心发现后的深深愧疚，报复的心愿总算了结，还是别的原因？[16]可以肯定的是，李再也没机会更正书的内容，或揭露该书背后的阴谋。

（请进一步参考附录四）

[16]李志绥在 1994 年底出版该书后几个月，即在美国的家中死亡。后来法轮功主办的媒体将其归罪于中共特工谋杀。但书已经出来，在该书引起轰动之时谋杀他对中共只会有反效果。因此，中共如果要谋杀他也不会选择这个时间。我更倾向于认为，要么真如他合作的出版社所说是死于心脏病，或者是死于背后某个组织的黑手，因为这本精心构建的摧毁共産党领袖形象的书太难得了，它的威力顶得上欧美媒体几十年来无数投入的效果，最好永远不要做更正，更不希望作者有朝一曰良心发现而揭发该书写作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作者死掉是固化一切反毛成果最可靠的手段。



三、中國女性站起來了！可站得更優美

1918年11月16日，湖南长沙一位叫赵五贞的女子，为抗拒父母之命的婚姻而在娶亲的花轿里用剪刀自杀，引起很大抛动。青年毛泽东为此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五贞自杀的批评》，尖锐地指出：赵五贞之死"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所致；“赵是被社会所杀”[19]。体现了对封建意识的愤恨和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也为毛泽东掌握国家领导权后，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大力推动，作了早期的注脚。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并被部分知识女性所接受。虽然经过了中国知识文人的大力宣扬，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古老国家里，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的观念并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即使像胡适这样的才俊在婚姻问题上也不能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百无一用是书生”肯定过于偏激，但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没有政权的参与，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能力必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的思想被广泛传播和被社会所接受认可，不是在蒋中正的中华民国时代，而是发生在1949年之后的人民共和国。

1930年代初期的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下达了一个英明的政令：禁止女性裹脚。当这一政令在孔孟之乡得到贯彻的时候

已经是三十年代后期，这使得笔者的母亲成了中国女性裹脚陋俗的最后一代受害者。那些裹脚裹了一半就“胜利大逃亡”的奶奶伯母们，用她们那畸形的小脚，记录了中华民国的这一重大成就。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其第一部滋法中才首次明文载明妇女和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建国后不久，全大陆范围内彻底消除了行淫和纳妾的社会毒瘤和陋俗，维护了女性的尊严。最具代表性的一句口号是毛泽东的形象比喻：“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城市工业化的推进，女性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在农村，成年女性是不能不参与集体劳动的）等，为女性参于社会活动提供了机铃，直接推动了女性解放思想的实现和普及。重抄一遍在第八章第一节中提到的毛泽东 1965 年致马尔劳的信，他就中阈妇女解放的问题写到：“从开始便给妇女法律平等，但到现在一切仍然有待完成。造成旧中国妇女地位低落的那些思想、文化和习俗一定要消失，而无産阶级的思想、文化和习俗必须出现。中国妇女还未存在于群众中；但他们已开始要求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及其政权在推动中国的女性解放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不论作何种评价，也不论毛泽东在个人男女关系方而受到怎样的揣测，对中国女性解放做出最大贡献的政治家当数毛泽东。
他开创了中国人，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新形态。.



全心全
意

那么，大陆女性解放运动的成果如何呢？要用 V
化的方式对这一社会运动进行描述是
困难的。但作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横向比较，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如果拿中国和曰本及韩国比较的话，中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及活跃程

度远超越日木和韩国女性，这应是没有争议的。即使和台湾的女性做个比较，其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台湾社会虽然已很开放，但以笔者本人和分铐男女朋友的接触和了解，能明显感觉到台湾女性身上浓郁的传统气息。表现在做家务上，台湾女性要比大陆女性主动的多。当然，负面的发现是：皇湾男人身上也较多地保留中国传统的特点，如大男子主义。对大陆的男人们来讲，如果你想展露一下男人的威风，必须作好而对暴风骤雨的思想准备。

中国女性就业率更以 73%而问鼎全球。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活跃程度。很难想象，几卜年前这还是个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型社会。

当然，如果因此而认为大陆的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大功告成的，未免有些草率，在职场等方面歧视女性的现象仍然存在。但另一个极端来行，笔者对大陆妇女解放的目标和成果産生怀疑，甚至是否有矫枉过正的嫌疑，是由一件震撼人心的事件引起的:

1991 年笔者到北京读书期间，得知位于中关村一带的科学院和几所著名高校有很多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其中包括一些享有声ززز的科学家。在清华校阙里就曾见到两份讣告，逝者皆是 50 岁左右的老师。这一现象曾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当时较普遍的看法是：这些人经历过“文革”，在事业上受到较大的冲击等。但如何解释那些更年长的，且经历过反右的知识分子呢？以笔者掌握的有限信息表明，这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大多有一位事业心很重的夫人。

另一件令笔者震撼的事是从师母那儿听到的:导师的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来访，他是西安某高校的教授，其而色红晕，精神

抖擞，与几年前面黄肌瘦的他判若两人。一问方知，这位老教授的老伴去世了，之后娶了一位在校门口开饭馆的守寡老太太。他的前妻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同道，而新娘子则对他关怀得无微不至。老教授感叹地说：″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才知道啥叫生活。”当然，师母，这位曾作过小学校长的善良老太太，讲这个故事给笔者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晚辈端正找对象的思想，尤其是在拒绝了她老人家的一次热心为媒之后。这个故屯在笔者的心里却有别样的冲击，因为，这类现象决不是个别的，而是在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云集的地区普遍存在的事实。这里面更涵盖着一个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改善家庭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课题，那就是：

女权运动的目标和中晒女性的自我定位。

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长期低下，居于从属地位。而儒家思想，尤其是后来的宋明理学强化了这种不平等性，强加给女性沉重的文化枷锁。在家庭里，女人成了男人中心主义的受害者。当然，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国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全无，是不全面的。孔子在《论语》里的一句“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得罪了中国女性，成了女性受歧视的铁证；但这句话实际上对中国男人的思维并没有发挥什么影鞞，有地位和家底的男人照旧娶好几个，而从来不嫌女人难养。尤其在百姓家里，男耕女织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体现和需要，男女之间的分工协作，决定了家务的琐事和男人外出谋生的艰辛一样的不轻松。为了生活的幸福，中国历史上就将夫妻相敬如宝、举案齐眉视为理想的校式，这不能不说是对

“夫道尊严”的有趣修正。尤其当女人成了母亲、婆婆或奶奶之后，不仅能和男主人一样享受晚辈的孝道，甚至在多数家庭里，



女拖拉机手（1964）

男主人远不如女主人受到晚辈更多的关心和尊重，这与中国家庭里男主人喜欢表露的“家长威严”密不可分。

虽然，“一夫多妻制”给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找到了攻击的把柄，但那只是不到百分之一男人的福气，大多数男人最多来个“望梅止渴”。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家中的老婆，都不允许他们得享齐人之福。

有意思的是，在男人中心主义的中国家庭里，男人可能是形式上的中心，男人怕老婆的历史同样悠久而且普遍。从唐朝的唐中宗惧内，到宋代的“河东狮吼”典故，中国男人怕老婆与地位和学识没有关系。《红楼梦》第七十五回里的贾府宴会，贾政坦率承认“怕老婆”，以取悦众人。在《醒世因缘传》第九十一回中那位可怜的吴推官及一干随从，除一丧偶一不带家眷者，皆为惧内者；吴推官辩解道：“世上但是男子，没有不惧内的人。阳消阴长世道，君子怕小人，活人怕死鬼，丈夫怎得不怕老婆？......

风土不一，言语不同，惟有这惧内的道理，到处无异”。有些男人坦率承认惧内，但大多数中国男子更愿意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家长地位不可侵犯，但在家中的能耐只有自知。多数懂事的女人也愿意在外人面前给男人这点面子，把自己放在“小鸟”的地位，但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在家里的权力。当关起门来时，女性会有独到的手段来化解男人的威风。这不能不说是文明古国的一大特异风景。当然，这也表现了中国女性的不错修养。至于个别女人做“胭脂虎啸”状而惊动邻里，只是不小心暴露了家里的故事罢了。

哪位西方人曾说：“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可如果他有机会到中国的家庭住几天，立即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孤陋驻闻。

总体来看，中国女人虽然大多数没机会像武则天或吕后那样飞扬跋扈，名垂青史，也没平等的机会去像穆桂英那样驰骋疆场，更没多少机会做买卖，但似乎中国的女性对这种基本属于男人的特权没有表现出愤愤不平。男人打仗、出外谋生，或背负光宗耀祖的责任而悬梁刺股、寒窗十载等；笔者实在看不出这点特权有任何值得女人羡慕之处。

当然，对于那些有一定宏伟志向的女子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显然是对她们人生梦想的制约。庆幸的是，在传统的中国女性中，这样的女子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大多败的中国女人还是满足于家庭的小圈子，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在交通工具极为落后的时代，让中国女人像男人那样外出做买资或砍柴放牧，即使给了女人平等的权力，她们未必领情。

如果和世界其它民族或文化比起来，历史上同时期中国女性的地位幷不低。不说回教世界和东方的日本、韩国，即使民主思想产生较早的西方国家女性，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被毫无疑问地放在了“一根男人的肋骨”的层次而难以解脱，至今还没机会像神父那样去作“神母”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自古以来，中国的女人何曾仅仅是“一根男人的肋骨”？她们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深藏不露的脊梁骨的角色。不过这样也不坏，中国女人的伟大，也出现了像孟母、岳母、秋谨、

“八女投江”等无数可歌可泣的伟大女性和动人事迹；她们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彩内涵，让她们仅做一根肋骨岂不是太可惜了。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脊梁骨。她们不仅为男人支撑起一个温暖的家，也支撑起一个伟大民族。

自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的思想来到中国。中国的女性终于找到了走出家庭，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中国家庭和社会的新纪元逐渐到来。本来枯糙乏味的男人世界，开始变得丰富多彩，缤纷万千。中国少数知识女性开始用她们特有的细腻和智慧，造福于整个社会,而同时保留了中国

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勤劳、节俭、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他们的美丽和笑声，为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这时的中国女性可能是最美丽的一段时光。只需要看一下“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男性诗人言情诗的数量和水平就可有个大概的了解。而才女的群体比过去几百年的总和还庞大。中国的文人骚客再也不需像过去那样到秦淮河畔，或藏春阁的妓女那儿寻找浪漫的感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迎来了新的春天。妇女解放运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了巨大的飞跃。男女平等的概念更被应用到无远弗届的地步。除了对清理下水道和厕所的活没有兴趣，女性们要在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证明女人的能力，实践男女平等的理念。这对男人来讲本来不应该是件坏事。但后来的实践表明，1949 年之后中国女性在迎接妇女解放的同时，也不小心导致了矫枉过正的嫌疑，为男人、子女甚至自身带来了损失和遗憾。

1949 年之后开始接受教育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着强烈的事业进取心的女性，开始发生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

在工作上，女性已表现得当仁不让，这是正面的发展。但在家庭里，却发生了一些与昔日女性明显不同的变化。在家庭生活上，已将男女平等当作夫妻权力安排的标杆，在处理不慎的情况下难免滑入“斤斤计较”的泥潭。不少女性孝敬公婆的美德似乎也被送进了博物馆。当夫妻意见不合时，夫人们已越来越难于做出让步。夫妻之间的那份亲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男人的本能弱点使得男人的生活能力、条理和细心程度始终不如女性；而阳刚易碎又决定了貌似强壮的男人自身的脆弱性，和女性阴柔而富韧性的特点相比，尤其明显。造物主创造男人时，又为男人设下了一个“死穴”，使得男人的生活不能离开女人的关怀，让体态弱小的女人有了获得男人保护的资本和诱因。这虽然体现了造物主创造人类的伟大智慧，但可苦了后来的华夏男儿，这肯定超出造物主的预料之外。

固然，女人体格上不如男人强壮的不足，已随着技术的进步而逐渐得到弥补。当看到体态娇小的女子驾驶着汽车飞奔时，你无法不惊叹于社会的进步。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男人的高大形象除了在相亲时派点用场，已越来越象是多余的摆设。

当中国的女人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阳刚之气，中国男人本来就有点惧内的遗传基因，更加走向了极端。所以当中国的女人呼吁“中国男子汉”时，她们越来越失望。1991 年，上海电视台制作了《海派丈夫变奏曲》的节目，其主题歌成为上海女人“寻找男子汉”的写照：“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蓝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缴，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很显然，几千年来中国男人身上的那份“虎性”，在“河东狮吼”震慑下，已变成了“猫的温柔”。

男人造就世界，女人造就男人。有什么样的女人，必然产生什么样的男人。当女人为今日中国男人的退化而感慨时，是否注意到女性自身的责任？如果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放在今日的中国，他们很难有名垂青史的机会。跟着刘备到处跑，刘备的夫人肯定不同意。有不少海外学子希望毕业后回国工作，然而夫人的不悦之色使得他们只得放弃回国的打算。

也许，昔日中国男人驰骋天下的辉煌岁月，已很难再现。因为，他们身上的那份野性已荡然无存，而在有限的活动空间里，又必须得到夫人的恩准。你还能指望这样的中国男人做得成什么？即使看一下当今中国的贪官们，他们的背后至少会有一个女人的影子。如果他们不贪污的话，女

人的那份攀比和虚荣心，将令他们在家里无地自容。

如果女人真愿意和男人来个角色对换也没什么。中国女人在各方面攻城掠地，驰骋天下，那也一定是中华之福。男人理家，女人挣钱养家。但女人们似乎不答应。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女士们的高论：男方的收入当然不能比女方低。这时，男女平等的标尺自然被抛到九霄云外。既要有理想的收入，又必须有所成就，大小事物的决策权又掌握在夫人的手里；对当今的中国大陆男士们来说，似乎活得越来越难。随着女性性观念的开放，离婚率的提高，男人更不敢掉以轻心。

男人受点委屈也许活该，但孩子们的委屈则令人难以接受。当今的女性甚至对给孩子喂奶这种令笔者羡慕的美事，也是女人天经地义的责任，都感到头疼。据说是为了保护身材，也可能是因为事业，不愿意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在孩子刚出世不久，就不得不面对妈妈解放的苦果。这是令笔者这样一位大男人最无法接受，又最无可奈何的事，谁让上帝不给男人这项功能？

作贤妻良母已被越来越多的女性不以为然。问题是，如果女人不成为贤妻良母，那么你的社会角色应定位在何处？如果不考虑职业上的定位，那么女性的角色只剩两个，一是朋友，一是性伴侣。不知聪慧的女性们是否注意到，一位贤妻良母的美丽可持续一生，甚至直至身后，而性伴侣的美丽很可能只有一个小时。

一般情况下，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上被体现出来没什么不妥，但如果因此导致亲情的削弱就未免有些可悲了。人的一生难免一些窘境，只有亲情的存在才是唯一最可靠的，如果不恰当地滥用男女平等，女权运动的庸俗化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笔者曾调查过三年困难时期家乡饿死人的事。针对“那几位为什么会被饿死而其它人却可以挺过来？”老一辈的人给了笔者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饿死的人，他们老婆不贤惠。因为男人饭量大，而他老婆在一家人之间搞口粮平均分配，使得女人和孩子有足以活命的口粮，但对男人来说，这点粮食已难以应付。经历过苦难的人也许会发现亲情的可贵，也可能发现婚姻关系的冷漠。

三年困难时期，笔者的大哥、姐和父母能安全度过，头脑灵活的父亲付出了巨大的艰辛，用他的双腿跑到安徽蚌埠、河南济源、河北邯郸等地，用家乡的白芍换回些许的玉米。甚至 I960 年除夕之夜，父亲从邯郓带回玉米的途中被冻僵在村庄南面的路旁，直到被村民救起。而母亲的辛勤持家和无私的爱对家庭渡过难关，是必不可少的。她不停地寻找一切可以入口的东西，包括菜叶、植物根须等，当父亲在外奔波时，维持着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庭生命。母亲常说：“要不是你爹，咱过不了那一关”，而老爹则说：“这个家亏得你娘”。一场惊天大灾难，不但没有摧毁他们，反而使他们彼此终生抱有感激。这和文化程度没有关系。

母亲代表了那最后一代受封建礼教影响的中国女性。她将全部的爱用日夜的操劳，无所保留地给了家庭。她没听说过女权运动，也不在乎男女平等的标杆，甚至没兴趣计较自己是否吃亏，但谁敢因此而嘲笑她的落伍？

当然，母亲幷非真的对男女平等一无所知。当笔者大学毕业时，母亲，那个从来不让儿子进厨房的母亲，硬是逼着笔者跟她





学做饭，理由是：以后成家了，两个人上班，你总不能下班后就坐着等饭吃，老让上一天班的媳妇做给你吃合适吗？母亲台无疑问地了解男女平等的含义，但对自己她却放弃了追求的权力。在她身上轻易发现母爱的伟大和神圣。

当代的女性们也许会对母亲一代生活的不够浪漫或缺乏情调而不屑一顾，但你绝对不敢说她们自私。她们用辛劳的汗水挥洒着那熠熠闪光的母性。在她们身上了保留了女性最伟大的质量。

母性是女人有别于男人，与美丑、贵贱、肤色、种族无关，且令男人永远无法超越却又永远期待和需要的女性特质。但当今日的中国女性已越来越普遍地收藏起她们体内的母性燥动，那么，除了“性”和生育的功能，您还剩下些什么特别之处呢？如果男人结婚仅仅获得了一个稳定而免费的性伴侣，及作爸爸的机会，桃袮烈烈的女权运动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一一女人不能接受仅作为满足男人的性需要和作为生育机器而存在。这未免令妇女解放运动推动者们倍感失望和尴尬。

对于男人来说，失去母性的拥抱又何尝不是一大悲哀呢？

女性走向社会无疑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也令世界变得更加缤纷万千，极大地改变了女性的形象和精神风貌，也给男人自身的世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如果女人只是待在家里，因没有机会丰富自己的素材而使她的智慧不能充分转化为生活的创意；同时，也必将过分关注男人的一举一动和衣服口袋里的内容，男人裤子上粘的一根长头发将足以令她紧张万分；也给男人的正常生活带来无形的压力。因此，女人走出家庭的小圈子而进入社会的大环境，对女人和男人都是一件幸事。

但如果女人走向社会的同时，将家庭和亲情带入到一个扭曲的状态，将是极其悲哀的。考虑到男女身体和心理素质的差异，男人在当今社会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必然会拉大男女平均寿命的差距。有朝一日，随处可见孤独的高龄老太太，而她的老伴早已乘鹤西去。那时，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性自身定位的偏差所带来的恶果就要显现出来。很遗憾，您只有独自吞下这一恶果，而无用的老头子再也没机会去抚慰您晚年的孤独和哀愁。

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的男女们似乎开始憧得“爱情”的意义。她们开始为了“爱”而不惜一切。很遗憾，对婚姻关系中的“爱情”成份，中国的现代男女们只搞憧了不到一半。中国千百年来对夫妻关系的最正面描述是“恩爱”，且“恩”字在前，“爱”在后。“爱”是所有动物的本能所在，人类虽习惯将自己的爱情描述得伟大异常，但实际上，和动物界的爱情比起来，人类的爱情幷没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有，那是人类学会用歌剧、诗词或鲜花来表达或歌颂爱情，而动物则没这点天分，最多来个“孔雀开屏”，或几声夜猫的嘶叫。中华文明在婚姻上的首要体现是“恩”，有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之说，随着性观念开放，您准备为未来的另一半把“恩”置于何处？正是这种对“恩”的记取和报答，体现了人性的高尚，成就了中国人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夫妻关系的高质量。这是西方文化下“爱情万岁”主导的婚姻所无法比的。但今日的中国男女在不顾一切地追逐所谓的爱情时，舍弃了最能体现中国人家庭价值的“恩”字。即使再过几千年，重“恩”的品德也比对“爱情”的重视，更能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浪漫、鲜花固然令人陶醉，但生活的根本则是下面覆盖的泥土，其中饱含真爱、尊重和感激的元素。

爱情可能是人类关系中最不靠谱的关系之一，正因为他的激动人心而又难以预测，它才成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正如足球比赛之所以引人入胜，就是因为结果的不可测性。而中国人历来对家庭的重视所体现出的亲情中心主义和感恩心态，才是更高层次的婚姻关系。

西方不少学者对中华民族的深入研究后发现：我们这个民族令人敬畏的特点莫过于超人的忍耐和坚韧、聪敏和勤劳，以及保守的家庭观。而当今风起云涌的性开放，将从根本上摧毁中国的传统婚姻和家庭观。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质讨必将大打折扣，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稳定和可信赖的生活和心理疗普基地——家庭。性开放和个人主义根本是对有序社会的挑战。据传闻，80 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策割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间鼓励性开放、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如果这个传闻属实的话，那美国人无疑抓到了打击中华民族的一根最敏感神经，它比原子弹能更有效地摧毁我们这个民族，因它要动摇的是我们文明的基石。而中国的一些以学术名义而肆意宣扬性开放的学者、文妓和不负责任的戏子们则毫无疑问地成了毁我中华的帮凶和走狗。

笔者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该是：政治上民主，言论上开放，文化上宽容，家庭上保守，工作上敬业和进取。

当然，本节所及之女性现象，幷非发生在每个女性身上，而是因为这些现象与过去相比有愈演愈烈之势，使笔者不忍回避。

面对过度计划生育和享乐主义及事业追求动机下导致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大部分女性在生育阶段重回家庭的可能性，也许是值得探讨的。尤其是生活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们，为了事业和担心抚养孩子的精力不够而拒绝多生孩子，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性的

现象。这是海外中华民族成员不负责任的种族自毁之路。甚至可以说，生活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如果夫妻不想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给您一个思考题：您个人事业的成功为所在国家贡献良多，然后让外族去享受您的成果，自己的后人因人口不足而难以获得足够政治权力，甚至最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多么愚蠢的价值观：只给外族贡献，而自己不享用，自己的那点成就感还有意义吗？

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和福利配套让女人回归家庭，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当然，并不是说今日女性解放运动已经过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多歧视女性的现象，这是值得男人们不断改进的课题。

女性解放运动的最大成果是让女性走向社会，并和男人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女性对自身定位的偏差，进而导致与人类自然本性的冲突，生育责任意识的淡化，和阴阳相协的动摇。虽然这点遗憾是瑕不掩瑜，但如果当代中国女性能对女性的定位和女权运动的方向再做更精细的思考和调整，无疑将令中国的女性们变得更加可亲、可爱和美丽。

本节谈论女性解放的话题，并不意味着男人们可以袖手旁观或随意推卸责任。一个男人如果不积极进取，如果不懂得付出，你还有什么资格对女人指手选脚？

寻找一条让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不至于太累的生活道路，无疑是摆在中国女性面前的任重道远且深具意义的课题。对此，中国的男人们就不便说话了。

一 974 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调人才难得



第十二章毛后时代邓小平及

中共中央之失 1

本书多处以邓小平和中共第二代领导层的事业作比较，无意否定邓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无意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只是为了在比较中能更清楚地看待毛泽东对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所犯错误的历史必然性。对过去过分贬毛、过高抬邓的做法予以纠正，部分地还历史真面目。当然，近二十年来的疯狂反毛运动，发端于邓小平主政时期，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较的重要原因。即使邓小平本人对

毛泽东形象曾给予有限保护的一面, 幷坚决顶住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倾向，也不能让笔者回避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片段

[1]1998 年笔者所写的著名八章网文《为毛泽东辩护一一兼谈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和本来面目》中的一章″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和本来面目"，被网友单独拿出在网上传播甚广。本章即在该文基础上扩充而成 P 第二版只对第一版的部分内容做了微调。

一、结束毛泽东时代方式的拙劣和短见

一九八零年初，学校曾组织我们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观看邓小平七九年访美的记录片。在欢迎邓的音乐会上，当一群美国小学生用中文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时，镜头在邓的脸上停留五秒钟；邓僵硬的、没有半点喜色的脸给年仅十四岁的作者留下深刻印象，也一定让美国主人感到奇怪。过于早熟的政治意识使笔者强烈地感觉到一场反毛运动将要来临，而以邓小平为首的“文革”受害者们将在实是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掺入个人的情绪和报复的本能冲动。[1]

八一年，《决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获得中共中央的通过，拉开了批毛反毛的序幕。虽然从《决议》中能感觉到中央试图以委婉的语言达到对毛的批评，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已经是过分。毕竟，中央在结束毛泽东时代及其影响时，完全忽略了人民应有的心理准备，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使得《决议》带来了矫枉过正的实际效果。所造成冲击和思想混乱，远远超过决议的范围。

[1] 在第一代领导人中，资历比邓深，毛更加信赖的大有人在，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则特别地欣赏。"文革”期间邓的待遇比同为刘邓集团的刘少奇好得多，后来再次启用。笔者怀疑毛泽东有刻意栽培和考验邓的目的。在 1976 年毛已时日无多，却再次“批邓”，目的何在？笔者怀疑毛泽东有如下动机：接班人肯定比邓政治上可靠，但未必比邓有能力，故先打倒邓，由接班人再启用邓，邓必倾力报答"新君"。当观看《雍正王朝》中康熙临终废大臣时，忽有上述奇想。但邓毫不客气地把启用他的华国锋给赶出局。当然，这个乱想只是乱想。


第十二章　毛後時代鄧小平及中共中央之失

來了一個矯枉過正的實際效果。所造成的衝擊和思想混亂，遠遠超越《決議》的框架範圍。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决议》除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的七年予以充分肯定外，毛泽东领导下的其余二十年几乎被否定。在全党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各界掀起了检讨毛泽东过错的声浪。文艺界更不甘落后，通过电视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国以来的成就。当打开国门看到外国的发达时，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泽东的错误，中国就应该如何发达，人民就应如何富有。他们无视其它和中国建国时有相近国情、而已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的存在；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国薄弱的基础和发展环境的恶劣；“实事求是”变成了反毛的专用借口。毛的语录被刷掉，画像被撕毁，塑像被推倒，家里的石膏像被扔进垃圾箱……。而中共中央对此没加以任何的控制，这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已经等同于认可和支持。

让当时年青的作者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在农村。农民们将毛主席画像保留，或担心犯政治错误而像春节后送神像般烧掉，或将石膏像悄悄藏起。在这些土气的乡下人身上，总算保留了整个民族的一份良心。

作者在修改此书时，每读至上述这段历史回顾，总禁不住情绪激动。一位为我们民族的独立、发展和尊严做出无与伦比贡献的伟大领袖，大半生求救国真理，南征北战，家庭因他雕零，国内外敌对实力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他的攻击。然而，他做梦也不曾想到，为之奉献满腔热血的民族却在他身后对其进行了厚颜无耻的羞辱。当我们为自己五千年悠久文明而自豪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们身上的庸俗和市侩气？我们这个民族真的那么成熟吗？

尤其是反毛急先锋的中共领袖和见风使舵的知识文人们，你们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不足？和那些目不识丁、满身尘土的乡巴佬比起来，你们显得多么可悲而又可笑！令人恨铁不成钢的中国知识分子，你们曾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布道者和帮凶，转身又成为毛泽东的诋毁者，你什么时候才能秉承自己的一份良知，坚定地肩负起对社会和公义的责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超凡智慧和胆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所做所思岂是几个庸才凡夫可以轻易领会？二十年前我们批评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今天不正在证明我们的浅薄和轻率吗？“缘槐蚂蚁”有“夸大国”的勇气，但却没有撼动大树的能力。

正是这种不健康情绪的弥漫，导致对毛泽东时代的处理变成对毛泽东时代的简单否定，缺乏冷静思考，为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第二章第三节提到的人民公社改乡镇，就是这种简单思路的典型案例。



二、“集体结晶论”及其它

在毛泽东逝世后，知识分子从检讨毛的错误迅速上升到检讨共产党的错误、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发展逻辑。邓小平慌忙推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不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忠的结晶”。邓试图将毛泽东和共产党、社会主

义制度割裂开来的作法显然是短见和幼稚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和整个中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已熔为一体，没有毛的中共还是中共吗？没有毛的社会主义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的解放军还是人民子弟兵吗？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得失可游离于共产党之外而作为个体予以评价，但毛任何时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会主义制度分离、和人民军队分离。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颇为滑稽的集体捞功之墨。打开和毛一起战斗过的革命家如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文集，然后再读毛泽东雄文四卷，能强烈感觉到他们和毛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是接近的思维层面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大作完成时，其它领袖们还没搞清楚该干什么呢。没有上述领袖们参与革命，毛泽东身边肯定会有其它人参与并取得革命成功；但没有毛泽东参与，上述领袖们根本我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并名垂青史；长征前后中共及其军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要拿国共两党同时代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进行对比，除毛泽东外，共产党其他人并不比国民党里的同级别领袖高明多少，把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等放到蒋介石手下，看他们还有机会“集体智慧”吗?

当然，正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们的助手也为科学发现做了不少工作，其它领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但他们的贡献还没到有资格强调“集体智慧”的地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是长期的、成功与失败的无数次反复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集体结晶论"无疑是对此结论的歪曲。

即便笔者本人对以上所有领袖们的崇敬之情，也不能因此而放弃评价历史的辨证思维和科学精神。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是毛泽东让中共其他政治家和军事家以胜利者的姿态名垂史册，并荫及后人，因此，这些毛泽东同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及其后代，是最不应该对毛泽东说三道四的，是最应该对毛泽东持感恩与崇敬之心的。但从毛后时代的表现看，

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做人的角度讲，显然是不合格的。

流行海内外、将邓和毛相提幷论的作法更是奇怪无比。如果说毛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那么邓则是在新纪元里开始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新阶段。毛对中国的影响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邓只可能是短暂的。邓比之于毛，如月亮比之于太阳；当邓的支持者试图因太阳黑子而遮住太阳的光芒时，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个有趣的结论是“没有邓小^^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这一结论大有值得商榷之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表明了毛是新中国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那么邓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条件哪？换了别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经历过“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邓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幷没像毛那样制定系统的指导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选择。实际上，经历毛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后转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轻工业优先战略是自然的转换，国际环境许可下对外开放也是历史的必然，将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大势所趋。赵紫阳任总理时曾讲

“没有’文革’的失误就不会有现在的大彻大悟”，部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没有邓，其它领导人最终都会走改革开放

的道路，都会“摸着石头过河”。林彪在他的“五七一”纪要中已表露了后来改革的部分思路。

当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内容如果仅指物质上的，那无疑比过去“幸福”许多，但信仰迷失、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横行、少儿失学偄重、百姓怨声载道、弱势群体遭受欺压而得不到保护等，表明今日的生活幷不那么“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确、为官清廉、民风朴实的年代更多了几分愁苦。

另外，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相提幷论，强烈暗示毛泽东主要只在建国之功，而将建国后的主要发展之功归于邓的名下，本书前面章节已对此作了否定。这样幷列的口号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历史、抹杀二十八年中几代人无私奉献的反动性质！

至于对毛泽东“三七开”的判断，更是荒谬之极。

毛泽东的建国之功，在其一生的功绩中至少占五成，那解放后毛泽东的错误就要占到六成才能凑够这个比例。按照这个推理，解放后所有的过错都是毛泽东的，还未必凑得上这个六成的比例。建国后 27 年中，没有毛泽东似乎中国可以发展的更好？看一下八大前后刘周邓主导国家事务后的糟糕国家管理能力，就可以看出，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发展成就，更不用提建国后几次民族战争所挽回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中国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毛泽东后期近乎百分之百的儿童入学率，完善的各级医疗体系，以及远超越中国实力的外交影响力。所有这些，指望刘邓周已经证明是不可能完成的，至少，没有毛泽东的坚持，刘邓早就让“两弹”下马了，“一星”也不可能上天了。

即便毛泽东建国后有错，那他的过错也已经固化，而用毛泽

东军事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几十年致力于建设的平等观念和民族思想解放，恢复的民族自信，基础建设成果等，将让中国人永远受益，也就是说，如果以时间跨度为分母，以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持续贡献为分子，那这个分子将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日益逼近分母，或者说，毛泽东的错误占比将逐渐趋向无穷小。

正是以这样的历史大格局来看问题，毛泽东才对秦始皇给予了肯定。和中国两千年政治体制稳定和国家大一统比起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小错误。以同样的格局看待毛泽东，不难得出更客观的结论。中国在大变革的时代里，在整个民族需要一次彻底的自我改造时，需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来推动领导民族的大复兴，这绝对不是“摸石头过河”层次的领导笼力所能胜任；虽然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难免瑕疵，也比一个什么大方向都抓不准或不敢抓的“完美者”更令人尊敬，也更符合民族复兴的需要。至于那些蝇营狗苟、滥用权力的自私政客，你有什么资格对毛泽东评头论足？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感言于韶山毛泽东故居

三、“批毛”的不良后果及中共的代价

《决议》的通过和接强而来的批毛浪潮，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乱，“六•四”事件是十年来思想混乱的必然结果。至今还有不少人大骂"共产党当政以来没干多少好事”，能怪他们吗？在中共自己传媒

和文章中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六•四”后邓小平沉痛地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很遗憾，邓至死都没有认识到祸根在哪里。前苏联在允许对列宁、斯大林肆意攻击时还指望苏维埃联盟的完整，中国对毛泽东不负责任批判时还指望人民对共产党有坚定的信心，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国际间存在明争暗斗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国搞“和平演变”也属正常，“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幷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共建立起来的坚实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对执政党和其社会制度的信赖幷没有改变。在华国锋时代，中国人思想上还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纯朴和坚定信仰，如果中共中央能抱更宽阔的胸怀，更高瞻远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对建国以来所犯错误进行党的集体反思，对建国二十七年历史指出失误的同时肯定进步和发展事实，用个案处理兼说服教育的方式对冤假错案一次性处理，在不损害毛光辉形象的情况下在领导层面上对毛进行保护性批评，用三、五年时间内实现毛泽东时代的“软着陆”是完全可能的。

《决议》的通过也在国际上给中共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文革”时期，虽然有不少的西方人坚决反共，但对毛泽东却有复杂的心态，反对者有之，推崇者更不乏其人。在“毛泽东与个人崇拜”一章中已有论述。这实际上是中共在毛后时代的一笔财富。但《决议》通过后，海外拥毛人士失去了市场，而反毛、反共力量则趁势而为。直到九十年代，对毛泽东给予较高评价的声音再现，但已很难抢占舆论的主流。1999 年 10 月 *1 号,* 《纽约时报》刊登社论《中国革命五十周年》（uThe50thAnniversaryOfTheChineseRevolutionw）论述中国五十周年的成就，谈到"数百万人民在毛的奇怪经济政策中丧失了生命，在六十至七十年代

的狂热’文革’期间牺牲了个人的事业和热情。实际上，半个世纪的所有经济成就都是自 1978 年邓小平放弃毛的社会主义和对外开放，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后实现的”。一位叫瑞蒙•劳塔(RaymondLotta)的学者给该报社发文，对该社论提出质疑，以数据列举了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就，最后问到：“如果这不是进步的话，那是什么？”。很自然，也遗憾，《纽约时报》拒绝予以刊登[20]。全面强调“文革”的非人道性，进而否定中共和毛泽东，已成为一些人士的惯用伎俩。

“文革”在毛泽东逝世后即自动结束，高考恢复，科技大会召开，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继续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导，对过去采取辩证的扬弃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顺利，今日中国的很多弊端也不会这样严重。

多年来，每当作者想及中共通过《决议》这种疾风暴雨方式结束毛泽东时代，并放任各界对毛肆意攻击和报复时，总深感惋惜。为国家失去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坚固社会和政治基础而心痛万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创了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时代，培养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一代领导人和民众。《决议》则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八十年代，并影响了一代人。

苍天有眼，当我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及时，让中国知识分子猛醒，给中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初步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思想混乱。这既是执政党的幸运，也是我中华之福。毛泽东时代还不太遥远，那时的人还在，知识分子们重新购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泽东选集》，掀起了全国性的、自发的“寻回毛泽东”的高潮。他们在〈〈毛选》里看到了对现实世

界的精辟分析，开始用“矛盾的、斗争的方法”来辨别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世界。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向中国的大学生们兜售他的“民主自由”时，学生们非但没有照单全收，反而送上了

“湖南的红辣椒”。

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年轻人已肩负起当今中国的领导责任，今日的中国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个大国未来的重任，虽然当今教育方法和干部选拔制度弊端甚多。这是毛泽东几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结果，决不是什么“集体智忠的结晶”。

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问题，是中共与苏共的主要理论分歧之一，苏共认为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就不再产生，永远不会有复辟的可能。而毛泽东则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剥削阶级复辟的危险幷没消失, 因此提出在火席蛍, 滇导卜-继绩革命的理论。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则直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至此，谁还能说毛泽东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完全错了呢?



四、毛后时代军队领导上的失误

邓小平的历史功过，留待历史评说。笔者怎敢，又怎能以一家之言以蔽之?

但邓小平的一些重要政治失误是不能回避的。提出的目的不在责备,

更无意进行恶意攻击，而是希望的醒

当今和未来。历史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此。尤其在毛泽东巨人的背影之中，能更清楚地看出问题之所在。

当中国为一个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后来者必须有所总结和警惕，以避免类似错误的重演，否则，心不白交了这笔学费？

“文革”虽然局势混乱，人民军队的纪律和纯洁幷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人民子弟兵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和钢铁一样的纪律，军民鱼水情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要素。然而，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一句“让解放军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军委主席任内，开始了空前绝后、文明国家仅见的军队和武警大规模经商，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时期军队搞生产的本来目的；对军队的纪律、战斗力、和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摧残，也为当时的国家正常商贸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干扰。这支毛泽东建立和发展，幷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武装的军队，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轻武风气，将军人的崇高武德和军人荣誉感首次撒满中华大地。解放军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有效地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极大地恢复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巨大遗产。如果不是人民军队过硬的政治军事积累和光辉的历史背景，真难于想象，遭受十多年糖衣炮弹的狂排烂炸，他是否还能冲录陷阵？而“六•四”对解放军的滥用，更进一步冲击了子弟兵和人民的鱼水深情，为我们可爱而伟大的人民军队留下太大的遗憾，也成为邓小平领军生涯中无法抹掉的污点。再经过江泽民二十三年（江泽民主政十三年，垂帘干政十年）的无作为，导致整个军队高层几乎烂透。邓江两代短见的领导人对解放军战斗力的破坏超过国军、日军、美军、越军、苏军、印军对我军伤害的总和。值得庆幸的是，习

近平一代受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对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本来应该什么样还有清晰的记忆，又有先辈传承的强烈责任感，以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对军队大力整肃，初步结束了军队的进一步腐烂。要说习近平挽救了军队，不算夸张。

每念及此，笔者都为中华民族曾拥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庆幸；不论他是否给了我锦衣美食，至少他给了我们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勇气和自豪。他不再让我们像先辈那样害怕洋人，更不会让我们任人宰割。他的这笔遗产将让中国人民世代受惠，对毛泽东一个人或其一代人，我们还应苛求些什么呢？他给我们的即使仅这一笔遗产，难道还不够多吗？

一名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官总结韩战时道："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如果中美开战）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天才，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把他当作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西点军校崇敬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子。" "很痛心，毛后中国



全方位的"去毛泽东化"已经让中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读到这里，读者们应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西方人不放过任何机会诋



毛泽东思想育新人

毁毛泽东。对付解放军这样的对手和毛泽东教育和组织起来的人民，靠先进武器是难以奏效的，最佳的方法就是摧毁毛泽东在百姓和军人心目中的地位，使他们怀疑一切；而中共高层的短见政客和一些无知的大陆知识分子则无意或有意间成了他们反华的帮凶和代理人！

五、值得注意的问题及无奈中的期望

本文对邓小平的批评，如果令读者因此而忽略或否定了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和地位，那将是遗憾的。对邓小平过高的评价，或试图对邓的全面否定，或别有用心地贬邓以扬毛，都是不客观的。

邓小平的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讲又何尝不是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遗憾，甚至是中共的历史性遗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尤其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初步成功，改革开放逐渐启动，中共宣传部门和高级领导人以及御用文人，开始了对邓小平的极力吹捧和宣传。

这实际上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共几十年来的一贯通病，即在一元化的舆论和非制度化的用人环境下，“拍马屁”风气的盛行。任何领导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总是尽力证明自己和核心的步调多么一致，以及对核心的无限敬佩，为此不惜利用任何场合和各种肉麻的形容词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

小平，都有着人类的本能弱点，“六十而耳不顺”几成常态。在此情况下，铮铮铁骨的直谏“大臣”也自然难于涌现。必然导致中共体制内长期存在的“逆向淘汰”现象的延续，并最终对核心的历史形象造成难于弥补的伤害。

当然，这一由体制导致的劣质政治文化也将长期制约公务员整体素质和执政水平的提高。这与公务员们学位的高低没有关系。“谏我者友，谀我者仇”的警句用在自己的身上，又是多么的困难。

尤其糟糕的是，中共之后的舆论中逐渐出现了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隐约对比，甚至出现不惜贬毛以扬邓的趋势。这实际上构成了对邓小平的真正伤害。

一本由国内知名学者撰写的《影响中国历史 100 名人》（1999 年 7 月版，民族出版社），甚至将邓小平和黄帝、大禹、孔子、秦王嬴政、刘彻、毛泽东等列入“作为’民族之魂’的贡献最大的 10 个历史人物”，李世民、康熙、孙中山、曹操等则排入“政治家”之篇中；如果该书能将邓小平列位于“改革家”名人，和管仲、王安石、商鞅等并列，至少能较贴切地反映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虽然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像邓小平这样继往开来的人物并非个别。该书实际上代表了中国舆论界和政界普遍性的不良倾向。这只能留下历史和学术研究上的笑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学术研究上科学精神的欠缺，也表露无遗。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作为历史上罕见的时代，留给后人的是巨大的财富，也有教训。但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研究必须抛弃一切偏见或为尊者讳的心态，文过饰非或否定失误都是极其错误的；即便笔者本人对毛泽东的尊敬和辩护，也反对一切将毛泽东时代错误政策的极力美化和掩饰，因为这根本上是对历史评价的不负责任。一本名为《评说毛泽东》的书，将三年经济困难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惨剧描写到：“1960 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感到粮食不够吃，有一种饥饿感”⑵〕。这种写

法不是严肃地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而根本上在否定历史，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而中共和大陆学术界对邓小平地位的处理，同样有这种“刻意”的成分，并最终伤害到对邓小平的客观评价。舆论、民心和历史评价的强力反弹是不可忽视的。'

不错，邓小平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政治上的“高个子”，在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上，其地位和影响应仅次于毛泽东而在周恩来之上。但当您非要让他和一个高得多的巨人一比高低时，正好衬托了他的矮小，这岂不正是对他的不敬和羞辱？但很遗憾，甚至邓小平最忠诚的部下和最亲密的亲友，也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在笔者完善该书第二版时，全国人大通过修宪提案，删除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此，我是完全理解并支持的。今日中国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其实面临巨大的风险，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政治堕落，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尤其军队内部两位军委副主席是巨贪，凸显了军队内部问题的严重性。因内部问题沉垢积累太厚，习近平推动的强力反贪必须长期坚持下去，稍有松懈就可能断送好不容易开创的反腐倡廉的局面，甚至彻底断送国家的未来，因此，修宪以给习近平持续领导这个绝对不能中断的大业，是有必要的。制度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合格的人来执行，制度等于虚设。习上台前后，中共并没有根本制度的改变，为什么他上台前体制内如此腐烂，而他上台后却能够严明纪律？中国现阶段必须保持制度的灵活性，才能为未来的制度稳定性创造条件。国家不论选择哪种制度模式，国情现实和国家根本利益永远是唯一考虑的要素。中共在这次修宪前后没有做好必要的解释宣传工作，是一大失策。至于学者们对修宪的非议，也许出于好心，但缺乏智慧。制度的灵活处理需要高层领导的自我约束和自知之明。我相信习近平。此人是否有大战略家的智慧还需要时间检验，但绝对是位有强烈责任心的政治家，是位不俗的人。在完成清党，廉政建设大局砥定，党和国家制度完善大见成效，习近平那时必然声望如日中天，相信他会激流勇退，重新恢复主席任职期限制度。最关键的是，在逆向淘汰的大环境下，习近平能聚集什么样的人才，这是根本。笔者为此写网文《中国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无奈和现实必要性》。

更不可能及时地予以警醒和纠正，为邓小平身后的任人评说，留下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究竟是对邓小平的热爱，还是对他的不负责任呢？答案应该是显然的。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憾制内，靠制度去逼迫一个领袖接受某种观点或改变，幷不容易，因制度自身存在缺陷。领袖们自身的智慧、胸怀以及营造良好的环境以鼓励进言，就显得特别重要；但这不可靠。李世民在晚年不再虚心纳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时，最信赖的人（包括下属和亲属）的作用有时会扮演关键的作用。这是可悲的，也是无奈的。

从这件事例中，至少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毛泽东本身幷非听不进不同意见，而是对属于局内人的政治人物的意见，会有所怀疑。这里涉及到两人的关系亲密程度、政治理念、甚至政治斗争的相关联想。实际上，毛泽东解放后的决策失误与他所掌握的信息错误密切相关，亩产万斤粮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毛泽东开始不信，但浮夸风太猛，以至于没有人向中南海红墙内传递真实的信息。不妨作个假设：毛岸英是一个聪明的人，从后来公布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很有理想、很不俗的青年，幷受其它领导人的喜爱；如果他不牺牲的话，可能成为毛二世（这让人不舒服），但中国很可能避免那许多的失误和荒唐，将人民的热情和凝聚力用在发展上，因毛岸英可提供令毛泽东信服的资料。正如蒋经国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发挥的作用那样（今天有些人说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是去镀金，问题是，毛泽东那么多亲人为革命牺牲，包括毛岸英的母亲。即使他不上前线，谁能阻廾.他的擢升？毛岸英像千万为国捐躯的英雄们一样，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纪念，做出上述猜测根本是愧对良心。今天作上述评判的人无论个人素养，还是牺牲精神根本没法和毛岸英比）。

能做这种假设本身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带来的无奈。

其次，毛泽东的亲友与自己不可能有“利”的冲突，只有“利”的一致。

再次，领袖人物的部下和亲属作为旁观者，是领袖的另一双眼睛，可以协助发现更立体的事物全貌；如果不能以旁观者角度保持警觉和智慧协助，至少应懂得珍惜。当全国人民的眼睛和历史的铁笔瞄准你亲人的时候，对个人的得失应有一份超然。

以此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亲信的作用，是值得探讨和注意的。邓小平的遗憾，与他亲信下属的作用密不可分。那么江泽民呢？中国风起云涌的贪污腐败浪潮，江的亲信是否涉及或是否受到江的庇护？亲属和部下又是否注意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呢？自己提拔的两位军委副主席是巨贪，江泽民没有直接责任？

在中共现有的体制内，能登堂入室者多为中庸思想的实践者，出现耿直之臣的概率实在太低了。高层领袖多半不要指望下属能给您敞开心扉。

本书对邓小平的批评和与毛泽东的对比，无意衬托邓小平的矮小，相反，希望能将邓小平和毛泽东拉开一定的距离予以评价，更好地，也更客观地恢复邓小平的本来形象。遗憾的是，对邓小平的全面评价并非本书的目的。

当您把邓小平看成是圣人，他的错误将摧毁他神圣的外衣；但如果将他视为一个伟大的凡人，则更突显他的伟大。

邓小平以超然的胆略启动四个经济特区，并带领中国人民从毛后的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时代逐步走向基于市场的商品经济时代；1982 年，他以智慧和铁碗迫使镰娘子撒切尔夫人在香港

回归问题上配合中方，并成功实践“-国两制”，也促成了澳门的回归；结束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终结老人政治时代；1992 年，退休的邓小平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南巡，推动已停滞两年的改革开放事业，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高度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对此，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抱持一份深深的感激和尊敬，身为一名民族主义者的笔者，又岂能例外？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

不论如何对毛后时代的中共领导人进行美化，中国社会和共产党自身的变迁已经残酷地证明了毛泽东生前的担忧是高瞻远瞩的。毛后时代中共高层是不可能回避掉自己的短见所铸造的一系列遗憾。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第十三章以动机判断道德

以结果判断能力

如何评价历史，如何评价政治人物，无论对评价者还是被评价者都是至为重要的课题。固然，要简单地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并不容易，但基本的评价原则，以笔者之见，应遵循：以动机判断道德，以结果判断能力。

对今日和未来的当政者来说，如果不能牢记这一原则，而是报着自私自利的心态，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则理应，也必然受到历史的否定和谴责。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功过评价，上述原则同样是适用的。就拿“文革”的发动如果仅仅是为了中央高层的权力斗争，那么毛泽东必须被否定；但如果出于自己的建国理念，那么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应该基于他的其它重大贡献而不应抛弃对他的尊敬」如果忽略了上述原则，对毛泽东这样长期领导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是不可能给予公正评价的。

有些人以反毛反共为预定目标，然后再寻找或编造证据的做法，根本不值一驳。他们要么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么带着不健康的心态，对任何有利于毛泽东形象的历史事实一概视而不见

或低调处理。笔者在联系本书出版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这样的情况，有间出版社明确答覆：对于歌颂毛泽东的书，他们不感兴趣。

笔者对蒋介石的评价不易提高，概因他在抗日之前及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他将自己政党和个人权力放在了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而他对自己亲信在抗战时仍不收敛的贪污腐化行为置之不理，也证明了他的私心。

美国某前总统在当选后，故意放慢经济的步伐，待到下届大选前一年，再让经济恢复发展，以达到连任的目的。这样的总统不论做出过多大的贡献，其存在的道德问题也是不应被否定的。

对于邓小平来说，前面提到的军队经商问题，如果邓小平是基于让军队官兵拥有充裕资金改善连队生活，那么邓小平的这一做法虽然短见，但不涉及道德问题。但如果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达到拉拢军方对自己的支持，那么，邓小平的道德问题就未免太严重了。

今日中国的贪污浪潮，到底是中央高层的能力问题，还是高层的道德间题，只需要认真了解一下这些高层领导人是否曾包庇过自己亲信的贪污受贿行为，是否本身就有贪腐之举，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中共在反贪中偶尔会抓些“大虫”，其出发点是为了打击异己，还是基于坚决反贪而不加入人际关系的好恶，将决定反贪的成果和领袖们个人的道德。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兴建了大量的巨型工程。其中不少工程的科学性及决策过程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建各类大型工程时，是考虑国家或社会发展需要为动机，还是仅仅为了建设政绩工程，或为自己树立纪念碑？1994 年 5 月 24 日《光明日报》报道了“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文章，论述了建设一条从烟台至大连的火车轮渡航线和一条蓬莱一长岛一旅顺的“南桥北隧”公、铁两用线；文章写到：“钱伟长等 20 位著名科学家进行论证后，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极大增强国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宏伟工程”。笔者对建设一条轮渡线完全赞成，但对那条“南桥北隧”感到震惊，花几天时间的认真思考，笔者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样一个需要巨大投资的工程，

到底如何“极大增强国力”；同样的钱用来建四条复线京九铁路，或在长江上建 30 座大桥，肯定能更好地增强国力（未来国家资金充裕了，建设此通道还是有必要的）。其中的玄妙就在于“深远历史意义”。笔者当时曾给有关部门写信加以反对，但这个项目肯定能上马，因为后面有一群家伙排队等着题字、照相、签名、数钱。

不知是否因为中国的历史太辉煌，很多人都不择手段把名字弄上去，游客会在故宫红墙上写上“某某人到此一游”，隔壁的政客比游客脸皮厚多了，他们干脆花几亿造个工程，痛快写上自己的名字。而科学家们要想有机会写上自己的名字，快捷方式就是跟在领导屁股后面，提个让领导欢欣的主意，也借此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甚至骗个院士头衔。三峡工程就是个代表性的例子；一些唯利是图的科学家和政客在对三峡工程的一片叫好声中，掩盖了这项超级工程的潜在技术问题；它由全国人大代表靠几页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介绍资料投票决定三峡是否上马，树立了滥用民主的恶例。

毛泽东时期建立起来的廉明亲民的公仆文化，自第二代领导人开始江河日下，到第三代已面目全非了。只要看一下这两代各级领导人对自己的部下和亲属的“无限”宽容和关爱，就能明白当今贪污腐化的根源和反贪不力的主因所在。对今日中国在短短十多年中从原来的清明廉正蜕变到今日的严重贪腐状态，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和第三代核心江泽民，对此能逃得了历史



的评判吗？在民主和政法体制建设难于跟进的情况下，贪污腐化已成为今日中国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总祸根，并直接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也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严峻挑战。毛泽东时期的法律体系远不如现在健全，但他可以对自己喜欢的“红小鬼”刘青山以及张子善等贪官亲自下达处决的命令，而蒋介石则不能，邓小平、江泽民同样不能。所谓“改革过程中出现贪污是正常的”论调，根本是无能者的苍白籍口。

指望每位政治人物都有圣人之德，或超人之能，是不切实际的。关键在于他是否在用心工作，而不是整天玩弄权术，耍小聪明，或得过且过。真正政治家的首要素质是无私、智慧、胆略和对伟大理想的执着追求，而不会专注于个人权术上的“奇技淫巧”。在网络时代，认为人民是傻瓜的政客将是必然的失败者。

伟人和凡夫，政治家和政客，他们的差别其实只在一线之间。而这条线是智慧、勇气、胸怀和无私，超越人类的自然本性。这条线泾渭分明地分开了大智慧和小聪明、远见和短视、勇敢和懦弱、博大和狭隘、无私和自私、大忠也小义、尊贵和龌龊……，也自然地分开了伟大和平庸。然而，这条线又是多么地难于跨越！毕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能跨越这条线的又有几人！

有缺陷的战士还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只不过是苍蝇。

——鲁迅



第十四章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

当很多中国人对毛泽东倍加责备时，不知是否思考过这样的简单问题：如果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那么，中国将会怎样？或者说中国的国力、国际地位，以及人民的生活是会更好，还是更糟？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风气会怎样？

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已多少涉及到这方面的话题。如：在第一章中就中国基础工业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成就，谈了毛泽东的特殊贡献。本章将就前面没有谈到，或不够系统的论述，进行总结和推导。

很显然，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虽然不可能准确描述出中国历史可能的轨迹，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将会继续在整个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执政，共产党没有取胜的可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亚洲其它共产党的最后命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蒋介石在大陆和台湾执政的两个时期，其执政特点和效果，就成了描述本章假设型命题的主要参考。

如果没有毛泽东，将可能呈现出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首先，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

现在的海峡两岸分裂状况将不可能出现[1]。但西藏和新疆的稳定将面临挑战。如果西藏和新疆出现社会动荡，蒋介石则肯定采取军事的手段予以镇压，但这种强硬路线对处理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这类问题经常产生巨大的负面效果。他从来就不会像毛泽东那样对群众工作和舆论的重视和运用。蒋介石的军队是纯粹的军事机关，而毛泽东的军队除军事功能外，还具有联系群众、宣传教育、生产建设的功能，强调的是军民鱼水情，这构成了解放军在处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类复杂问题方面的特别优势。大陆解放后，毛泽东在边馏建设了庞大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既扛枪有拿锄的特别部队，对促进边疆的发展、稳定、民族融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如果蒋介石继续在大陆执政，蒙古还是会独立的，这是他对苏联的承诺。即使没有这个承诺，在苏联的介入下蒋介石也没有足够的胆略强制性收回蒙古。苏联会凭《中苏友好条约》在旅顺长期驻军，幷共管大连和中长铁路，中国的主权完整就谈不上了。美国的在华势力也将继续保持下去。

第二，从经济发展上来看。

如果蒋介石继续在全中国执政，今日的台湾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经济成就。美国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给予关照，但肯定不会对蒋介石领导下的一个庞大中国给予特别关照，相反，会给予防范。蒋介石带去从大陆搜刮的黄金和部分跟随而来的大陆资本家，也为台湾本土工商业的起飞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消费群体。蒋

[1]新加坡《联合早报》网页版 2004 年 3 月 8 日发表作者文章《台海：中华民族的天赐良机和对策》，文章认为：海峡两岸 1949 年后的暂时分裂，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特殊机遇，只要善于利用，对中国的整体利益是利大于弊。

介石撤退台湾后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当然也不可能发生，因这是他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后，才认识到“土改”的重大意义。当然，大陆的土地将会继续集中在大地主的手里，中国多数农民将继续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生活，一部分农民会继续逃荒要饭，或生存在城市的边缘，成为中国的边缘人。由于南京将继续是中国的首都，那么，上海在亚太的地位肯定超越香港，但台湾、港粤、京津及大陆其它地区的发展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繁荣。尤其是毛泽东领导下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国策，在蒋介石的自由市场经济情况下不可能达到毛泽东发展中西部所取得的成就。

在第一章已经谈到，蒋介石在中国执政，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发达，因他得不到苏联的帮助，发达国家只可能将国际分工的低技术层次和原材料工业分给中国。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会出现不少的超级富豪（他们不少的财产会存放在国外）和繁华都会，但同时也会有几亿赤贫阶层，贫民窟遍布各城市周围。蒋和毛的一个区别是：毛泽东注重平民利益，对社会精英阶层保持警惕，而蒋介石则忽略底层人民利益，而和上层阶级保持密切联系。中国的贫富差距比今日的南美和南亚将更加严重。土改也不可能发生，蒋介石和地主阶级及地方豪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地方霸权。

由于蒋介石对官员贪污的宽容，1949 年前不少的中国官员在海外拥有财产；高级将领贪污军饷和在大城市拥有房产和股票更是平常，如果蒋介石继续执政，官员贪污和资产外逃将会非常严重，甚至根本上窒息中国的发展。而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官员清廉，确保了社会财富的均布和资金在发展上的有效利用。看一下南美和南亚国家就该明白蒋介石的治国之道将会带来的后果；大陆的基础、规模和复杂程度非台湾可比，因此台湾的成就不能说明蒋

介石在大陆可取得同样的成就。[1]

毛泽东对人民的教育和发动，使得大陆军民以极大的个人牺牲，换回国家基础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成就。而蒋介石则在发动和利用民众力 B 方面乏善可陈，他更喜欢用物质的手段来激励。难以置信的是，蒋介石甚至将物质鼓励应用到军队打仗中。

第三，社会风气建设方面。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卖淫嫖娼、黑社会、吸毒等将会更加泛滥，看一下 49 年前的大陆和 49 年后的台湾，以及改革开放后十多年大陆的变化就明的了，中国人可能至今还躺在“东亚病夫”的病床上。蒋介石本人就和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顾一下大陆在过去十多年的“扫黄”、“扫毒”和“打黑”成绩就该明白，钱除这类社会丑恶现象，仅靠法治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毛泽东则有效地发动民众，同时并用铁血手段对付黑社会和地

1 据美国政府估计，1940 年代中国缺乏资金购买抗日军备时，国民党高官在美国的私人存款却达 3.3 亿美金。而美国提供的 2.5 亿美元的援助，有 8 千万元被高层私人瓜分。内战失败后那么多国民党高官移民美国就很说明问题。抗战时国府向美国购买飞机，宋启龄都要抽佣，后来美国不再提供现金援助。现在大陆出现一股推崇宋美龄的邪风，真是一边受贪污之苦，一面抱贪官臭脚。毛泽东虽然有大笔稿费（估计有千万元量级，不算政治出版物，仅诗词稿费也不少），却让民政部保管，不让家人接触，给儿女没有留下分文遗产，毛泽东去世后，民政部给了他女儿李纳的只是一台电冰箱（毛的诗词稿费，理应属于毛泽东的后人）。而江泽民、朱熔基、李瑞环等高官都在任内和退休后靠出版他们的讲话稿之类出版物获得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稿费。仅可查证的朱熔基、李瑞环等人的稿费捐赠就高达几千万元。而他们书稿和讲话都属于职务创造，按照国际通行惯例，这些稿费应该属于国家，他们最多拿点奖金（朱熔基是最喜欢和国际接轨的，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忘了接轨）而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和讲话稿有关的著作所获得稿费，据传在上亿元这是明目张胆的假公济私和中饱私报如不遏制这股歪风，政治局常委各个都将是富豪, 太具讽刺意味了。毛后时代领导人都特别财迷，位居如此高位还对金钱看不开，太俗气啦，真是令人叹息的现象。

方武装，才在解放后迅速消灭了这些盘踞中国千年的社会毒瘤。对于今日的大陆民众，和几十年来倍受金权、黑社会、色情业困扰的台湾人民来说，应不难理解毛泽东的这一贡献及其意义。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大力倡导学习雷锋及英雄人物等，在大陆建立起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实现了全民精神上的空前高尚和统一。通过破除迷信和“破四旧”，千年累积的封建迷信思想被清除，为现代化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坛，没有第二个人能在果断剔除社会毒瘤，积极有效教育人民方面，像毛泽东那样取得成功。

第四，军事力量

蒋介石在军队建设上的失败无须多提，他在大陆的惨败就是明证。在第八章第五节已就解放军的战斗精神和台湾国军作了比较。可以肯定的是，在军队建设上毛泽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赋予了中国军人强大的信心和民族精神。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军人在面对军事强国时是否拥有今日的战力和自信，将是个未知数，因蒋无论如何也会避免和美、俄等强权的正面冲突，看一下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和苏联签署的那个《中苏友好条约》，就该有个大概的了解。而毛泽东在他的军事生涯中，靠解放军的劣势装备和世界所有大国军队，如日、美、俄、印、法（奠边府战役）、英（韩战中歼灭英军皇家第 **29** 重坦克营这支劲旅）等交手幷取胜，以辉煌战绩向国际社会和中国人自己证明了中国军人的能力。而这构成了中国军人珍贵和永久的精神财富。而人民解放军在国家建设等各方面的独特角色，则使中国军人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和最具道德力仙和战斗力的军队。

第五，国际地位。

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不是别人给的，而是打出来的。如果蒋介石执政，他会采取对美国的一面倒外交政策。而美国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和洲际导弹会采取某种制约措施，看一下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一些政策就明白了。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丐帮帮主”角色密切相关，而蒋介石对开展发展中国家外交似乎不像毛泽东那样，将此作为全球战略的核心环节。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会很糟，中国会成为冷战双方的角力场而不是单独一极，法国会在东南亚存在下去。甚至后来英国是否会在香港问题上配合中方，都将成为疑问。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和地缘战略环境将面临挑战。

第六，国家的组织管理和动员能力

毛泽东时期依托共产党组织建立起遍布大陆每个角落的管理网络，农村至各乡村、城市至各街道，形成蜘蛛网式的密集网络。在防御外敌入侵、抵御自然灾害和救灾、大型基础工程建设、流行病防治和全民保健方面，发挥着巨大而又无可替代的作用。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组织性的国家，考虑到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就能明白该组织能力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后人的一个世界独一无二而又高效低成本的行政和社会基础。几千年来全体中国人第一次被组织起来，并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和集体意识，完全纳入到国家的整体力帛:之中，一旦动员起来，必将战胜一切人类或自然界的敌人。看一•下这些不识字的农民在历次战争中和大规模基础建设中的表现就清楚了。只有这样的网络才能将“人多力量大”变成现实。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反应速度和调动能力，只需和经济技术比大陆发达且面积狭小的台湾进行一下对比，就能理解毛泽东留下的这笔财富的深远意义和无穷价值。它也必将让我们民族世代受惠。如果和印度、印尼、中东、南美这些失序的国家进行对比，将更能看清国家组织能力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这种重要性将更加明显。

固然，没有毛泽东中国不会爆发“文革”和反右，但将会失去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前途。毛给了中国强健的体魄和心态，虽然偶尔让他的人民摔得鼻青脸肿，但肯定比体弱多病来得强。

如果没有毛泽东，即使中共侥幸取胜，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将全国人民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充分调动起来；虽然毛泽东时代对人民的劳动热情幷不总是恰当应用。

当然，没有毛泽东，后来的反毛急先锋的中共高层领袖和部分学者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胡说八道。中共高层领袖们有机会登堂入室，名垂青史，与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是分不开的。而建国后掌握各级领导权的人员构成，要么是曾参加过打天下，要么是来自社会各层的模范或优秀代表。他们是毛泽东智慧领导的直接受惠者（蒋介石手下和其它国家共产党的能员强将则没这么幸运）。没有毛泽东，没人会记得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是谁，改革开放也就根本不需要了，因中国无论如何改革也会像南美和南亚那样，改革不出任何的名堂，因社会利益集团的庞大势力将窒息任何挑战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措施。

有人认为，1949 年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不应归功于毛泽东，而主要是其它技术官僚的，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幷且认为毛在 1949 年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方面，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问题是，没有毛泽东，不说上面这些领袖们根本没机会领导中国，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道德和智慧力量将

全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他们的个人魄力也决定了，旧中国的大部分社会弊端都会保留下来；再看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官员的迅速腐化就不难明白，没有毛泽东，上述官员根本没办法在中国这样落后而复杂的国家建立起廉洁的官员队伍，也必将导致早期的有限资源在经济发展上无法有效应用，中国的发展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上述官员固然是杰出的领导人，但具备他们这种素质的官员在蒋介石的政府里也不乏其人。前面第二章第五节提到毛泽东 **1965** 年针对国家卫生部没能为农民服务的批评，才启动了意义深远的农村赤脚医生队伍和基层城镇卫生体系的确立。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当时的一线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还有邓小平、陈云等一批担任或相当于副总理，但人们从来没有批评过的官员）领导的国务院职能部门卫生部，为什么在解放后十多年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批评，可能到 **1976** 年周、毛逝世还没能为农民和小城镇建立起有效的卫生保健体系，中国人的整将健康素质和寿命、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鬲、政权的人道主义色彩，乃至社会的安定等都将面临挑战。没有人怀疑周恩来总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之心，也没人怀疑周恩来、邓小平等是极为杰出的官员，但没有了毛泽东这样纵观全域和切实理解和同情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的领袖，周恩来是否能很好地发挥他的才智，将是令人怀疑的。

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和人民的统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事务上，他并非是最内行的专家，但作为最高领袖，在把握国家发展大方向，有效教育和调动人民积极性，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维护社会公正，照顾弱势群体，发展经济和文教卫生事业，建立强大国防和外交，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体系等诸方面，说他是失败的幷不客观。要求毛泽东是个完人，是不切实际的。

当然不能把中国发展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一人，但完全漠视他的领导贡献同样是错误的。今天批判毛泽东，尤其是诅咒“文革”十年耽误了中国发展

的人们，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幻想之中：一方面，他们咒骂毛的错误，似乎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会更好；另一方面又要求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基础、人民对中共的坚定信仰、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官员的廉洁奉公、中国军事和外交成就，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地位和民族信心等一切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有利因素全部存在——这种对待毛泽东历史评价的方式，怎么看都有点无耻！

缺乏历史的纵向和国际的横向对比、缺乏对中国各项国情的全面把握而去批评毛泽东，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后来批评毛泽东的政治人物、学者等，有多少人能跳出个人的、局部的、暂时的、表象的得失，真正能从历史的、全域的、发展的、本质的和科学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呢？很遗憾，他们的眼界、胸怀、经历和知识结构，为他们造成了难以摆脱的局限。

中国劣质政治文化特征之一是：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而毛泽东则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对中国所有落后的方面进行革命，犯错就在所难免了。但他为国家的后续发展完成了“三通一平”的艰巨基础工作。他不论有多少已知和未知的错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及其时代留给中国的宝贵遗产是为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而全面的基础，包括高效而廉明的行政基础，物质基础，科技基础，文教卫生基础，全民族素质基础，外交、军事和安全基础，以及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妇女解放、破除迷信、公民意识、平等思想和民族信心的精神基础！



第十五章共同的责任



一、弘扬毛泽东时代的精神遗产

从政权意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时代已成为过去。但毛泽东时代为我们留下的财富和教训实在太多。尤其在遗产的整理上，值得今人的关注和努力。

以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视角，毛泽东时代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先贤对“大同世界”的部分幻想。对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是极少的一段全民族空前团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陆，像雷峰、王杰、王进喜、向秀丽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遍布各行各业，为了革命工作而放弃节假日、废寝忘食的工作，是那个时代具普遍性的现象。中国国内的平民百姓第一次将自己和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由于对民众创造力的不当利用，虽然也导致了大炼钢铁和毁林造田的悲剧，但这种民族大团结以及高涨的劳动热情，带来了社会经济建设的空前高速度，积累了巨大的内部凝聚力。不要说外国，即使台湾在毛泽东时代要在大陆搞谍报活动，也是极端困难的。

毛泽东领导下的这段时期，虽然有着不少的哀痛，但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能否认，毛泽东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最闪光的群体品质：淳朴、耐劳、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团结精神、大公无私的品德，以及惊人的创造力。这一系列民族质量在毛泽东时代的集中表现，为以后的中国人提供了必要的信心，也证明“一盘散沙”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性，而维护民族利益不惜自我牺牲，才是我们民族的真本色。不信，您去瞧瞧毛泽东时代！



那么，今天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面对未来时，又怎么舍得置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于不顾呢？毛泽东给中国的最宝贵遗产，其实正在于对中国人来说永远需要的那份精神示范。如果只叮着反右的遗憾、饥荒的哀痛、“文革”的失败，而将其它的一切予以忽略，将必有遗珠之憾 C

虽然毛泽东时代让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中国人遭受冤屈（挣态地看占总人口的 0.1%,如果动态计算，即受害人数除以从反右扩大化至 1976 年中国生死的人口总该数据肯定更小），但如果因此而忽略几亿人民的精神奋发，无异于一叶障目。

毛泽东时代的遗憾和光辉，都已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群体记忆；后代中国人也许不会相信和理解，他们的先辈曾经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拼命地工作；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创造一个个科技奇迹；科学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而回国效力,虽历经政治风雨而不悔；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们（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明知道核辐射对健康的破坏力，但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无怨无悔地赔上自己的健康；更有母亲送儿上战场的动人事迹……。但是，如果不能设法让后代中国人了解这些，岂不是一个天大的损失？

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廉明，实际上对今日中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得政府对中国遍布的贪污腐化始终不敢掉以轻心（相对来说，世界不少国家的贪污问题，人民和政府已经麻木，甚至不抱任何解决的希望），这本身就是毛泽东时代为后人留下的无形资产。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和失败幷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和整理。那时的经验，在反毛的声浪中被抛弃，而教训似乎幷没有很好地被吸取。今天，中共理应利用电影、电视等形式，宣传讴歌毛泽东时期举国人民无私奉险的精神风貌，不能因为这期间的错误而顾虑重重。对错误，我们巳经检讨，幷将继续反思；对成就及党札 I 人民群众的献身精神，我们也不该回避！

北京电视台曾采访解放前来到中国，幷在中国终老的美国人阳春和寒早的儿子阳和平。他改革开放后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工作期间切身感受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另一面，与自己在中国国有企业工作生活的比较中有更深体会；他后来返回北京定居。采访的最后，他提到自己的父母时说：我告诉我的妹妹，没有人比父母更幸福，他们从来都不后悔在中国生活（此时阳和平不禁激动落泪）。他们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都是人民需要的事业。毛泽东时代有那个大环境，人们不为生存而奔波，他们不追求比别人多，也不追求做人上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上。

这个美国人的话，事实上表达了毛泽东时代伟大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可贵的精神遗产。今天精英阶层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极端自私心态下导致对社会治理的无能为力的必然结果。但不能因为今日市场经济和私字当头的大环境，后人

就随意抛弃毛泽东时代那伟大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创造。

积极发掘和弘扬毛泽东时代的这笔遗产无疑是值得尝试的，它是一个时代的特质和骄傲。在民族精神和凝聚力上，中国人毕竟曾经阔过。



杨，忠

二、整理和发展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产

在文化艺术领域，当代作家和艺术家们对毛泽东时代是否定多于肯定。画家被迫放弃传统国画，而改去画宣传画；作曲家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创作革命歌曲;曲艺大师们放弃传统的表现手法而投入到革命样板戏的行列；作家没机会去写儿女情长和生活的哀愁（使得他们“强作愁"的能耐难以发挥）而改写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不免带着历史和艺术创作的悲情，回顾过去的这段历史。

不可否认，毛泽东时代在强调艺术的使命时，始终围绕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则指出了新中国文艺的创作手法。使得艺术家不得不将他们的兴趣随时代进行调整。如果因此而认为毛泽东时代的这种调整是对中国艺术的摧残，或认为是中国文艺创作的损失的话，那么，当今艺术家们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省；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艺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讲话》的精神是否正确？直到今天，中国的艺术家们在抨击过去的文艺路线时，却没人否定《讲话》的正确性，谈话使得昔日的戏子成了人民的艺术家，这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对艺术发展方向在再反思的基点。

中国传统的国画大师们，他们骄傲于自己细腻的笔法，丰富的想象，协调的布局，创造出一幅幅美仑美奂的艺术精品。高山流水，小桥残雪，青松古柏，茅屋亭台；如果说生命的内涵，不外乎彩蝶飞舞，猛虎下山，水牛牧童，老者远眺。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画的创作形式。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人”和时代刻画的轻描淡写，中国画创作的千年发展中，始终没有将“人”纳入主要的范畴，更别提对平民生活和社会变迁的刻画了。一直到毛泽东时代，中国骄傲的画家们才开始了以人物刻画为核心的时代，这是政治使然，也是中国蒂家被迫进行的一场划时代的艺术革命。

今天重新翻开昔日的政治宣传画，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些画作所表现的人物形象，能现了一个时代人民的乐观主义和冲天革命干劲的精神风貌；辅导学生的农村女教师、田野里的赤脚医生、拼命工作的石油工人、学习雷锋的解放军战士，满面沧桑的农民老汉的微笑……，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难道他们不值得艺术家们的刻画和歌颂吗？和奔马、毛驴、老虎相比，中国各行业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有着更深厚的人文内涵。金黄的麦田，雪白的棉花，连绵的工厂，和青山、翠柏、冬梅、荷花、青竹比起来，有着别样的活力。至于这些画作的艺术水平，就让那些批评毛泽东耽误了他们艺术生命的艺术家们去评判吧；如果这些画作的艺术水平低的话，只能说明中国

艺术家们的专业造诣还没有到家。看来，他们除了参考前辈画家的作品进行发挥，似乎缺少绘画内涵革命的能力和勇气。而对刻画的主题进行责备，幷不是强者所为。

当今中国的艺术家们已没有多大兴趣将目光盯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他们要么选择回归风险较小的传统技法，要么在一个少女的裸体上涂点油彩，然后在''人体”、“行为”后面强奸式地加上“艺术”两个字；它除了说明当今艺术家们创造力的枯竭，要么昭示了部分艺术家的人格颓废。

固然，画幅山水，可以让艺术家和评论家们语无伦次地评价一番，但一幅过于贴近现实的作品，他们再也不敢随意评判。当代画家也越来越精明，一幅山水画要比刻画一位老人的表情容易的多。这就是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的道理。当他们评论一幅画时，首先会看一下画家的身份。

中国的曲剧创作在毛泽东时代来了个翻天征地的变革，以“十大样板戏"为代表的“现代革命 **X** 剧”（其中的 **X** 代表各剧种的名字）开创了中国传统曲剧的伟大创新时代。中国百姓总算从《捉放曹?、《苏三起解》、《打金枝》的百听已厌中，找到了换换口

味的机会，无论是《红灯记》、《沙家浜》、《朝阳沟》、《人欢马叫》等，都很快风靡全国。就连当时的老人也发现，哼上几句阿庆嫂、银环栓宝的段子，丝毫也不亚于“花木兰”所带来的享受。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有人指责为“高大全”，但“高大全''难道不该是艺术化加工的方向之一吗？当然，让现代一些艺术家再去创作“高大全"的作品已难为他们，因为他们自身的道德素养和欣

赏口味，已离“高大全”过分遥远，创造点“矮小黑”才是他们的专长。



毛泽东时期这些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作品，歌颂了中国人民真善美的精神风貌。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完全消除了剧情和百姓的距离，使得《讲话》的精神真正转化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实践。其意义就如同小说创作史上，《金瓶梅》开创了以日常生活为描述对象的世情小说时代一样伟大非凡。但《金瓶梅》的色情成份丝毫没有阻碍它对后代世情小说的巨大推动，并直接导致一百年后《红楼梦》的横空出世；但样板戏的政治背景，却使它在毛泽东之后即被束之高阁，中国曲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因为我们放弃了曲剧发展史上最辉煌和最集中的创造，除了翻翻老祖宗的发黄剧本，再也拿不出新的篇章。每当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请一些所谓的“大腕”唱一腔除了老段子还是老段子，除了老票友还是老票友，您就知道传统曲艺界在毛泽东之后变得多么无聊。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中国艺术发展的乏善可陈，很能说明了问题。而年轻观众对传统曲剧的敬而远之，无疑敲响了不思进取、墨守陈规的中国传统曲剧衰微的警钟。

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剧照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歌曲，丝毫没有埋没作曲家们的才华，这些了亮高亢的曲调，不少已进入经典歌曲的宝库，至今被广泛传唱。这些昔日的“戲子”们用他们优美的歌喉，唤醒和鼓励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赞美和对献身精神的讴歌。令某些歌



革命代京剧《平原作战







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手遗憾的是，他们的青春年华用来歌颂雷锋和工农兵，而没有用来歌颂爱情, 虽然他们连爱情是什么还没有搞懂。

毛泽东时代的宛影，虽然技术上比较落后，情节上也未必完美，但导演和演员的真情投入，体现了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使得当今最傲慢的电影明星相形见絀。现在这米电影和侶视剧艺术家越活越邪门, 他们的电影作品恨不得囊括人类的全部哲璃插入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所有风流体验：可以在客厅里进行的对白，非搬到床上进行，然后以一个拥抱卧倒结束；一个普通的对白非加入一些挑逗；拥抱-•下可以表达的深情和别离，非加入一个接吻的镜头他们不顾中国人喜欢举家看电视的习惯，这帮“戏子”什么都敢拍。把电影和电视剧拍得更象是导演和编剧旁若无人的自慰中国电影已经发展到什么都有的地步，唯独缺少观赏性和健康的娱乐性，以及积极而不太肉麻的教育性。看当代中国的电影，幷不比''文革''时期的电影舒服。而满足中国亿万农民和儿童需要的电影作品几乎绝述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工作者的颓废人生在他们的作品中暴露无遗。中国艺术界出现那么多“大腕”时，却少有大艺术家的身影。他们的作为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修理”知识分子的运动在理论上不算离谱。如果毛泽东重新从纪念堂里走出来，中国当今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不少人都会被打倒而不会引起任何的同情。《讲话》告诉他们如何成为人民艺术家，可他们不知好歹地非要重作“戏子”。

中国作家在过去 20 年的作品始终离不开性、颓



废、政治悲情、故作一鸣惊人的无聊。不说《京华烟云》或《家》《春》《秋》，甚至比得上《艳阳天》的又有几部？过去二十年中，除了个别，如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值得摆在书架上,十年后还能让人一翻的著作有几部?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不同的时期，总有带朝代标志的文化创造：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铸造了中国的人文基础；秦汉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汉晋时期道家的兴盛和佛教传播，唐朝之诗、宋朝之词、元之曲剧、明朝之小说、清代小说繁盛、民国之新文化运动，那么，共和国几十年来的主要文化创造是什么呢？如果将本节所谈之以《讲话》精神指引下的文艺革命完全否定，那么，共和国交出来的将是白卷。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毛泽东是唯一的“统治者”，强力揪着中国文人骚客那高傲的脑袋,去主动引导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必须为民众服务。

笔者无意否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但在原汁原味传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艺术家们必须放弃固步自封的，唯传统马首是瞻的•贯作风，应以满腔热情投入对新生活的体验和发掘。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幷不全是复古，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精华基础上的创造。毛泽东时代已经为我们作了虽不完美，但确是最具创造性的开端。

“阳春白雪”未必比“下里巴人”更具价值。“和众'者未必一定“他高”。艺术幷不总是能让多数人欣赏，但艺术不能总不让多数人欣赏。否则，艺术的价值和艺术家的人生价值必将大打折扣。

艺术家们以维护传统为理由而对现时代的逃避,实际上是对自己有限创造能力的苍白掩护。“向江青同志学习"，不是学她在政治上的作为,而是学她对“样板戏"的革命性推动和积极的创造

精神。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三、自觉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本书幷非全面评价毛泽东，因此较少深谈毛所犯的错误，因为批评毛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了。对毛泽东的辩护也不可能以此书结束，因为对毛泽东的诋毁'拔在继续。

对毛泽东声誉的维护，不仅应是中共的自觉行动，也应成为天下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实际上，毛泽东作为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遗产，已和整个民族熔为一体，没有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将黯淡许多。

当然，笔者幷不是说要粉饰或掩盖毛泽东的错误，但关键是当我们批评毛泽东错误时，是为了否定他的目标去断章取义地寻找证据，还是真正去理解他及其时代的情况下去客观分析昔日的正误？尤其是毛泽东的伟大绝对不是现在的一群肤浅之辈所能理解。比如，《祸国的辉煌》一书（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出版）中“王震对赴源女兵集体逼婚”一节中提到王震如何在内地骗一些女大学生去西北，然后劝她们和当地军官结婚，幷鼓励多生孩子。笔者坚信这段内容有相当高的可信性，而且肯定毛泽东知道此事。问题是，毛为什么同意王震这样做？新娜过去百年与祖国的分合历史，使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在边牌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必须不惜一切手段增加汉人的比例，同时绝对不允许任何由少数民族领袖组成的地方帮派势力。毛泽东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就地转业和发展生产建设兵团而在新号立即留下了几十万常驻人口，而且鼓励她们将内地的家属带去，当然也要梁助他们结婚生子。上述书里谴责王震的作为和大谈“爱情的不幸”根本是对先人良苦用心的漠

视和无知。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几代人作了他们可以做的一切，为国家的长期统一做出伟大贡献。他为国家把那么多困难的事做了，后人理应抱有一份感激。然而换来的是后来这帮无知后生的护骂，你们良心何在？内蒙古在解放后的行政区划多次改变和后来的“内人党”事件，笔者判断都是毛泽东这一建国大战略的具体表现,可他老人家和中共又绝对不能明讲这一切的动机，笔者在是否应写上述文字时也犹豫再三 I。这件事至少告诉后人，在亲骂毛泽东之前，首先提高一下自己的智慧。否则，必然是盲人摸象，同时败坏我们的良知和人格。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一句名言：“阿拉伯人现在还在寻找自己的毛泽东，而印第安人则已经永远找不到他们的毛泽东了”。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有理由为曾拥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而骄傲。在他的领导下，这个曾经是“一盘散沙”的民族，终于团结到一起，并昂首挺胸地迈向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这一历史事实比起来，对他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议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在毛泽东身上更多地表现了民族英雄的形象，意识形态仅仅是他实现民族振兴的工具。斯大林对毛的社会主义一直有所保

[1]毛泽东之后给人以最开明形象的领袖当属胡耀邦，可他在边疆政策问题上一系列看似开明实则祸国的幼稚行为，极大地摧残了毛泽东一代辛苦建立的边疆社会基础。胡耀邦及同时代的中央高层，在边疆问题上是有负于国家的。第二章提到对边疆汉族采取与内地无差别计划生育政策，是另一个必须批判的错误行政。就凭这类边疆政策，就足以给第二和三代领导集体打差评。



留，一位美国学者曾讲：“毛泽东是唯一有勇气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他发现籍此不能带来民族振兴的话”。他革命所走的道路和所建社会主义的模式和列宁的模式有很大差肌确切地讲，毛的社会主义应称“民毛主席和外国朋友（1978,油画）族社会主义”才比较贴切。在海外对毛泽东评价较高的高层政治领袖中，以资本主义国家右派政治家占多数，而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左派政党领袖则较少；中、苏对立以及苏联在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固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总让正统“左”派不以为然；毛泽东本人更毫不含糊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交枪投降主义，和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对欧、美右派则表现出一定的好感。使得中共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另类”。

至于毛泽东参与创立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如果外界对这一名字不太喜欢的话，应称“中国人民党”较为妥当；因“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而“实现共产主义”仅仅是一“远大（遥远而且伟大）理想”，而非现实的行动纲领。

对于一个党派，有一美好的理想并没什么不对。实际上，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先人幻想的“大同世界”，还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都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和期盼。正如基督徒相信自己死后可上天堂，佛教徒相信死后将去西方极乐世界；至于他们死后是否真的到了天堂和极乐世界，因去的人都没有回来而无法得到证实，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基督教和佛教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了呢？

理解了对毛泽东创立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上述说明，大陆以外的中国人、华人对神州大地也许会多一分亲和感，少一

分距离感；外国友人也许会少一分先入为主的成见；对毛泽东和他的事业将有更好的理解和认识。

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而孔子、孙子、毛泽东则是为数不多的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华伟人。当全球军事机构对毛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世界范围的游击队将毛的游击战术作为必学内容，不同政治信仰的各国政治家们对毛推崇倍至，国际众多学者穷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经济发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将毛看成他们的力量和榜样……，作为炎黄子孙，对此您能毫无感觉？那里面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共产党，只有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骄傲！

当全世界印度人尽力维护圣雄甘地的尊贵，美国人拼命美化林肯的嘴脸时，中华民族的成员们却为了一己之欲而涂黑自己的民族英雄他们一定忘了，毛泽东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优秀素质和丰厚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在抹黑毛的同时，也抹去了自己的一份荣耀。他们是否意识到，一个不出英雄只出大流氓的民族是难称“伟大”的，一个诋毁自己英雄的人也必受外人蔑视。正如郁达夫所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植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知崇敬爱戴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当笔者读到多篇由欧、美人士撰写的为毛鸣不平的文章，作为毛泽东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真不知该深感欣慰，还是无地自容！

在由西方舆论和文化主导的世界天空上有一颗我们自己的

星，那就是毛泽东。希望更多的同胞行动起来，共同拭去上面的尘埃，恢复其原有的光亮；无需为其装饰美化，他本来已经够美够亮。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附录一随想：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 1

笔者按：在华者关注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变迁和否定毛泽东的现象时，总有个“中国人的心态"问题，或者说一种文化现象总在头脑盘旋。关注毛泽东的过去和当今，实际上已远远超越政治意识形态范畴，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文化和中华文明走向的思考。尤其是毛泽东在中国人经一百多年惨败后信心无存的时代横空出世，再现唐汉的威势，从极弱一举托至强势，更能为当今和未来的中国人提供思考的坐标。毛泽东的研究不能没有文化的探索，围绕毛泽东的一生构成了续纷的文化景观。由于他的出现，将中国文化多方面、多层域的展现出来，而且线条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鲜明。遗憾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探讨是本人的弱项，本书的部分章节如第八章等只是作浅显地思考。

本附录的内容是自己在观察毛泽东现象时的随想，谈不上深入和成熟，只望能抛砖引玉。原本准备作为该书的第十四章，但因它的不成熟性而只好列入附录，同时也可避免把本书的主题拉得太远。

对于大多数否定或不公正批评毛泽东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幷没有其它的政治目的，而是由于受舆论导向，学术界和政界对毛泽东时代认识的偏差，或个人和亲友在毛泽东时代的痛苦记忆，以及个人的知

, 附录内容在第二版基本维持不变。虽然其中部分内容已经与今天的贾际有所不同，比如附录一所探讨的文化自信问题，但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作为原貌的记录值得保留。随着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等迅速達到国际一流水平，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增，但幷不意味着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幕可以忘记。自《河殃》之后三十年中国人具普遍性的时代精神症候群，即便以后彻底改观，仍然不能忘记那个曾经精神残缺的自我。

识局限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等，导致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时代抱持否定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它的要素在发挥作用呢？

在海外生活多年，对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海外华人，以及外国人的生活形态，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对中国自身的认识，也得以置身“庐山之外”，以识其真面目。当思考一个志士仁人百年深思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似乎撞到了笔者的某根神经，由此导致对该章内容的遐想（您有权理解为“瞎想”）。

尤其是最近几年，一些中国人以否定中国的英雄为乐（如认为雷锋过时了，拿萤存瑞开侮辱性的玩笑），将否定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视之为“科学”和“客观”（如南方某文学刊物上的新编《沙家浜》将阿庆嫂描写成荡妇，嗨，中国文人的人格实在有必要做个清洗），这种心态上的疾病，在否定毛泽东的时候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得笔者没法回避这一涉及未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态走向的大课题。很显然，这既影响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心态，也远远超越之。

毛泽东身上那强健的人格力量和国际事物中的强烈自信，尤其为后世树立了参考坐标。

一、从拿破伦和毛泽东的身后谈起

拿破伦的东征西讨，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抬高到空前的地步。也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但他的赫赫战功掩盖不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带领法国人民的对外征讨，犠牲了大最法国青年的生命，折损了法国的财力，但最后又回到了原点。他没能替法国扩充版图，甚至失去了部分原来的领土；是他以 8000 万法郎将路易斯安娜州卖给美国。他带给法国更多的是牺牲，最后甚至让反法联军直捣巴黎。但是，法国人民没有

埋怨他，相反，所有的法国人都将拿破伦视为法兰西民族的骄傲。法国人民显然没有忘记拿破伦为自己民族曾经带来的那份短暂荣耀。

那么毛泽东呢？

从“革命”舞台的规模（拿破伦的战场分布虽南至埃及，东至莫斯科，但面积不比中国大），一生领导战役的次数，对“一盘散沙”的中国进行内部整合，对外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无论是看过程, 还是结果, 毛泽东没有任何一个方面逊色于拿破伦。拿破伦的一生最光彩照人的是他的军事成就，但他除了经常性地直接带兵打仗（毛泽东更喜欢运筹帷幄），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开创新的战术和军事理论, 并为世界各国所广泛学习。在文采、理论建树等“文”的方面，拿破伦与毛泽东相比，更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了。

但是, 与拿破伦相比,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否太低了呢？尤其考虑到还有那么多中国人在歇斯底里地咒骂毛时，您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中国和法国人民对自己英雄的不同态度，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外国高层领袖和学者在不断给予毛泽东极高评价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态度就更显得有些怪诞了。

其实，如果留意一下当今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念，或者说得不好听点，看一下当今不少中国人的嘴脸，对上述问题就不会太奇怪了。

长期以来，中国人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谈军事必谈拿破伦、巴顿，甚至包括彭德怀的手下败将麦克阿瑟也能被常挂在嘴上；谈政治家当然少不了丘吉尔、华盛顿、戴高乐；谈文学更是罗列一长串从托尔斯泰大仲马到马克•吐温的西洋作家，已证明自己的文学修盘（可悲的是，就连某高层领袖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也未能免俗，他罗列自

己一长串阅读的著作中居然没有一本是中国的。不少中国的大学生没有通读过四大名着，还有不少中文系毕业生至今认为《金瓶梅》是淫书）。更荒唐的是，一些财富新贵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不忘摆上一些古巴雪茄，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成就和情趣。有些中国人分明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进行表达，但他非穿插一些英文不可。在外企工作或喝过几天洋墨水的中国人，更随时准备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清华读博士时，曾请一位从美国回京探亲的年轻学者作个讲座，谈谈他的课题；该仁兄在短暂的讲座中，每隔几句话就肯定以拉长的音调说："在美……国…"。笔者能记住，概因该仁兄的这句话实在倒了胃口。

笔者的一位好友，是位美丽而高雅的中国姑娘，她的公司里多为欧、美、澳白人，她能很自然地和他们拥抱和亲面颊，可当笔者面对这位很久不见的美丽老友，开玩笑道："可否拥抱一下？"她痛快地拒绝了，理由是："你是中国人，没这个习惯。"笔者幷不意外，因在国内曾就这类话题和朋友争论过。其中的问题是：西方人来到东方，幷不考虑入乡随俗；他们知道东方女性的矜持，却还是在东方社会里行西方的礼仪，而东方女性则可以接受而无怪罪之意，但面对同为男人的中国好友，却不好意思起来。如果中国人到欧美去，可否带着自己的习惯而不会受到非议？比如问一下对方的年龄，或夸赞一下对方胖了（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夸谁胖了是一种礼貌，证明对方过得不错；相反，如果说"你瘦了"，那分明是在说你过得不怎么如意。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对"瘦"情有独锺，甚至已经很瘦的女孩也反对别人说她胖了，真是病态的审美心理。而只有西风东渐之后，中国人才历史上第一次对自己的年龄讳莫如深）？我们从不会嘲笑来到东方的欧美人不会用筷子，但对海外生活的同胞使用刀叉的笨拙却感到难为情。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中国优秀女性嫁给欧美男士，这没什么，但您很容易发现，不少这类幸运男人的素质和层次之低与那位中华女儿很不般配。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的女同胞却对同样层次的中华男儿完

全看不上眼！一个低素质白人在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不少女孩子“送货上门”。

提及这些，概因这涉及到毛后时代，中国人的不健康心态：当国门打开，西风东进之时，一些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除了盲目崇洋，就是文化自卑和自虐，间或狂妄，因此也不可能对自身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在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平台基础上，对毛泽东这样的影响深远的民族英雄进行肆意的攻击，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所有精彩内容，均缺乏基本的欣赏能力和兴趣。但对西方的一切，至少给予理解，甚至接受。联想到最近几年，中国一些人对“学习雷锋”提出质疑，拿芾存瑞等开下流玩笑。一些中国人在否定自己的美好内涵方面，已达到颓废和堕落的境地。

今天的中国人在对自己的任何肯定之前，都会习惯于看一下外国人的看法。外国人只言片语的赞扬也一定令中国人深受鼓舞，就象学生期待老师的表扬一样。有记者提到“美国西点军校也学雷锋”（实际上没这回事），令中国人立即激动不已（美国人学习与否都不影响我们对雷锋精神的颂扬）；一篇有关某中医课题的研究报道，也不忘提到：该成果受到美国专家的高度评价（一个不熟练应用中文的人居然能成为中医权威，听起来真有点荒唐）。中国人已经到了非指望别人的肯定才能相信自己的地步。笔者在写该书的时候，不得不大吊：使用外国人的观点，因为如果不这样，要说服那些自卑而又粗鲁的同胞，还真的很难。

再看看法国人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自豪，就不难理解法国人对拿破伦的推崇。正是对自身文化的信心和由此带来的健康审美心态，使得法国学者成为海外研究毛泽东最早，对毛泽东最推崇的海外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懂得欣赏伟大。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谈到：中国人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也许柏杨的话不够全面或过分刻薄，但在今日的中国人当中，犯有这类疾病的人不是个别。不论才子佳人，高官显贵，还是商贾学者，概未

能免俗。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一个证明。

二、从赛艇和龙舟看中国人的文化心态

1999 年，每年一度的“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拉开首次比赛的帷幕。可以想象，两校领导和学生会主席莅临比赛现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不外乎什么“赛艇比赛体现团队精神”、“增进两校友谊”等，笔者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这是两个学校之间的一场体育比赛而已。再怎么比赛，两校的学生还是照旧互相贬低对方，抬高自己。

虽然两校领导都不好意思讲明，但谁都清楚，这是“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和"哈佛耶鲁赛艇对抗赛"的中国翻版。虽然缺乏创意，但“向先进看齐”的做法肯定不应该受到批评或嘲笑。

当然，比赛之后中国的各大媒体和两校校报，对这场比赛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尤其是令这一比赛的发起人（当然是两校学生会）感到得意的是这样的文字：“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以及哈佛耶鲁赛艇对抗赛，成为世界三大赛艇对抗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至少有一项已经进入世界级。至于这“三大”是谁封的，当然是两校的才子们自己。世界高校的赛艇比处肯定不会只这几所。如果是一些三流学校，而不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率先举行这类比赛，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当然没兴趣跟进，“体现团队精神”只好找别的方式去体现了。

面对中国高校等各方面缺少创意的刻板和教条，笔者早就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这种现象在中国各行各业几乎都能找到。笔者也不认

为有什么需要特别评判的，直到下列事件的发生，“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背后所隐藏的严重问题，才引起笔者强烈的关注和思考：

地点：新加坡，这是个人口五百多万，华人占总人口 77%的南洋小国。

时间：2001 年端午节下午

事件：在滨海湾举行端午节庆祝活动，展出有关端午节的故事，包括介绍屈原这位爱国诗人的生平以及爱国情操。另一项展览是，图文幷茂地介绍世界各国界龙舟的情况，其中不少还是欧洲国家。这次活动正进入最后的压轴节目一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一年一度的龙舟对抗赛的首届比赛在此举行，争夺由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贊助的“总理挑战杯”。吴作栋也暂时卸下政务到滨海湾观赏龙舟尖, 幷主持敲锣开赛仪式。比赛结果，南大龙舟队技高一筹，从总理手中捧走奖杯。

至于吴作栋总理为什么赞助这两所高校的龙舟赛，他在赛后的茶话会上提到：他希望借此在两所大学之间树立一个良性竞争的优良传统，就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年一度的界艇比赛一样，发扬健康的竞处精神。他是从这两所世界级名校的这项传统竞赛中获得启示而发起的。从他写给 2000 年新加坡国际龙舟赛特刊献词中能更准确地把握他的动机，他提到：刘龙舟强调的是团队精神，这种精神对一个国家的成功非常重要。他也提到和端午节有关的传说，幷赞扬诗人屈原的伟大爱国主义及为国牺牲的精神。他也对新加坡龙舟协会积极推动龙舟赛，及在保留中华文化传统上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

新加坡华人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海外华人一•样，在当地土族文化的环境下保持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很显然，由于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而新加坡不少社会精英曾在英国读书，对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应该比清华和北大的学子们知道得更早，但是他们选择老祖宗的龙舟赛, 而不是照抄牛津剑桥的界艇赛。固然, 这没能让他们获得进入“世界四大赛艇赛”行列的自慰，但他们更好地尊重和表现了自我。

从比赛规则和比赛技巧等方面来看，龙舟和赛艇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他们的文化内涵则有天壤之别。赛艇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谈不上

任何的文化色彩;但龙舟则轻而易举地带领人们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与中国厚重的文化和价值核心联系起来。这是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最大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泛指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当然包括还没丢掉中国文化传统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标签。

在“清华北大赛艇对抗赛”的背后，是当今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文化心态。I

在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方面，大学，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中国高校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忽略掉自己民族的精彩内涵，未免太可悲了。“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激起的浪花，掩盖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人对自身文化内涵的漠视，和对幷不优秀的外来文化的轻易接受;这里面包含着盲目的崇洋，和无知带来的文化自卑。是那位中文幷不流利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而不是北大和清华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在强调着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题外话：中国教委的那帮家伙已将岳飞从民族英雄的名单中剔除，相对而言，屈原爱的是位于湖南、湖北的楚国，更应该被剔除；否则他们不担心山东人和陕西人造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大国的中央政府里总有一些彻头彻尾、不值一辩的白痴。可不理他们又不行，如果任由他们这样折腾，中国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都将面临危机，至少“炎黄子孙”是不能再用了，否则中国的维吾尔族、朝鲜族和俄罗斯族同胞有理由造反。而秦桧则因统一国家有功而成了英雄。考虑到共产党的目标是全人类实现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那么今日的资国分子将成人类的功臣？！中国少数民族曾为中国文明史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历史形成的汉文化和中原政治历史的主体地位而感到不自在。就连康熙皇帝都极为尊重岳飞。而中国教委则以小人之心揣度中国的少数民族，实在悲哀得离谱。

正如苏州人自豪于“东方威尼斯”的称号、海南人得意于“东方夏威夷”的美誉、东方人自称亚太为远东等，都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堕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陷阱。

清华、北大无疑是中国最杰出的大学，自然也是笔者少时的梦想。在山东曹县一中读书时，更以多次高考模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而成为当年最有希望考进清华的，但在关键时刻苍天安排的一场疾病，使笔者没能进入清华园，只得“上妓院”（上海机械学院的荒唐简称）。笔者在这里学习格外从容，得以“不务正业”，对学院图书馆的非本专业类书籍进行了四年的尽情“扫荡”。当在大街上、火车上不时听到“我是交大的”、“复旦的”，笔者实在不好意思报出自己母校那奇怪的校名。可看到这些天子骄子过早地摆出一副文人騷客的姿态时，笔者才算找到了自信。当 21 岁大学毕业时，带着广博的知识而傲视同龄，当需要“骚”一下的时候，在多个领域没人敢轻易视在下为外行，更具备了同龄人不可多得的宏观视野。当然，也为本书全面重新评价新中国历史和把握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脉搏作了最初的、全方位的知识铺垫。同样也为后来避免中国年轻一代精神的全盘西化，注射了“疫苗”

o

不了解自己，就不可能懂得欣赏别人的长处。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深度，才能不去嘲笑别人的粗糙文明，同样不会因为看到别人的灿烂而立即自卑起来，因为您已经具备了健康的文化自信。

考虑到人类的本能弱点，文明的糟粕有时比文明的精彩成果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文明成果的亮点，难免有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和个人欲望的遏制，这是建立有序社会的必然要求。相对来说，文化糟粕中不少是对人类自私和丑恶本性的放纵，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怀疑和挑战，如个人主义和性开放。中国过去十多年“国际接轨”中出现的问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清华、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发扬方面，理应

发挥方向性的作用。尤其在这两所学校均随时准备“傲视群伦”的时候，总不能老拿“国学四大导师”和“五四运动”来炫耀，那毕竟已是明日黄花。

清华大学最近要开多门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可看作是冲击世界一流的大胆尝试。理论根据不外乎国际学术交流的方便。但更多的疑问随之出现：

今日英文的国际地位，是由于世界经济和科学中心先后轮到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文国家的缘故。后来虽然有苏联在科学上的成就，但封闭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苏联不可能具备向英语世界挑战的可能；而日本和德国就更没能力了。在世界主要语言体系中，随着中国和东亚的崛起，中文是唯一具备向英语世界提出挑战的语种，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作为世界文化圈的一极，也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最重要部分。毕竟，在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民族凝聚力、国家的规模、发展的潜力、历史和当今国际影响力、海外华人的全球分布广度和数虽，等，中国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优势。在人类未来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建设方面，我们有资格去作领头雁！

当然，要达到这一步，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是必需的。中国人对英文的态度趋向和对中文推广的执着程度，就变得非常关键。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科学院所和教育部门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中文字自身的丰富内涵和组词特点，也不可能出现象朝鲜语和日语那样的音译尴尬。如果中国大学的科目多用英文授课，中文在学术领域的崛起将是不可能的；而中文的学术刊物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性刊物。如果中文不能进入学术语言层面，将只能是语言的配角。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高素质论文越来越多地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中文学术刊物的再定位和文章发表于审评制度的完善，到了该认

真考虑的时候了。[1]

最近，马来西亚华社正在和马国政府教育部发生激烈争吵。马教育部要求所有的华文学校的数理科目必须用英文授课；而华社则坚持使用中文教学，以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实在有点悲哀，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中国文化的传承看来只能依靠海外华人了，中国纳税人巨资支持的清华大学似乎更愿意使用英文。

至于中国学校如何更好地教授英文，则是另一个课题。固然，中国的年轻一代学人必须学好英文，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必须搞清中英文语言的不同角色，和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以笔者的经验，不论中国人的英文水平有多高，思考语言还是中文。虽然有些中国人坚持读英文小说以锻炼英文，但要在只有几百年稳定历史的拼音文字的作品中，得到像中国古典名著那样的文学享受，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马克•吐温，都不可能像笑笑生和曹雪芹那样，将简单的文字堆积出一座座精彩处处、玩之不尽的绚丽迷宫，这是只有几百年稳定历史的拼音文字所无法实现的。

为了提高中国学人的英文水平，是否可以考虑如下建议：任何一门课都设定一定的外文资料阅读贝，至少掌握各门课的英文专业词

中国现在一流的学术成果首先是用英文发表在欧美杂志上，对提高中国学术界的声誉有积极意义。但国家巨资投入科研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国际上的名次。由于英文刊物价格昂贵，在中国各图书馆和资料室的普及程度不高，中国学者的英文水平也并非都那么高，所以这类文章发表后受益最大的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或者说，中国用巨资帮全世界做科研。当今国际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中国政府是否应该考虑如何鼓励最好的成果首先在中文刊物发表，尤其是多少涉及到国防应用和一些新兴产业的领域，如新能源等，学者为了文章能顺利发表和成果可重复性，往往给出详细的研究方法和数据。这些文章中不少都是应用科学的，是免费和全世界进行知识分享。要知道，对于欧、美、日发达国家来说，以他们的工业基础和科研能力，对于这些成果产业化有更大优势。美国当年为与苏联争霸，研发 FI17 隐形飞机时，美国工程师就是从苏联科学家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获得理论启发。但苏联受制于资金和工业基础却没有从该文中得到实际好处。汇。至于用英文讲说，就凭中国人的薄脸皮，只有少数学生可利用这样的授课机会来锻炼自己的英文。看一下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那份沉默，就明白了。

清华和北大在文化传承和弘扬方面尚且如此，对他人就更不敢抱太高希望了。下面再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能更好地发现中国人当今心态的疾病。

2001 年 12 月底，笔者在夜幕中欣赏了一下北京长安街两侧的新变化。在从复兴门到天安门广场的这段路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北京西单时代广场大厦和前面表扬过的国际金融大厦上，英文 HAPPYNEWYEAR!”（新年好！）的霓虹灯格外刺眼。笔者在欧美旅行时，每见到中文的招牌，都有一份欣慰，那是海外华人对祖先文化的继承和骄傲。在中华第一街，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公司的大原上，主动写上英文新年贺词，又意味什么呢？这比昔日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文化殖民还让人难受。看来，这里的主人是决心不给中国人拜年了。如果这儿的主人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外文造诣，用这样简单的词汇也太没水平了，他们应该到南美或非洲部落中寻找几个文字才更显玄妙。如果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话，中国人都该把头发染黄。

当然，如果和部分上海人比起来，北京人立马发现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弘扬是多么的执着。在相当一部分上海人中，从他们的消费习惯就可看出，他们对中国的“老土”是多么的不屑一顾，只要和外国粘上点边，那也一定价值猛增。上海家用电器市场上，外国进口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始终是全国最高的。对不少上海人来说，中国的电视机哪比得上日本货，可这些没有任何技术认识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日本电视机在电压波动巨大的中国电网上难免出现图像抖动，而中国国产电视机的开关电源则是针对中国国情设计，具有更好的稳定性。真是无知者无畏。和相当一部分上海人头脑中的外国崇拜情节比起来，一

台家用电器实在不算什么：美国进口的桔子当然比南昌蜜桔还要甜，在海外颇受欢迎的山东和陕西苹果，哪有厚皮的澳大利亚苹果更能体现个人消费层次。那本书《上海宝贝》中，美丽的女作者必须放上个蓝眼睛的外国“男孩”为主角（中国的无聊文人成功地将蓝眼睛、黄头发塑造成美丽的标准，甚至用“金发”来形容黄毛，真是自我作践到病态的地步。我咋就没看出过去称为“色目”的蓝眼睛和黄头发特别好看在哪里。有位嫁给中国人的外教，曾自嘲：她老公的朋友都以为她头上布满了金丝），这老外的体毛怎么看都比新邹或湖南男人的体毛更能勾起她体内的动物燥动；如果放个山东大汉在她身上磨蹭，那多没品位。上海女人的涉外婚姻案例一直是全国城市中最高的。看上海建筑物上的霓虹灯标牌，英文的比中文的还多，笔者在一本杂志上见到几幅介绍上海的图片中，建筑上的中文标牌数讨甚至不到四分之一。今日的上海也许以建设国际化都会为目标，但从人们的崇洋情节可以看出，上海的方向似乎是剔除中国色彩的国际化。如果让上海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这没什么，但如果将上海视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旗舰和样板，那么，当中国实现现代化之时，也将是中国人文化身份定位的迷失之际。

当中国的多情男女自以为时髦地过情人节时，他们不会知道西方情人节背后的任何趣闻，那更加凄美动人的七月七牛郎织女相会的中国情人节，他们却丝毫没有兴趣。也难怪，在私欲横流的今天，中国的情人们是否真正懂得“情为何物？”

海峡两岸的政治领导人也似乎随时准备亮一下他们的英文。如果哪天美国总统能用中文发表演讲，中国人一定会为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英文造诣和对外国客人的语言礼仪，大表自豪。

当然，如果我们的卖命表现能得到外国人的赞赏，至少也没有白费工夫，说不定外国朋友一高兴给个出国的机会，也未可知；如果别人礼貌性赞扬几句，自己又多了份自豪的资本，可以到媒体上吹嘘一下，以满足自己那可怜的虚荣心。但稍微有点文化修养的外国人来到东方，似乎对这儿英文的普及不感兴趣，更多地是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探究。

在新加坡繁华的乌节路上有一家希尔顿酒店。在酒店正门两侧各立了两个塑像：一个是唐朝开国大将秦叔宝，另一是尉迟敬德某日，一群美国游客面对这两尊塑像倍感好奇而不知所以。他们在问一个过路的中国人，得到“对不起，我不知道”的答覆后，刚好路过的笔者热情走上前去，向他们介绍了这两尊塑像背后的历史传说。最后问他们：“华人新年时，去过美国的唐人街吗？”“是的。”“是否注意过华人门上贴的画和门两边的文字？华人的这一新年习俗就来自于这一典故。”“是吗？太棒了。”

从他们那愉快的神情中，能体会到那句话：“民族的，才是最美的"。这是他们在新加坡旅游期间，最难忘的文化之旅，他们对华人新年的有趣习俗居然在这里找到了出处。他们一定为希尔顿饭店的这一设计喝彩。如果哪天他们搞一副“哼哈二将”或“关羽张飞”的门神画贴在自家门上，将不会令人意外。当然，中国自己的旅店绝对不可能在自己的酒店门前搞出这样的噱头，他们宁可弄一个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后现代雕塑或裸女放在门前。后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问过几个本科学历以上的中国朋友，很遗憾，除一人外，全部不知这一典故，而他们对美国某个城市的四季气候变化，或某个牌子的洋酒却能知之甚详。在他们对中国的节日习俗一无所知的时候，却对“洋节”抱有持续的热情。中国人的心态问题，可见一般。这些美国白人应多为基督徒，从他们比着在塑像前留影，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中国基督徒对中国神鬼传说的那份敏感，在文化和信仰的区分上，他们似乎比中国基督徒成熟得多。

笔者有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从大陆出来的人比海外华人，更多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虚无意识，同时又伴随着傲慢和自负（这种关联是必然的）。当他们试图为自己的祖国辩护的时候，又不小心披上沙文主义的袈裟。这些可能与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和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有关。真是不敢想象，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成为第一强国，肤浅而傲慢的同胞是否会比今日目空一切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更令世人讨厌。就像日本人因为自己能造最好的电器就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样；一个不了解

自己的民族，就无思想的深度，也必然导致自卑或狂妄的极端。

正因为这种虚无意识的潜移默化，使得当今中国的任何难题，都喜欢去国外寻找答案；而自己的精彩成分则无人过问。如，经济学、投资界政治学上被广泛滥用的“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酥对门徒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这里的宗教色彩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借用也不太准确。但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经济学上的这一理论，有比《圣经新约》更浅显明白的哲学论述，而且不涉任何宗教内容。在《道德经》中有句尽人皆知的话：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它更准确地反映了经济学上的这一原理，点明了单靠市场经济的“人之道”（人们追求个人欲望的自然本性），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将会日益加剧，只有靠行政力量“替天行道”，才能缩小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差距。但中国的学者对这样的精确描述不予理睬。

必须强调的是，笔者无意反对向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更不会花精力浪费在“体用之辩”得但只有我们首先了解了自己的家底，才能更好地把握我们缺少什么，或国外的何种文明成果需要引进。到时才不会有遗珠之憾。如果我们置自己的财富于不顾，带着一个空白的大脑面向世界，其它文明的成果被吸收的同时，也会一起吸收别人的槽粕，甚至将别人厕所里的一个臭石头，当成旧石器时代的
文物。

在前面第八章中谈论华人基督教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时也曾提及，华人基督徒有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国学功底的浅薄。

三、金字塔阴影下的文化自信

正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普遍性认识缺乏，在国门打开之后，民族虚无

意识和自卑心理的发酵，将是难免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去欧洲旅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出现，那就是对欧洲文明的叹服，和对中国自身文化的些许自卑。对于那些去过希腊和埃及的人，就更别提了。欧洲雄伟的教堂、多姿多彩的雕塑、精美的壁画，还有希腊的神殿、埃及金字塔等，无不令人赞叹。不少中国人叹息：咱们中国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历史悠久的宏伟建筑？中国建筑多为木结构，经不起岁月的考验，可为什么就没有欧洲和埃及的石料建筑，我们的祖先是否太偷懒了？这些中国人出于民族自尊，他们不好意思对中国文明史在世界上的位置产生怀疑，但内心的文化自信已大打折扣。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欧洲、埃及和中东的一些古老建筑，不难发现，它们大多与宗教有关，如埃及和希腊的神殿、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等；或者与王权和贵族阶级有关，如金字塔、罗马竞技场等。中国和欧洲历史进程、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差别，导致了这类建筑只可能在欧洲和中东出现，而不太可能在中国完成，即使在中国产生，像万里长城，也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

首先，历史发展进程的巨大差别。

埃及、希腊、中东、印度和欧洲，有过漫长而发达的奴隶社会，其封建社会相对短暂而且落后。而中国则奴隶社会较不发达，却有着世界上最辉煌和最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的道德文化又使得中国的奴隶社会与西方和埃及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差距巨大。这导致的不同结果是：欧洲王权和贵族阶级，在追求奢华和排场方面，能较从容地利用劳动力——奴隶，而无须为此承担太大道德、经济和政治的风险，他们在迫害奴隶后可以通过祷告换得上帝的宽恕。而在中国封建经济环境下，中国百姓早已摆脱蒙昧状态，朝廷不要说对百姓不顾死活地强制劳动，即使横征暴敛也会导致政权的彼灭。埃及建造金字塔和希腊建造巴特农神殿，在没有先进工具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成千上万奴隶的死亡；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中国的任何朝代，必然会激起民变。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两项工程一一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虽然为后

人留下了骄傲，但却导致秦、隋两朝的覆•灭，以及“暴君”的恶名 0

因此，中国没能修建太多的浩大工程，与中国社会制度的极大进步和高度文明密不可分。当然，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普及，也与此有关，毕竟其需要的工作代比石料建筑小得多。尤其是中国的都城远离优质石材供应地，给石材的采运带来更繁重的劳动。故宫干清宫后门台阶上的那个巨大石雕，采自河北；为运到北京，不得不开挖一条河道，利用冬天的河道结冰运来，朝廷也肯定费了不少的银两；可要搬运金字塔和希腊神殿上的巨大石块，要消耗多大的民力？如果需要为此支付饷银的话，他们还能建得起吗？

其次，在文化发展进程和内涵上的巨大不同。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幷不是在孔子的时代突然形成的，而是贯穿于之前的整个信史和传说时代，从炎黄二帝、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等等，中国人文传说所包括的仁义道德思想，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对后来当政者和奴隶主阶级带

来道德的规范和影响。这决定了，中国的奴隶社会要比其它文明的奴隶社会阶段少了一份血腥和残暴，多了一分人道色彩。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建立在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研究基础上的。所以，要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观点划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水岭，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的奴隶社会（春秋时代及以前）实际上拥有明显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特征。所以，奴隶社会的暴君代表人物商纣王，让历史唾骂几千年；但如果和埃及为自己建造金字塔的法老比起来，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多杀几个宫女，又算得了什么呢？但基督教抚育下的欧洲人对有恩于他们的上亿印第安人进行了彻底大屠杀一直到 1930 年代,美国的基督徒们还会饶有兴趣地观赏一个黑人男孩被吊起来烧死，他们的耶和华神此时肯定睡着了（据我观察，耶和华神多数时候是睡觉的）；但我们祖先给中华民族植入的仁慈基因千百年来则从来没有睡着过。

另外，中外历史上宗教力量的不同影响。

中国历史上,在佛教传入前,就没有过一个带来普世影响的宗教体系。所谓信仰不过是筑个台子拜拜天、祭祭地、祈祈雨。而中国统治阶级也从来保持世俗政权的性质，即使皇帝也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人民。这样，也就不可能利用信仰的力量来恐吓、组织和发动人民给予无私奉献。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了解信仰的力",并有效发动之的中央政权。相对来说，从埃及的神庙、希腊的神殿，到欧洲、土耳其的教堂及清真寺等，都说明了宗教的巨大力量。尤其是西方和中东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宗教王权的性质,为利用宗教和奴隶制度的双重便利,提供了条件。今日欧洲最著名的教堂，大多是在文艺复兴及以前建造的。

佛教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国教，且是相对温和慈悲的宗教，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仍为中国留下了辉煌的石雕艺术、绘画、寺院及文化典籍。西方残酷且疯狂的宗教历史留下雄伟的宗教建筑和艺术成果，就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在没有辉煌的建筑作为历史见证的情况下，中国的文明程度，或者说中国人民的智慧发展，是否就没有了充分证明了呢？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说过，中国除了“四大发明”，还有第五大发明，那就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上，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当然，和汉字＞《易经》及经络学比起来，那“四大发明”就不算什么了。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内容日益丰富的同时，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使得今日的中国中学生可轻而易举地读怵两千年前的《论语》和一千多年前的唐诗，而英国的优秀大学生只能读懂五百年前英文作品的 30%o 汉字的特点，也为中国的文人们发挥他们的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拼音文字的文学作品不可能达到像《金瓶梅》和《红楼梦》那样出神入化的精妙，带给读者无穷的文学享受，中国文字的特点令文学天才们可以借音、借意、借型来达至神妙的境界，这是拼音文字所无法实现的。今天，随着信息和知识爆炸，面对那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词汇，汉语的优势更加明显。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中文在传输和存储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如果将一部小说分别存成英文和中文版本，那么中文版本所占字节数，只有英文版的十分之一。

经络学是中医学的核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出现于公元前 5 至 3 世纪的《黄帝内经》，相传是黄帝和臣子讨论医学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经络的发现肯定要远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经络的发现本身是不可思议的。按照对经络的描述，它遍布人体，具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之能。如此说来，当今西医研究的目标离此还远着呢。但长期以来，虽然给炎黄子孙的保健瞥疗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西医的发展，尤其看到西医院里的先进侪疗仪器，人们对经络是否真的存在产生怀疑，西方人更长期视经络为无稽之谈。直到中国科

学院院士祝总験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用电学和声学的现代科学方法，终于证明了经络的存在，以及强导电、导声的特点。测试的结果和古代经络图完全吻合。

主要表皮层经络线只有一毫米宽，用解剖的方法难以剥得出来，用显微镜难以看到，但它确实存在。那么，我们的祖先在科技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是怎么精确地发现它，幷认识到它的功用的呢？人们常称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有太多不可思议，但幷非不可想象；但经络的发现过程，已远远超出当今人们的想象力。

1998 年在笔者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小腹部又出现经常性的疼痛，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而新加坡的医生们只会给些止痛药，无论怎么样提醒他们止痛药不能根除病因，他们还是照旧；如果这也叫医学的话，医学院早该关门了。靠人不如靠己；从此花五个晚上，一头钻进中医学的著作里，最后找到靠穴位按摩治疗的方法，集中在胃经和大肠经诸穴位，兼用丹田深呼吸，只用三天即腹痛全消。读这点中医书极大地提高了“治病救人”的自信。后来在美国硅谷出差期间，曾跑助一位拥有护理学学士学位的白人美女治好了脚部突发的疼痛，幷因此赚得一个慷慨的拥抱。当她好奇地问治疗的原理时，笔者自信地告诉她“这是中医的方法”，令她大感惊奇。至于到底靠什么中医学原理把她治好的，凭笔者的那点中医学知识当然不可能知道。

很痛心，中国灿烂文化当中有那么多精彩的内容，但中国教育部门对此置之不理。在中学有《生理卫生》课，讲述人体的结构，但中医的知识一点不提，甚至连经络都被忽略。中国古代读书人大都读过《黄帝内经》，对医理略通一二。要学会西医治病救人，至少要几年的学习，如果针对性地学点中医，只需几天就可应用。科学的发展，不是使科学更复杂，人们更远离科学，而是更简单，使人们能普遍地掌握科学的手段。如果说人类在电子科学领域，从模拟时代发展到数码时代，使得非电子专业毕业的人稍加学习即可设计数字电路和计算机，说明了数字技术更好地逼近对自然规律本质的认识；那么经络学则直指人体生理的核心，它避开了现代西医

学大蜡复杂的内在机理研究。可以预期，西医学走漫长的一圈后，最终将会在经络学的研究上落脚，打开生命体系的真正核兀、经络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不仅人体，就连树木等植物和动物也有明显的经络存在。

《易经》对宇宙的阴阳二元描述，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之为唯心的、非科学的。直到数码时代来临，人们才认识到，不论自然界的何种现象，如天气、地震、声音、图像等，均可用 0 和 1 来描述，甚至控制，这才有了数码音乐、数码影视、自动控制等。在计算机技术中，。和 I 幷不是简单的数量词，而是电子技术中“开”和“关”两种状态的描述符号，这实际上就是“阴”和“阳”在电子物理上的表现。如果将“阴”用 0 表示，“阳”用 1 代替，则八卦就成了数字电子技术中用二进制数表示的从 o 到 7 八进制数。而六十四卦则成了从 00 至 77 的八进制描述，其运行本质都是二进制运算，即 0 和 1,或阴和阳。《易经》的哲学价值远远被低估了。从哲学对普遍规律的概括性和对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指导性角度来看，包括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在内的西方任何哲学体系，也无法和《易经》相提幷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行政和长城建造的大规模管理方面，还是在科学发现的智慧表现方面，或最高哲学原理的形成方面，都丝毫不逊于世界任何文明。当埃及人强迫数十万奴隶建造金字塔时，希腊人被迫建造巴特农神殿时，中国人的祖先则在探讨人体的奥妙、仁义的精神和宇宙变化的规律。

建筑不过是人类文明的表象成果，而人类文明的核心则是对自然、自身以及宇宙变化的认识和利用。动物尚且会垒窝、挖穴、搭巢，何况拥有灵巧双手的人类？但动物任何时候不能完成简单的哲学发现，或认识自己身体的生命原理。

顺便说句题外话：华人基督徒们普遍对犹太人有份特别的推崇，因为以旧约，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可关乎身揽健康的经络学和宇宙奥秘的《易经》，上帝咋就忘记给犹太人了呢？仁慈与宽容，比金钱更能获得上帝的恩典。

当然，笔者幷非贬低其它文明，西方文明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但这远不足以令中国人自卑。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只有认识自己才懂得去理智地欣赏别人。而不至于看到别人的光辉，立即感觉自己的灰暗。

笔者曾听到不少从巴黎回来的人大赞梵尔赛宫的后花园。在笔者去之前，颇有一份强烈的好奇：能让以园林艺术自豪的中国人称赞的花园，一定不同凡响。甚至顾不上去欣赏梵尔赛宫的内部奢华，直奔后花园而来。很遗憾，这个占地巨大的花园，居然没有任何足以令笔者称赞的地方，尤其是在去了欧洲其它花园之后。这儿除了欧洲花园都有的喷水池、两侧的几座雕像外，中国园林建设最忌讳的设计这儿全有了。这儿的树木全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花园从头一望到底；那个正中心方方正正的池塘，怎么看都像个巨大的游泳池。而欧洲园林的花坛更是一律将各种花卉平摊在地上，象是个穆斯林编织的地毯。这个著名的花园还有面积巨大的树林，但除了面积，看不出任何的精妙。如果是中国园林，一定会在这个树林里铺有鹅卵石的弯曲小径上，突然冒出个堆满乱石的荷塘，或靠在假山下的小亭，甚至还有路易十四或拿破伦的手迹，再取个“什么亭”之类的雅号。

固然，东西文化的不同，可能使笔者无法欣赏这一名园的妙处。但人类的基本情趣，如对香、甜的喜好和对臭的反感，整齐的单调和曲线的动感，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像梵尔赛宫后花园这样的地方，实在想象不出，到底谁会长期在此游园而不感到单调。但笔者在清华读书期间无数次去圆明园遗迹跑步，穿越于小山、湖泊、小桥和树林之间，每次都会有愉悦的感觉。这种感觉应该与种族无关。但对这种感觉的发现和如何满足这种感觉的需要，则因文明的发展轨迹和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西方贵族会建一座巨大的城堡，中国的豪门则会修一座精巧的园林。西

方人会把树剪成病态的整齐，中国人则会花更多工夫把树搞成病态的弯曲。西方人喜欢修草坪，以便视野开阔，而中国人则喜欢使用“障眼法”，避免一览无余；要么曲径通幽，要么九曲回桥，再来个别有洞天。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也向国外学会了修草坪，但因不让践踏而成了奢侈的摆设。至于不分青红皂白修草坪而不是多植树，凭借的是什么审美情趣，只有鬼知道。

即使像余秋雨这样见多识广的学者，在对外域文明的欣赏上，也会不小心踩着自己的脚。余秋雨的文笔和敏锐眼光是笔者所喜欢的，但他在美文《扼守秋天〉"功一文中，对英国贵族阶级所表露出的那份“仰视”，似乎表示，他也会不经意间迷失一下自我。1621 年英国的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症的解剖》(AnatomyOfMelancholy)一书在英国出版，被贵族阶级骂得狗血淋头。书中对中国科举取仕的制度大为推崇，写到：“这是一套完整的选拔人才制度，我主张英国借鉴中国的先进经验。这个主张如果被接受，这些贵族就要喝西北风了。……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凭自己的德才升上来的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显贵，也就是被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人”[23]辛勤耕作的农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顶风冒雪站岗的战士，行色匆匆的工商界人士……，这些人显然没工夫像贵族那样去矫饰自己的语言、服装和步伐，他们身上的特殊气质虽然没有贵族般庄重，但更突出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而那些只可做花瓶的贵族对于中国社会，既不能代表最高的价值理想，也不能成为时代的标签，只能是些无聊的摆设，中国根本不需要他们。在英国贵族当中，虽然也间或冒出个“滑铁卢英雄”，在历史上更多地扮演了不劳而获和享

乐主义的奢靡角色。而中国“贵族”即使要把国学好好研究一下，以便使自己像个有高尚教养的中国贵族也不容易，因为，面对那么多有文化的“贱民”，他们要读更多中国浩瀚的文化典籍才行，而这会使一个人早生华发，面容憔悴，并与贵族的外观形象根本对立。因此，中国最近几年出了一些想作贵族的人，把子女送往国外的贵族学校（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父母，据可靠消息，某高层人士的小孙子甚至被送到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希望他学成后最好别回来，如果让他来治国，会比一不识字的农民还糟，因为他不了解中国，且又故弄高贵），或经常炫耀一下自己的外语能力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了解和欣赏能力；很显然，这比学习中华文化容易的多。几天时间可以学会打高尔夫球，但这点时间连读懂《红楼梦》和《金瓶梅》的故事情节都不够。在中国作个地道贵族还真不容易。

身上的泥土要比燕尾服和文明杖更令人感到塌实和可靠，也更能体现出文明的活力。相信余秋雨教授不会为中国无法“盗版”贵族而感缺憾。英国贵族是历史的“阑尾”，如果不“发炎”的话，留之无碍；但对“阑尾”进行欣赏，则是滑稽的。如果某个英国贵族可敬、可爱，绝对不是因为他是贵族。《忧郁症的解刨》开了余秋雨一个玩笑，使得《扼守秋天》和他的《十万进士》卩气怎么看都象是一对矛盾。

当然，中国人在欣赏外域文明的时候，并非都是盲目的夸赞，更多地是基于不同而好奇，出于好奇而欣赏，这无疑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任何人都难于避免这种情趣，除非是天生的自恋狂和吹毛求疵癖。但必须搞清楚自己是在欣赏差别，还是在不加思考和对比地向往差别，甚至诱发对自己本身文化的排斥和自卑。笔者坚决反对像民国时期还留着大辫子的爱丁堡大学硕士辜鸿铭老先生对中国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辩护，但对全盘西化论者和中华文化虚无意识更嗤之以鼻。友人曾给笔者介绍一位法国留学归来的美女，令笔者冲动不已；但第一次的交谈中她对法国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向往和倾慕，这没什么不对，但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嘲笑，彻底冷却了笔者的热心。她没有去了解一下法国人对“宁可食无肉，不可院无竹”的审美情趣是否体

会。看来，一杯清茶、几本杂书、一杯薄酒，再来一盘烧牛肉，更合在下的胃口。烛光红酒无过，偶尔为之，固然别有情趣，但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

面对那么多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观，对于少有机会出国，或少有机会认识一下自己的中国人来说，精神的“出轨”幷不令人感到意外，就连一些敏锐的学者也难例外。关键是，您是否还能重新找回自己？当中国人丢弃了自己的标签，或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自卑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球上，我们必将迷失自我，甚至是在自我埋葬；对“我是谁？”这样的简单问题，将难以找到答案。

哈佛的杜维明教授对中国人有个有趣的层次划分：•、自然生命的中国人；二、社会习俗的中国人；三、文化意识的中国人。只要有中国血统的人，都符合第一类；懂得欣赏和加入中国民俗文化的人，则符合第二类中国人；但是只有经过自觉的反省而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价值内化的才有资格达到第三类的境界卩句。海外“香蕉”华人当属第一类，大部分海外华人属第二类。那么生活在中华文化发源地和大本营的中国大陆人，又能列入第几类呢？很痛心，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缺乏对民俗文化的欣赏和加入，只能进入到第一至一点五的层次上，这未免有点令人寒心。

RICHARDLYNN 在他的《优生学再评价》一书中说：“在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 13 亿保守智慧的人民”。中国几千年沉积的优秀文化精髓铸造了智慧、勤劳、节俭、谦虚、保守的性观念以及对家庭的忠实等一系列中华民族的优秀质量。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些而在开放中引进西方文明的糟粕，我们将是真正的失败者。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挨打，幷非由于我们文化内核的

缺陷，而是长期中央王国地位带来的政治惰性所使然。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势是我们重新站在世界前列的根本保证。那些对西化、个人主义和性解放的鼓吹，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的新鸦片麻醉，如不予以制止，将从根本上断送中华民族的前途。看一下日本年轻一代在过去几十年对西方的全方位吸收所带来的变化就明白了。

有了对中华文化的信心，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时才不会茫然，才能真正做到虚怀若谷.谦虚从来都是以自信为基础的,而自卑只能导致轻狂。盛唐的出现，离不开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的智慧和信心，正是这种信心的存在，使得唐朝在接纳八方来客，吸收异域文明方面，比任何朝代都宽容和积极。1840 年后，中国人遭受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之大，为前所未有。经过志士仁人的辛苦探索，民族求存的百年挣扎，我们总算走上了独立和复兴的道路。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文明古国面对巨大外来冲击而消亡，然而，中国再次跨过了民族发展史上最艰困的这段岁月，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硕果仅存的古老文明再次成功经历考验。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固然，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在过去的百年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和羞辱，但是，考察人类的发展史和中华文明的自身历史，今日的中国人没理由继续抱有一份悲情或妄自菲薄，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适应力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满怀信心，笑傲江湖。

面对新世纪的开端，中国人在物质的建设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信过。面对西方世界在过去千年的悲歌和新时代的困惑，久经历练的中华文明将为人类的新时代提供释疑解惑的文化套餐。把中华文明撒播于世界，成为人类新纪元的主要精神养份，是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传播中华文化的福音，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熔铸中华文明的强大精神。

附录二美国经济学家对毛泽东及”文革”的看法

作者：梅森

本书作者董玉振按：笔者在海外生活期间得以感受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成果，有直接的机会了解其它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历和今日的尴尬结果，心中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没有拌稀泥似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怎样呢？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对食污已习以为常，社会的利益集团关系错综复杂，国家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调控能力虚弱等，贫民窟和富有阶层同时存在，宗教和传统文化习俗对社会的进步有强烈的抗拒。中国虽然政治上保守，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普遍的感觉是：中国是个有充分自由和心态开放的社会，甚至超越日本。执政廉在反贪上始终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压力，对进步文化的接受抗拒较少，国家在发动民众力量应付各种危机时得心应手，等。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中国优秀文化的作用，但毛泽东的革命和政治运动是否发挥了作用了呢？如果改革开放提前十几年开始，即在“文革”前启动后来改革的政策,结果真的会象今天这样成功吗?笔者在百思而难理清头绪之际，却在网络上发现了这篇文章，某些方面的思路非常新鲜，部分回答了笔者的疑问。附在此，以供参考。

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大程度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

功过的判断得启发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学思考是这样的：去年经济史学

家 DoglasNorth（1993 年诺贝尔奖得主）来我在的学校作了一次演讲。他把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史和美国十九世纪经济史扯到了一起，得出了和自文艺复兴以来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见解。North 的演讲启发我写了一篇关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由于文章结论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观点相背，且又缺乏实证资料的支持，我一直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题”而公开我的想法。从经济史的角度，文章对“文化大革命”关于经济制度转换和社会结构功能的演变是这样切入的（从历史文化的评价另当别论）：

1）中国“文革”前出现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将会减缓或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类似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很可能象巴西和印尼一樣，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网织的社会势力鲸吞很大一块，阻碍或打断发展的过程（董玉振按：看一下自价格双轨制以来，中国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勾结获得特别利益，国企改革时一些人借机鲸吞国有资产，就该明白该论述的正确性）。极端情况下，中国将会象印度一样，演化的上层势力通过制度沿习完全拥有发展民族工业的珍贵农业剩余，造成社会中穷的极穷，富的极富。永远陷入三流国家而无法发展的陷阱。

中国的实绩是，土改和统购统销一方面为中国从制度上汇聚了稳定的农业剩余。另一方面，“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打掉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层的可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力和经济新贵在制度上合法结合的土壤（董玉振按：“文革”前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中国部分中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的特权行为有所抬头）。农业剩余有了，鲸吞农业剩余的现代化绊脚石式的社会势力不在。这就是中国今天成为继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上亿人口国家在二十多年长时间经济腾飞的秘密。

2）中国“文革”后在九十年代出现了官僚和经济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但由于经济起飞的基础工业体系已经建成（董玉振按：参见本书第一章的论述），社会承受这种破坏现代化过程的能力加临“文革”结束后，工业体系基本建成。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八十年代后期，经济新贵和官僚权力在社会转型期结合起来，借制度漏洞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财富（董玉振按：中国的新贵阶层有多少是完全的合法经营，依法交税？）。这种势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扩大之势。但是，由于农业在工业的支持下，为全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城市发展也使绝大多数市民生活获得改进。鲸吞新增社会财富的势力在社会中引起动荡，但没有大到足以抑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表明：工业化后出现鲸吞新增社会财富集团时，发展过程已走出童年期，免疫能力相较前一期要强。

3）九十年代新贵势力剧增，特别是军队经商、警察违法、海关走私和基层中层干部大面积结合贪污，威胁中国存亡的时候，中国平民阶层在 1950-1980 三个十年的长足发展中已占社会的主流，累积了能够打倒这批新贵的社会综合力量。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等制止军队经商等就是平民老百姓和中央地方正面力量占优势地位的明证。如果中国没有“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全社会趋向平民化的过程，九十年代的反贪很可能是印尼的样子。同样，巴西和印尼比中国大陆经济早起飞二十年，他们的军队、警察和地方新贵勾结起来，盘根错节，普通老百姓和中央的一批改革派几乎无能力实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两国不仅经济结构缺胳膊少腿，而且再行发展的经济动力也不够。

这说明，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经是个平民阶层主导

社会发展的格局。这是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虽然她和西方现代化国家政体的表面构造不一样。印尼、印度和巴西是传统落后国家的政体，虽然她们在表面构造上和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体相同。中国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的洪炉，化掉了社会中的传统筋骨，使其在构造成份上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比例（董玉振按：形象比喻，见地之论）。

“文化大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 3%（董玉振按：此数据是在西方国家很流行的“文革”受害人数，既 2、3 千万之多。实际数据分析请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董玉振按：西方学者在看待毛泽东时代时，并不拘泥于人权、民主等局部，他们在接受被夸大的毛泽东时期政治运动受害人数的情况下，却能从更宏观视角看待毛泽东时代的全方位贡献和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相反，中国学者则拘泥于少数受害者的不幸，进而忽略那些对整个国家更具根本性的贡献。）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今天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制度设计人，而不仅仅是开国元勋。（摘自：



1968 年，意大利米兰群众走上街头支持毛泽东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标语上写着’‘毛泽东的马列主义哲

www.cmilitary.com,2001 年 7 月 16 日。没查到正式出版物来源，但部分代表笔者观点）

附录三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

作者：何炳棣

本书作者董玉振按：该文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旅美教授何炳棣根据“文革”期间在大陆的所见所闻，加上自己的学术分析而完成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位在美国长期生活，受教育于民国时期的学者来说，共产党要对其在考察大陆前进行洗脑是困难的。根据笔者对其中部分数据的考察，没有发现明显错误或有意夸大的成分。该文资料和结论具有相当高的信服力，故附录在此。该文原载《七 O 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号。

谈了这篇文章，笔者不禁感叹：中国大陆那么多的社会学家，且曾经历过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拿不出这样具有学术价值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论文？这篇文章对大陆的观察细致和深入，一些大陆人忽视的社会变化，却没有逃脱该文作者的眼睛。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

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它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

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

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丘，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洁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幷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

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幷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幷非真正民主，幷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一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石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象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谐。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止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林祖亚当斯密(Adam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 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遗沁(JeremyBentham,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一一“最大多数的最大幸

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一一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

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SocialStratification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一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僞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着《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困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它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它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

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它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劃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

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 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 止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它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削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幷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

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它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 73-49 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 48?33 年）、成（公元前 32-7 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

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它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 r 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 2 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幷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幷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幷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

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廾。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败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

把思想教育叫作选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

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止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仃陇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幷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得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一一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一一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悖之战败晋复箭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幷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庄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传统中国最健全的尚武时代是战国。列国之间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生存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各国不得不解放农奴为自耕农，实行普遍的征兵制。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人民尤其肯当兵，为国家尽责，藉农、战以求仕进。秦汉一统之局既定之后，征兵的原则仍然存在，可是有资产的人们已经不必亲身服军役，可以出钱雇人代替。西汉有

战争时，已一再发遣“亡人'’（流民）、“赘婿"、“贾人”、“死囚"、’‘恶少年”和投附的外族人从军。但西汉继战国秦皇之余烈，幷幸而西北沿边诸郡一向尚武的“良家子”之中，产生不少像李广等的将才，所以还能以军事和外交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幷在西域（即今新那和俄属中亚之一部）建立了一大帝国。

东汉光武帝废内地郡国兵，又废了更戍（征兵）制以后，兵的品质，每况愈下。班超（公元 31-101）在西域的丰功伟业，全凭他过人的胆识机智和以夷制夷的策略。东汉时期，汉族的人一般都已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大多仰仗内附的外族，早已种下五胡乱华的根苗。不仅如此，地方政权和豪族的兴起也就是部曲私兵的开端，这一现象，往魏、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西魏、北周到盛唐百余年间，半征兵式的府兵制度虽曾发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在沉重赋役担负和将弁剥削之下，府兵制内的士兵，至晚从武后时起，已经大批逃亡。使得玄宗不得不废府兵而采取募兵制。杜甫的“新丰折臂翁”就是府兵末期士兵生活悲惨力求避役的写实。

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各养私兵。唐末、五代、以至北宋，将领防止兵士逃亡，往往在兵士面上刺字，使士兵们毕生戴上社会贱民的烙印。明初卫所制度略仿府兵余意，寓兵于农。二百余万平民一被列入军籍，法律上子孙永无脱籍机会。自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起，清查军籍的法令虽多，兵士逃籍的也越来越多。中叶北疆海防吃紧，正规军严重缺额，几乎全不可用，明皇朝不得不靠各将领自行组织的多种“民兵”。此后兵骄将悍，弊端从生，清代八旗兵士，入关未两三世，已习于安逸，坐吃山空，靠皇室周济。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士类皆各地土著，以当兵为世业，自始即操练与应役不分，号衣之外，另有应差衣帽。至晚从乾隆末年起，绿营兵士的地位比近代的勤务兵还不如，无异将弁的僮仆。“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质量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

国民政府军队的质量，抗战以前稍有提高，抗战后期日趋低劣。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沦陷区返昆明，五月初过贵州，在盘县歇夜。山顶上只有一家小饭铺，内中只有两张圆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饭。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夹沙米饭之后，去抢盛第二碗时，被班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才勉强爬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士兵每人每日领生米二十二两半，何以晚饭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为军官层层扣柯中饱。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炼长串踉跄的活骷体一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竹。

两千年来，中国跛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浚，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它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鞸应辨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押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兴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产。解放军人数在三百万以下，请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现和高度政治觉醒的，很难入选。入选之后，当地整个的居住或工作单位认为是集体的光荣，往往举行鹿祝。这种弥遍全国地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考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

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己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邮地区

的少数兄弟民族。（比较起来，苏联何以不敢使乌克侧人组织民兵，台湾双十和元旦的军事检阅何以不敢发给兵士苡弹，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诚然，林彪事件发生之后，西方不少的“中国通”曾揣测今后解放军将领阴谋政变的可能性。这类揣测是极府浅而错误的。一，他们不了解制度上解放军自上到下与饿、政、群众层层地密切结合、相互制衡，将领中即使有阴谋家，阴谋也无法实现。二，解放军自始即破格遵守裼的控制，党对军的控制，今后只有更为周密。三，军政方而最基本的安定力贤是每个现任和退伍军人的高度政治觉醒。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使得每个军人都公忠体国，能辩是非。最高领导，自解放军草创伊始之际，即深刻了解历代军政的积弊，因此有关的组织与教育，无一不为了根本防止军人的跋扈。解放军绝对不许有勤务兵，就是当初建军筹划极富远见的笪例之（柏反而又有趣的是美国至今日才发贵勤务兵是军制中稂 t 难改的主要弊端！）

综合古今，楚庄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小部分过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几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经矜、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岛“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服强烈清泄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矜推开《阿 Q 正傅》对荞道朔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杜矜拈须称许了！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的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呵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网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艽性质

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黝武主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新中国建设所需技术物资虽远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对很多国际盟友都尽力予以经济和技术的援助。新中国是否真尊重新国际平等的原则，

是否是黩武的国家，现任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可汗(SultanMohammadKhan)先生的谈话，就是最好的答覆。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应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晚宴后讲巴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讲完讨论之中，好几位芝大同事反复探问美国援巴是否有秘密条件。我最后问他中国援巴的问题。可汗大使的答拟很长。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驻华大使，对中巴关系很熟悉。如以国家全国经济能力作分母，中国多年来给予巴国的经济援肋比例上远较美援为多。他继绍诚恳地说，巴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援巴始终毫无条件。他还记得曾经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 巴国应该怎樣处理中国的经济援助，周总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贵国自己的事，中国完全不过问。”我的美国同事和校外来宾，听了之后，为之动容，似乎还相当惭愧。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四、经济建设成就举要

近三年来。中外访华人士和团体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大体上对新中国的社会改革、福利措施、妇女保健、儿童教养、医药卫生等方面的进步，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展望，意见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节所论新

中国的成就，以经济方面为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闪为我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地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让我们先列举近年•系列经济的成就——二万万市亩以上的新耕地的开辟；各地区极广义的水利建设（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区破碎山谷地的改成梯田；内蒙等草原地区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业的较速发展；全国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规模的植林绿化运动；海河流域及其它地区盐碱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种糊食及草棉种籽的科学培育；粮食和工业作物抢地矛盾的逐渐解决；复种、问种系数的不断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农、林、牧、茶、丝、竹、药材、鲜干各果、各种“山货”的全盘综合利用和生产；真正科学农业的开端；两条腿走路政策之下，举国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种类、质地、供应的不断提高；新兴各稲人造纤维及塑料工业坚固基础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办万万千千轻工业企业向国家所缴的利润的笊人加速地增加；近两年来国家对矿冶设备工业异常巨额投资以为钢铁工业加速“起飞”的准备；煤、铁、钢、大型复杂机器、大小农业机械等工业的质量、种类与数吊的进步；特别是石油生产和各种石油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等等——基本上无一不靠全国各民族人力、物资——技术和精神的总动员。以上所举的各项进步，有些在辽远的边骝地带，新邮、青海和西藏都已开始出现广。

除了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的统计数字有些紊乱了以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统计数字都非常谨慎，很少发表全面性的数字。这给予海外关怀祖国的炎黄子孙很大不便。据我个人粗浅的揣测，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应在二万万六千万吨左右（不包括大豆和汕料作物）。如果这估计不太错误，中国无疑义地达到了食粮自给和各地合理的储榄备荒（八亿人，食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左右）。小麦和少量大豆的

入口，仅抵全国粮食总生产的百分之二，但同时中国还要输出大量的稻米供应和接济亚非的盟邦。我国薯类，尤以甜薯，产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饲料。除稻米外，我国他种粮食作物每亩产量仍远不及美国水平。所以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应时，才能发挥。农业的前景是决不悲观的。

最使我们欣慰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由事实证明确有积累建阔资金的能力。理论和事实上，煨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断地替阈家租累资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来，轻工业在比例上替国家积累的资金最快最多。主要原因是中、小型轻工业创建时所需成本较少，建厂需时较短，出货快，所出的货品多是人民日常必需的，所以在市场上无不畅销，利润多而且快。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自留用于再投资，扩充设备，甚至改变企业原来的性质与范围。中央大型轻工业企业也起同样的作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曾有概括性的报告：“由于生产发展，今年（一九七三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上缴国家的积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这笔资金用于建设，可以开发十几个大庆油田或建设七十座南京长江大桥。”仅就上海一市而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轻工业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润，等于同时期国家给上海轻工业企业投资的四十六倍。”从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国六大都市城乡若干工厂的访问视察的经验，我货得《人民日报》这种综述决不是夸张的，而是真确的。

我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D.GaleJohnson),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幷对苏联及束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惯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刺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质量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

東欧

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问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耑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盌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责笑话=英国剑桥人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溃孙夫人(Mrs.JoanRobinson),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刺的讨论与拟定。可见这类独立、深刻的经济分析和本文第一节中所讨论中国人民在基层中当家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我一九七一年 H 月下旬启程返美时，已开始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向上的螺旋运动。因为农业达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给轻工业所谣多种原料便会刺激轻工业的加速发展；轻工业就会加速替阈家积累资金；国家就可以大!投资在重 T 业的某些部门；重工业若干部门进一步发展之后，不但也积累资金，而且还能刺激轻工业和农业更高的发展。这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向上的螺旋运动。经过两年将半的考虑，我更相信我原来的想法大致不错。但是，这不是说农业和轻、重工业三大部门之间，每大部门本身之内的无数小部门，在同一时期发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门之内，三大部门之间，发展照例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较长时期看来，小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总趋势是随着螺旋继续向上转动的。

在重要经济部门之中，败上发展较慢的是钢铁工业。一九七二年产达二千三百万吨，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资本，部分是闬于此柿:重工业性质程序的复杂。中国煤藏之富，仅亚于美、苏，而且极火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干净煤”。近年证明煤藏绝不限于华北，华南西南都有。铁矿之大者在鞍山一带，首都西北、包头附近，大冶的矿藏远较数十年前

所估为多，而且是含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质矿。此外，甘肃、贵州、广東等处都有相当的铁矿藏，海南岛的是高质矿。一九五八年齐有报导，因航空测量，在江西新喻一带无意中发现七十亿吨的铁矿，在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发现了十五亿吨的大铁藏，氧化铁百分之五十以上。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矿尚待进一步证过，即使现知中国较大铁矿是低质矿石，藏至少已是几十亿吨。美国的铁，大多是“贫铁”矿，集中在大湖区最北的密沙比丘陵(MesabiRange),其总藏!约十五亿吨，但已使美国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钢铁产量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从矿源讲，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是很好的。

至于钢铁工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耍是制造程序不但复杂，而且各种钢的合金和最后的钢材都需耍特种技术和设备，因此整个钢铁工业需要很大的投资，中国资金积累的能力很强，但很多工业都祟要资金，投资就必须有缓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使得中国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不可。欲增钢产，首先必须投资在开矿的稲稲机器设备，不仅要增加铁矿石的生产，同时还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产量，煤必须炼成焦炭。低质铁矿又须先炼成较高的质钢石，冶成铁之后要再炼成钢块，最后才造成种种钢合金和多种专门钢材。–•九七二年开矿机器设备猛增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即反映政府对钢铁的政策是从根本入手，与日本近十五年来只重钢材制造迥然不同。从长期建设的观点看，中国的钢铁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汕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哈尔滨西北重要的大庆油田之外，《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我国是一个石汕资源丰富的国家。经历近十年的勘探，全国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发现了储藏丰富的汕气田，有些油气田已投入开发。我国海域的大陆架也有远大的前景”。同时，第一次正式报告继大庆之后第二个成功的胜利大油田。翻检美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国地图，这油田在山东境内，距黄河口不远的利津、蒲台、博兴一带。此外，《人民日报》首次报告：“另一个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紧张地进行勘探，一面加快开采。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已证明这里有很有利的含汕地区，汕田分布广，面积大，汕层厚，渗透性能好，油井产量高；原

油质也比较好。”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的《纽约时报》，根据西方曾经访问大港油区的人的报告，大港在天津之东，陆上海底都有油，但以沿海近陆处为多。此同条新闻里，有由日本外相传出的消息，年初周总理与他谈话中提到去年的原油产景是五千万吨（据我粗计，已相当一九七一年美国原油产喷的十分之一；美国至今是世界产油最多的国家，因为中东区所产虽多，但国家单位也多）。

西方对此消息，目前疑信参半。我个人在一九七一年秋从中国官方得悉渤海铐大油田的发现的消息。次年夏天，台籍和在台受教育的十位钓鱼台运动爱国青年学人访华两月，返美之后，也带回同样消息，并且国内某相当高级的官员告诉他们，根据初步估计，中国内陆和沿海已知的油藏，相当世界已知油藏的三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尚未勘探的黄海、柬海、南海以至国境最南端南沙群岛沿岸大陆架可能很富的汕藏。以上这些新闻，有的可以认为是有价值的启示，有的尚待进一步的证实。

从纯研究的立场，我曾向芝加哥大学充任美国某大石油公司总裁的一位校姐，请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绘制的世界和中国的氢碳盆地的地图。氢碳盆地是从地质观点最可能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反复细看之后，发现中国内陆及沿海的氢碳盆地的面积都较他洲他国同类盆地的面积大；其它最精细的地图，又发现中国全部沿海的大陆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内的地区，面积也较他洲他国为大。中国至今还没有大规校用最新技术勘探大陆架的汕藏，但照常理推测，我个人深信中国氢碳资源开发的前景是非常远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内，中国新油藏的发现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汕和天然气

前景的光明，对我国长期经济建设是极为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国国际贸易的新倾向很值得注意。中国报章期刊虽仍旧只公布与亚非盟邦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贸易，甚至不大提与西方各国的商务关系。美国报纸和刊物却偶有重要报道。美国《时代》杂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济栏中有一醒目的标题“柬西贸易的大跃进”，主要内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贸易额「II 七千万美元左右猛增十倍以上，超过八万万美元，这是美联邦政府商务部梦想不及的。美国对华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喷气式客机和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恺洛格(Kellogg)公司所签价值二万万美元、建造八个最新型的化肥厂。此外中国正在与美国数家大石油公司洽购最新探汕及深海打汕井的技术与设备，同年之内，中国还向英国订购大批开矿机器设备及其它工业品，向日本订购了几个肥料和热电厂，还向法国订建一完整的石汕化工厂。与英日、法三国的合同总值约达十万万美元之巨。《纽约时报》在一九七三年 H 月二十八日，对中美化肥商约报告较详。计刺中三四年内建成的八间化肥厂，每厂每日生产纯铋的容 4 是一千吨（一年 365,000 吨），此外还有价值九千万美元的合同，另建八个制造纯尿素的工厂，每厂每日的尿素生产容！卩: 是 1,620 吨（每年 581,330 吨）。以上诸厂建成投产之后，每年共可供给铋和尿素约八百万吨。（约折成纯氮四百五十万吨。）一般商业习惯，化肥必须渗入大细砂等物填装成袋，否则纯化肥要烧死农作物。中国一九七二年所产装袋的化肥大约超过二千万吨，折合纯铋约二百余万吨，此外还有较少！n:磷、钾化肥的生产。与美签约诸厂三四年后建成，中国化肥肥田的能力要增加两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粪和绿肥，每亩必会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农业对中国向上的经济螺旋，必会发生稂极的作用。近年国内特重矿冶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成就，决不可能不归功于“自力更生”和

“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这两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费悟，化剩余劳力为建国资本的集体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机，逼得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的群众不得不从反复实践之中解决工、农技术上极大部分的困难，使得今日的中国日益接近技术自给自足的地步。“两条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钢铁、化肥、水泥等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孳乳生长起来。这不但减轻了对原来几处大工业基地的要求，减少了国家运输部门的担负，减少了都市和乡村经济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经济日趋平衡和自给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实在是极富远见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确已建成了初步繁荣的社钤主义经济。

从晚近历史看，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吝吝啬（与苏联给予印度、古巴、中柬各国的援助对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蛮横狠毒，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但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似乎不妨开始考虑与先进国家建立一定原则和限度以内的经济科技合作。一九七三年份中国与美、英、法、日等国贸易的激增，是一可喜的现象。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加强，必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今日的中国是受举世尊敬的三个最大国家之•，有能力充分保障国家的权利，绝对不会再受二次大战前式的帝国书义的榨取剥削。中国如与西方先进国家商签较大规模的商约，条件无凝地是平等互惠的。唯一的问题是中国所提延期付款的办法能否满足国内各种重工业较长期的巨大入口需要。近代史上，工业化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在资源、资本、技术等方面完全依靠自己的。即以苏联而论，目前还极力设法吸引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以开发西伯利亚西部的汕藏。中国如肯与美国相机合作，大规校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以大增产的原油的一部分换取国内钢铁等重工业的加速建成投产，应该对中美两国都很有利。一定程度的中美经济合作，不但对“自力更生”有辅助的作用，而且在外交上还可以减少中国北顾之忧。

本节小结：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

速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斑况。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来的研究和屡度的调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今后中国人口每年的增长率如果能长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国的经济建国必可加速完成。

五、结论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籍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中国社会改革的种种成就，西方凡无政治偏见的人士都已承认。只是有些囿于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人，对新中国的经济前景，不无疑问。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如与人类史上最富盛的美国和近十余年西方盛称的日本的“经济的奇迹”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两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并开始批评以无限制的商品消费来刺激“繁荣”的种种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声疾呼，西方专重物质享受的人生观的不健全，应该恢复或追求比较健全的惯值观念。

治史者有时有他固执的地方，我虽在北美将近三十年，始终不为“经济的奇迹”等说所动。相反地，我总不忘以研究法国旧制度及十九世纪前半美国民主制度闻名的法国史家陶克斐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长期预言。他在百四五十年前已经感赀到将来在世界上鼎足而三的大国应该是美国、俄国和中国。那时美国人口还很少，国土大多没有开发，俄国虽大，尚很落

后，中国仍在传统文化和制度中昏睡。陶氏的预言决不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而是历史家对较远的将来的一种直觉。但他的直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国家强大虽靠很多自然和人为的因素的配合，自然条件确是基本因素之一。果然几经战争和革命，今日世界三个最主要的国家就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都是广土众民资源丰富的“大陆”型的国家。

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在本文第三节中，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a 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本文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 Q 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

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阈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集远的。我并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芝加哥



1958 年 6 月 28 日，毛主席在北京亲切接见 75 岁的新疆维吾尔族库尔班•吐鲁木老人家，后来又接见一次，对促进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历代统治阶级，谁会像毛泽东那样与底层劳动人民有自然而密切的关系。

附录四关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公开信

(1995 年 2 月 17 曰）

本书作者董玉振按：该公开信是由纽约华社发起，并刊登在当地的报

纸上。附上以作为本书内容的补充和支持。这封信的发起人和署名人中，大部分是来自台湾在美国工作的才俊。他们在反共反毛的教育环境下成长生活，却能超越意识形态之争，从整个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待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尤其在和一些大陆知识分子的对比中，更能让人有所省思。台湾人民经历了比大陆人民更复杂的心路历程，尤其是那些随蒋介石去台湾的人们，他们被逼离开熟悉的家乡而来到台湾这个小岛上，不得不面对 [22]之后岛内敏感的省籍对立情绪，家乡在毛泽东时期又遭遇了三年经济困难和“文革”，甚至在大陆的亲友也在政治运动中因为他们而受到牵连……；本来他们更有责骂毛泽東的理由，但他们却能超越个人、家庭甚至自己政党的得失，以更恢弘的气度看待大陆的历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相对来说，有几个大陆人能以这样的超然姿态超越个人所遭受的冲击？如果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能以这样开阔的胸怀相向，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将不再是遥远的梦。今日两岸的那点争执，和千万年积累下来的历史文化和生命情感的共同特质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注：部分（）内文字是董玉振所加，以解释原文中的英文。

去年秋天，曾经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同时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回忆录。英文版由美国的 **RandomHouse** 出版，书名 **he**

PrivateLifeOfChairmanMao(《毛泽东的私生活》）”。中文版由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出版，书名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的出版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重视，在出版前夕，NewYorkTimes
(《纽约时报》）头版报导，USNewsAndWorldRepor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刊出全书摘要。一些知名的学者也纷纷发表书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AndrewNathan(黎安友）更是积极参与这本书的出版并特别为它写了前言。

这是一本以丑化毛泽东和毛泽東领导的社会主义为主旨的书。李以毛的私人医生的名义，对毛的性生活描绘了一些所谓内总丑闻。用男女关系的问题，攻击政治上的对手本是常见的手法。80 年代初，中国出现了非毛的潮流，社会上关于毛的私生活议论很多，也起了一些短期的作用，但十年之后，毛

泽東又#了广大中国人民最尊敬的历史人物。很明显的，多数中国人民尊敬并不是因为他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那些力图丑化他的人，之所以至今还仇恨他，大约也不是基于他私生活方面的原因。

对历史人物性生活方面的人身攻嘈，一般而言没有反驳的必要。然而书中那些无中生有的“丑闻”竟成了美国媒体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记者的报道，或黎安友等学者的评论，都津津乐道地转述李所公布的独家秘闻；指控毛泽东是荒淫残酷的封建暴君，共产党行残害人民的暴政等等。读过此书，我们发现中英文本有一些微妙的出入，而可看出这本书对毛泽东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喂和污蔑，已经远远超过了表达个人意见正当的范围。此外，在主流传媒中为此书造势捧场的文字，特别是一些以“中国通”自居的学者和记者借题发挥的稀种谬论流传甚广，不仅丑化了毛的形象，也侮辱了广大中国人民。如黎安友的前言，便是一篇严重辱华的文字，通篇充斥着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流行的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八股偏见，充分暴露了文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轻蔑。对于这样的论调，应该有中国人迎面作出批驳。站

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中国面临一个历史的时刻。李和黎的言论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其中反映了一些所有关心民族尊严和前途的人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我们对这本书和其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的共同看法。

书中内容究竟有无根据？

李志绥医生对毛泽东的指控和攻击究竟真货性如何？这一点可以从李医生的行文和中英文的差异来判断。这本书以暴露毛私生活的丑闻为号召，但所谓揭发丑闻，往往只是在回忆所见所闻的中途插上一句对毛的性生活的骇人听闻的描述，而没有拿出可资左证的事责材料。

正是这些没有根据的描述，成了主流媒体热衷传播的所谓丑闻。举例而言：全文在很多地方一再提到毛泽东参加舞会，有很多年轻的文工团员和他共舞，这本是中国民众知道的事情。叙到这里，他总会提醒读者一个他所掌握的独家内幕，说这些年轻美丽的文工团员，很多与毛有性关系，有些“备感荣耀。引介亲姐妹，共沾雨露”，但是象这样骂人的独家内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都会向读者作具体的事实说明，因为事关毛的形象及女当事人的名誉，也涉及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感情。而李志绥医生却不交代：他究竟有什么根据？在众多传闻之中，他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是哪一部分？

李医生在行文之中，凡是他亲自见闻的与毛有关的，即便平凡无奇的小事，他都详细的记述，而且往往细得让人难以置信。此外书中还有揭发其它人男女关系的内藉，如李银桥、邓小平等，他都讲了细节，为什么全书的要害，最惊人的关于毛的性生活的内幕，他语焉不详，一笔带过？因为他没有掌握任何事实的根据。

中英文本对照暴露了其中的弄虚做假。

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出了中英文两个版本。仔细对照中文本和英文本，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玄机。首先石到的是中英文版本大体一致，但恰恰在所有最引人注意的有关毛泽东性生活，也就是全书要害的地方，中

英文本有重大的出入。且举几个例子。

在媒体中很引起兴趣的一个“丑闻”是毛患有性病，并传给他的女友。实际上原书不论中文本、英文本都不敢直接说毛曾患性病。英文本提到毛有性病的只有一处：“性生活如此之多，性病实际上是不可免的”（英文本 P.363),接下去就叙述毛染上了滴虫病而非任何性病传染给他不计其数的女友。在中文本里相应的地方（中文本第 349 页）却没有影射毛有性病的那一句话。中文本任何其它地方也都没有叙述或影射毛有性病的文字。

可是，黎安友的前言却偷天换日地说：“……性病在毛的女友中兹延”。对于这句话，中译本改成了“滴虫病在毛的女友中蔓延”。为甚么李志绥要改黎安友的前言，在中文本里把性病两个字删掉。道理很简单，滴虫病是由寄生虫引起，很容易通过衣物传染，而不是什么性病。

如果毛有性病，李志绥医生一定能说得出病名。李志绥不敢公然造假说毛泽东有性病，于是不惜擅改黎安友所撰前言。至于英文本前言中所谓毛有性病的丑间，完全是为了在英文媒体造势的需要捏造出来的。

书中说毛行道家采阴补阳的房中术，中文本是这么说的：“毛在 67 岁那时成为道家的饮践者，性的功用是延年益寿，而不单是享受"（中文本第 343 页）。英文本却在这一句之后，加了一句：“他最高兴和最满足的是和几个女人同时共睡一床，他鼓励他的床伴，介绍其它的女人来集体性交，说是可以健身益寿。”（英文本 P.358)，英文本中讲到集体性交的还有一处：“就在这文革高潮时，毛有时和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女人同眠”。然而就此一句，没有任何解说，怎么樣看到的，谁看到的，完全不提。中文本则全书从头到尾没有集体性交的说法，原因很明显：中国人一眼就会看出个中破绽。而李在 BBC 电视节目访问中是这样说的：中国的农民没有其它的娱乐，（性）是唯一的消造。姑不论中国农民究竟如何，这样的说法首先暴露了李志绥本人是如何的心态。

这是本什么样的书？

由中英文对照看，这是世界出版史上少见的书。英文版列出原著人是李志绥，英译者戴鸿超；中文版本的封而列出的原著人是李志绥，英译戴

鸿超，中译李志绥，然而没有说明哪一个文本是原著。如果原著是英文，为何要有英译本？如果原著是中文，为何又有中译本？何况中英文本之间有很多的出入。我们认为，这本书名为个人的回忆录，实际上可能并不如此单纯。英文本在前言中指出黎安友从头就参加了本书的出版，另外还有专人负责参考核对已出版的有关毛的著作，其中一个外国人参与了英文本的写作，另一个中国人参与了中英文的加工。在中文本的谢言里却不提这个内情，也忘了感谢那个中国人的贡献。从英文本与中文本不同之处可以想见，有人根据中文材料改动加工，上文举了几个所谓"丑闻”的例子，中文本没有，却硬编造出来塞在英文本里。除此之外，英文本（P314—315)有一条与毛的私生活无关的丑闻：邓小平在 59 年庐山矜议期间，让一位护士怀孕，后来强迫打胎，中文本把这一段也删掉了。

书中关于周恩来邓颖超的描述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内幕，但行文之间，对二人却尽是人身攻嘈的用词，骂周是毛的奴隶，对毛唯命是从，是奴性十足的忠犬，一付老门房的模样，周的夫人邓颖超极端自私自利，邀宠固位，是泥鳅样的人物。

听其言而知其人。

公开信署名者：

花俊雄，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巫正夫；李腾芳博士；谭南平；王中平，洛杉矶华夏政略研究会；李荣武；王津平，统一联盟秘书长；韩束平；龚忠武博士；黄嘉平；董叙霖博士；王春生，亚太妇女小组；叶先扬，加州大学教授；翁启元博士，华盛顿战略研究会；杨重光；王晓波，海峡评论社长，世界新闻大学教授；许建康；程君复，天普大学教授；黄哲操，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和；桑湘明；王丽清，亚美艺术基金会执行理事；徐守腾；张圣辉博士；杨高雄博士；景埃埃；王颜铸，霍华大学教授；居乃虔；林长杰；苏庆黎；赵环；董庆圆博士；陈映真，人间杂志发行人；张世雄，中华两岸文经贸促会秘书长；刘生余博士；林国炯博士；朱立创；毛铸伦，统一联盟主席，中兴大学教授；姜思章，统一联盟执委；林碧芬，统一联盟执委；梁电敏；林书扬，政治受难会创立会长；林丽峰，政治受难会现任会长；陈钦赐，统一联盟执委，中医学院教授；唐志远，教师人权促进会会长，统一联盟执委；廖天欣，远望杂志社长；张敏生，统一联盟经委会召集人；汪立峡，劳动党中常委，中枥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行博士；印铁林；潘家牛，亚美文化协会；关文亮；许登源；孙大成，纽约大学机械系教授；戴新生，中国科学院数研所研究员；雁湫博士；凌志；朱众惠；萧文鸾；阮建平；林梅芝；缪思丹；迟中博士；金宝瑜，密西根社区学院教授；顾维宽博士；沈颂祺博士；周本初博士；谢宗海博士（部份名单）。

參考文獻

作者按：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大量使用了筆者長期閱讀的記憶和筆記，很多內容已難于憶起詳細出處。有些內容雖記得來自哪本書，但出版社和出版日期難于確定。多數沒有記錄具體的頁碼。也有些內容來自網上的資料（只有本人判斷這些網上資料具有可信度，才予以采納），但不知作者姓名，甚至有些網址出處也沒能記錄下來。故此處參考文獻難于詳列，甚憾！**第二版修改時，新增加的參考文獻的大部分則直接在正文下以頁脚注明。**

1. 《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 年 11 月。
2. 《中國統計年鑒 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
3. 《鄧小平文選》1 至 3 卷。
4.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1999,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New York.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
6. 淩志軍，《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1989-1997），東方出版中心，1998 年。
7. 發展研究所綜合課題組，《改革面臨制度創新》，上海三聯書店，1988 年。
8. 王夢奎主編，《中國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前瞻》（1979-2020），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年。
9. 仲大軍，《中國社會內部的巨大衝突——戶籍分別》，黎鳴主編

24.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隨筆大系，《杜維明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 1 月。
25. 《毛澤東選集》1 至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6.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决議文件，摘自人民網 www.peopledaily.com.cn。
27. 何炳棣，《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原載《七〇年代》1974 年 3 月號。
28. 譚宇權，《梁漱溟學說評論》，臺灣文津出版社，1999 年 8 月。
29. 余秋雨，《行者無疆》，華藝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30. 余秋雨，《山居筆記》，文匯出版社，1998 年 9 月。
31. 徐焰，吳少京，《抗美援朝戰爭畫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7 月。
32. 雙石，《劍吼西風——1950～1953：中國軍隊出兵援朝》，http://twostones.yeah.net
33. 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34. Rius & Friends，《毛澤東思想淺介》，香港博益出版集團，2001 年 10 月。
35. 王邵軍，《聖者人生・梁漱溟》，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36. 三峽探索網 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gb/index.cfm
37.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年版。
3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年。
39. 《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册（1949-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0. 《世紀的輝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 年 8 月。

41. 中華文明網 http://www.encyna.com/phpnuke/html/

42.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 4 月。

43.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 年 2 月。

44. 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45. 孔慶普，《城：我與北京的八十年》，東方出版社，2016 年 5 月。

46.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47.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簡體全本），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6 年 4 月。

48.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 年 2 月。



後　記

當您讀完該書，您的感覺是什麼呢？是撥雲霧而見天日的驚喜，超出意料之外的驚訝，還是令您難以容忍的憤怒？筆者有信心地認爲，您很難說該書是老生常談。如果您感到憤怒，繼續堅持您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固有否定看法，這當然是您的自由，但如果能指出該書在立論、引證、推理分析上的明顯漏洞，筆者隨時準備洗耳恭聽。但當您在咒罵毛澤東的時候，如果不考慮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城市底層人民、爲國家出生入死的解放軍指戰員、受毛澤東感召下無私奉獻的前輩們的感受，那您未免太自私了。毛澤東的智慧如同大樹，我們這些後生們的閱歷和智慧也許像爬在樹上的螞蟻，使得我們無法輕易閱盡毛澤東智慧的完整光譜。較高的資質也曾讓筆者不知天高地厚地自負過，但在認識毛澤東的過程中才發現自己是何等渺小。你在農村生活過幾年？是否瞭解國營企業？對經濟、社會、歷史、工業發展規律、國際政治、社會保障、教育和學術、軍事、信仰和文化等你是否稍微用心地探討過？如果你對這些沒有興趣，或缺乏起碼的認識和閱歷，也就是說你根本不瞭解中國的國情，那麽，你也就根本不具備批判毛澤東的資格，你只能依靠一些帶傾向性的文章或歷史片段，去作出魯莽的評判，并必然得出片面的結論。

對那些由于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政策而受冤屈的人們，請相信，本書并不意味對您個人和家庭痛苦經歷的漠視。但如果您無法從自己的家庭悲情中解脫，要讓您接受該書的內容，顯然是强人所難。但如果該書能多少幫您對歷史釋懷，無疑是筆者的莫大榮幸。

該書寫作初期考慮的讀者群以來自大陸的讀者爲主，因此，其中的一些用語習慣和政治取向肯定有不少令來自臺灣讀者感到不適。書

中一些帶有挖苦、批判和諷刺的文字風格，也可能會令一些讀者不習慣。如果這本書能令臺灣讀者對毛澤東少一點反感，對大陸過去的歷史多一些認識，必將令筆者欣慰非常。

“中國女性站起來了！可以站得更優美”一節，是令筆者極爲矛盾的一段文字，甚至在是否應該保留這節內容方面也徘徊良久，畢竟，沒有哪個作者願意去得罪讀者，尤其是得罪我們可愛的女性們。如果女性讀者對此節感到不適，筆者只能深感遺憾。但因這一話題涉及到中國未來家庭生活的質量，而使得筆者不忍忽略。得罪中國女性的這些直率話，就讓筆者一人來承擔責任吧，這類出力不討好的探討必須得有人去做。它肯定不是最後真理，只希望能喚起中國女性對女權運動和自身定位的再思考。

在該書出版之時，中共中央第四代領導班子已經産生，新的領導班子也表現出不同以往的清新形象，其中的個別文字可能已沒有與時俱進，但出版時就不改了。歷史評價的公允與否，并非短期所能判別的。只希望在新一届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任滿之時，筆者能情不自禁地爲他們鼓掌。現在爲他們鼓掌還稍微早了些。希望他們身上能少一些中國公務員隊伍裏彌漫的俗氣和劣質政治文化，少一分懦弱和自私，多一分自知、膽略、遠見和責任心，爲歷史做好接續，爲後代做好鋪墊。只需要考慮一下：在個人智慧、學識、眼光、道德、能力和膽略方面，您比毛澤東若何？他尚且會犯嚴重的錯誤，您不拿出十二分的努力，百分之百對國家和事業的忠誠，清教徒式的無私，又怎能肩負得起人民的重托？毛澤東離開政治舞臺後，中國人民照樣生活，離開了您國家同樣運轉，除非您以巨大的貢獻和德能向人民表明：這個時代，舍我其誰？

但願本書的歷史評論，能成爲一面鏡子，促使新一代黨、政、軍領導人對自己的政治人生慎之、思之、鑒之。

2003 年 2 月

作者董玉振簡介：

1965 年生于山東曹縣孫老家鎮，工學博士（後），當代雜家，出版人，戰略諮詢專家。曾就讀于上海機械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1996 年南下南洋理工大學做博士後。之後加入半導體行業。2002 年底複建新加坡南洋出版社，以出版本書第一版和他主編的全球第一套雙版本合輯《金瓶梅》。2011 年跨行業加入城市規劃與諮詢行業，歷任新加坡某城市規劃顧問公司副總規劃師和副總裁、新加坡國有裕廊顧問有限公司副總裁等，以其跨越多個理工科、社科與人文领域的罕見獨特優勢，在該領域如魚得水，成爲戰略諮詢與產業研究方面的綜合性專家。

董玉振博士至少在八個領域有高學歷、專著、論文（包括頂級刊物專家稿）、項目實際操作經驗等。具體包括：

一、理工科領域涉足多個專業：在機械工程、電子與計算機控制系統設計、康復工程有學歷和實操經驗。擁有工學博士（後）學位。在工業界曾先後任職機械工程師、電子工程師、晶圓處理工藝和裝備工程師、集成電路製造裝備工程師等。



二、企業管理學：有專著《如何分析直銷公司》，是全球第一本解析直銷公司運作機理的著作，填補學術空白。是新加坡直銷史上唯一被公共機構邀請做公開直銷演講的學者，以協助民衆識別欺詐性傳銷。在直銷專業刊物《中國直銷》發表專家約稿《中國直銷公司兵敗新加坡探因》。

三、古典文學：古典文學名著《金瓶梅》研究已成顯學。關于《金瓶梅》版本關係的研究是學術方向之一。董玉振從“崇禎本”眉批中發現明確證據，證明“崇禎本”是《金瓶梅》 的祖本，挑戰了學界普遍認識。他主編出版了全球第一套雙版本合輯《金瓶梅》，對《金瓶梅》普及閱讀做出貢獻。他關于版本的研究成果首見于他爲此書第一版所寫的序（2003 年）。在第十二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崇禎本”眉批揭示其是<金瓶梅>祖本的事實》《對普及<金瓶梅>閱讀的體會與建

議》。在第十三屆研討會上發表《“崇禎本”評點者刻意杜撰第三十回眉批的可能性分析》《就崇禎本第四回一個眉批和對應正文內容的比較分析》（這兩篇在論文集被合幷成一篇）



四、珠算傳承：他修補注釋出版《曹縣董家祖傳·經典珠算術集萃》，成爲唯一有注釋的古代珠算書籍，對珠算文化傳承做出貢獻。有些古老打法如古代田畝計算口訣，他是當今極少數會打者。《珠算與珠心算》雜志刊發了董玉振所寫的該書介紹文章《家族百年傳薪 成就珠算經典傳奇》。

五、社會科學之新中國歷史研究 涉及多領域的專著《巨人的背影》和早期網絡文章《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1998 年），傳播甚廣。在該文出現後，中國學術界才開始大量出現正面看待毛澤東時代各方面貢獻的著作。該網文和書中的內容被國內學術界大量引用，催生了民間和學術界對毛澤東時代全方位的正面認識。網上流傳甚廣的《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建國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歷程》《巨人的背影——客觀認識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文革十年中國人在幹什麽？》《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等都是被讀者從該文或該書中的章節單獨成篇的文章。曾有網站稱董玉振的上述文章是開啓毛澤東時代再認識最早最全面和最具影響力的文章。

六、經濟學：本書中大量涉及經濟學領域的內容，包括上述單獨成篇的關于新中國建設成就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經濟學家廣泛引用。2015 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財經類雜志《財經》發表了董玉振所寫的專家稿《鋼鐵業病態布局之禍》。

七、臺灣問題研究：所寫臺灣系列文《臺灣是如何失去大陸的》被廣泛傳播。應臺灣朋友的邀請深度參與臺灣大選，所寫宣傳文甚至被洪秀柱支持者製作成宣傳貼，準確預測朱立倫換柱的陰謀。在《聯合早報》網頁版發表文章《台海：中華民族的天賜良機和對策（2004 年 3 月 8 日）》

八、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言論版頭條發表文章多篇，涵蓋財經、政治和新加坡城市規劃。



九、網絡熱點文章：過千萬閱讀人次的文章包括上述毛澤東有關的系列文、《福島核輻射陰影下中國人冒死游日本》（該文是對抗戰勝利 70 周年獻禮，阻斷了安倍經濟學導致的中國人日本游的升溫趨勢）、《畢福劍事件暴露國人價值混亂與失序》、《從曾蔭權判刑和梁錦松被迫辭職時內地人士反應看中國現代化的差距》等。

十、出版人：在盜版猖獗和海外中文書閱讀風氣日減情況下，他以情懷驅動，靠諮詢業收入補貼，爲南洋出版社設定了高品質出版物定位目標。出版了全球第一套希特勒著《我的奮鬥》全譯中文本，國家絲路基金贊助英文出版項目 China's Road，該社已成爲中文出版界主要的《金瓶梅》資料出版機構，除他主編的雙版本合輯排印本《金瓶梅》，該社即將推出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新刻金瓶梅詞話》（介休本）灰度影印本，是該書首次以盡可能接近原貌面世，在金學界引起轟動。加上董玉振所著《巨人的背影》《如何分析直銷公司》《曹縣董家祖傳·經典珠算術集萃》的影響力，南洋出版社已經成爲南洋一帶享有盛譽的綜合性出版機構。

十一、社会認可：董玉振以其在文化和出版等方面的貢獻，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與尊重，《聯合早報》、《南洋商報》都曾對他做進行報道。入選《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

十二、**戰略諮詢與城市規劃**：主導和參與了多個國家級高新區戰略定位與規劃、多個文旅園區策劃、生態城研究、高端産業新城戰略定位研究、物流業規劃（包括中新（重慶）互聯互通物流規劃項目）、多個一帶一路項目諮詢等，獲得客戶的一致好評。董玉振獨特的知識結構和研究能力，構成了他在戰略諮詢領域的獨到優勢，使得他能跨越這麽多細分領域，幷都能做出令客戶滿意的成果。現爲獨立諮詢師，從事城市與産業園區規劃與産業定位、商業地産策劃（如綜合體）、文旅項目策劃等，以及政治經濟綜合課題研究（比如：共青團新時代發展戰略研究策劃）。

戰略研究不是一門大學專業，戰略型人才是長期個人積累、思考、閱歷和素質的綜合，與學歷和工作背景無必然聯繫。不要指望到黃埔軍校和西點軍校去找毛澤東式的戰略家。戰略性人才可遇而不可求！董玉振博士是您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